

超越马哈迪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31033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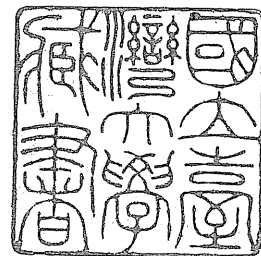
633244996

超越马哈迪

大马政治及其不平之鸣

邱武德 著

王国璋、孙和声、黄进发、陈文煌 合译



燧人民

3103307

作者简介

邱武德，出生于马来西亚檳城州乔治市，在当地成长至中学毕业；尔后留学美国罗彻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Rochester)、麻省理工学院 (MIT) 以及南澳弗林德斯大学 (The Flinders University)。他是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USM) 社会科学系的副教授，著有《马哈迪主义的吊诡：马哈迪·穆罕默德的知性传记》 (Paradoxes of Mahathirism: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Mahathir Mohamad)。

译者简介

- 王国璋，国立台湾大学政研所硕士，著有《马来西亚的族群政党政治，1955-1995》 (译第一、第二及第四章)
- 孙和声，文化评论人 (译第三及第七章)
- 黄进发，英国东塞塞思大学政府系博士生班研究生，著有《草昧十年》 (译第五章)
- 陈文煌，诗人 (译第六章)

论述丛书

超越马哈迪

邱武德 著

王国璋、孙和声、黄进发、陈文煌 合译

出版

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

Prometheus Enterprise Sdn. Bhd.

277 Jalan Desa Mesra, 58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邮: pe2@streamyx.com 电话: 012 310 3300 传真: 603-798 00310

编辑顾问

陈文煌

译文审阅

陈文煌、陈剑虹、黄水莲、唐南发、王宗麟

责任编辑、排版

燧人氏事业

封面设计

minimus design

承印

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Printed in Malaysia by Vinlin Press Sdn. Bhd.

56 Jalan Radin Anum Satu, 57000 Kuala Lumpur

定价

RM 36 零吉(马币)

© Khoo Boo Teik 2003

first published in 2003 by Zed Books Lt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Prometheus Enterprise Sdn. Bhd. 2004

中文版出版权属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

2004年4月初版

ISBN 983-2197-05-8

16.0 万字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目次

| | |
|---------------------------------|-----------|
| 表格一览表 | vii |
| 简称与缩写 | viii |
| 邱武德自序 | ix |
| 第一章 从吊诡至危机 | 1 |
| 关于马哈迪的政治遗产 | 2 |
| 关于某项事业的政治 | 7 |
| 第二章 愿景规划 | 15 |
| 三个转折点 | 17 |
| 民族主义与区域主义: 2020宏愿和“亚洲价值观” | 21 |
| 霸权统治的插曲: 1995年全国大选 | 27 |
| 多媒体超级走廊的未来主义 | 32 |
| 第三章 无政府状态的市场 | 40 |
| 下赌注 | 42 |
| 货币贬值、股价下跌与撤资 | 49 |
| 援救、资本重组与再通胀 | 53 |
| 内部危机与收复失地 | 59 |

表格

| | | |
|-----|----------------------|-----|
| 第四章 | 安华的创造 | 74 |
| | 摆动在颂赞与咒骂之间 | 76 |
| | 党代表大会前的发展 | 82 |
| | 继承希望渺茫 | 87 |
| | 四个阶段和一项矛盾 | 91 |
| 第五章 | “烈火莫熄”和巫统霸权式稳定的终结 | 106 |
| | “烈火莫熄”的意涵 | 107 |
| | 安华依不拉欣的审讯 | 117 |
| | 替代阵线与1999年全国大选 | 121 |
| | 巫统霸权式稳定的终结 | 131 |
| 第六章 | 结盟建构的文化驱策 | 145 |
| | 行动党和少数政治的钟摆 | 146 |
| | 回教党的崛起再崛起? | 156 |
| | 在愿景和事功之间的公正党 | 166 |
| | 结盟建构的文化驱策 | 172 |
| 第七章 | 马来人困境的重临 | 180 |
| | 个人化霸权的极限 | 182 |
| | 抱负、理想和失和 | 188 |
| | 有关回教国的流言 | 196 |
| | 马哈迪的最终困境 | 204 |
| | 参考文献 | 220 |

| | | |
|-----|--------------------------------|-----|
| 1.1 | 1981—1994年间的政治大事及其重要结果与意义 | 6 |
| 1.2 | 1995—2002年间的政治大事及其重要结果与意义 | 8 |
| 3.1 | 马来西亚：1987—97年私人界未偿付外债 | 46 |
| 3.2 | 马来西亚：1991—97年投资于股票与企业证券的组合投资 | 47 |
| 3.3 | 1990—97年吉隆坡股票交易所精选指标 | 48 |
| 6.1 | 1974—99年大选中行动党的国会选举表现 | 147 |
| 6.2 | 1978—99年大选中由马来人支配的反对党国会议席(得票率) | 157 |

简称与缩写

| | |
|---------|---|
| 公正党 | 国民公正党 (Parti Keadilan Nasional) |
| 国行 | 国家银行 (Bank Negara Malaysia [BNM]) |
| 国油 | 国家石油公司 (Petroleum Nasional [Petronas]) |
| 国阵 | 国民阵线 (Barisan Nasional [BN]) |
| 回教党 | 泛马回教党 (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 |
| 回阵 | 回教联合阵线 (Angkatan Perpaduan Ummah [APU]) |
| 烈火莫熄 | 1998年9月以来的改革运动 (Reformasi) |
| 马华 | 马来西亚华人公会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 |
| 人民党 | 马来西亚人民党 (Parti Rakyat Malaysia [PRM]) |
| 人阵 | 马来西亚人民团结阵线 (Gagasan Rakyat Malaysia) |
| 社阵 | 社会主义阵线 (Socialist Front) |
| 诉求 | 1999年华人社团大选诉求 [Suqiu] |
| 替阵 | 替代阵线 (Barisan Alternatif [BA]) |
| 巫统 | 马来民族统一机构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 |
| 行动党 | 民主行动党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DAP]) |
| ABIM | 马来西亚回教青年运动 (Angkatan Belia Islam Malaysia) |
| ADIL | 社会公正运动 (Pergerakan Keadilan Sosial) |
| FDI | 外来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 GAGASAN | 人民民主联盟 (Gagasan Demokrasi Rakyat) |
| GERAK | 人民公正运动理事会 (Majlis Gerakan Keadilan Rakyat) |
| IMF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 ISA | 内部安全法令 (Internal Security Act) |
| JIM | 马来西亚改革理事会 (Jemaah Islah Malaysia) |
| MSC | 多媒体超级走廊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
| NDP | 国家发展政策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
| NEP | 新经济政策 (New Economic Policy) |
| PMIP | 泛马回教党的旧称 (Pan-Malayan Islamic Party) |

自序

邱武德

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已当了廿二年的马来西亚首相。因其任期之长及安渡政治危机的能力，马哈迪的个性、想法、政策甚至“风格”，在在都使各路“马哈迪观察者”——包括新闻从业员、政治人物、学者和外交官——着迷不已。

马哈迪在这些入当中流传的形象，是个争议性甚至矛盾的人物，而这矛盾，已非老练政治人物都会耍弄的那套反复不一的手段这么简单。结果马哈迪看来就像是充满对立事物的混合体，有时候令人发噱，有时候教人惊忧，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困惑不解。譬如我们若阅读过许多有关马哈迪的新闻报道与学术评论，或会觉得此人虽能活力十足地实践其想法与计划，却很可能昧于经济现实。有些观察家赞扬马哈迪是位具远见并能深察未来发展的领导人，但也可能同时批评他瞧不清楚现状。还有马哈迪虽著述丰硕且言谈无忌，却有他莫测高深的一面，令人难以理解、无法预测。

马哈迪这种种作为个人与政治人的矛盾不谐现象，是否经得起进一步深究，恐怕还是个疑问。无论如何，它们围绕着马哈迪形成一种气势，使他成了中心、成了主题、成了关键推手，以及马来西亚政治舞台上“皮影戏的操弄者” (*dalang*)。

自省地说，我应当承认，或许亦曾营造过对马哈迪的这类观感。我的前一本书，《马哈迪主义的吊诡：马哈迪·穆罕默德的知性传记》 (*Paradoxes of Mahathirism: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Mahathir Mohamad*)，

在描绘马哈迪的意识形态肖像并视他为身兼不同角色且充满吊诡的人物的同时，或许也已经把马来西亚政治的一大部分，看成仅仅是任马哈迪挥洒其行动、倡议与干涉手腕的画布。青年时代的马哈迪或仍无此能耐，执政时的马哈迪，却的确如此。

当然，马哈迪的身影，“总是”在“马哈迪时代”的政治世界里存在。他也确实撑过了种种艰困情势，以较其当代人都远为出色的手段，智取其敌。话虽如此，许多在他任内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到底还是逸出了他的控制之外，尤其是当他费劲地处理这些事件所掀动的经济影响与社会动荡。马哈迪权势的局限，在本书所议论的这段时期——也就是马哈迪任内的后半期里——尤其让人看得分明。此时“马哈迪式政治”从凯旋的高处滑落至危机，然后体现出不确定性。

举例来说，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关键之际，国际货币市场，就不在马哈迪的掌握之中。在另一危急时刻里，马来西亚的“烈火莫熄”运动 (*Reformasi*)，也公然蔑视其宰制。眼下我们若认真对待马哈迪于2002年6月宣示要从政坛引退时，所提出的“马来人的二度困境”警告，那未来更是依旧混沌不明。简言之，这些事物与其它的演变，都已逸出马哈迪的五指山。

《超越马哈迪》主要是分析过往社会转型与未来发展规划、民族主义雄心与全球化趋势、霸权统御与顽抗冲动这些潮流的暧昧交汇之下衍生的马来西亚政治。如今我们知道马哈迪确曾试图制衡这些交汇及其衍生的冲突，但却无法成功掌控。所以马哈迪执政最后岁月里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个人离任后，仍将对马来西亚政治具有深远意义。

我是在马哈迪宣布有意退休的一个月后，着手写作本书。但我却是早在1999年5月至2000年2月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USM) 休假期期间，以访问研究员身份赴澳洲柏斯的莫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Asia Research Centre, Murdoch University) 时，就开始有了撰述这书

的构想。在此我想对分别提供我休假期机会与研究奖助的理大和亚洲研究中心，表达我的谢意。另外我也要感谢理查·罗比森 (Richard Robison)、西斯卡·史宾塞 (Cisca Spencer)、盖里·罗丹 (Garry Rodan)、卡尼施卡·加雅苏利亚 (Kanishka Jayasuriya) 和戴尔·布雷克威 (Del Blakeway) 诸友，他们的友情、鼓励与对我著作的关切，让我在亚洲研究中心留下了一段难忘时光。

过去一年来，我陆续获得许多人的协助。首先在理大社会科学院里，阿都拉欣·依布拉欣 (Abdul Rahim Ibrahim) 既体谅又总是予我支持；列琦米·黛薇 (Letchimi Devee)、罗斯妮·尤索夫 (Rosni Yusoff) 和再顿·卡欣 (Zaiton Kassim) 为我减轻行政上的职务；伍玉丽和江小妃则是我能干的研究助理。而星报出版社方面，李锦兴、伍宝蝶、阿莎·黛薇 (Asha Devi) 和图书馆的馆员们，则让我能自由便利地取得相关报章资料。

我亦感激瑞典的Sida/SAREC，让我得以自“东南亚的民主论述与实践”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Democracy in Southeast Asia) 这项计划中，获得一些资助。谢谢瑞典歌德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Goteborg University) 的威尔·博冠 (Wil Burghoorn)、史文·瑟德洛夫 (Sven Cederroth) 与尤金·欧彦德尔 (Joakim Ojendal) 在共同参与计划期间的体谅与合作。

另外阿都拉曼·恩蒙 (Abdul Rahman Embong)、曾一丹、谢玲英、甄义华、华梅生、邱继仁、罗国华、玛兹娜·穆罕默德 (Maznah Mohamad)、黄月娟、拉玛克里施南 (P. Ramakrishnan) 与叶人赐诸友，也各以不同方式，帮了我很大的忙。他们或耐心聆听、或借我数据、或答复我的问题，并在我需要协助时，随时伸援。谢文庆、刘瑞贤、慕斯达法卡玛尔·安努亚 (Mustafa Kamal Anuar)、陈绿漪和杜乾焕都读过本书的整份初稿，并着实为我提供了不少改善文稿的宝贵建议。我衷心感谢他们。

在本书的制作上，佐摩 (Jomo K.S.) 给了我毫无保留的支持、批

自序

判性意见与良好建议，符亚强以卓越的能力与耐性完成排版，林尚仁则慷慨地为封面设计绘图。而方振威虽是在不断被烦扰的情况下工作，却还是熟练、细心地编辑文稿，由始至终，都展现着因友谊与职责的结合，才能激发出的坚忍、体贴精神。

当我正在为文稿作最后修订之际，父亲却因癌症而濒临死亡。令我俩同感伤怀的是，父亲终赶不及见到本书出版。然而若无玛丽安山医院 (Mount Miriam Hospital) 的胡茹珍、茹碧·钟、凯文·邱诸人与班台珍珠医院 (Hospital Pantai Mutiara) 陈国兴对我父亲专注、慈爱的专业照顾，以及母亲林亚碧、妹妹爱珠、爱宝、爱华、爱梅、弟弟武兴、爱妻碧玲、儿子鼎坚与鼎祥的分忧，我恐怕根本无法完成书稿。

檳城

2003年7月17日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林亚碧，
及纪念先父继尧公(1926-2003)

第一章

从吊诡至危机

马来人特有的作风是：一旦对某人投注信任与尊重，那即便将来情势转变，他们也不愿再修正其意见。所以自己的信念是啥已不重要，拿督翁 (Dato Onn) 的信念，才是一切。

—— C. H. E. Det 〈关于民族性的新思考〉 (New Thoughts on Nationality), 《海峡时报星期刊》，1950年4月9日

有人曾提示马来人应粗鲁无礼些，很多人也确实接受这样的看法。但为什么只是有些粗鲁无礼？干脆明明白白的粗鲁无礼吧。如此一来，马来人就大可不必觉得他们需要感激其恩人。

——马哈迪在巫统常年大会上的发言，2000年5月11日

廿二年前，马哈迪医生当上了马来西亚的第四任首相。他在任期内所督导的经济与社会变迁，让马来西亚蜕变成了一个大有别于1964年时的地方。那一年，马哈迪刚获选为吉打哥打士打南区 (Kota Star Selatan) 国会议员。他在1969年大选中落败，惟自1974年起，即接连获选为古邦巴素区 (Kubang Pasu) 国会议员，直到1999年11月依然连任成功。

当然，我们若以今日马来西亚和1948年殖民地时代的马来亚相比，这当中所经历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变迁，更是深远。英王爱德华

七世医学院 (King Edward VII College of Medicine) 的青年学生马哈迪,正是在1948年,开始崭露其作为意识形态思想家的头角。马哈迪以 C.H.E. Det 为笔名,在《海峡时报星期日》(The Sunday Times) 发表了他对马来事务与马来亚政治的最初思索反省。从那时候起,马哈迪对有关马来社会状况和它与马来西亚其他社会群体及政体的关系、或他本人1970年所提“马来人的困境”之广泛议论及撰述,就再没其他的马来知识分子或政治人物,能够望其项背。

关于马哈迪的政治遗产

马哈迪的政治生涯既长,间中又常夹着许多争议与危机,所以一旦计划在2003年10月退休,自然引来不少的评论与评估。这些评论,毫无疑问大多尝试排比马哈迪的成就与失败、长处及短处,以及最重要的,试着为后世子孙记载马哈迪“对马来西亚社会的贡献”。

我想有必要把话说在前头,即本书的许多观察与评述,确实难免对马哈迪有所臧否。但严格来说,本书并不依前述的论功叙过方式,来评价马哈迪的政治生涯。之所以不这么做,理由之一,正是马哈迪自己常反复表示的,他根本不在乎“会被历史如何评价”。举例来说,马哈迪就任首相才刚两年时就曾提过:“这与追求历史地位的不朽,完全无关。你无法决定历史将来要如何评断你。”¹而对于他希望如何受人追忆,十八年后的马哈迪,更是很简单的说:“我不在乎。”²这第二句话出自向来不断敦促马来西亚人要有历史感的马哈迪之口,似乎令人感到惊讶,但那倒是他极少数几乎能完全照字面意义来看待的声明。换句话说,马哈迪对他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行动、见解的正确性,实在是深具信心,以致根本不在乎别人要怎么评断他。

另外我们也有更正当的理由,不在这里评论马哈迪的政治“遗产”(legacy),至少不在此刻。马哈迪甫宣布其引退计划,国内与国际媒体,就都迫不及待地评述他在马来西亚历史上的角色。惟这类针对马哈迪的即时评价,却多是些无益的党派之见。譬如马哈迪的某位顾问,就毫不迟疑地断言,他是五百年来最伟大的马来领袖。类似的评

价还有:某位亟欲跻身巫统(UMNO,即马哈迪的党,也是马来西亚执政联盟之主导政党)最高领导层的政治人物,也迅速宣称像马哈迪如此才干超卓的领袖,真是千年一遇。还有国内外新闻记者、专栏作家、学者和其他的评论人员,也都贸然给马哈迪冠上诸如“发展之父”(Bapa Pembangunan)、现代化推手、远见卓识者和“将马来西亚摆入世界地图的人”等惯用头衔。马哈迪就这样被抬举或简化成了一位既定的典范人物,而这种形象,轻易即能烙印在民众的脑海里。反过来说,在政府控制范围外的信息网络上,某些与马哈迪不共戴天的反对者,则是把他贬抑成马来西亚社会一切败坏事物的化身。

在我们唯有不要脸地阿谀奉承或一味咒骂的二择一选项下,即便是马来西亚文化语汇里惯用且被视为其政治体系美德的“折衷之道”,恐怕也无法带来任何均衡,因为企图在颂赞与污蔑中求取中道,同样也会是件偏颇的事。一位政治人物到底留下了什么,并不是离任的那一天,就能拍板论定的。这方面的影响并没法突然抑止,再干净利落地收拾清楚。我们唯有隔一段时日后,才能看出它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此外,如果要认真诠释某人的政治遗产和其结果,我们也不能假定过去乃诸事已定的无波岁月。这种诠释必须考量很大程度上仍在建构成形的当下,以及无人能够精确预知的未来。不过那还不致让人绝望;它毋宁只是在为我们的责任划限。眼下我宁可这样想:往后的历史学家,因为可以得到更多数据、可以作更远距离的客观观察,或许再加上更佳的社会分析技巧,当能对马哈迪在马来西亚历史上的地位,作出更清晰且经得起考验的判决。

马来西亚社会已渐受大众传媒广泛宣扬的一些假定所拖累,即认为政府和领导人所作所为都是好的,至于那些坏的,都是因文化缺陷与公民本身的过失而起。所以我们似有必要检视马哈迪执政最后岁月里的重要大事,因这段时间内有损社会利益的作为,大多是由各类菁英或国内外的要角所造成。相较之下,一般公民反而汲汲于挽回马来西亚社会一度充满希望的愿景。当此时期的危急事件里,马哈迪虽仍是主角,却已有他人介入干预。虽然到头来,马哈迪也

好、其他的角色也罢,都无法驱使事件往自己乐见的方向发展或予主导,但这关系重大、纷扰不安却也令人鼓舞的“马哈迪时代”最后岁月,诚然是多事之秋。马哈迪对此倒也心知肚明,所以才说他原本虽计划于1998年退休,却觉得非继续留任不可,以应付1997至98年间的动荡与威胁,认为当时众人眼中的马哈迪“钦定继承人”安华·依布拉欣(Anwar Ibrahim),并未能妥善处理此危机。与此同时,某些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也促使我们即便不重新定义马来西亚政治体系的特质,至少也该重新检视马来西亚的政治运作。或许让人意外也激荡着马来西亚政经社会的最新发展,就是马哈迪最近有关“马来人二度困境”已经浮现的强烈警告。他告诫说,这是个急需解决的新困境,否则马来人过去三十年来,在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与国家发展政策(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NDP)下取得的社会经济进展,就难免要逆转了。

我在提到这一切时,当然也不会忘记关键性事件如1997年7月之“东亚金融危机”、马哈迪政权1998年9月1日实施的资金管制、副首相安华1998年9月2日被黜后面临的迫害、改革运动(*Reformasi*, 以下或译为“烈火莫熄”)的发酵、替代阵线(*Barisan Alternatif*, 简称“替阵”)的成立、1999年11月之大选结果、2001年9月11日美国世贸中心与五角大楼遭遇的袭击,以及最后马哈迪在2002年6月22日,宣布他有意退休。以上诸事,全带来了即时且混乱的影响,而它们积累交缠下造就的远程冲击极大,特别是对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小国小社会而言。所以就算对冲击结果一时还难有面面俱到的理解,我们终须对这些国内外大事交汇后激发的政治发展作出诠释,以了解当前情势和马哈迪离去后的政治风貌。

本书所提供的诠释,始于我前一本著作《马哈迪主义的吊诡:马哈迪·穆罕默德的知性传记》(*Paradoxes of Mahathirism: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Mahathir Mohamad*) 结束之处。这本出版于1995年的旧著,勾画了马哈迪的意识形态肖像,以检视经其核心关怀所架构出来的世界观。我认为“马哈迪主义”蕴含某种相对一致

的意识形态,而这套意识形态,主要当是从马哈迪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回教、民粹主义(populism)与威权主义建构而来。惟我确实也曾告诫,马哈迪主义充满张力与矛盾,当中反映马哈迪作为一个人、一位意识形态思想家与政治人,置身于当代社会、政治的中心议题时,偶尔采行的迂回之道。举例来说,马哈迪的民族主义,多年来早已从初期充满社会达尔文主义式不安全感的马来民族主义,演化成更为兼容并蓄的马来西亚民族主义,冀使马来西亚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另外马哈迪的资本主义,也是从新经济政策的国家干预思维,转变成偏好塑造马来新兴资产阶级的私营化主张。马哈迪的回教,虽试图灌输现代化及工业化所必需具备的一类工作伦理,但在其回教化政策所引介的价值、制度背后,我们倒也能清楚看到“自立者的宗教虔诚”。而民粹主义对马哈迪来说,就是基本上需要了解“人民”的想法、感受与需要,并在国内及世界舞台上为“小人物”的利益代言。但马哈迪式的民粹主义,却总是与他的威权主义仅一线之隔。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民主的同时,他也一贯强调有必要——甚至视如秘诀——以某种优质的领导,来治理国家。有人曾认为马哈迪一旦面临经济、政治上的压力,其民粹主义即化为威权主义。《马哈迪主义的吊诡》另外也考察了马哈迪青年时代在吉打老乡与新加坡的生活经历、其家庭背景和父亲的精神面貌,以及习医从医之体验对他未来身兼多重人物角色所烙下的影响。我在这书的结论里论证说,“2020宏愿”及伴随而来的“马来西亚民族”和“新马来人”概念,正是马哈迪自C.H.E. Det的年轻岁月以来,就已在尝试建构之大计的成熟意识形态代表。他曾在《马来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和《挑战》(*The Challenge*)两书里对此作过详细阐述,并随时间之推移改良后,全面贯彻于首相任内的重大经济政策当中。

由于讨论马哈迪主义,必须包含我们对马哈迪执政后的政策与政治分析,《马哈迪主义的吊诡》遂涵盖了1981年至1995年大选前的重大政治事件。这本书就是出版于1995年。为有助于读者参考,表1.1即对这些事件作了摘要整理。

表1.1 1981-94年间的政治大事及其重要结果与意义

| 年份 | 政治大事 | 重要结果 | 主要意义 |
|---------|------------------|--------------------|-------------------------|
| 1981 | 胡申翁退休 | 马哈迪成为首相 | 改革主义与自由主义开始 |
| | 慕沙与拉沙里争夺巫统署理主席职 | 慕沙获胜并成为副首相 | 巫统派系斗争的迹象 |
| 1982 | 全国大选 | 国阵在马哈迪领导下的第一次胜选 | 马哈迪提出新的经济政策 |
| 1983-84 | 宪政危机 | 巫统与皇室间陷入僵局 | 行政权集中化 |
| 1984 | 慕沙与拉沙里再度对垒 | 慕沙获胜, 拉沙里失去财政部长职 | 巫统派系斗争恶化 |
| 1984-85 | 马华公会危机 | 陈群川成为马华总会长 | 马华政商交缠的最高峰 |
| 1984-86 | 沙巴危机 | 拜林与沙巴团结党崛起 | 卡达山杜顺族自觉意识, 联邦与州政府间关系紧张 |
| 1986 | 慕沙于2月间辞去副首相职 | 嘉化峇峇受委副首相 | 不满马哈迪的领导 |
| | 全国大选 | 巫统与行动党的胜利 | 马哈迪依然掌权 |
| 1986-87 | 慕沙与拉沙里联手组成B队 | B队准备挑战A队 | 巫统派系斗争的最高潮 |
| 1987 | 巫统党选 | A队险胜 | 整肃B队, 巫统分裂 |
| | “茅草行动” | 大肆逮捕反对者 | 马哈迪式自由主义终结 |
| 1988 | 巫统被撤销党注册 | 新巫统成立 | B队异议分子遭剔除 |
| | 司法危机 | 弹劾最高法院法官 | 马哈迪式威权主义 |
| 1988-89 | 数场补选: 互有胜负 | 新巫统仍持续面对异议 | 政治力量对比犹未明朗 |
| 1989 | 四六精神党成立 | 拉沙里带领B队转入反对阵营 | 反对党新联盟的基础 |
| 1990 | 全国大选 | 国阵胜选 | 两线制出现; 回教党重夺吉兰丹执政权 |
| 1991 | 2020 宏愿 | 马哈迪新议程 | 国家发展政策 |
| 1993 | 巫统党选; 安华准备挑战嘉化峇峇 | 宏愿队获胜 | 安华成为副首相 |
| 1994 | 沙巴州选举 | 团结党险胜, 却因部分议员变节而垮台 | 新的联邦与州政府关 |

关于某项事业的政治

本书可以但不必然需要把它当作《马哈迪主义的吊诡》的续集来读,因为它不仅仅是前书的延伸,或又一项政治意识形态研究。本书的核心,或可看成是对马哈迪社经发展宏图的政治检视。就概念上来说,马哈迪的发展宏图,既是资本主义驱动下的民族主义事业,亦是充满民族主义抱负的资本主义事业。

这事业从好几个方面来说,都是资本主义的。就历史而言,它本就是建筑在某殖民国家遗留下来的特定资本主义结构之上,当中还曾挫败过1948年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之叛乱所蕴含的反资本主义选项。自1970年新经济政策实施后,这事业就大多与马来资本的兴起有密切关系。马哈迪80年代初开始推行其“马来西亚大宝号”(Malaysia Incorporated)与私营化政策后,这事业的优先要务之一,则是巩固国家与本土资本间的策略联盟。后者在马哈迪的谋划中,就是以国有资本,为国家所培育出来的“土著工商群体”(Bumiputer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Community, BCIC)的马来企业家,提供一个领导角色。

另外这事业就以下两则含义来说,也是民族主义的:它始于马来民族主义者运用新经济政策及土著工商群体,来从族群的角度,重组马来西亚阶级结构,亦即重新安排马来社会的阶级位置。到了90年代初期,该事业就已协助确立一个马来西亚资本家阶级,而马哈迪希望他们将引导推动2020宏愿。1970年后,历届政府坚定的国家干预作为,早已昭示着本时期的发展事业乃“社会工程大计”,根本不是任经济自由运转下的偶然成果。

这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事业(nationalist-capitalist project)或马哈迪事业,在设计上本就非单一的整体,实施时又不无争议,其进展也非一帆风顺,以致在1970至80年代,造成了各类纷争与危机。纵使如此,这事业还是沿着新经济政策、私营化、马来西亚大宝号、国家发展政策与2020宏愿一路走来,眼看在1995至96年间即可高奏凯歌,岂料竟又坠于1997至98年的严重危机当中。我的论点是:

正是这突然逆转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事业情势，激荡并形塑了马哈迪执政最后岁月里的政治。

表1.2 摘要整理了本书的分析时段里，极重要的一些政治大事。第二章首先分析马哈迪式事业的辉煌胜利期，也就是从1991年颁布2020宏愿开始，至1997年7月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本章说明马哈迪政权牢控马来西亚社会之情形，而这是国家经济成长与世界银行所谓“东亚奇迹”交汇的结果。国内方面，执政联盟——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简称“国阵”）于1995年大选的胜利，标志着这

表1.2 1995—2002年间的政治大事及其重要结果与意义

| 年份 | 政治大事 | 重要结果 | 主要意义 |
|-----------|---|--------------------------|-------------------------------|
| 1995 | 全国大选 | 国阵大胜，行动党大败 | 2020宏愿占主导地位 |
| 1996 | 回教徒团结阵线分裂 | 拉沙里与四六精神党 回归巫统 | 回教党的吉兰丹州政权面对威胁 |
| | 巫统党选 | 马哈迪与安华在无竞争 对手下连任 | 安华被视为“钦定继承人” |
| 1997 | 7月：东亚金融危机爆发 | 货币贬值、资产跌价、 外资撤离 | 国家与市场爆发冲突， 经济衰退 |
| 1998 | 9月1日：实施资金管制 | 资金管制与建立 “经济护盾” | 拯救企业、重组资本、 通货再膨胀政策 |
| | 9月2日：安华被黜 | 开始对安华展开迫害 | 安华号召改革 |
| 1998-1999 | 98年11月至次年4月：安华被控贪污，首度受审 | 争议性审判过程中，出 现烈火莫熄的示威活动 | 安华被判有罪， 需入狱六年 |
| 1999 | 11月：替阵参与大选 | 国阵胜选， 惟巫统受重挫 | 巫统丧失马来人支持； 回教党重掌吉兰丹与丁加奴州政权 |
| 1999-2000 | 安华于鸡姦罪名下再度受审 | 在同样具争议性的审判 过程中，示威持续涌现 | 安华被判有罪， 需入狱九年 |
| 2001 | 以内安法逮捕公正党众领袖及嫌疑圣战组织成员；行动党与回教党分歧；美国911事件发生 | 公正党大受削弱， 行动党离开替阵 | 替代性联盟的终结 |
| 2002 | 马哈迪宣布有意辞职 | 巫统对马哈迪的引退 作折衷处理 | 领导权逐渐移交 阿都拉巴达威 |

项霸权成就的巅峰。世界方面，马哈迪政权最恢宏的壮志，则是清楚体现于多媒体超级走廊。多媒体超级走廊(MSC)随后虽在运作上面对困难，但其前瞻性概念与大张旗鼓的宣传，无异昭示着马哈迪政权与世界最充满自信的一次接轨。本时期所成就的空前物质昌盛，正是马哈迪政权生气勃勃及马哈迪信心十足的凭借。那是自1957年独立以来，第一次有许多国民以身为马来西亚人而自豪。吊诡的是，这种国民团结感，1969年前的联盟执政菁英与后来新经济政策的建构者皆求之不得，却竟是在马哈迪这一度被马来人奉为“马来民族主义者”而非马来人惧为“马来极端分子”的政治人物手上，营造出来。

然而马哈迪政权与世界的水乳交融，却在1997年7月，陆地转为动荡纷扰。当时国际货币市场的投机活动导致泰铢崩溃，连带触发东亚金融风暴，几乎坏了马哈迪的整个大计。这场风暴，使马来西亚政府卯上了货币市场，彼此互责对方要导致马币贬值、吉隆坡股市资金流失、且终结十年来经济高成长的“投资人信心丧失”负责。随着冲突深化，马哈迪政权成了独行者，既拒绝货币市场的改革要求，也不接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翻修泰国、印度尼西亚、南韩三国金融体系所提的方略。第三章叙述了这场冲突的面貌，并探讨国家方面逐渐减少的因应选项，以解释马哈迪政权为何决定祭出资金管制这“经济护盾”及通货再膨胀措施。由于当时还没法明确看出资金管制的利弊，马哈迪遂赖其政治直觉及挽救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事业的紧迫需要，下了这项决定。就挽救事业而言，马哈迪政权的确是成功了，惟第三章的结论指出，1998年9月1日开始从货币市场上暂时撤退的行动，却意味着那曾象征马哈迪治下，资本主义进一步朝合理化发展的“马来西亚大宝号”概念，就此划下句点。

1997年7月危机还带来一场戏味十足的续篇，随翌年9月2日安华被黜，拉开了序幕。第四章即揭示马哈迪与市场的恶斗，是如何把当时的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也卷入争执里头。安华与中央银行——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高级技术官僚们，因试图安抚马哈迪和

市场,换来悲惨的政治后果。一方面,市场谴责马哈迪拒绝改革,并要马哈迪下台;另一方面,马哈迪对安华的改革政策并不信赖,而国内有政商利益的集团,则密谋阻止安华当上首相。在危机深化下,没起色的经济,开始孕育孤注一掷的政治。当安华的盟友阿末·查希(Ahmad Zahid Hamidi)1998年在巫统青年团大会上,企图不怎么掩饰地批评马哈迪主政下的“朋党”、“裙带”恶风失败后,他这举动挑起的反击,终于导致安华垮台。

第四章回溯了马哈迪与安华俩早在1997至98年诸事以前,就已经埋下的嫌隙,并论及巫统内部领导权移转上面对的困难。毕竟该党自70年代以来,就不断受派系斗争所苦。与此同时,第四章也为读者回顾了安华三十年来的社会实践与政治生涯,并反思安华的个人矛盾,和那导致他在危机时刻与马哈迪对峙的“悲剧性发明”。第四章论证说,民粹主义和双方对“亚洲价值观”的歧异见解间存在的紧张,使安华早在1997-98年的灾难发生前,就已是一般公认的反马哈迪主义者。

被撵下台的安华,经重塑成了强而可靠的改革运动象征,而这“烈火莫熄”之名,正是取自1998年5月推翻苏哈多“新秩序”政权(New Order regime)的印度尼西亚同名异议运动。马来西亚的“烈火莫熄”运动,带来了逾整个世代最持久的反政权群众示威,虽然这不满情绪的倾泻,还是无法与印度尼西亚先例之规模、深度和品质相提并论。第五章对马来西亚“烈火莫熄”运动的几项不同含义,作了详细分析。从某个层次来说,“烈火莫熄”乃是初期的文化反对运动,它源于马来人对安华遭粗暴对待的嫌恶反感。从另一层次来说,“烈火莫熄”运动也是供异见者发声及表意、沟通、辩论的替代媒介。尤其是在互联网这不经审查的管道上,个人或团体的“烈火莫熄”支持者,创造了新而丰富的社会批判及政治反抗形式。至于“烈火莫熄”运动的第三个层次,则意味着马哈迪政权对公民社会的宰制力量,已经大不如前。

马哈迪式政治(Mahathirist politics)在危机前取得的成功,有

赖于三组前提,即经济的高速成长与持续繁荣、民族主义愿景和广泛的民意支持,以及强势领导和事先安排妥当的继承人选。1997年7月危机,挑战了马哈迪政权确保高成长以追求2020宏愿昌盛未来的能力。1998年9月2日安华被黜,则是损害到领导层的正当性,并使巫统的继承规划陷入混乱。随后兴起的反马哈迪及反巫统示威浪潮,亦逐渐腐蚀政权的支持基础,削弱其民族主义愿景。以政治语言来说,“烈火莫熄”运动虽无定形,但它所表达的异议,却很真实。局面如此,各反对党和某些异议色彩鲜明的非政府组织(NGO)既不能置身事外,又希望影响这场运动的走向,乃共同加入,先是联组“人民公正运动理事会”(Majlis Gerakan Keadilan Rakyat, GERAK),后则孕生替阵。这两个建制,遂成了将“烈火莫熄”的群众异议,转化成选举时有组织反对力量的载体。

国阵在1999年11月大选中虽赢了替阵,但“烈火莫熄”运动的首要靶——巫统,却遭遇到与1969年大选规模相当的顿挫。巫统的真正挫败,主要不在丢掉了多少议席,而是竟有半数的马来选民,已经能接受并打算选出不是由巫统领导的联邦政府。讽刺的是,巫统反而要靠非马来人选票的坚实支持,才能保住许多关键性的“族群混合”选区。这样的选举结果,可是对未来政治深具意义的历史发展。一种逼着各主要政党不得不改头换面以求生存或前进的政治变迁,似乎已经浮现。第五章显示,巫统不论是藉其内部改革,或诉诸“马来人大团结”以抗衡想像中非马来人威胁的老调,都没法达成这项任务。我遂在第五章结论说,“烈火莫熄”运动,冲击了巫统自诩为马来西亚政治体系里支配性稳定力量的说法。

值此重要时刻,替阵的四党联盟(外加某些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是否真能建立在“烈火莫熄”所创造的反对动力上,就是个紧迫问题了。第六章描述了替阵当中最成功的政党——回教党(PAS)与最落魄政党——民主行动党(DAP)于大选后滋生的主要紧张。两党间的齟齬主要虽是围绕在回教党对“回教国”的追求上,但其他的麻烦倒也不少。事实上,行动党的困境,或可上溯至非马来人政治特质的转

变,亦即早在马哈迪政权的胜利阶段,就移转了他们的重点与同情对象。就回教党这方面来说,则是它在全国层次与它所领导的吉兰丹、丁加奴两州地方层次的政治规划上,并不相同。与此同时,国民公正党(Parti Keadilan Nasional)这与落狱的安华关系最密、也是替阵中较弱的政党,在2000至2001年间遭到了无情镇压。当美国世贸中心与五角大楼于2001年9月11日遇袭时,行动党和回教党的合作已告终,而马哈迪政权也已将公正党内最有活力的一批领导人,依内安法令(ISA)不经审判地予以监禁。还有些公正党领袖,也很快就因内部意见不和或个人的失望,离开了该党。至此作为第二联盟与替代性阵线的替阵,几乎已经完蛋。马哈迪政权似乎藉镇压及对手的不济,扭转了它在1999年大选时的劣势。

如此说来,“烈火莫熄”运动与替阵,难道只是那依然不变的政治体系里的短暂插曲?第六章的结论,遂以考量替阵在建构联盟时文化上的必要意义,探讨了这项问题。政党联盟早已是马来西亚这多元社会的政治史上,独特而重要的一环。无论如何,在经历过这许多涉及国内政经发展、霸权动摇、新意识形态冒现并激起新形式社会实验的危机后,政治局面真会只是回到1998年前吗?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政治、社会变化?为体系带来了何种变迁?而这种转变,对于未来的马来西亚政治,又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一大堆相关问题,都在马哈迪出人意料地在2002年6月22日宣布,他有意辞去巫统主席并从首相职务上退休后,变得更加紧迫起来。

本书从第二至第六章,每一章都会对所谈论到的主要领域里经历的转型与变迁,作出评估。至于最后的第七章,则是专注在四项能够深切左右“后马哈迪政治”主要路向的议题。

首先是关于领导的问题。马哈迪在其漫长任期内,对于政治、政策制定与公共建制的状态,都发挥了无远弗届的影响。不仅如此,由于他那似乎能为马来西亚社会勾勒宏大愿景的能耐,马哈迪还另外获得了一种个人形式的主宰力量。他是凭个人意识形态与领导上的才华做到这一点,但那却是等着接班的巫统众领导人所没有的。

其次,巫统的派系斗争关系重大,因为它总是广泛又紧密地牵扯到马来社群内部意见不和的轴心,而那可是马哈迪作为党、国领导人二十余年期间,诸多动荡的根源。马哈迪个人的想法、倡议与政策构成了许多施政概念的基础,这虽符合新兴主导阶级的需要,惟新经济政策及马哈迪主义在发展某个不断断裂的党-官-商轴心时存在的结构性弱点,却带来不稳定的问题。由于马哈迪无法长期确保这轴心的完整,因此问题在于其继承者(或继承者们)是否能够重构马来资本主义并充分恢复它与国家机关和巫统的联系,以避免他们的问题延烧至巫统,让巫统成了马来人内部冲突的战场。

其三,我们无法排除世俗的马来西亚国体与立宪政府,会被依“神圣法”(divine laws)治理之“回教国”取代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已经在1999年11月大选回教党崛起、巫统受挫后攀升。从那时候起,它就成了马来西亚国内政治与后9·11回教论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七章检视了回教党迈向回教国之路的障碍。本章也提出告诫,在某些社会条件限制下,世俗立宪政府及民众对它的信念,容或开始动摇,却不必然是由回教党所促成。

其四,马哈迪在宣布即将辞职后不久所谓马来社群正面对新的困境,或“二度困境”的说法,是句值得关注的谜语。马哈迪既曾宣示过“马来人的困境”已成过眼烟云,那这马来人的二度困境,究竟是什么意思?第七章和全书,就是以诠释这马来人的二度困境作结。我会将马哈迪的悲惨预测与后马哈迪时代的政经互动前景,以及马来人大规模干预马来西亚政治运作的过去联系起来谈。我相信马哈迪对此也将敏锐地有所察觉。

我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种既有异于主流诠释,亦能跳脱一贯将马来西亚政治视为“分裂社会”下“族群政治”的标准认知的社会、政治变迁感。过去数年来的转变,已足以提示我们必须另觅新法来分析马来西亚政治,以更精确地理解其未来。这新的理解之道,有赖于我们从1997至98年间的历史中汲取教训。这段历史时机推翻了许多“族群政治不变”假设、考验了马哈迪政权解决政经紧要问题之

能力、测试了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事业在国家与国内外资本三方间求取权力均衡的固定需要、昭示了一场奠基于相异“亚洲价值观”认知的文化反叛的活力，并且激发了新一轮反国家霸权的斗争。这些民众斗争的最佳面向，当可在“烈火莫熄”运动对马来西亚过去与现在的再诠释和其充满创造力的异议表达中，以及替阵的社会—政治实验当中，寻觅得到。

我并没把这本书当成学术论著来写。我虽努力使自己的陈述和论证符合严格分析的要求，却避免涉入学术或理论上的论辩。在有益或有助于澄清重要论点与特定论证之处，我会提出既有的学术分析和其他观点供参考。另外，我也尽量少用尾注和引证，通常只要足以说明直接引文的出处即可。总之最重要的是，我想要吸引那些对马来西亚历史有些了解、对其当代发展有所领会、对其政治未来甚为关心，并能直觉地认识到政治这重大要务，不能只由政治人物和学者专家独占的一般读者。

1 引自“A Vision for Malaysia: Interview with Prime Minister Mahathir”, *Asiaweek*, 1983-9-23, p.37

2 引自“When You Grow Old, You Face Reality”, *Asiaweek*, 2001-1-26, p.27

第二章

愿景规划

新亚洲正在崛起，而那是唯有思虑上的瞎子或聋子，才没办法察觉的事实。亚洲已势不可挡。这个新亚洲，当持续成为有成就之亚洲、进步的大陆，为所有亚洲人带来大规模的广泛发展。这个新亚洲，也必须是能有所贡献的亚洲……是驱动者激励者，是国际事务的主体而非受体，是因不是果。……我们当来一场亚洲文艺复兴，亦即重建亚洲也重塑世界的一次新生。

——马哈迪于“新亚洲论坛”(New Asia Forum)上的发言，吉隆坡，1996年1月11日

我们大概能公允地说，从前一切有组织社会的凝聚力量，皆有赖于(或部分仰赖于)那不致令彼此过于颀颀的对过去的想像……我们极难在这类想像里找到的，是对未来的强烈关注。然而当十八世纪晚期民族主义来到这世界后，一切都已经历根本改变。

——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2001)

身为马来西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自马来亚联合邦1957年独立建国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大概都让其子民感到困惑的问题。它的答案，显然也不令人满意。

就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层面而言，马来亚那已经形诸于



身为马来西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默迪卡宪法”的去殖民化经验，并未能克服其多元社会的族群分际。独立六年内，马来亚即与新加坡、沙巴、砂朥越合并，成立了马来西亚。这场合并激发许多有关国家特质的问题，主要是因来自国外的挑战而起。菲律宾反对沙巴加入马来西亚，宣称对沙巴拥有历史主权。印度尼西亚则是从马来西亚倡议案窥出英美两国满怀敌意的帝国主义图谋，遂以“对抗”(konfrontasi)回应。至于新加坡方面，麻烦也不小。该岛的并入，结果只成了它1948和1957年（即分别是马来亚联合邦成立与独立之年）被不自然地排除在联合邦外、并且于1965年就反常地从马来西亚脱离这段期间的短暂插曲。从那时候起，马来西亚就凝成了一个政治单位，虽然半岛与沙巴、砂朥越间的隔阂至今犹在，亦无人知晓该如何加以连结。

就个人层面来说，种种与历史遗绪、社会分裂及政治发展有关的复杂因素，都使个人极难将马来西亚人的观念，内化成他深刻感受得到并愿紧密持有的身份认同。源自中国、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的亚洲民族主义三股大流，虽皆横扫过殖民地马来亚，却没因此留下任何真正称得上马来西亚民族主义并持续至今的综合性意识形态，诚然是个历史的讽刺。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社会，本就受一度严格的族群劳力分工所苦，因缺了这综合性意识形态，乃轻易即被族群间竞争的不安全感所动摇。即便是为纾缓1969年5月13日暴力事件之痛苦而颁布的国家意识形态“国家原则”(Rukunegara)，也同样无

法催生强烈的社会共同感。国家原则实在过于做作、肤浅，并没办法撩动民众的想像。反之族群间的相互指控，倒是主导了70及80年代新经济政策(NEP)实施期间，所谓“马来民族主义”卯上“非马来人沙文主义”时的政治。

“马来西亚人”身份认同受限于这两方面的困难，遂往往诉诸于一种强调有必要维持国家完整、并且希望达致国民团结的内省立场。我们若考量到克服多元社会分裂倾向所需付出的实际及想像上的需要，当可假定在很长时间内，身为马来西亚人，就是拥有一个高于（或竟讽刺地低于）马来西亚人从出生至成长即具备的各自族群认同之认同。¹

不过到了90年代初至中期，这同样的问题——即身为马来西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却以一种陌生的方式重塑，使它那看似合理的答案也变得新颖起来。如此一来，那些在成长、求学及社会化过程中，几乎毫无例外会把自己看成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或“其他”，并甚常在社会、文化领域自行其是的各族群马来西亚人，就会如班纳迪克·安德森的著名论证所言，先倾向于“想像”自己是马来西亚人。这大概是马来西亚人迄今，最能为身为马来西亚人而真正感到自豪的一刻了。这种出乎意料之外的现象，不仅是在1987年族群暴动一触即发的威胁后不久发生，更显然主要是马哈迪这直到70年代，仍被马来人奉为“马来民族主义者”而被非马来人惧为“马来极端分子”领导下的结果。

到底是什么样的条件，造就这令人兴味盎然的结果？问题的答案，就落在经济发展、政治倡议及意识形态影响的交汇作用上。那是在马哈迪执政的第二个十年里发生，而三个分别在经济、政治与政策领域浮现的转折点，早已预示了这场变动的来临。

三个转折点

9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经济已明显从它1985-86年的衰退遗绪中摆脱出来。经济成长平均逾8%的势头，从1988年(8.9%)一路

持续到1996年(8.6%)。还有国外直接投资(FDI)的净流入,90年代初期也大多数很高:1991—94年间,平均每年就达到31.9亿马币,至1995—96年间,才降为4.86亿马币。这场经济复苏,归功于马哈迪的私营化计划、抑制公共支出、搁置新经济政策的重组要求、松绑外资投资条件,并积极招引来自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

高成长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至90年代初期就已普遍感受得到。官方失业率从1986年的逾8.7%,降到了1992年的4%(甚至1996年的2.5%)。国民收入与生活水准一般而言都有所提升,消费也广泛活络起来。其结果即是国内外对马哈迪和财政部长达因·再努丁(Daim Zainuddin)的国家经济管理,皆报以喝采。当中赞誉最力的,自然不外巫统党员、马哈迪在国阵的盟友、与国家合作而获益最多的工商业巨子,以及那些存在重大政商利益勾连的大众媒体。

马哈迪之所以被视为领导有功,让马来西亚从80年代的艰难岁月里逆势冲出,确实有个极具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在国人的记忆里,从来就没有过比这更为丰饶的岁月。有份区域性杂志还颇为谄媚的带头说:“马来人就如马来西亚的其他族群,正享受着自马六甲王朝以来,最昌盛之世”!²然而边缘化的少数群体,毕竟无缘均沾这物质丰饶下的普遍幸福,这些人当中,一向遭到忽略者即“原住民”(Orang Asli),另外还包括了那些没有技术与半熟练的合法、非法外籍劳工等新的下层阶级成员。

90年代初期,也是马哈迪击垮其主要政治敌手之时。他在1987—90年间的政治地位一直处在紧要关头,先是于党内面对东姑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挑战,并闹上法庭,然后又是在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四六精神党。惟到了1990年大选,国阵却打下一场明显的胜仗,击败由四六精神党、民主行动党(DAP)、回教党(PAS)、沙巴团结党(PBS)、马来西亚人民党(PRM)和其他小党分别组成的两个反对阵线。国阵的胜利,巩固了马哈迪的领导地位,使他不再面对任何可预见的挑战。

除政党外,曾经在1983—84年宪政危机期间和马哈迪战成僵局

的马来统治者,也在1992年重挫于马哈迪之手。当时马哈迪和国阵主导的国会,藉柔佛苏丹攻击某钩球教练的良机,立法部分撤销了皇室面对检控与司法诉讼的豁免权。另外司法部门曾在80年代中期左右,无意间成了政府行政部门与各类政治异议者之间,以及巫统党内对峙派系之间一处独立的争论平台。惟在最高法院院长和两位该院法官于1988年遭弹劾并予免职后,司法部门也随即作出自我调整,屈从于行政权的至尊地位。

至于曾经在80年代串连成共同运动,以抗议马哈迪政府不少丑闻及危机的许多非政府组织,本时期虽依然活跃,但所获得的民间支持,却也已经不如1990年前来得广泛。

以上的政治发展,都证明了马哈迪续掌政权的决心与能力,更是行政部门权力愈趋集中的征兆。然而关键是:对曾经历过马哈迪执政前十年各项危机与喧嚣的马来西亚人来说,这样的发展,却意味着回归他们极度渴望的常态岁月。

第三个转折点,则是与国家发展政策有关。二十年来,1990年这新经济政策预定结束的一年,早已在族群间造成积怨,此因没有人知道,新经济政策到底会不会或应不应该加以延长。1986年晚期,马哈迪为应付经济衰退,曾冒着政治风险决定“暂停新经济政策”。尽管如此,马哈迪也好,其他的重量级政治人物也罢,都仍未确立过1990年后发展政策的正式方向。

当崭新的“国家发展政策”(NDP)及伴随它的“1991~2000年第二展望纲领”(Second Outline Perspective Plan)终于在1991年公布时,这已多少解决了新经济政策终结与否的问题。国家发展政策将不露声色地保留新经济政策为追求两大基本目标——“不分种族地根除贫穷”与“重组社会以打破种族经济分工”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就这两项目标来说,“重组”(restructuring)马来西亚社会的“扶弱”(affirmative action)目标,显然更具争议性,而它早已不断激起马来人和非马来人社群间的猜疑及互相指责。

惟马哈迪对新经济政策的评价却是:它自1970年施行以来,已

经取得巨大成就，尤其若与世界各地失败的社会改造工程相比，更是如此。马哈迪很满意的指出，“在一切尘埃落定后，新经济政策应被公认为独立以来，马来西亚最伟大政策之一。它使马来西亚在兴隆之际，又能避免出现那些在彻底唯物主义的社会里，总会公然存在的不公不义。”³ 尤其若以新经济政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马来人可谓进步显著。公司所有权的马来人所占比重，已经从1969年时的大约2%，跃升至1990年时的稍逾20%。与此同时，还有国有企业为马来人和马来私营公司掌握“信托”资产，支配了经济领域的战略高地。而“打破种族经济分工”的成效，一般认为更是广泛，这当可以从具有政经影响力的“土著工商群体”（BCIC）之崛起，清楚看出。马来资本家、专业人士及中产阶级成员，共同构成了这样一个群体。

马哈迪论说，土著工商群体应该不再需要在股权、商业、教育和就业机会上，继续仰赖国家设定额加以拉拔。惟土著工商成员务必学会管理和企业经营技巧，并以一套能够提升“他们参与经济运作的品质”⁴ 和使他们的参与“既持久又经得起考验”⁵ 的价值体系，来强化自己。马哈迪告诫说，土著工商群体必须拒绝“以不分皂白的方式分配财富”的诱惑，这些财富只会“被轻易挥霍掉”，并且带来“永久性伤害，造就依赖性特强的社会，一旦不获政府继续提供支持，即无所适从”。⁶ 反之，土著工商群体必须展现他们“维持其应有份额”的能力，“要逼自己学习，并要学得很快”，还要“彻底投入市场的竞争”。⁷ 马哈迪遂在这里，揭示了一种明显有别于国家过去对于重组社会的看法。相较于新经济政策“因为强调数额，已经导致有些土著不过是百分百拥有不断亏钱的公司”，国家发展政策对“参与品质”的坚持，则意味着“倒不如让他们去拥有赚钱公司的一成股权”。⁸ 马哈迪这点不论众人如何诠释，毕竟是在议论里抛出了意义深远的马来人—非马来人商业合作承诺，亦即“非土著必须寻找那些愿意冒资金损失风险，并且参与公司日常运营的真诚土著伙伴”。⁹ 举例来说，马哈迪在评论都市零售业的结构及表现时，即力陈“土著零售商业……不要再强调他们的土著特质，而该放眼于更大的市场”。¹⁰

马哈迪这是以谨慎的方式，来暗示“新经济政策不再”。而数年后，当他揭橥一项新政策兼崭新的愿景后，他确实说了这话。

民族主义与区域主义： 2020宏愿和“亚洲价值观”

不论你是新经济政策的马来热情支持者或多疑的非马来人批判者，恐怕都可以这样说：不设族群配额（固打）的国家发展政策，或许反而是为马来人超越新经济政策的原定目标铺了路。这类议论之没有公然出现，恰恰证明了马哈迪已成功地将马来西亚政经及社会发展的未来，以“后新经济政策”的语言重塑了。抑或如马哈迪在某篇题为〈迈向前路〉（The Way Forward）的论文里勾勒的：马来西亚的未来，已是落在2020年时达致“已开发国家（以下译为‘先进国’）地位”的新目标之上。他这“先进国地位”，意指马来西亚最终要跻身成为富裕、现代与先进经济体之一员。就经济上来说，这目标有赖于未来三十年内，平均每年7%的稳定成长。那当然是个野心勃勃的设定，但在马哈迪看来，却是办得到的挑战，绝非想望而已。借着提高0.1%的年均成长率（回顾前二十年，平均即有6.9%），每十年将国内生产毛额（GDP）翻上一倍，冀使马来西亚人到了2020年时，能够较1990年“实际上富裕四倍”。马哈迪在〈迈向前路〉一文中，详论了马来西亚经历的结构转变，亦即从早期对原产品生产的依赖，发展至工业化经济规模，遂得以进一步朝后工业（post-industrial）的条件迈进。

当马哈迪说出要在三十年内达成先进国的2020新目标时，他已无异默认，新经济政策追求国民团结的长程目标，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许多马来西亚人立刻就将马哈迪的声明，理解为已经大步迈出新经济政策的旧关怀。许是因近来节节胜利的鼓舞吧，马哈迪对于达成这2020目标，满溢着感染众人的乐观之情。然而不论是马哈迪的乐观情绪，或纯粹只是国民对过去成就的自豪感，或任何对于未来财富的粗糙预想，都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这以“2020宏愿”整

装示人的马哈迪式议程，竟能攫住一般马来西亚民众的想像。短短时间内，2020宏愿即以没有人能事先预见到的方式，崛起为支配性意识形态。举例来说，1993年巫统党选时，副主席安华就领着纳吉(Najib Abdul Razak)、莫哈末·泰益(Muhammad Taib)、慕尤汀(Muhyiddin Yassin)和拉欣·淡比仄(Rahim Tamby Chik)组成“宏愿队伍”，欲排挤掉当时的署理主席嘉化峇峇(Ghafar Baba)，和另两位副主席阿都拉·巴达威(Abdullah Badawi)与沙努西(Sanusi)。宏愿队伍的成功，反映他们相当巧妙地利用了“2020宏愿”广受欢迎的政治好处。在90年代，很多店家与商业公司也都流行将“宏愿”(wawasan或vision)或“2020”之名，并入商号或产品的商标名称当中。这都是些平凡却明摆着的例证，说明2020宏愿是如何深入马来西亚社会。但我们就是无法想像，会有谁愿意以“新经济政策”或“国家原则”为其商行命名。

不过2020宏愿，倒也不全是崭新或新奇之物。《马哈迪主义的吊诡》就曾解释过，它其实大多来自马哈迪早前的想法。然而就意识形态来说，2020宏愿之所以广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与它微妙地调和了过去、现在与未来有关。套句马哈迪自己的话说，就是它以某种方式“说出了吾国公民的最佳抱负”，“将国民思维从生产力较为低落的境地，转引向建设更有希望的未来”，并“指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应走的方向”。¹¹约翰·希里(John Hilley)曾深刻地指出，2020宏愿“把一般人对于现代化、社会流动与跨族群共荣的理解脉络化(contextualise)，成了‘概括性’国家框架的一部分”，¹²遂有助于马哈迪政权建立“‘集体经济发展’观念与2020宏愿间的一种强有力联想，暗示着未来的丰富回酬”。¹³在提出〈迈向前路〉六年后，马哈迪理直气壮的声称，“马来西亚人民已经史无前例地团结在2020宏愿之后”，因为2020宏愿已经

“制服了潜藏在我们历史最黑暗廊道里的小妖精(gremlins)。它解决了过去许多悬而未决的争议，也替我们卸下了背上某些极为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些包袱在过去，可都是非常扰人的障碍”。¹⁴

马哈迪正是在此刻，斩钉截铁地宣告“新经济政策不再”。他解释说，

“2020宏愿已经非常清楚地指出，身为国家独立后第二代的马来西亚人应该做些什么，以让这一代马来西亚人，能够成为活在所谓‘发展中’社会的最后一代”。¹⁵

有关2020宏愿的华美之词，倒也不全是出自马哈迪之口。当时一般民众，其实也都视2020为自我的挑战。但他们对马哈迪表述抱负之能耐致敬的奇妙方式，却是将这宏愿看成仅仅是马哈迪个人的宏愿。所以我们或可以说，是“马哈迪的宏愿”，给了新经济政策一个近乎完美的方式终结，既没有爆出人们常在惧怕的砰然巨响，亦没造成对“许多未决争议”的呜咽啜泣。它的结束，反而给人带来一种集体性直觉，套卡缪(Albert Camus)的话来说，就是马来西亚社会“对其未来的真正慷慨，在于它为现在奉献一切”。¹⁶2020宏愿已经激励马来西亚人发现，他们其实拥有想像成共同体的能力，而且还是怀着相信“民族具根深柢固之好”的感觉下这么做。¹⁷

不过2020宏愿之所以能风靡马来西亚社会诸多领域，绝不仅仅是单凭一堆术语。商界、专业人士与中产阶级对它支持尤力，因为它最直接且强有力地提到，要大幅改善这些人的社经条件。马哈迪的愿景一旦抽离传扬2020宏愿时的历史脉络，那就会听来像是许多未开发国家蹙脚领导人的冒进之举。惟90年代的荣景，却为鉴定马哈迪的愿景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助马哈迪式议程取得无以伦比的宰制地位。吉隆坡股市(KLSE)从1992年晚期开始至整个1993年的飙涨，不仅让那些本来就有钱的上市公司老板和大股东借着投机活动变得极端富裕，就连不少手头有些现金的寻常百姓，也在空前强劲的牛市魔咒下，投身股票市场的投机运作。他们就这样涉入并往往推进了由投机性投资转化成纯粹赌博的过程。过程中他们迅速吸收了市场的日常用语，学会谈论公司的“船长”、“舵手”和他们的舰队与旗舰，还有机构买家及外国基金等等。他们也交换着诸如公司合并、接管和新股首次公开发售(IPO)、第二交易板上市的消息与传闻，

并密切留意交易天数和保证金追缴、成交量、收益率及本益比等的变动。1991至1997年初平均每年8.6%的经济增长表现,使他们兴致昂扬地沉醉在来自每一类型市场的炫目财富里。股票市场飞涨,产业市场兴旺,而耐久物市场,更是扩张到当国产车制造商供不应求时,二手车竟也可以和新车等价这样的规模。

这个国家的消费情况,从未如此广泛热络过。许许多多的马来西亚人,似乎前所未有地“感觉十分美好”,以致“90年代中期,不少马来西亚人眼中所见,就唯有财富”。¹⁸ 举例来说,年轻一辈的专业人士,当时就普遍认为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机会是又多又棒,以致海外各地如新加坡的工作机会(那向来可是年轻大专毕业生与熟练工人偏爱之地),都变得不再诱人。而在需求吃紧的国内劳力市场较底层,因半熟练与非技术性工作机会充斥,也吸引了越来越多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外籍劳工,参与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从社会观点来看,上层与中产阶级家庭,以及包括家营式非正式领域生意在内的小型商企,都因为易得又负担得起的低薪外籍帮佣和劳工而获益。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私人界如今则有幸成了经济成长的火车头,亦是众人追求高报酬与事业速成之所。哈林·沙列(Halim Salleh)曾观察说:

“这个社会对于财富、权力与美好生活的认知,突然有了新的逆转:传统上对政府的依赖,已经不敌私人界所能承诺的物质回报。如今在私人公司上班或自营生意,已能予人社会地位提升之感。”¹⁹

那些倾向自视为“最优秀聪明”的大专毕业生与专业人士,都不愿再投身于一度威望卓越的公务员行列。事实上,越来越多符合“选择性退休”资格(当时所设标准,为四十岁的壮年之龄)的高级公务员,包括学术人员在内,也都受鼓励离开公共领域,以开展新的企业或经商生涯。而若某些政治人物的话可信,马来西亚的成功,甚至已诱使许多“新经济政策移居者”(NEP émigrés)²⁰ 憧憬归国。当时社会各界普遍弥漫着高昂的乐观情绪,并洋溢经济繁荣的幸福感,令人

难以相信不过数年以前,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曾经狠狠打击过马来西亚社会。有时候,马哈迪似乎真能像他所说,在经济高成长之际仍可通货膨胀率减抑至“零”,²¹ 还有他所谓经济不会过热、其成就绝非偶然的话,似乎也是不假。

简言之,马来西亚当时似乎真能闯出一番非凡成就,尤其其它的经济表现,还恰好受惠于世界史上难得一见的东亚惊人工业成长。马来西亚兴旺的股票市场,已经使它跻身新兴市场一员,因其获利潜能而深受环球投资基金经理人的青睐。马来西亚经济更被世界银行高调誉为“东亚奇迹”。此外,这个国家还是某些观察家相信,即将在西历第三个千年期主导世界的亚洲一员。在大量关于亚洲持续崛起的有关市场、国家与区域的论述中,马哈迪为马来西亚社会设定了一个颇见矛盾的位置。一方面,马哈迪因深疑西方人的背信作风,连带使他对于“西方”将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都贴上“新兴工业国”(newly-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NICs)的经济标签,深深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类标签不是赞誉,反而不过是美国用来剥夺东亚新兴工业国继续享受其一般优惠制(GSP)关税的策略一环。世界银行的热情澎湃,也未能使马哈迪稍缓辞色。他不断强调所谓的奇迹,都是借着谨慎规划,再配合那需要东亚人——包括马来西亚人——付出大量“辛劳、泪水与汗水”的“老方法”,²² 辛苦换来的。马哈迪同样也拒绝接受任何将21世纪视为“亚洲世纪”的预言,认为这“虽是个非常迎合亚洲人自尊的诱人想法”,实际上却是“黄祸论调再兴,只不过这回还添上了少许褐色”。²³ 对马哈迪来说,西方有关亚洲支配的预言,不过是为了正当化其贸易保护主义和其他经济上针对亚洲的坏念头。

另一方面,马哈迪本人对于亚洲欣欣向荣的现实及前景,未免过于自豪,而不置疑某些亚洲菁英和民众普遍认为所谓东亚发展模式的优越性,造就出许多强劲“猛虎经济体”(tiger economies)的观念。这种自豪感表现在外交上,就是马来西亚倡组的“东亚经济集团”(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 EAEG)。他认为这拟议中的集团,

将能较亚太经合会(APEC)架构更能够直接表达亚洲各国的经济利益,因亚太经合会根本就是由美国和其他太平洋国家在主导,亚洲各国并无分量。惟亚太经合会内部主要来自美国的反对声浪,却终使马来西亚不得不为其倡议瘦身,将东亚经济集团构想,降抑为没什么实际作用的“东亚经济论坛”(East Asian Economic Caucus, EAEC)。马哈迪恣意表达他对亚洲竞争力的信赖,并力陈“该是让亚洲享有适当尊重的时候了”。²⁴这需要经由“亚洲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建构达成,亦即他所谓让亚洲成功、稳定的一类非西方价值观。马哈迪的论证,加上李光耀对亚洲文化的看法,马上在90年代中期激起一场国际性的“亚洲价值观论辩”。马哈迪与其他“亚洲价值观”的提倡者,着重点虽稍有差异,却都同声共气,紧扣着一组相同的价值来谈。²⁵他们认为,亚洲人向来显示出一种偏爱稳定领导更甚于政治多元的文化倾向,希望维持政府的一贯而非改变。另外他们也提出来说,亚洲人都会直觉地对权威与社会和谐怀有敬意,并倾向寻求共识,避免出现异议或对抗。他们往往还会将这论点进一步引申为亚洲人偏爱强势甚至严厉政府,只要政府的政策与作为,能够持续带来经济繁荣即可。所以亚洲领袖如马哈迪和李光耀都坚持说,亚洲人不仅容忍甚至还会欢迎一个凡事皆管、渗透力强的国家机关,并不在意政府官僚介入社经事务,因亚洲人更关心其经济福祉,而不是他们眼中西方人所热衷的公民自由与人权。最后,他们认为亚洲人乃群体主义(communitarian)而非个人主义者,并且接受群体的福祉与共同利益,应先于个人权利。这类价值,正是东亚发展模式之道德基础。

在这场政治人物、意识形态思想家、社运活跃分子、学术人员与新闻工作者都曾参与的“亚洲价值观”论辩里,不少人点出来的有力批判,都是环绕在“亚洲价值观”的观念有效性和它被亚洲威权政府粗劣挪用的问题上。然而“亚洲价值观”论述的真正意义,并不落在哲学上的认识论(epistemology)或人类学范畴,而关乎其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日本经济虽然在90年代开始即呈现滑落,东亚的菁英

们,却仍坚信这块地域的伟大。其实任何宣称某某价值乃亚洲固有的、不变的与独特价值的说法,都不难被人从中挑出毛病与造作之处。但即便如此,亚洲的菁英们,还是需要一类民粹式的文化与哲学上的共同基础,来表面上抚平——交流应该还谈不上——亚洲多元歧异的风貌。马来西亚社会或许并不怎么为各式“亚洲价值观”的说法所动,不过在领导菁英反复提到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价值观与工作伦理、模式与奇迹,以及谆谆训诲要“向日本学习”、“向南韩学习”、“向台湾学习”的不断轰炸下,它遂也不免沾染了亚洲必胜情绪,虽还不至于强烈到感觉与这些东亚成就卓越者休戚与共,毕竟开始有了同心协力的一体感。处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亚洲价值观”之于亚洲,竟巧合地一如2020宏愿之于马来西亚,也发挥了同样效用。²⁶而因为马哈迪同时大谈这两套意识形态,不难理解民众即会在意识里揉合这新鲜的马来西亚民族主义与初兴之亚洲区域主义,并将“马来西亚能”和“亚洲可以说不”²⁷的印象,连结起来。

从那时候起,某方的民族主义雄心,即因为另一方的区域必胜激情而获得确证:世界的未来既属于亚洲,马来西亚当然会有光明未来。

霸权统治的插曲:1995年全国大选

1995年4月全国大选前,马哈迪即已牢牢掌握着马来西亚政治可预见的未来。这场大选从两方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首先,1995大选的结果,本质上标志着以新经济政策为主轴、族群间争论极为激烈的一段政治时代,终于落幕。其次,国阵那几乎将反对党于1986和1990年取得之战果横扫殆尽的辉煌胜利,普遍都被人看成是马哈迪的个人胜利。

1970—80年代,马来西亚的政治风貌,曾因政府实施新经济政策与先前延续下来的文化争论,而充斥着非常紧绷的族群争执。这类政治争执,曾在1986年8月的全国大选中达到最高潮,并于1987年底发展到了令人忧惧的地步。争执后来还延烧至1990年大选,不过

这场大选说来就更复杂了——巫统已经在1987年分裂，拉沙里和巫统异议分子，还不断地挑战马哈迪的持续领导。然而在新经济政策落幕与2020宏愿映照下的社经环境里，族群间的相互斥责，却因几方面的因素而稳定地减少了。高飞的经济成长率及随之而来的繁荣，还有国家发展政策的提出，都共同移除或抑减了直接触发族群争议的经济源头。此外，马哈迪政府也对高等教育推行某些自由化措施及改革，包括将公立大学企业化，让新学院私有化，并开放高等教育领域。这类措施扩大了高等教育机会，遂减少了新经济政策下，公立大学依族群配额招生引发的争议。这正是当时政策重点转移后的典型表现，即随着1994年高等教育法令通过，各种措施都会在务实的基础上，因应就业市场需求而加速人力资源发展，并改进大专毕业生与专业人士的素质，以契合国家所需。

类似的务实作风，还可以在昔日容易造成争议的语文及华校问题上看出。马哈迪70年代担任教育部长时，曾在推行以马来语作为国民学校系统及公立大学唯一教学媒介语的国家政策上，扮演过关键角色。国语政策实施二十年后，政策本身虽未遭人贬损，却在政治、行政与企业各领域皆激起忧虑，咸认马来西亚人的英语程度已大不如前。马哈迪遂思调整国语政策，以扩大并深化英语在各级学校和大学里的应用。这是他再度以务实理由来说明政策调整，即之所以重新注重英语，主要是为了应付外交与国际商务、快速跟上科学知识与技术进展，并维持资讯科技理解能力的需求。惟马哈迪恢复使用英语的计划，却因马来“语言民族主义者”的反对，而没办法有系统地施行。无论如何，学生绝大多数为非马来人的私立学院，终得以英语授课，尤其学院若与外国机构联办课程，更是如此。最后还有一点，则是出人预料地竟有不少非华裔学生——这当中绝大部分为马来学生，进入华文小学就读。1995年时，这类学生据估计就有3.5万人。一般送子女进入华小的非华裔父母，都相信华校的纪律较佳，且能在数理科这类“困难科目”上提供出色教学，如此一来，自然能够在公共领域已非主要就业之地的新局面里，让学生更好地面

对未来。我们若对照华教政治过去的喧嚣史及当年各方就国语政策展开的激烈辩论，华小马来学生如今稳定增加却丝毫没掀起争议的现象，无异昭示着族群关系的转变，而这绝非新经济政策时代所能想像。²⁸ 由于马来西亚族群间的分歧与文化怨情总不免内含经济要素，马哈迪就文化问题从经济与务实角度切入的解决之道，终于消弭了族群间针对语文、高等教育配额制与华文独中诸议题的口角。

1990年大选后，有组织的政治异议，乃集中于三大中心——此即沙巴、吉兰丹两州和以华裔为主的大型都会选区。在沙巴，沙巴团结党凭恃卡达山杜顺族人与华人联手下的坚定支持，从1984年起共执掌了十年州政权。沙巴政治由于地方对联邦政府侵权的反弹、卡达山杜顺（大致为非回教徒土著）族群意识的抬头，以及各主要回教徒土著政党重组整合为沙巴巫统的发展，早已出现族群因素与地方主义交织结合的色彩。²⁹ 回教徒与非回教徒土著两极化的基本态势，不啻让既非回教徒又非土著的华人，夹到了两者中间。至于吉兰丹方面，则是由1990年大选在该州囊括一切、尽逐巫统势力的回教党与四六精神党联手执政。吉兰丹政治几乎可说就是马来政治，这里头充斥着回教党惯用的回教语汇、四六精神党争取马来人权益的“复古”诉求，以及巫统口口声声代表马来人族群、宗教关怀的声明。民主行动党虽没在哪里执政，当时却崛起为重量级反对党。它的力量，来自马来西亚半岛上（尤其是檳城）以华裔为主的大型都会选区。不过这类选区总会微妙地在执政联盟与反对党之间摆动，依选民对地方上经济利益的算计和族群关系的整体气氛，而变换抉择。

惟到了1994年2月的沙巴州选举，卡达山杜顺族人与华人反对力量的结合，却因团结党丢掉了维持十年的执政权而分裂、弱化。该党的挫败，其实是联邦政府压制、它本身的州选举失利，以及某些议员选后即跳槽至巫统领军的国阵所共同造就的结果。而到了1995年大选，巫统也已在吉兰丹州赢回7席。回教党仍有24席，四六精神党12席。³⁰ 不过回教党与四六精神党的结盟，当时却已濒临崩溃。大选后仅仅一年，回教党在丹州的执政地位，就因四六精神党解散和曾

是马哈迪最强悍宿敌的拉沙里率众回归巫统，而变得岌岌可危。³¹ 不过，1995年大选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结果，还是行动党竟失去了它1990年所获20国会议席中的11席。这场溃败，是因行动党这回就连传统上的强区——以华裔为主的大型都会选区都保不了。在槟城，1990年时，非马来人选民简直可说已准备好将州政权交给反对阵营，岂料到了本届大选，行动党竟丢掉14州议席中的13席。换句话说，1990年时只差3席就可以组织槟州政府的行动党，如今却只剩下区区1席。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向来和行动党竞夺华人选票的大对头马华公会(MCA)，1990年时还因为非马来人选民对这巫统最老牌搭档宣泄怒气而在槟州全军覆没，1995年却囊括了该党竞选的全部9席。总体来说，国阵也拿下了历来最高比例的选票(63%相较于1990年的53%)，并赢得空前的国会主导优势(84%的国会议席)。无论如何，1994年沙巴州选举与1995年全国大选的结果，并未标志着族群政治终结。只要选举体系依然按照族群的分际建构，投票行为就不免受族群议题和利益所左右。不过团结党的挫败、回教党—四六精神党的不如意及行动党的惨败，却也点出老式族群诉求的吸引力，的确已经渐失。有关新经济政策重组社会的争论不再，大学的配额限制、语文及华校议题也都没戏可唱，于是就连前反对党支持者，套句罗国华的话来说，也开始偏爱“从族群主义至发展主义



中国报提供照片

1995年大选——马哈迪的个人胜利

的转移”。³² 话说回来，2020宏愿若不是个诱人的发展至上产物，那还是什么？

1995年大选乃马哈迪领导国阵四人选战以来最辉煌的胜利，而这无疑也是他个人的胜利。当时马哈迪已是在任最久的首相，俨然已成无可匹敌的政治人物。他对未来的愿景亦独据民心，且民众对他的继任者到底是谁，也还没多大兴趣。这场大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结束了以新经济政策为主轴的政治。1987年10月几乎演变成暴力冲突的族群间恶言相向，大致已不复记忆。就连执政联盟与各反对党内某些政客惯用的公然操弄族群怨懣的手法，也都收敛不少。取而代之的，竟是对2020宏愿团结目标的真诚且满怀希望之议论。

巧的是，即便是回历与华人农历，这回可说也帮上了忙。从1995至1997这三年间，回历新年与农历新年竟极难得地凑到一处。如此巧合，催生了令人朗朗上口的“Gong Xi Raya”一词(即以回教徒的“Hari Raya”，结合农历新年之贺语“Gong Xi Fa Cai”而成)，遂能偶然地将族群歧异的旧要害，转换成文化多元的新力量。马来西亚社会就这样微妙却意味深远地，摆脱掉了过去以社群为本位的某些倾向。它已经从马哈迪所号召的竞争性国家资本主义兼统合性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而不仅仅是马来民族主义)的精神中，取得某种形式之共同体意识(communitarianism)。³³ 由于国内政治多少会受国际事件影响，“东亚奇迹”全盛期下这类竞争性国家资本主义精神，自然显得迷人，而统合性民族主义也在前苏联集团崩溃后骇人的族群战争映照下，格外显得明智。

独立后的初期岁月里，国家归属感诚然是联盟(Alliance)执政最着力之处，惟马来西亚却仍是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国度。接下来的新经济政策规划者，以国民团结为终极目标，但那依然抽象遥远。不过到了90年代中期马哈迪治下，国家归属感与国民团结，却都前所未有地贴近真实。当副首相安华抛出他那句“我们都是一家人”的口号时，³⁴ 他或许不吝多说好话，但这话却可能并未言过其实。

多媒体超级走廊的未来主义 (futurism)

如果说有样东西是马哈迪一直焦虑地想要卖给其“家人”的话，那就是阳光里的未来（借马哈迪过去的某句吁求话），或以今日的卖弄说法，就是确立本身在无国界世界里的一个适当位置。

马哈迪在这件事情上，因其本人对科技的兴奋之情（尤其当科技具体落实为可动之物，如摩哆车、汽车、海船或飞行器时，更是如此），更是不遗余力地促销。举例来说，不论是出于彰显他娴熟大型机械或其社会地位的动机，抑或两者兼具，马哈迪曾骑过哈雷摩哆车 (Harley-Davidson motorcycle)，而在亚罗士打当医生时，他开的则是庞迪亚克 (Pontiac) 的大车。身为首相，马哈迪似乎真的很高兴在汽车、卡车甚至小型赛车的驾驶盘后供人拍照。要不他会孜孜地登上船舰、快艇，或坐在飞机的驾驶舱里。而虽未拥有飞行员执照，马哈迪却故意让人知道他驾驶飞机。还有新点子老是不不断涌现的马哈迪，为促销浮罗交怡旅游业，更发起浮罗交怡国际航海及航天展 (LIMA)。而贴近新落成的吉隆坡国际机场之雪邦国际赛车场，则将适时地为第一方程式竞赛提供驰道。

另外犹值一提的是，马哈迪可不像他某些同事或下属，因对科技怀有恐惧，而不愿去碰触机械，或对电脑无动于衷。马哈迪由始至终，都是位科技迷。他对科技的兴趣与信仰，早就可以从当初提倡重工业化的努力中看出，虽然这事后来并没十分成功。总之，当马来西亚政治人物与官僚对于科学、科技、研发及创新种种，都还信念不坚地说不出个所以然时，拥抱科技的马哈迪，却已将迈入公元第三个千年的未来拟人化，意识到未来发展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掌握资讯科技。

既如此，那就来“热爱资讯科技吧！”(Cintai IT!)——这是国家很快就透过公共广播及电视，向其公民作出的规劝。资讯科技的热爱者，恐怕难免都会爱上多媒体超级走廊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MSC)，因为它计划拥有“全世界最好的硬件基础建设”，并“跃进式提升当前的资讯基础建设”：

“MSC 就硬件上来说，是个宽 15 公里长 50 公里的廊道，以世界最高建筑且本身即是个智能区的吉隆坡城市中心 (KLCC) 为起点，一路延伸至 1998 年启用后将会是本区域最大的机场。这块几乎全是绿野的地皮，将用来建设最先进的都市与系统。我们会在 KLCC 与吉隆坡国际机场的中途建两座城市，即马来西亚的新行政首都 (布特拉再也) 和一座电子数码城 (cyber city)。后者将供我们安置各项产业、研发设施、一间多媒体大学及各机构，并作为跨国公司的营运场所，以多媒体指挥其全球范围内的制造和贸易活动。”³⁵

就概念上来说，MSC 的大胆“前提”是，它最终将会带来：

“一个让国际公司和马来西亚公司相互依存的多元文化网络，合作开发新产品新服务，并行销于经济活力十足的亚洲甚至亚洲以外。它还会像个蜘蛛，在参与的国家当中，编织出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协力网络。这样的网络，当能成为资讯时代的发展新模式。”³⁶

另外为促进 MSC 内各公司的运作，国家将制定“全世界最好的软件基础建设”，亦即某个“契合社会的网络商务诸法构成的总括性框架。举凡智能财产、数码化签名、电脑犯罪、远距学习、远距医疗及电子化政府，皆包含其中”。³⁷ 当对着一群他极力讨好的美国听众发言时，从来就没促进过国内民权发展的马哈迪，针对这事，竟会愿意提供一项“十点多媒体保证法案”给那些已获多媒体发展机构 (Multimedi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亦即该计划“充分授权的一站式店”) 授予 MSC 地位的公司。³⁸

这是马哈迪将马来西亚作为一处投资中心，促销全世界的典型热忱。以公关顾问的话来说，马哈迪是在精力充沛地进行“巡回演出”(roadshow)，以向国外投资者和大学听众“展示”(showcase) MSC。此外，马哈迪也颇有先见之明地邀请某些世上最佳、最聪明与最富裕的资讯科技经营者和创新者，担任 MSC 的国际顾问团成员。马哈迪仿佛就是位孜孜不倦的推销员，强调着任何他能想到的、马

来西亚国家与社会可以确保该计划成功的优良特质。举例来说，他认为国家三十年来，都能使发展的优先重点契合全球工业生产结构变迁的经验，证明它既有能耐作细心规划，也具备推行长程大计划的财政能力。另外国家与外国直接投资者彼此都满意的伙伴关系，也可以从马来西亚过去成功吸引并扩大了出口加工区内出口导向工业化范围的表现，得到证明。如今甚至连马来西亚的族群差异，都已不再是弱点，反而成了为推动 MSC，急需征用的一股重要力量。马来西亚“多文化、多语言、多族群的环境……源自许多亚洲文明”，为“马来西亚生活带来独特的生命力”，并将有助于公司与“规模最大的亚洲市场建立多元文化连结”，遂能使业务上（包括多语文出版或远距医疗）需结合多种形式的西方、非西方知识的公司获益。³⁹

当然，马哈迪在这类推广活动中，未能免俗地也要为进驻 MSC 的外国投资者提供投资激励。惟马哈迪即便偶尔会在产业领袖、重要角色与其他有分量的意见、决策人物面前言词谦逊，这回他行销 MSC 的手法，却避免模仿未开发国家竞相吸引外资时，抛出第三世界相对优势配套的那种典型的可怜兮兮姿态。还有就算“马来西亚相当清楚的知道，自己并非任何领域尖端科技的领航者”，⁴⁰ 马哈迪还是以一种自信马哈迪式民族主义正在世人面前展现的想像，来宣传 MSC。他提醒众人说：“别的计划听来或许类似，因为它们全用上



“……唯有多媒体超级走廊，才是这世上货真价实的头一个。”

了‘资讯科技’、‘网络’或‘多媒体’这类字眼”，⁴¹ 不过唯有 MSC，才是“这世上货真价实的头一个”。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里——亦即当世界正来到“网络革命的关口上”；当迈向资讯时代、数字经济、电子商务、无国界行销、无线电信业等等之路，都必须以“智能多媒体”来铺设；以及当“工业时代的精神死亡剧痛与另一精神之诞生”，呼唤着一个“不仅仅是多媒体科技，同时也是……开展中的资讯与科技时代新生活方式演化的庞大试验场域”时，马哈迪正是将 MSC 呈现为马来西亚“带给全世界的礼物”。⁴²

MSC 的许多概念与兴致所在，当可溯及马哈迪个人和其政府，对于马来西亚经已达到外资带动之出口导向工业化极限的关注，这是从后者对国家经济的需索或贡献方面来说。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市场对于一国投资环境诱人与否的衡量标准，不断改变，而这意味着马来西亚之广开门户，长远来说或已保不住竞争优势。这个国家恐怕有必要揭橥新的经济方向与政策，来进一步转移国外科技或提升本土科技。无论如何，都不能任经济从原先制造电脑零组件与装配电子产品的辉煌中凋零。据马哈迪和他手下两大工业计划大蓝图 (IMP) 的规划者算计，马来西亚经济，必须从服务型的后工业发展方向，朝更有赚头的附加价值链内前/后生产阶段转移。以实在的话来说，作为此方向转移象征的 MSC，将为研发工作、科技创新、软件工程及以资讯科技为基础的新型态服务业，提供一处巨大的温室。

另外，MSC 也将作为“以塑造资讯时代的全球力量，来调和我们整个国家的领航计划”。⁴³ 于是在 2020 宏愿范围内，一个紧扣着 MSC 的马来西亚，将会从制造业经济一跃而进入后工业社会。1996—1997 年间，马哈迪政府在国际听众面前呈现 MSC 的方式，无疑充满“未来兜售者”大多都会采用的意象、夸张言语与诱惑。然而当观念、知识与愿景都是全球面向未来的时髦用语之际，MSC 的大胆概念，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不过这份胆识，随后即因为执行上的各项问题，而大多遭人淡忘。MSC 遂也被人与其它“霸型计划”混为一谈，批评它们不过是

些累赘之物。这项计划即便不是恰逢国家面临最严重经济危机时开始施行,当前也没人可以权威地确定,马来西亚是否真能崛起为举足轻重的资讯科技要角。⁴⁴但我们确实无法小觑这马哈迪式愿景中最恢宏的大计、以一国之力跨时空地投入资讯科技的无与伦比象征诞生后,伴随而来的未来主义魔力。

宏愿。繁荣。民族主义。区域主义。马哈迪意识形态上的说服力,大多来自这四要素及彼此间的互动。如果说物质繁荣确证了2020宏愿,宏愿反过来亦鞭策着经济成长。过去经济高成长的经验固然重要,但它主要却是作为火爆的族群交涉与阶级控制的镇痛剂。90年代以前,马哈迪式民族主义因其本人常令人无法捉摸地在马来人一马来西亚人之间摇摆,而难以开展。但如今在国内,马哈迪主义讲的,却是崭新的马来西亚民族认同(Bangsa Malaysia),而国际上它则融合了新兴的区域主义。如果个别来看,宏愿、繁荣、民族主义与区域主义这四要素,都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它们适时凑到一块的结果,却成了怀抱着必胜信念的非凡母体(matrix)。这当中的基本经纬,就是民众对政治领导人与日俱增之信任、对国家能力的乐观评估、区域内的真实成就,以及对最终回报的可靠承诺。所以我们或可如此描述马来西亚社会:往内看,它已恢复信心,正在高喊“马来西亚能!”(Malaysia Boleh!)往东看,它会发现一个经济奇迹。至于遥望未来,它则预见自己成了先进国。

所有这一切,都能让人读到一种去殖民化叙述,因为这样的历史成就(主要表现于昭告的意图中,但也不无部分事实)可是真正去殖民化的关键所在,理由即在于它有助破除想像世界的殖民化。⁴⁵惟追求这样的成就,却也摆脱不掉一道逻辑——那就是要赶上前殖民者或与其并驾齐驱,而这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后殖民情境里,到头来都甚常走样出岔。就大马社会而言,马哈迪这要迎头赶上甚至超越西方的逻辑,需要对心理兼社会层面的一类自卑情结,作出矛盾的过度补偿。这类情绪源自马来各邦对殖民者的俯首称臣,因马来社群经济上的相对落后而益彰,并一路延伸至马来西亚低度开发时期。

宏愿、繁荣、民族主义与区域主义这凑成一块的母体,无疑大大削弱了这类自卑感,以致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社会,终能求得些许安宁。从2020宏愿至MSC,马来西亚社会可说已绕完一个大圈,扬弃了它对内部族群分歧的执着,转而改采“以全球力量,调和我们整个国家”的外向性策略。然而这个母体一旦确立,自卑感却摇身一变而为追求极致的傲慢:世界最高建筑、世界最佳的硬件基础建设、本区域最大机场、最长的海底电缆,以及MSC这“世上货真价实的头一个”。那就仿若被殖民者从前极受钳制的世界观,必须以进入《健力士世界记录大全》的方式超越。还有其他种种“马来西亚人第一”,亦紧接而来:征服埃佛勒斯峰(Everest)、赴南极上空跳伞,或者单人孤船环航整个地球。马哈迪勉励国内的年轻人说:“我们当要有自信实现所有梦想……这包括攀登埃佛勒斯峰、航越太平洋、征服南北两极。”⁴⁶但这些梦想,难道不就是在跟随大多已逝的“大英帝国众英雄”的脚步吗?那又何尝跳出了想像的拘限?马哈迪说来还曾在“大英帝国的解体上,扮演过小小角色呢。”⁴⁷马哈迪如此有悖于自己向来极清醒并斥责任何“猴仿(aping)西方”之作为,竟要驱策马来西亚年轻人去尝试那些“之前唯有西方人才喜欢干”的“疯狂事情”,这样的去殖民化心理,是不是有些问题?⁴⁸

然而马哈迪的愿景并不纯为个人之事,更不仅仅是个胜利的意识形态建构。这位精明的领导人,拿捏得住一般民众的关怀与热望,遂能在90年代伊始的重要时刻里,说出马来西亚国家资产阶级的梦想。新经济政策时代的初期马哈迪主义,充满马来民族主义观点,倾向依族群分际来重塑马来西亚政治经济。但要达成这项任务,却又必须依阶级来重构马来社会,也就因此重构了马来西亚社会。晚期的马哈迪主义,则是越来越没把重心放在马来人面对非马来人蚕食时的普遍焦虑,而是越来越关注马来与非马来菁英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雄心。

马哈迪是在1991年2月马来西亚商业理事会(MBC)的成立典礼上,揭橥其2020宏愿,而不是先与马来西亚人民、人民的国会代

议士或甚至巫统分享;这事其实并非政治上的巧合。该场合云集的国内外及马来/非马来人工商界领袖,以及经遴选安置到理事会的政治人物与高级官僚,才是马哈迪想要针对并代表的发言对象,希望他们能够为马来西亚的未来好好努力,留下一番功绩。

回顾过去,马哈迪显然已经在追索“身为马来西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上达致突破。但这双刃的马哈迪式突破,到底有多牢靠,却很快就因为来到跟前的未来未如所料,而面临检验——这个未来,并非2020宏愿下支配命运的愉悦景象,而竟是众皆以为,MSC能够“调和”的恶性全球化力量的粗野展现。

- 1 前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曾就这事,说过一句颇富哲学深意的话:“身为马来西亚人,不外就是身为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卡达山人、姆禄人(Murut)、达雅人、伊班人和其他……”(Lim 1990:124)
- 2 'The Spokesman', *Asiaweek*, 1995-6-2, p.52
- 3 Mahathir (1993: 429).
- 4 同上, p. 428
- 5 同上, p. 431
- 6 同上。
- 7 同上, pp. 435-46
- 8 同上, p. 438
- 9 同上, pp. 435-36
- 10 同上, p. 439
- 11 Mahathir (1997c).
- 12 Hilley (2001: 7); 斜体为原文所加。
- 13 同上, p. 6; 斜体为原文所加。
- 14 Mahathir (1997c).
- 15 同上。
- 16 Camus (1956: 304).
- 17 这是挪用了安德森另一则有关民族主义的启发性想法(Anderson 1988: 364)。原文为“ineradicable Goodness of the nation”。
- 18 Halim (1999: 189).
- 19 同上。
- 20 这是我对那些因不满新经济政策而移居国外,且绝大多数为非马来人移居者的称呼。
- 21 Mahathir (1995a).

- 22 当马哈迪指出据某份调查显示,1994年时唯有智利人与韩国人较马来西亚人工作得更勤奋时,他尤其是针对“西亚人”强调这一点。(Mahathir 1997b)
- 23 Mahathir (1996e).
- 24 Mahathir (1996c).
- 25 见 Robison (1996: 310-11) 与 Rodan and Hewison (1996: 47-48).
- 26 Khoo (1999a).
- 27 这是马哈迪与石原慎太郎(Ishihara) 1995年合著之书的日文原名。
- 28 陈绿漪对于马来亚华教运动与政府之间漫长艰辛的论争,曾有过详细记载(Tan 1997)。非华裔(主要是马来)学子在华小就读的人数,目前估计已可达约6.5万人。
- 29 Loh (1997).
- 30 有关巫统与四六精神党所赢取的席位,英文版原作数字有误,现已更正。
- 31 随着四六精神党某议员拒绝回归巫统而转投回教党,1996年时吉兰丹州议会的权力均势为回教党25席,巫统18席。
- 32 Loh (2002).
- 33 在此我们必须强调“国家的”(national,译注:指原文之national capitalism)以凸显这股精神兼意识形态的团结性质,是如何有别于世界各地之情形。因为资本主义竞争精神从另一意义来说,是会孕育出“人人争先而落后者遭殃”的个人主义态度,并非恰恰与此相反的共同体意识。
- 34 值得玩味的是,安华是以华语而非官方的马来语来表达这句口号。安华对于文化多元主义的想法,曾在讨论“亚洲文艺复兴”时详述过(Anwar 1996)。
- 35 Mahathir (1997d: 78).
- 36 Mahathir (1997g: 41).
- 37 Mahathir (1997a: 98-99).
- 38 同上, p. 108
- 39 同上, pp. 104, 106.
- 40 Mahathir (1997d: 81).
- 41 Mahathir (1997a: 100).
- 42 Mahathir (1997f: 66).
- 43 Mahathir (1997a: 100).
- 44 有关MSC或面临某些实际问题的概括性当代评论,可见 Ong-Giger (1997)。
- 45 见 Nandy (1983) 与 Chen (2001)。
- 46 'PM reminds Everest climbers to be vigilant', *Business Times*, 1997-3-1
- 47 《大英帝国的英雄们》(*The Heroes of the British Empire*) 直到60年代中期,仍是小学五年级某历史教科书名。里头的主要人物,包括了 Edmund Hillary (译注:即埃佛勒斯峰的首位登顶者)、James Scott 与 James Cook 诸人。
- 48 'Wanted: Heroes', *The Star*, 1997-3-1

第三章

无政府状态的市场

惟一能够停止这事件的就是,全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金融体制有了秩序。

——马哈迪:引自《时代周刊》的报道〈你竟敢说这些话〉
1998年6月15日,页30

经济方案,只有在连带的政治和社会妥协都能被接受之下,才是可以实行的。拒绝认清这点的经济学家是在鼓吹乌托邦式的经济主义。

——沙米尔·阿明(Samir Amin 1993)

1996年4月16日,马哈迪在牛津大学的圣凯瑟琳(St. Catherine)学院发表演说时,对其听众说道:“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是个取胜公式(winning formula),我们信服市场经济。”只是,他随即问道:“昙花一现的繁荣有什么用?如果最终我们会被打回原形,回到贫困的境况,这样的繁荣又有何用?”¹于此,我们可别误解了马哈迪的意思,他并非悲叹市场的失灵,而是就人性的弱点发出警告。他要人们警惕,任何经济繁荣的社会,依然得实践良好道德与不懈的伦理,以免被打回原形。马哈迪在圣凯瑟琳学院发表演说的十五个月,就发生了以多个亚洲国家的货币大贬值为标志的“东亚金融危机”,而一些亚洲国家也真的“被打回原形”。这次,马哈迪参与

一个剧烈的意识形态与政策论战,以试图确定是什么人及什么因素,导致这场危机——究竟是东亚政权及其道德缺点?还是国际货币市场及其犬儒式的操纵?

主要由主流西方、区域与国际媒体发出的市场共识,则把这危机归因于亚洲统制经济的政权(dirigiste regimes),违反了自由市场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与资本部署的原则。这个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联成一气的市场共识,指责“东亚发展模式”,充斥着在强大政商利益结盟下的幕后商业活动,衍生了无效率、朋党作风与贪污。易言之,只有实行严厉的经济改革、市场纪律与优良管治的疗法,方有可能把这些被“投资者信心丧失”,所造成的垂死“猛虎经济体”(tiger economies)救活。²

可是,马哈迪则把矛头指向贪婪的西方货币商与套期保值基金(hedge fund,也称“对冲基金”)经理(以索罗斯[George Soros]为其代表人物);认为他们串通起来,对泰国铢及其他亚洲货币发动投机性攻击,以致触发了剧烈的货币贬值,最终导致了泰国、印尼、南韩的经济崩溃。更广泛地说,马哈迪把这个危机归罪于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受管制的操作状态,正是这种“不必要的、非生产性的与不道德”的货币交易,使得弱小的经济体变得无助。³既然是庞大的投资资金组织颠覆了主权国本该拥有的货币与经济掌控的能力,那么,需要更严厉管制与监督的,是国际金融体系,而非亚洲的政权。

马哈迪与国际金融资本之间的鸿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马哈迪的发展宏图被逼与全球金融市场对峙时的潜在冲突。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概括的,马哈迪的发展宏图,既是资本主义驱动下的民族主义事业,亦是充满民族主义抱负的资本主义事业。在90年代时,这个事业已沿着新经济政策(简称NEP)、民营化(privatization,也译为“私有化”)、马来西亚大宝号(Malaysia Inc.)、国家发展政策(NDP)与2020宏愿的政策路线前进。在这过程中,这个事业从两个结构性要素取得关键性韧力。

一为三角的权力均势;也就是源于国家、外资与内资之间,并

维系着大马政治经济相对稳定的权力均势。其二为在国家的优先项目与全球经济结构变动之间的管制性接触(managed interface),以营造整体竞争优势。然而这个扩张中的危机,动摇了这二根政治经济支柱,或正如韦德(Robert Wade)所形容,它削弱了国家“管治市场”的能力,并危及了马哈迪式宏图的持续推行。以往的萧条,从未使国家受到这样严重的综合性实质破坏:突发与急剧的货币贬值、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亚洲经济政权的敌视,及西方在冷战后全球环境中对东南亚日渐淡薄的关怀。

从马哈迪极端憎恶社会失序的思路来看,始于1997年7月的危机并非单纯是经济灾难,而是一种源自自由市场的无政府状态(anarchy)。此种失序状态,将使“无政府主义者借口推动开放式社会来摧毁弱小国家,并强制我们屈服于国际操纵者的独裁之下”。⁴若货币危机确是近于无政府状态,那么,马哈迪及金融市场的各种门户之见都不能成立,即这个破落既源自内外的失序,也源自各政权与市场的双重失灵。

下赌注

什么东西是“没有心、灵魂、良心与国土”?一位加拿大商人认为,答案是钱。⁵说得准确些,它是三种形式的资本,即外来直接投资(简称FDI)、组合投资基金(portfolio investment fund)和国际贷款。这些不同形式的资本,以不同的运作方式,对它们所到的国家、经济体与社群,发挥不同作用。只是,到90年代时,这些不同形式的资本,都被理解为在全球上下热衷于到处漫游,孜孜不倦地寻求谋利机会的流动性资本。

在大马所接触的这些不同类型的外资中,来自跨国公司的FDI是最受欢迎的。因为,这类FDI在国内建厂生产,尤其是在出口加工区里;即便其中有些已局部地在其国内基地脱离工业化,而令人担心他们不会安于一地,但是,他们的投资还是相对长期和稳定的。在大马,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一波FDI发生于70年代;当时,国家的

NEP的部分目标,已在源自全球工业生产结构变迁的“新国际分工”中实现了。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初期的另一波FDI,则协助马来西亚从1985-86年的萧条中脱身,更进而把经济推入高速成长期。

对大马而言,一向以来,国际贷款几乎都是由政府向外国借的,只是政府从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危机,及本身在“广场协议”(plaza-accord)后日币贷款升值中体会到偿还债务的痛苦经验等前车之鉴,而减低依赖外债作为发展资金的来源。从90年代开始,随着政府让国内金融界自由化,国内民间的举债人也更容易取得国际贷款——尤其是投身于霸型民营化计划的大型公司举债人。当国内的股票市场也享有国际基金经理所偏爱的“新兴市场”地位时,它也得到同一的金融自由化的便利。

其结果是,最具流动性的资本——组合投资基金,也一涌而入。由于这种“热钱”是投机性的,也毫不顾虑它的任意进退会为金融系统带来什么后果,因而具有破坏稳定的潜能。

即便政府对这时期的金融全球化有所保留,它还是希望利用它来扩张国内的资本市场。实际上,政府那时已在发展资本市场的物质、制度与法令方面的基本设施,以期能把马来西亚转变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在1990年,政府便在纳闽(Labuan)设立了国际岸外金融中心(IOFC),以便让拥有国家银行(BNM,即马来西亚的中央银行,简称“国行”)发给的岸外银行业务执照者,在纳闽设行;也有计划在纳闽设立国际股票交易所与货币交易所,以及利用国际岸外金融中心,来提供各类回教岸外金融产品所需的专门知识。⁶另外,经营各类债券、凭单与票据的成长中的民间债务证券市场,也需要另一个国内等级评定机构来提供服务。到1996年末期,吉隆坡期权与期货交易及马来西亚货币交易所也预定开始操作。作为一系列金融自由化的部分措施,向来需要为其资产作谨慎投资的国内最大的资金库——雇员公积金局,也早已被允许在资本市场进行更大的投资。股票行不但可以经营单位信托基金,还引进了级差型(graduated)佣金制,以使其抽佣收费更富竞争力;与此同时,外国基金管理公

司,尚被允许在本地百分之百管理其基金。吉隆坡股票交易所更接受大型民营化基本设施项目公开上市。简言之,政府有计划地扩大、开放与提升吉隆坡股市的操作、指南与便利,以期它能把证券业“提升到更高水平的精湛运作与专业地位上,并与证券交易的全球化同步”。

马哈迪也曾不很热衷于急剧成长且与“真实经济”脱节的国际“纸币经济”(paper economy),也就是,货币在各类有价证券、票据、衍生产品间,像是无限地转换来转换去的交易活动。他尤为关心货币交易及外汇交换波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牵连作用。⁸但是,当马哈迪式经济规划需要加速成长,以及需要越来越多资金注入各类经济领域时,政府提升国内资本市场并从中吸纳投资资金的政策,使到“证券交易全球化”成为政府有计划地参与的国家发展优先项目。在90年代,一些官方言论便暗示,政府有意扩大与多样化吉隆坡本位的资本市场,以期它能超越新加坡,或取代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的金融地位。一份有关马来西亚资本市场赚钱潜能的投资评估,尚特别热忱地预测吉隆坡会崛起为“亚洲未来的华尔街”。⁹

不论吉隆坡发展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真正前景如何,在政府与金融市场交会下的创议金融自由化,恐怕只会让一批国内的综合企业(conglomerates)受益最多。因为这些综合企业处于进入金融服务自由化领域的最有利地位,且需要为本身的快速扩张寻求资金。这些国内综合企业——由马来人、非马来人,以及马来人与非马来人联营,早就在马来西亚大宝号(即在马哈迪的策划下,后NEP的政府与国民资本联盟之称号)的框架内被培植起来。¹⁰马来西亚大宝号基本上是让马来资本可扮演主要角色的联盟;¹¹但是,这些享有迈向广泛的民营化门路的综合企业,通过特权而获取商业进展,却在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权力联盟与治理方法上,留下了不少后果;进而为1997年7月的危机埋下了本土因素。

本来,马哈迪政权实施民营化的理据,是出于削减公共支出、

解散无利可图的国家企业,并建立更有效率的民营部门(私人界)。在英国的撒切尔(Thatcher)政权下,这理据曾被意识形态化为“卷回国家的前线”。但是由于民营化已“深植于政策罗网中”,且政府早在1991年便已制定了《民营化大蓝图》(Privatization Masterplan),结果有利可图的优先发展项目便由公共部门彻底移交给民间部门。¹²于是,在接下来的实践过程中,就违背了当初的理据。民营化最终包括了出让有利可图的国家专营(state monopolies)事业(如能源与电信),授予大规模基本设施工程(如南北大道与巴昆水坝便是其中最大的项目),以及开放社会服务里的新兴商业化领域(如保健与高等教育),给国内资本。这个趋势终而使日益多的领域、公司与项目落到民间的手中。可以说,民营化涉及了一定程度的“卷回国家的前线”的现象。尽管它是以亲市场的名堂来进行,马来西亚的民营化并不全依照市场条件来运作。比方说,大型民营化项目,便是在没有公开竞争,甚至常是连招标过程也没有的情况下签定的。¹³在这种严控情况下,由于有影响力的结盟围附着国内综合企业茁长,以及有权势的政治人物竞相成为民营化的主要受益人,各类的寻租活动与金钱政治便盛行起来。

诚然,并非所有的综合企业均靠民营化项目起家;其中一些在尚未成为大型民营化项目的候选人之前,已在各自领域建立了名声(虽然,也享有不同程度的政府照应)。但是,现在,一种新型的,与政治权贵关系密切的马来人、非马来人或族际性综合企业,逐渐演化为享有特权的寡头企业集团(privileged oligopolies)。这些综合企业并不从事那些必须开发世界市场的制造业——这一方面的成功取决于技术创新、研发和国际竞争力。它们其中一些从事原产品生产,或原料导向工业;前者的竞争力可上溯及殖民时期,而后者则享有原产地采购的明显优势。它们大多涌向银行业、资源开发、建筑、房地产、赌博、旅游、交通、公用事务与选择性的进口替代工业。这些都是政府的政策、保护或惠顾可决定成败兴衰的行业。

总的来说,这些综合企业均采取近乎标准的商业策略(虽不一定

依以下次序进行),即:经营房地产、建立建筑能力、游说获取基本设施与公用事业、取得银行或金融业务或证券行执照、收购种植园、扩展到旅游业及进入新的民营化领域,如电信与社会服务事业。早有人观察到,这些“当代综合企业的成长方式”日益涉及“合并、收购与资产拆卸(asset-stripping),而不重视相关的经验与专门知识”;这也反映出,“他们较兴趣于积累金钱而非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能力——这是艰难但最终却是必要的环结”。¹⁴到了90年代,一个个的综合企业相继采取了意料中的发展方式:先在一领域建立“旗舰”(flagship),然后透过企业接管(takeovers)、收购、合并,或向政府申请建立公司“舰队”。于是,这些综合企业会转化为日本式“财阀”(zaibatsu)或韩国式“财团”(chaebol)。二者的成功,皆启迪了马哈迪的马来西亚大宝号的想法;只是,一个关键性差别是,典型的马来西亚综合企业并不以生产力、创新与出口竞争力闻名,而这些则是南韩政府施加于该国“财团”的表现准则。

在高成长时期,马来西亚的这种企业扩张趋向确是狂乱。为了

表 3.1 马来西亚:1987-97年私人界未偿付外债

| 年份 | 中期与长期债务 (亿马币) | 短期债务 (亿马币) |
|-----------|------------------|---------------|
| 1987 | 55.59 | n.a. |
| 1988 | 48.55 | 24.64 |
| 1989 | 46.13 | 33.43 |
| 1990 | 49.43 | 44.15 |
| 1991 | 67.23 | 71.71 |
| 1992 | 104.71 | 131.57 |
| 1993 | 154.98 | 173.20 |
| 1994 | 242.03 | 142.44 |
| 1995 | 280.80 | 162.04 |
| 1996 | 329.73 | 251.70 |
| 1997 (6月) | 386.50 | 356.81 |
| 1997 (年终) | 610.89 | 432.57 |

资料来源:国家银行《月度统计报》(Bank Negara, *Monthly Statistical Bulletin*, January 2002:123, Table VIII.11)

支援它们的扩张,它们便从两个来源取得财务资源:向外举债和在国内股市筹资。在90年代的这一时刻,政府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挑逗已进入了状况,而自由化使综合企业更轻易筹举外债或内债。

在1988至1990年间,民间部门的中长期外债尚不到50亿马币(见列表3.1);之后,则以平均33.8%的年率成长,或从1991年的67.23亿马币升到1997年6月的386.5亿马币。¹⁵在1988到1997年6月,民间部门的对外短期债务,也从24.64亿马币升至356.81亿马币(见表3.1)。

企业扩张的第二个主要资金来源则是吉隆坡股市。从1991年到1997年第2季(即金融危机即将发生之前),组合投资基金的涌入直接促成了吉隆坡股市的成长。如表3.2所示,在1991至1996年间,外资投入股票与企业证券的总额竟增长了九倍以上。仅是1997年的首二季便显示组合投资的投入额高达697.97亿马币。¹⁶除了1991-97年间的期初与期末外,马来西亚在股票与企业证券都取得了净流入的投资额。这些资本流入,大大地推高了吉隆坡股市的资本总市值(market capitalization)。见表3.3。它在1997年2月达到了8886.6亿马币的顶点(相对于在1990年为1316亿马币,及1997年6月为7444.7亿马币)。在90年代,吉隆坡股市的综合指

表 3.2 马来西亚:1991-97年投资于股票与企业证券的组合投资

| 年份 | 投入额 (亿马币) | 支付额 (亿马币) | 净流入额 (亿马币) |
|------------|--------------|--------------|---------------|
| 1991 | 136.45 | 155.24 | -18.79 |
| 1992 | 333.24 | 264.81 | 68.43 |
| 1993 | 1,167.43 | 920.76 | 246.67 |
| 1994 | 1,299.53 | 1,155.21 | 144.32 |
| 1995 | 909.87 | 856.42 | 53.45 |
| 1996 | 1,275.90 | 1,208.99 | 66.91 |
| 1997 (首6月) | 697.97 | 782.79 | -84.82 |
| 1997 (全年) | 1,132.12 | 1,386.75 | -254.63 |

资料来源:国家银行《月度统计报》(Bank Negara, *Monthly Statistical Bulletin*, February 1998: 117)

表 3.3 1990-97年吉隆坡股票交易所精选指标

| 年份 | 综合指数 | 交易额 (亿马币) | 上市公司 总数 | 新发行股 总额(亿马币) | 股市总值 (亿马币) |
|------|----------|--------------|------------|-----------------|---------------|
| 1990 | 505.92 | 295.22 | 285 | 86.496 | 1316.6 |
| 1991 | 556.22 | 300.97 | 324 | 43.914 | 1612.9 |
| 1992 | 643.96 | 514.69 | 369 | 91.815 | 2458.2 |
| 1993 | 1,275.32 | 3872.76 | 413 | 34.326 | 6196.4 |
| 1994 | 971.21 | 3280.57 | 478 | 85.479 | 5088.5 |
| 1995 | 995.17 | 1788.59 | 529 | 114.376 | 5656.3 |
| 1996 | 1,237.96 | 4632.65 | 621 | 159.244 | 8067.7 |
| 1997 | 594.44 | 4085.58 | 708 | 182.247 | 3758.0 |

资料来源:国家银行《月度统计报》(Bank Negara, *Monthly Statistical Bulletin*, February 1998: 68-69, 72)

数,从1990年终的506点升至1992年的644点;之后在1993年几乎倍增至1275点;然后,在1994年与1995年各别递降到971点与995点。在1996年,综合指数还升至1238点;之后在1997年6月跌至1077点,并在1997年11月竟跌到危机后的545低点。¹⁷

在80年代后期时,马来西亚的金融系统已经历了改革;只是,这些改革,主要在于自由化资本市场,支援其成长,及引进一些竞争。¹⁸新的立法(1989年银行与金融机构法令)赋予国家银行更广泛的监督权;而1993年设立的证券委员会,目的则在于管制与制度性改革(尤其是在1986年吸收存款的合作社瓦解后)。只是总的来说,这些综合企业避免了本应在自由化下附带的审查与管制。部分原因是,在马哈迪政权下,技术官僚与行政官僚的权力均被削弱了。在敦拉萨掌权时,诸如国家银行、财政部及经济计划署的技术与行政官僚,都扮演着策划、执行与管制的关键性角色;而在胡先翁担任首相时,非金融民间企业与各州经济发展局,均享有社会型企业(social enterprises)的地位。

尽管我们可以批判他们的实际表现,以及带有族群色彩的动机,那些在NEP下管制资本的官僚,尚可能带着使命感执行其任务;但是,在马来西亚大宝号下,他们已受命与民间部门合作。或说得露

骨些,正如马哈迪爱说的,为支付公务员薪水的资本(尤其是马来资本)服务。¹⁹这造成了官方与商界之间的权力转移:“随着马来霸权在70年代的增强,占主导地位的马来官僚的角色也明显地提升;只是,进入80年代后,这个马来官僚的权力也得屈服于日益嚣张的企业主管,以及在政治上较具影响力的寻租型商业群体”。²⁰

其实,即便官僚机构有着严厉与一致的管制或优良管治,当它们与权力日增的综合企业对峙时,恐怕也难有效执行其职务。综合企业的权力,不仅反映于其倍增的资产及政治联系中,也在于它们在马来西亚大宝号下,是官商谘询机制的高层次论坛里具有影响力的成员(其中以马来西亚商业理事会[MBC]最为重要)。某些企业领导人据说特具影响力;但总的来说,马来西亚大宝号使大企业变得几乎与政府对等。前副首相慕沙·希淡曾说,“事情发展到民间部门发号施令的地步,他们凭着与领导层的关系,而告诉政府做这做那”。²¹一个明显的例外,则是首相本身。他高度集中了决断权与政策制定,几乎达到个人私有化的程度;以至于商界人士公认,取得马哈迪的信任,是良好商业实践的要素之一。

因此,这种权力与财富日益集中化的现象,形成了高明士(T. Gomez)与佐摩(Jomo K.S.)所谓的“政治化寡占”(politicized oligopolies),²²进而制造了以下的各类问题:缺乏有力的企业治理规划、政商之间的不透明关系、狂乱的寻租或坐享其成行为。此外,尚可加上: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经济过热的威胁、出口竞争力递减的可能性、高涨的债务,及形成中的房地产与股票市场的资产泡沫(asset bubble)等。这后一堆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其中一些在1997年年中诱发了对东南亚各国货币展开投机性攻击的主要因素。

货币贬值、股价下跌与撤资

事后孔明地说,即便是犬儒者也没想到,竟然是国际金融市场暴露了,马来西亚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事业不只是依存于借款,也依存于借来的时间。1997年始于泰国的“东亚危机”的传染,在二个

主要方面危及了这个宏图的持续推行。一方面,全球性市场力量,体现为货币交易商与基金经理失去了对马来西亚的投资信心,而猛烈贬值了马币和大大削减了吉隆坡股市的资本市值。另一方面,持续了几乎十年的高成长突如其来地终结,逼使政府得痛苦面对 IMF 型结构性调整与市场改革,以及迫切保持马来西亚大宝号领导下的宏业。

在1997年4月,马币汇率高居于2.493马币对1美元的高峰;但是,到了1997年7月与1998年1月,却各别跌至2.636与4.595马币对1美元。²³正如国家银行所报道:

“对于这股由泰铢浮动所引发而施加予马币的感染性压力,国家银行的初始反应是:介入外汇市场,以期能稳住汇率。然而,这个介入的代价则是利率上升。较后的国行行动,显示它为了维持国内利率的稳定,而决定接受外汇市场里的反覆无常波动。”²⁴

既然已如此决定,国行便撤掉马币对美元的准固定汇率(quasi peg),而马币汇率也在1997年7月滑跌至平均2.636马币。这变动虽然可观,但贬值的幅度还不至于令人惊慌。有些分析员尚预计马币对美元的交易将介于2.70至3.00马币之间。²⁵实事求是地说,国行恐怕也难有更佳的选择。实则,国行对外汇剧变(volatility)的初始反应,不但导致利率上升,还蒙受了外汇储备的巨大损失。正如泰国中央银行用了外汇储备也挡不了泰铢贬值的情况一样,任何进一步的护盘就得冒耗尽外汇储备的风险。与此同时,吉隆坡股市的资本市值也如马币一样连续下跌,从1996年的8067.7亿马币跌至1997年的3758亿马币(见表3.3),主要是因为全球基金经理人正在离开东亚地区的“下沉中的市场”,以免蒙受外汇与股票损失。

随着危机的展开,马来西亚政府的领导人就被逼采取新的姿态与金融市场交涉,而其初始的尝试则引起“逆火”,事与愿违。1997年8月,吉隆坡股市禁止对100项指数化股(index-linked stocks)的卖空,以期能阻止跌势。政府在9月宣布,它会动用600亿马币来

选择性地从本地公司或股东购买股票,而不买外国人手上的股票。²⁶《经济人》周刊则指这些措施,是把“令人恶心的言论与气势汹汹的大话……转化为经济行径”。²⁷当这些举措失败后,也就是,无法挽回暴跌时——由于基金经理怕会受困于狂跌不休的市场而大量脱售手中股票,政府就快速逆转或修改其上述措施。有一篇报道便如此写道:

“投资者因政府决定限制指数化股的卖空而吓了一大跳,进而把股市推向四年来的新低;综合指数以812.18点收盘,掉了4.2%。与此同时,马币也受到了新一轮的投机性攻击,跌至2.9020马币对1美元——这是马币自1973年正式浮动以来的最疲弱水平。”²⁸

之后,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及达因(Daim Zainuddin,当时被委任为新设立的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NEAC]的执行首长)便试图安抚投资者的信心。安华在他于1997年10月提呈的1998年度预算案中,尚提出财政节约、削减预算与采用IMF型的结构性调整措施。²⁹只是,这个预算案却预测了7%成长率,而市场认为这是全然不实际的。到了12月,安华宣布了内容更严厉的节约措施,这包括:把1998年的经常账户赤字减低至国民生产毛额(GNP)的3%,削减联邦政府开支18%,把1998年的成长预测降至4~5%,及延后非策略性的各类计划。³⁰这个被视为不受IMF干涉却近似IMF的配套,在12月发表后似乎恢复了一些市场信心。³¹

一个月后,外资委员会(FIC)修正了企业接管规则,以允许“马友乃德”(UEM)在不须向其他股东出价全面收购之下,便可收购其母公司“玲珑有限公司”(Renong Berhad,即巫统的控股公司)的32.6%股份。³²市场对这行径的反应,则是把马币与吉隆坡股市的综合指数推向新低。在1998年3月,国家石油(Petronas)管控了马来西亚国际船务公司(MISC),而后者则收购了“通运财团”(KPB)的海运资产与债务,在这之前马哈迪的儿子米占(Mirzan Mahathir)则拥有通运财团的51%股份。在当局一再宣布挽救债务累累的银行与公司的计划

后,资本外逃已恶化为资本抵制:如果马哈迪掌权下的政府不能秉公办事,市场将不会回头。

在这时候,本应以谨言慎行与打造信心的措施来安抚惊慌的投资者,马哈迪何以竟反其道地挑衅市场,则是一个迷思。毕竟,“马来西亚可说是最新一代亚洲猛虎中的佼佼者”,³³而且“它在危机前的宏观经济基本要素是健全的”。³⁴特别是陈达怀已清楚提示,相对于1985-86年的经济萎缩初期,1997年危机初期的大马经济具有更多有利的“关键性特征”。他辩称,“当时若有透明措施及处理得当的宣传运动,以打造国内外信心,就不会发生大量腐蚀信心的现象”。³⁵

更直截了当的提问则是:马哈迪是否不合时宜地说错话和做错了什么,以致一些本可有序地离去的投资者,转变为愤怒撤走的国际资本。马哈迪本人曾在多个国际论坛,及多次的新闻文告与面谈中,详谈了他对货币市场的批评,以及全面检讨国际金融系统的必要性。他坚持,国家本来就应该可以控制它们自己的货币;但是,他也现实地认识到,若不对全球金融市场施加广泛管制,是无法做到这点的。对于马哈迪要求改革国际金融市场的呼吁,IMF是不置可否,而主流西方与国际媒体则冷嘲热讽;二者均采取把“东亚溶解”(meltdown)诠释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失败,以及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市场的实例。³⁶结果是,马哈迪越痛责索罗斯(G. Soros),越非难西方的不良企图,或越责备IMF的迟钝,³⁷或暗示“犹太人议程”,³⁸或警告“破坏经济者必须受到惩戒”,³⁹货币与股价则跌得越猛,而资本外逃也更快。对一个长期以来便依存大量外资流入的国家而言,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金融市场也已怀疑,马哈迪对“独霸国际的操纵者所支配的自由市场”的痛责,是马来西亚有意强施资本管制的前奏。马哈迪的严厉言辞及政府的反覆无效政策,在泰国、印尼,甚至是在始料不及的韩国暴发经济大崩溃之前,显得微不足道。随着这些国家被逼向IMF求助并接受其援助条件,IMF、金融市场与正统经济学家更坚信,解决这个危机的惟一处方,就是货币浮动、较高利率、约束货币流动

量、市场自由化、(国内)金融界改革与优良管治等。

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哈迪的言行是否近乎失去理性,⁴⁰或预示将与金融市场拼个你死我活,已非重点。严厉实行任何市场或IMF推介的救济方案,对马来西亚综合企业都是一道苦方。总的来说,它对马来西亚大宝号所起的作用是致命的;它意味着,自由市场将支配非干预型国家(non-interventionist state)。

援救、资本重组与再通胀

整体上言,在1997-98年的货币与股票暴跌中,很少人能幸免于难,不论是得用廉价贷款来扩张的企业公司、靠进口货生存的生意、把储蓄投入吉隆坡股市的中产阶级投注者,还是依靠家庭或官费并以主要外汇来支付其费用的留学生。

主要的国内综合企业似乎注定会先行引人注目地倒闭。他们发展得很快,是向来即从事赚取马币现金并受到良好保护的非贸易部门行业。但是,由于它们的扩张主要凭借国内外贷款与股票资本市场,这个危机便使得这些综合企业过度暴露于膨胀及未加护盘(unhedged)的外债偿付中。此外,吉隆坡股市的大暴跌,也导致他们的资产价值大大萎缩。对那些依靠吉隆坡股市来进行收购与合并的综合企业来说,“当股价下跌及金融机构把它们作为抵押的股票卖掉时,这些公司、商人与相关的金融机构便蒙受了永久的财富破坏”。⁴¹由于金融市场出现了资本外逃现象,这些综合企业便也无法获得新贷款、延长偿债期或期待股票回升,进而阻断了它们的快速复元。诚然,有人估计,在1997-98年间,个别蒙受了马币5亿以上损失的公司中,有58%归于十大综合企业集团旗下,另外42%则属于其他上市公司。⁴²消费需求萎缩、工程搁置与银根紧缩——即萧条迹象逼人而来——不但使综合企业及其他商业受困,也进而危及金融系统。

就这课题而言,国行也没提供多少援助。其实,国行也必须出尽法宝,一方面得安抚深切影响国民经济的市场情绪,另一方面又

要照应久蒙国家保护的复合企业的利益。于是，国行就陷入既要激励投资者的信心，又要避免IMF乘机介入的两难困境中。很明显的，国行在安华与达因的支持下，选择执行旨在改善公司治理的货币政策与措施，也就是，相当于“没有IMF的IMF配套”。在1998年初，国行还限制信贷增长，对金融机构施加更高法定储备需要，提高利率；及把“不良贷款”(NPL)重新界定为三个月未履行债务偿还的贷款，而非六个月。如所料，这一“改变”把银行界的不良贷款率从1997年的4.1%提升至1998年的13.6%。⁴³ 最直接受到这个重新界定影响的是主要的复合企业，其中很多得面对即临的破产。

由于受到过往成就与对未来抱负的影响，要政府把经济计划转向较缓的成长、较低的消费与更严的管制，也是同样困难的。1997年10月与12月宣布的节约预算与结构性调整措施，到98年第1季时，也未能阻止经济进一步萎缩。引进FDI以从事长期的生产性业务也试过了；但是，由于历程耗时，它也解不了燃眉之急。另一条门路是从东亚引进FDI，这个策略在80年代后期大有所获，但现在根本行不通。通过设立“亚洲货币基金”，以使用“亚洲方案”来解决“亚洲危机”的初期寄望，却由于美国、IMF甚至是中国的反对而成空，以致日本无法落实多年以来受促行使的区域性经济领导权。⁴⁴ 结果，马哈迪搜肠刮肚，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恢复市场信心；而这一年来，市场需求已经从谨慎管理经济基本要素，转为倾向接

受IMF附有条件的援助、强制关闭国内金融机构、对外开放国内公司股权和移交控制权，及最终得重组政府。⁴⁵

1998年9月1日，政府采取了一项孤注一掷、险中求存的决策：国行启动了终止自由兑换马币的外汇控制机制。⁴⁶ 当日的汇率是4.0960马币对1美元，第二天起就固定于3.800马币对1美元。而岸外的马币持有人，需在一个月內，把马币汇回马来西亚；即从10月1日起，马币不许在国外交易。对金融市场来说，最严厉的管制为：禁止非居民(non-resident, 包括法人[公司])拥有的代理银行与证券交易所取得国内的信用便利，及禁止居民从非居民个体取得马币的信用便利。同时，非居民尚得将其马币证券存于指定的保管机构；若把其证券脱手，则得把其收入存放对外账户(external account)，一年后方可兑换为外币。国行坚持这项管制措施会制止货币投机，却不会影响到“经常账户交易的普遍兑换性”及“FDI、利息、利润、红利与资本的自由流动”。⁴⁷ 用国行代行长的话来表达，若政府不采取这项“把马币带回国内”⁴⁸ 的措施，货币恐会崩溃。实则，这项资本管制措施阻断了资本外逃——尽管是强行把剩余的外资围困一年；它甚至逆转了资本外逃——尽管是强制岸外的马币基金回流。至此，对美元的固定汇率终止了马币的剧变性及为国内企业与FDI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规划、缔约和经营的稳定基础。

马哈迪与达因的政治前提是利用国内的自力更生和资源来拯救策略性经济领域与复合企业，他们并没有更见效的处方。1998年，马来西亚的净资本流出额为217亿马币，⁴⁹ 而资本依然拒绝进场。当政府想要发售新债券时，却由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Moody)以及“标准与普尔”(Standard and Poor's)降低马来西亚的信用等级，便只好放弃这个计划。由此可见，资本管制酝酿了政府的相关政策：援救本土企业，重组金融界资本，以通货再膨胀刺激经济。⁵⁰

为此，政府设立了三个机构来处理金融系统的问题，即“国家资产管理机构”(Danaharta, “一间资产管理公司”)、“国家资本机构”(Danamodal, 一个“特定目的工具”)，及“公司债务重组委员会”



资本管制：孤注一掷

(CDRC)。其中,国家资产管理机构的任务为:“消除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的不良贷款,以便它们在脱离了回收困境后,有余力提供贷款给其顾客”。⁵¹在1999年,国家资产管理机构便从金融与银行机构手中购买了455亿马币的不良贷款。国家资本机构则透过信贷注资方式,把75.9亿马币注入一些主导银行,在金融界进行了资本重组。公司债务重组委员会则处理了涉及363亿马币的67项债务重组申请。其中,最为人知的申请来自巫统所拥有的玲珑,国有的土著银行(Bank Bumiputra),及森合银行(Sime Bank)。至于资本重组的资金,则有三大来源:公共资金(以雇员公积金局和国油的储备金为主)、外债(来自日本和世界银行),及最终由政府与国油在1999年发行的国际债券。1998年9月后,国行便增加货币流动量及促进银行对企业界的放贷。其部分方法则为,降低银行的法定储备需要,即从1998年2月的13.5%,降到1998年9月的4%。同时,基贷率也从6月的12.27%降到10月的6.79%。到了1998年9月,不良贷款的界定基础从三个月不履行偿还恢复到六个月。国行也订下了更高的银行放贷目标,和提供较1997年7月时更为有利的条件,以便关键领域如汽车工业与房地产业能较易取得贷款。

1998年9月的资本管制,在全世界引起了争议,迄今尚争论不休,将来恐怕也不会在经济理论与分析里找到定论。虽说这个争议是新的,自由市场的拥护者准会对资本管制大加抨击;其中,有些尚引述中国与印度的“官僚化与各种漏洞导致贪污与资本外逃”等资本管制问题,而认为资本管制与货币挂钩(currency peg)是行不通的。⁵²其他人则发出警告:“即便能在资本外流的短期惊慌中起到暂缓作用,这个缓兵之计的长期代价是很高的”,且“即便这个措施明显不包括FDI,正如马来西亚所设计的,但是历史提示,投资者还是宁可避开风头的”。⁵³不管怎么说,当“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资本国际”把吉隆坡股市从其指数中除掉后,外国投资者确是避开了马来西亚。

一些有名的经济学家如格鲁曼(Paul Krugman)和史蒂格利斯

(Joseph Stiglitz),则表达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认为资本管制不失为暂缓金融市场混乱的暂时处方。另一方面,佐摩则质疑1998年9月的资本管制的成效,虽然他也认为,“对金融系统管制不足已成惯例的发展中经济而言,资本管制或许是缓和资本流动引发的动荡局势,最为合适的选择”;⁵⁴佐摩的论点是,它太迟被用来避开危机,反而惩罚了“对马来西亚作出更大承担的投资”,此外它对经济复苏的作用也难以捉摸。⁵⁵

或许,资本管制的最重要的收获是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而非经济。资本管制被护卫者称为“经济护盾”,政府正是在这个“经济护盾”背后实施资本重组、援救与再通膨计划。这就不符合金融市场与国际机构对危机重重的亚洲政权的改革要求。只是,资本重组、援救与再通膨措施却使经济在没有IMF干涉之下,避开了崩溃。出乎意料的是,资本管制竟因此成为许多不同政见者眼中的高招,这些不同政见者拒斥任何放任的金融市场远景,和这个远景“‘敲定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及“断绝东亚发展惯见的政商挂钩”。⁵⁶比方说,一些批评者非议政府不民主地对待安华,可是他们也支持资本管制的“独立性”。尽管1999-2000年的经济复苏,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偶然的发展——主要为区域范围内的复苏,和以电子产品为主的出口美国的增长——使得这个区域性的危机好转,除了身受最惨痛重创的印尼外。到了1999年后期,马来西亚的贸易盈余已巩固了国家的外汇储备;且再通膨政策也推动了足够的成长,使失业率保持在危机前的低水平。同时,股价也从1998年的最低水平回升,这当然与国内的机构资金的支持有关。

可以说,部分由于这个经济复苏的现象(相对于印尼的一无可取的持续暴动与混乱),导致政府与市场进行磋商并达成新的拆衷方案。而早在1999年2月,政府便放宽了资本管制,允许外国资金在“级差型退出税”(graduated exit tax)的制约下,把资金汇出。政府一直依此行事,直到实质上只有货币挂钩保留下来。尽管原初的资本管制已大部分解除,这个方法依然无法阻止某些外资(尤其是

Templeton) 明显地避开马来西亚——即使是在 1999 年 9 月后, 当受困的外资退出时已不必再受惩罚。无论如何, 政府还是能够回到市场来, 虽说是得到日本政府的幕后支持与必须承担自食其果的额外代价。在 1999 年后期, 政府与国油依然能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个别发行美金 10 亿与美金 5 亿的债券。

约言之, 尽管依然有着原则上的歧异, 政府与市场还是为了要做生意而达致和解; 就如一位外国公司的首席投资专员, 在 1998 年 9 月几乎准确预测一样, “在六个月到一年间, 投资者可能会回心转意接受新的游戏规则”。⁵⁷ 这项和解的一个具体迹象是, 在 2000 年初期, 摩根史坦利资本国际便重新把马来西亚纳入其指数内, 进而为基金经理重返吉隆坡股市铺了路。1999 年 6 月 23 日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便在其社论中诱劝马哈迪: “既然现在亚洲危机的压力已减退, 也应是时候宣布得胜, 而重归全球经济体了”。⁵⁸ 这段话便是政府与市场达致和解的意识形态讯号。

政府与市场和解的另一个言之成理的理由是: 强施资本管制并不仅仅是抑制区域性——即便不是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的最有效方式, 它也是全然跟着政治直觉走的孤注一掷。只是, 就恼人的政治计算而言, 马哈迪也并非是在全然不利的全球情势下采取这一行动。

随着 1997 年危机的深化, 甚至连全球性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也质疑金融市场的正统理论, 认为它不过是“IMF、美国财政部与华尔街复合体”⁵⁹ 为谋私利的教条, 或只是“一种伪华盛顿共识”;⁶⁰ 而史蒂格利斯也因批评 IMF 而离开世界银行。在全亚洲甚至可能在全世界, IMF 的介入已等同于傲慢与失败。此外, 1998 年, 俄罗斯、南非与拉丁美洲的突发性货币贬值, 也被公然归咎于货币投机疾病的传染。大约在马哈迪强行资本管制的时际, 东亚金融危机尚未减退: 印尼的经济与政治处在混乱状态; 俄罗斯则没履行对外债的偿付; 香港在护卫其货币挂钩与股票市场; 而维系货币控制的中国与台湾, 看起来反而像是典范。⁶¹ 马来西亚则从未示范出这类东亚发展模

式。部分原因在于马来西亚尚未达到如台湾与南韩后期工业化的那般高度; 部分原因也在于马来西亚的阶级和族群复杂性, 与其他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历有所不同。尽管如此, 在一定程度上, 东亚国家看起来不愿对马来西亚的经验表态——虽然不是很多国家愿公开护卫它, 但也不是全部希望马来西亚出错。

马哈迪曾说: “如果你喜欢, 你可以说我是异端”, 或是“被放逐者”;⁶² 但是, 他却乘机把握了对于西方支配金融市场的区域性愤慨, 而为东亚的经济民族主义作出了辩护。⁶³

内部危机与收复失地

有人曾经提问, 何以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小经济体, 竟然敢冒险去激怒有权势的外在行为者如 IMF, 或日益强盛的金融市场?⁶⁴ 前文所提出的答案则是, 基于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事业的迫切性, 当政府不再能依据市场的条件实现其宏图时, 便不得不暂时局部地退出国际金融市场以自保。只是, 较全面的答案, 则须超越政府面对市场的论述; 因为, 强施资本管制导致就政策分歧已争论约一年的双方决裂: 一方是松散组成的“安华阵营”, 另一方是同样地约略界定的“马哈迪阵营”。

总的来说, 得到安华支持的国行技术官僚, 意图为这危机寻求经济性处方; 而执行其他管制功能者, 如证券委员会, 则意欲把优良企业管理化为事实。二者都希望能恢复投资者对马来西亚金融与证券市场的信心。一般来说, 小企业对马哈迪批判较多, 而大企业则对经济灾难批评较多。⁶⁵ 尤其是那些与巫统有关系, 且被市况伤得较深而又未获得保护的小型马来商家, 更不会漠视那些针对政府动用公共资金选择性拯救综合企业的批判。其实, 马来西亚大宝号下的民营化脱卸责任、寻租现象与金钱政治肆无忌惮, 以及马哈迪不愿承认政府犯了任何错的情况, 至少把部分马来与非马来人中产阶级都惹恼了。尚有其他人士则相当警惕, 因为, 不但马哈迪在面对市场乱局时看起来不理性, 还有传闻说, 他正考虑宣布紧急状态来应对这场

危机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威胁。那些对马哈迪的言辞与姿态持怀疑态度者，不管是感到幻灭者还是较自信的人，都可能持有这种想法：只有IMF介入，或全面的全球化，方能真正清除马来西亚政治经济中的弊端。⁶⁶

在这种情况下，当国行对危机的评估及对危机管理的观点导致资深技术官僚与马哈迪不和时，国行的角色便至关重要。在危机的高潮期，马哈迪便曾嘲笑地说：“期待市场力量建立稳定货币兑换、稳定经济与稳定政治，就如同无所作为和听天由命一样”。⁶⁷ 虽然，身为财政部长的安华并不想无所作为或听天由命，但他似乎较愿意把这事付托于国行的金融技术官僚。在其1997年的年度报告书中——即他尚是财政部长时的最后一份国行报告，国行便解释它在1997年7月后如何设法处理外汇规制：

“既然开放经济体中的中央银行，不能同时地决定汇率与国内利率，那么，企图稳定汇率，只会把易变性转移到国内利率。这就是货币政策的挑战。在限制汇率或国内利率的易变性时，是需要均衡的判断的”。⁶⁸

说起来，在1997-98年，政府中的决策者或资深顾问，在面对国民经济与国内生意受制于剧烈外汇变动时，没有一位能处之泰然；事实上，国行本身已在初期护卫马币时，遭受了数额不详的外汇损失。随后，国行的“均衡判断”，是建基于求稳当地接受“金融价格的反覆波动”乃是“金融市场以及实体经济在递增的全球化整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后果。国行在逻辑上辩说：

“这并不意味由外部震荡所引起的利率与汇率的涨落不定，应该通过经济孤立或资本管制来避开；而是一般人都认识到，健全的国内经济管理，是减低这易变性附带的风险的重要因素”。⁶⁹

回顾起来，国行是从谨慎客观与专业的角度来处理这个危机管理的关键课题；这种思路本可与马哈迪那辞藻华丽的指责形成突出有用

的对照。结果国行的资深技术官僚赢来的反而是马哈迪的愤怒，而不是感激！当外在的易变性日益狂乱与国内利率被推高时，国行的经济正统派的思路，已不能满足马哈迪所要求的稳定汇率与低利率。当马哈迪要撒下限制投机之网时，国行依然很专注于改善投资者的信心与施加优良管治，即：

“提高决策的透明度，也可消除类似私人决策所引起的很多疑虑。一个具有清晰目标，与献身于达到这些目标的政府，将会赢得威信”。⁷⁰

就此而言，国行的经济学家立场天真可爱，只是在政治上显得幼稚；因为，不论对或错，国行的观点，与IMF及金融市场的观点，越来越如出一辙。像恶兆般，国行对金融界实施更严厉管制——经由收紧货币流动、提高法定储备的条件、限制信用成长及更严格界定不良贷款等——便显得其措施日益类似IMF的处方；而其后果，则对不稳当贷款及正当生意皆带来惨酷的冲击。

从往昔的经验来看，马来西亚的银行业崩溃、贷款丑闻与金融危机等事件，都显示出国内的银行与金融公司，常在缺乏可靠的依据下放贷巨款给具有权势的个人或公司。以金融报刊为主的国际大众传媒，认为土著银行与森合银行的快速崩溃，已清楚显示历史重演。其实，1999年后官方发表的前后不一致的不良贷款数字中，就已症候式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不确定性，以及缺乏对不稳当贷款的准确鉴定。因此，媒体与商业界对马来西亚金融界的健全性之感应，就被未证实但却似乎是日益高涨的不良贷款数额渲染了——当然，这个数额也很可能受到泰国、印尼与南韩的金融大崩溃所影响。一方面，可确定的是，国行对不良贷款更严格的界定，会让放贷者与借款者面对更多烂账的烦恼。另一方面，即使是记录清白的正当生意，也已被市场的易变性夹击了一年。对他们来说，若“健全的国内经济管理”，实质上等于信用紧缩、贷款可能被收回和最终的萧条，那么，这样的“健全的国内经济管理”并没用处。比方说，一位抨击

“反市场的发言、不愿意考虑市场处方、对霸型项目的矛盾声明导致的危机恶化”的银行家，也曾是一位稳健的经济学家，就曾经断言，1998年9月之前国行“所施加的收缩银根规则导致了过量杀伤”。⁷¹一位前国行经济学家出身的钢铁制造商便不满“政府内部对应如何处理危机有严重的歧见”；进而论道：“初期的热心仿效IMF政策的冲劲，尤其是削减开支与即时的贷款收缩的交叉政策，大大地恶化了危机。”⁷²

虽然上述二种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商业从货币挂钩、资本重组与通货再膨胀获得喘息机会，且与马哈迪阵营的观点一致，但是他们并非所谓的现政权的朋党。很明显的，马哈迪对危机的起源的看法，及其管理政策，对综合企业的存亡具有关键作用；只是其它的国内大企业及其它社会团体，也欢迎马哈迪坚持对一般的商业界提供援助。至于后一类团体，他们的出发点不尽相同，有者出于“爱国心”，有者则出于“现实”考虑。综合企业，或其他的既成商界（比方说，各类商会的名人），及“爱国”的社会群体，都不愿意看到任何的IMF的干预或进一步的自由化，以免本国的企业资产最终会落到外国购买者手中。商界一般认为，放宽银根、降低利率规则、甚至是出售资产——只要不是卖给外国人，都是帮助他们渡过经济危机的方法。⁷³其他则因爱国心的激发而降低进口与购买本国货；这样做，并不一定等于接受马哈迪的危机阴谋论，而是他们从泰国、印尼与南韩的不如人意的经验中，警觉到接受IMF附带条件的危险。这么一来，本土的另类方案，就优于把本土股权转让给外国人。这类本土的替代方案包括了：在“为国服务”的名堂下，挪用少数富裕公司的稀有现金和资源；把部分的马来股权卖给非马来人；动用公共基金，如公积金。

当然对于紧随IMF处方的忠告，没有人比马哈迪更为嗤之以鼻。正如马哈迪所说的：

“若我们对IMF亦步亦趋，我们会把我们所有的公司弄垮。若你看跟随IMF的国家的公司，它们在技术上实已破产。IMF要我们

做的是，提高利率、减少信贷、增加税收，这三者一起实施，将会使我们的公司破产。当你把货币贬值50%，也把股价降低超过50%；那么，所有的公司将无法偿还债务——因为，他们用股票抵押借钱，以股价的80%作为借钱的基准。现在，由于股价已跌，他们的借款就超额了，而得加额。问题是，在经济表现不佳的时刻，又如何找钱来加额？要补足缺额是很不易的，你无法补足它。我们的规则是，应付借款若在六个月内没有偿还，便被视为不良贷款。IMF说不可以，必须是三个月。但是他们无法在三个月内履行债务。如果我们不听从IMF，信心就会丧失，而货币也得贬值；所以，我们得服从。结果是，很多本非不良贷款，也变成不良贷款。一旦他们成为不良贷款，公司就不能再举债。当他们不能举债，他们就不能做生意，而我们的情况就会恶化。”⁷⁴

比起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意见不和，行政部门与资深技术官僚之间的不同观点，还算不大。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意见不同虽导致政策性争论，但是，在初期，它并未预示这争论会使马哈迪与安华走向相反的两端。比方说，马哈迪猛烈批评IMF，而安华则主张：“我们与IMF干部保持着良好关系”（虽然安华也另加说明，“他们也说马来西亚不需要IMF来打救”）。⁷⁵马哈迪指示，要用国家基金来援救一些他认为是无辜而濒临破产的著名综合企业；安华（有时也得到达因的支持）则表示反对拯救他们，且还向市场再次保证：

“我们需要更多的透明度。我们要加强企业管理。我们会认真惩罚那些违规者。不管这些企业玩家是什么人物或与具有任何联系，只要他们违规，他们就会受到惩罚。”⁷⁶

马哈迪命令吉隆坡股市改变其规则，保护本土利益与惩罚外国投机者；安华则恢复这些规则；然后，规则又被马哈迪取消掉！马哈迪要训诫市场及愤怒地要削减马币交易，安华则想要安抚市场情绪；如安华所言：“我们要使投资者信服，我们需要他们。我想，我们是与

国际体制及其对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的承诺一致的。逆转公共政策的问题并不存在。”⁷⁷ 尚有许多这类政府高层的政策辩论的例子，以至于一些外国观察家形容情势是“政策僵局”(policy gridlock)。⁷⁸

尽管如此，我们不应像马哈迪、达因、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及政府的其他代言人那般渲染决策上的分裂，随意地把错误全部归罪于安华与国行“在危机初期采取的不当对策”，⁷⁹ 甚至是“蓄意破坏”。⁸⁰

我们有许多理由怀疑，安华应该对经济形势的恶化负起全部责任的片面说法；同样可疑的是“马哈迪的历史性修正主义”——即佐摩所指称的1998年9月后对安华经济管理的攻击。⁸¹

首先，安华在1997年12月已澄清，那些错误的盘算“并非出自我或马哈迪，而是内阁的集体决定”。⁸² 在1998年1月中旬，安华重复“我要明明白白地指出，这些措施都经过内阁的批准，而我们会继续支持自由主义的规则”。⁸³ 安华可能为保护自己而宣称，任何可能主宰国民经济的政策，是由内阁集体负责的；可是，当安华作出上述声明时，马哈迪、达因，以及所有内阁部长，均没有任何异议。

其次，除了备受批评的IMF的一刀切对策外，消除危机的解方也从来没有一个公式或贯彻到底的过程。在寻找良方的过程中，所有的建议都是难以操作的、不可行的、或不得人心的。其中，以马哈迪向国家经济行动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最为奇妙。马哈迪认为：

“为了化解马币贬值的影响，就得增加每个人的收入和提高所有东西的价格。

若马币的汇率掉了100%；那么，我们就提高收入100%。如此一来，购买力便依然一样。”⁸⁴

较后，马哈迪承认，他的建议当场就被理事会拒绝；他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行不通的。约言之，这个寻找对策的过程是迂回的，且在途中也需要逆转政策。据此，佐摩认为：“由于马哈迪的政策主张与言辞使得情况恶化，安华反而较能接受社会与商业媒体，以及外国人，包括IMF的政策忠告”；安华也就此“受到许多其他政府官员的

强烈而沉默的支持”。⁸⁵ 于是，虽然“安华从1997年后期起就遵循同样是IMF建议的市场需求，认同收缩性财政与金融政策；到了1998年中期，他其实有意使用公共消费与再通胀政策，来抵消1997年10月与12月实施的节约计划所引发的不良后果”。⁸⁶

随着危机的延长，政府便得面对各种不惬意的政策取决。若不依从市场的“改革”要求，则会招来资本抵制——直到“市场力量最终被允许发挥其功能为止”。⁸⁷ 但是若同意采取根本性改革与全面自由化，就等于“全国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以及“引发对‘便宜到笑’的贬值资产的疯狂掠夺接管的后果”。⁸⁸ 马哈迪就问道：“为什么我们要提升利率？——我们已提高了利率——为什么我们要缩紧银根？”他自答道：“因为我们害怕。”⁸⁹ 他的意思是，我们害怕触犯了IMF与金融市场。这种说法自有其一面之理。在危机初发时，各方的共识是，马来西亚的经济及金融系统虽需结构性改革，但与泰国及印尼相比，它依然是健全的。即使是马哈迪的市场批判者也同意这点。正如他们的抱怨所暗示，马来西亚的基本问题是自己招惹投资者丧失信心，即马哈迪的狂言与市场干涉引起投资者的惊慌。

有一种评论反讽地认为，马哈迪可以“有恃无恐地为所欲为……因为在东南亚，马来西亚的银行是新加坡以外最稳固的。比方说，资产负债表是坚实的，不良贷款率并不高，而银行监管的素质，也至少比区域性标准高”。⁹⁰ 若真是如此，且IMF也表示无须打救马来西亚，那么，理性地说，要有效抑制破坏，借用索罗斯的话，就得阻止马哈迪成为“他国家自己的灾难”。⁹¹ 结果是，安华便得负起“澄清”、“再次保证”与“进行对事件解释”等，来抵消马哈迪的爆发性言论。与此同时，国行也得启动信心建设的任务与措施，来安抚不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市场。当马哈迪影射安华与国行的技术官僚，是因为“吓坏了”才实施银根紧缩政策与更严格的谨慎标准时，马哈迪可能是对的。若是如此，或许，这个指摘本身就是一种谅解；因为，安华与国行毕竟不是IMF的跟班，他们希望“较强的基本因素”，会使马来西亚避开其他经济体的命运，同时致

力于巩固金融系统以避免 IMF 介入。或许，我们可以推测，国行尤其是资深官僚，还不习惯在这么一种混杂了环境、个性和体制保守主义的环境下，把“经济孤立与资本管制”视为“开放经济”的可行处方。可悲的是，如巴都马奇 (Heikki Patomaki) 便清楚地观察到，技术官僚对理论的基本信条的信念，包含着一种否认：

“诚然，以事后孔明及对正统理论的坚强拥护，我们总是可能从根深蒂固的自由市场原则中，找出多种任意的解释，或一系列的偏离。‘基本因素毕竟是不正确的，即使我们之前没有看出来。’或许国际收支平衡或外汇中含有看不见的问题。或许，国内的不同族群之间的政治妥协，使得经济体的一部分受到过度的补贴。或许，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是‘朋党主义’，意思是某些公司或银行被偏爱。或许，也有明显的贪污。或许，毕竟政府过度参与银行与公司里的关键性投资决策与日常作业。税率也可能太高，或政府预算中隐含着弱点，而且这些弱点长期受到忽略。或许，政府的贸易与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方式中，便存在着弱点。”⁹²

资深国行技术官僚受正统经济教育出身，过去也因实践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而备受赞扬，我们是否应该要他们放弃中央银行那些备受考验的信条呢？

对一个我行我素，并拒绝在关键时刻遵守规则的政治人物来说，事情是不一样的。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马哈迪曾因他在工业化与经济现代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广受喝彩。但是他的经济思想，融合了现代化理论、结构主义式论证、保守的依附论、“第三世界主义”，以及作为后期工业化教材的“向东学习”等，而从未清楚地说明或发展起来。到 90 年代，马哈迪坚定地执行一种东亚模式的经济，让国家支援的综合企业受到优待，大事建设。面对灾难时，马哈迪依靠的是豁出去的果断与灵活变通。他没有要护卫的正统，只有要保护的利益；没有要证明的理论，只有要保存的事业。无需赘言，他还得挽救他的政治生涯与声誉。实则，在美国放弃布雷顿森林

会议 (Bretton Woods arrangement) 之前，与固定汇率配套的资本管制，本是国际金融体系的规范。只是，在现阶段，资本管制能终止东亚货币混乱局面和稳定其金融系统吗？在 1997—98 年，没人知道真正答案。此点，也可由国际清算银行对马来西亚的资本管制的暧昧回应中窥见：

“马来西亚诉诸于资本管制，已进一步激化了新兴市场经济是否太仓促全面自由化其资本账户的辩论。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多人认为，在市场、制度与管制框架充分强化之前，应该采取措施放缓短期资本流入。遏制资本流入的措施，如对短期流入资本抽取更高税率的储备条件，可能是有效的。若设定得当，这类措施在一方面可避免国内的放贷热潮与通常接着到来的资产价格泡沫；另一方面也允许对长期的流入投资如 FDI，保持着一种自由宽大的态度。至于对外流资本强加控制，则不那么受欢迎，尤其是在制度已经比较自由的地方。一种常见的论调是，控制资本外流，会使当局拥有必要的条件来制定与执行调整计划，以恢复投资者信心。相反的论调认为资金管制也可以被滥用，造成不恰当的政策方针维持太久，或延迟了衰弱的金融领域的重组。此外，只要制度出现漏洞和被利用，管制外流资金的效果就会降低。要塞住这些漏洞，便会引发一个更为复杂与广泛的管制程序，甚至有用的经济活动也会受到严重的破坏。另一个反效果则是，实施控制资本外流政策，可能会在关键时刻传达负面讯号，使资本流入却步。信心丧失如果波及同病相怜的邻国经济（但却自制而不实施资本控制），那么，一国实施资本管制，可能会对他国造成特别大的破坏。最后，控制资本外流也会埋下潜在的信心丧失，及对政策的疑虑，并因此提高国际举债的成本，而且时间也比危机阶段更长久。”⁹³

换个说法，在是否有必要实行资本管制的问题上，反对派的意见不是受到既得利益的支配，就是建立在未证实的理论、情绪与纯粹猜测上。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市场的声音难免会倾向于贬低资本管制的

实用性,而其实他们真正反对的是,全球金融市场的“自由”,受到资本管制的象征性或真实的阻碍。就此而言,他们倒没预料到,马哈迪在被逼时是有勇气冒着九死一生的政治风险,来贯彻他的信念。

1997年7月是全球资本主义、投机性货币交易、甚至是东亚式商业行为的危机期。在马来西亚,这个危机更是马来西亚大宝号及国内综合企业的幻灭,它们在与全球势力的首次冲突中几乎被连根拔起。马哈迪坚称这些综合企业是良好且管理得当的公司,只是受到不道德的操纵者破坏。然而这种辩护难免损及了公信力,因为它完全没有提及,让综合企业沉溺其中且由政府促成的对外来资金的偏爱照顾,本身就带有企业冒进和管理无能的味道。综合企业相继倒账,显示了那些结合马来人与非马来人的新马来西亚资本作业,夸言要在世界经济体自立门户,只是空洞的口号。一个人无须是市场基要主义者(过去或现在)方才相信,政府的主要的危机管理措施,旨在打救属于巫统的主要综合企业或政府的所谓“朋党”。任谁都看得出,这些综合企业只拥有谋求私利的“经济民族主义”,而没有什么宏愿。当它们兴隆发达时,它们会以民营化的长处的典范来标榜自己;当它们陷入债务中时,却要社会承担损失。⁹⁴若这些不怎么投身市场的综合企业要在市场中大难不死,那么,马来西亚大宝号就得挺起其“经济护盾”。

这么一来,马哈迪显示出,他或马来西亚大宝号,均不再是马来西亚的资本主义合理化作业(capitalist rationalization)的旗手。早期的马哈迪式“2M 政权”(即马哈迪及其副手慕沙希淡的称号),体现了朝向现代化与合理化的冲劲。较后,马哈迪与达因联合起来,对广泛涉及商业活动但却亏损连连的官僚机构与公共企业,实施金融纪律与民营化。这个朝向资本主义合理化的作业,在1986年达致高峰,当时马哈迪大胆地搁置新经济政策的重组需求,与放宽FDI的条件。之后,达因与安华相继掌管的财政部,则“根据证券交易的全球化”,进行自由化与提升金融系统的工作。就那个时期而言,那

些措施,如官僚改革、民营化与自由化,每一项都背离了当时的现行政策。在1997年7月后,马哈迪只看到货币投机者的卑下操作,而没有回应全球经济的根本转移,这些转移可是对东亚资本主义模式及马来西亚大宝号本身的可持续性,起着重大牵连作用。

然而,不管是否出于政治动机,即将遭殃的安华阵营,总算短暂地提供了朝向合理化的驱动力。在1998年8月27日,国行的行长亚末·东(Ahmad Moh Don)及其副手邝荣柏,由于坚持反对资本管制而辞职。在9月2日,马哈迪也解除了安华的所有政府职位。安华被黜,展示了马哈迪不再对亲市场的改革让步,否定了全球货币市场想要对危机重重的亚洲经济重赋活力的理论。反之,马哈迪、达因与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留下的国行技术官僚,以及新设立的危机管理机构,全力地执行援救、资本重组与再通膨的计划。采取这“经济孤立与资本管制”之前甚至是之后,隐含于早期的政策争论中隐含的选择,并不仅止于IMF式的结构性调整与市场支配的治理,或是让关键经济领域与策略性商业倒闭;它至少还有一个基本选项,即借机把特定的援救计划、打救措施、再通膨政策,并严格重组具有政治联系的综合企业配套进行。其后,国家资产管理机构、国家资本机构与公司债务重组委员会也援救了这类综合企业,并重组了它们的股权分配。虽说,在1998年9月后,一些大企业经历了重组,但是,

“对玲珑集团的多次打救,以当时市价的双倍价格向大股东收购马航股票,及不愿意让柏华惹(Perwaja)钢铁厂倒闭……都清楚地说明了,马来西亚决意不惜代价保护衰败中的企业”。⁹⁵

在实施资本管制一个月后,马哈迪说道:“不良贷款问题及货币流动性紧缩(liquidity crunch),主要肇始于国行企图迎合IMF”,而“随着外汇管制的实施,及回复到更合理的金融规则,不良贷款的问题已经缓和”。⁹⁶易言之,1998年9月后的资本管制与再通膨政策,并不在乎对管理失当的综合企业进行根本性改革,也不在乎解除他们

对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的箝制。在持续的保护之下,虽然马来西亚大宝号作为资本主义合理化作业的代号已终结,政府与综合企业间的结盟则旧态依然。当马哈迪政权表白功劳,声称它逆转了“在危机初期时采取的错误盘算”时,不言而喻的便是,安华取代了索罗斯与IMF,成为1998年9月前,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的所有错失的替罪羊。

如此,如同在80年代后期发生过的事件一样,1998年9月又再次发生:经济危机触发政治斗争。这次,安华成了资本管制的祭品,造成马哈迪言如所料的所谓“无政府状态”,一发而不可收拾。其他人则称这状态为“烈火莫熄”(reformasi)。

- 1 Mahathir (1996b: 204).
- 2 比方说,见 *The Economist*, 1998-3-7.
- 3 Mahathir (1997g: 64).
- 4 Mahathir (1997e).
- 5 加拿大一间汽车零件制造商 Magna International 的总裁 Frank Stronach 说道:“在商场,首要职责就是赚钱;而钱无心、无灵魂、无良心,也无祖国”;引自 Suzanne Billelo, 'Free-Trade Pact Stirs Emotions', *New York Newsday*, 1992-8-7, cited in Henwood (1997: 113).
- 6 Abbott (1999: 197).
- 7 政府措施是在90年代中期计划或导入,这个节要摘自 Mahathir (1995b).
- 8 Khoo (1995: 59-60).
- 9 McCarthy (1994).
- 10 马哈迪倾向于用温和的用语来描述其联盟,如政府与商界间的“精明合伙”(smart partnership),但不包括组织化工会的角色(Mahathir 1996d).
- 11 Khoo (1995: 129-36).
- 12 Adam and Cavendish (1995: 135).
- 13 有关南北大道、第三电视台、成功多多、泛马博彩、Totalisator Board of Malaysia、古晋路-甲洞路交流道、英达利水、巴昆水力发电项目、马来西亚食品工业、Peremba Berhad 等案例的讨论,见 Jomo (1995: 44-48).
- 14 Gomez and Jomo (1997: 179-80).
- 15 Bank Negara Malaysia, *Monthly Statistical Bulletin* (February 1998: 103). 比较起来,从1987至1997年(6月),政府的外债从来未超过1987年的447.67亿的水平;在1997年6月,公共领域外债则为马币415.3亿。这并非由于国际放贷者信心不足,而是因为自1985年经济衰退以来,政府便抑制其债务。

- 16 Bank Negara Malaysia, *Monthly Statistical Bulletin* (February 1998: 117). 在1996年及1997年的上半年,分别另有149.95亿及186.27亿马币的债券、金融市场票据与金融衍生产品。
- 17 Bank Negara Malaysia, *Monthly Statistical Bulletin* (February 1998: 72).
- 18 Mohamed (1996: 328-31).
- 19 有关马哈迪批评公共部门对民间的偏见,可参阅 Mahathir (1996d).
- 20 Gomez and Jomo (1997: 179).
- 21 Jayasankaran and Hiebert (1998: 14).
- 22 Gomez and Jomo (1997: 180).
- 23 最低的交易价为4.88马币对1美元,在1998年1月成交。
- 24 Bank Negara Malaysia (1998: 80).
- 25 Lim (1998: Preface).
- 26 Lopez (1997).
- 27 *The Economist*, 1997-9-6, p.14. 也见 Appell and Lopez (1997).
- 28 Lopez and Pura (1997).
- 29 这包括把联邦政府支出降低2%、延后“霸型工程”、减少经常账赤字、把公司税减少2%、在1998年底前限制信用增长在15%内、巩固马来西亚银行系统里有关不良贷款与货币流动性等的谨慎标准与管制(Malaysia 1998: Chapter 1).
- 30 对此及相关措施,包括更严格批审逆向投资、增强企业资料的公开,及更严密管制企业重组,见同上。
- 31 *Business Times*, 1998-12-9.
- 33 Hiebert and Jayasankaran (1997: 62).
- 34 Rajah (2001).
- 35 Tan (2003: 31).
- 36 *The Economist*, 1998-9-27
- 37 Pura (1997); 'Dr M: We have evidence Soros did it', *New Straits Times*, 1997-8-27.
- 38 'It could be a Jewish agenda, says PM', *The Sun*, 1997-10-11.
- 39 'Local funds set to enter the market in a big way', *New Straits Times*, 1997-8-29.
- 40 在1997年尾,区域性新闻工作者不只一次问我,马哈迪是否“已很激动”(had flipped)。显然不仅新闻记者,连“商界”也有此疑问。
- 41 Tan (2003: 35).
- 42 同上, p.36, Table 3.6.
- 43 Bank Negara Malaysia, *Monthly Statistical Bulletin* (January 2002: 42, Table III.15); 这个13.6%数据,是依据三个月没偿付利息为标准。
- 44 *The Economist*, 1998-9-27, p.84. “从一开始,美国与日本这两个世界

- 最大经济强权就对这危机管理失当,而它们在此区域的影响力大大超越其他任何国家”(Godement 198: 28)。
- 45 *New Straits Times*, 1998-6-13. 马哈迪因此说:“我们为了(经济)复苏所作的任何努力,都被视为错误及导致信心丧失”(Time, 1998-6-15)。
- 46 此处的资本管制大纲摘自《新海峡时报》*New Straits Times*, 1998-9-2。
- 47 同上。
- 48 同上。
- 49 Mahani (2000: 185).
- 50 Malaysia (1998).
- 51 Mahani (2000: 186).
- 52 Tripathi and Saywell (1998: 52).
- 53 *The Economist*, 1998-9-12, p.93.
- 54 Jomo (2001a: 201).
- 55 同上, pp.204-07.
- 56 Beeson (2000: 348).
- 57 Alan Brown, of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ondon, quoted in 'Executive Action', *Asiaweek*, 1998-9-11, p.36.
- 58 'Malaysia needs to end isolation',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1999-6-23.
- 59 Bhagwati (1998).
- 60 Sachs (1998: 19).
- 61 *Asiaweek*, 1998-9-18.
- 62 Mahathir (1998a).
- 63 Higgott (2000).
- 64 Beeson (2000: 335).
- 65 Hiebert (1998: 14) 报道,有位巫统代表在党大会说:“很多人对首相感到不愉快。小商人埋怨他对经济管理不当,且选择性地拯救某些人。人民对他不断抨击外国人而逐渐感到厌烦。我们开始受到伤害。”
- 66 RAM (1997).
- 67 Mahathir (1998a: 21).
- 68 Bank Negara Malaysia (1998: 80).
- 69 同上。
- 70 同上。
- 71 Thillainathan (2003: 12-13).
- 72 Tan Tat Wai (2003: 31).
- 73 *The Star*, 1998-7-1
- 74 'How dare you say these things!', *Time*, 1998-6-15 (http://www.pathfinder.co...malaysia_interview.html).
- 75 'A Difference in Style', *Asiaweek*, 1997-12-19.

- 76 同上。
- 77 'What is Success Without Freedom?', *Time*, 1997-10-6, pp. 23-24.
- 78 Saludo and Shameen (1998: 44).
- 79 Malaysia (1998: no pagination, Box 1).
- 80 'When stability is vital for growth', *New Straits Times*, 2000-8-23.
- 81 Jomo (2001b: xviii).
- 82 'A Difference in Style', *Asiaweek*, 1997-12-19.
- 83 'Camdessus accepts DPM 's invitation to visit Malaysia', *New Straits Times*, 1998-1-10.
- 84 Mahathir (2000b).
- 85 Jomo (2001b: xx).
- 86 同上, xxiv
- 87 *The Economist*, 1998-3-7, p.7
- 88 这种做法“会被很多人视为偷取”,(Godement 1998: 28)。尽管如此,把金融系统对外人开放依然是受到考虑。此点,也可由副财长欲把外资在金融机构里的持有比率提升至 50% 以上的有关发言窥知。(New Straits Times, 1998-7-30)
- 89 'How dare you say these things!', *Time*, 1998-6-15 (http://www.pathfinder.co...malaysia_interview.html).
- 90 'Mahathir Mohamad 's Very Bad Bet', *Fortune*, 1997-11-24, p.23.
- 91 'Mahathir vs. Soro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97-10-2, p. 32.
- 92 Patomaki (2001: 11).
- 93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1999: 47).
- 94 Lim (1998: 125-29, 142-45).
- 95 Tan (2003: 38).
- 96 Mahathir (1998c: 86).

第四章

安华的创造

问：这些指控都是针对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的吗？

答：是的……显然那是因为大家认为他很可能将[原文如此]继承我。有人正图谋抹黑他，好让他无法继承。就这么简单。

问：您是说那不过是要破坏拿督斯里安华的名誉？

答：我不认为他们会得逞。除非有人实在是笨得可以，竟会相信这类荒谬指控。

——摘录自《新海峡时报》与马哈迪的访谈，*New Straits Times*, 1997年8月25日

这确实令人遗憾，因为我对贪污腐化、企业管治、私营化原则、朋党徇私、裙带攀附与人权的看法，并非要针对一小撮人，而是为建设更理想的社会。但他们却认为，这些议题太过激进。[有些人也]觉得我要挑战马哈迪，就算我作出多大保证，他们还是不信。

——安华：引自 *Asiaweek* 的报道，〈我从未威胁首相〉
(I Never Threatened the PM), 1998年9月18日

自从安华1993年将嘉化·峇峇(Ghafar Baba)从巫统署理主席的高位上拉下，并在稍后受委副首相以来，国际媒体就一直对安华和马哈迪两人之间，据说在个性、风格、看法与政策上存在的歧异，甚感

兴趣。随着1996年巫统党选的脚步逼近，媒体的兴趣，也就变成不断在追问以下问题：安华会挑战马哈迪的主席大位吗？结果安华终究没与马哈迪对决。安华反复声明他不会挑战马哈迪，而会视后者为其导师甚至就像父亲。而马哈迪则强调，他会遵从巫统对其党、政副手人选的抉择。1996年巫统党选过后，马哈迪与安华对于外界有关他俩闹分歧的进一步议论，皆淡然以对。马哈迪1997年5至7月渡假期间，还首度正式委任安华为代首相。观察家大多理解这样的安排，不仅是在测试安华能力，亦是马哈迪对其“钦定继承人”的信心展现。马哈迪7月中结束休假回国后，还明言他对安华治国两个月来的表现感到满意。此外，从首相与代首相俩这段时间内经常联系——即安华若觉必要，就会征询马哈迪意见的互动来看，这两人似乎关系紧密，且安华亦颇见恭顺。¹

1997年7月货币危机开始在泰国浮现之际，马哈迪还身在国外。当他回到马来西亚时，距危机发生已近三周。接下来的一年里，马哈迪与安华都尽量掩饰彼此间的分歧，只提共同看法，并谈到要执行内阁的集体决定，以维护国家利益。²1998年6月，马哈迪似乎对媒体毫不放松地探究他与安华的关系动了肝火，竟说：“我是不是要在街上当众亲吻他，才能让大家停止议论我们不和？我们一道过日子，也共同治理这个国家。我承认我们之间确有分歧，但最后总是能达成一致共同看法。”³

1998年9月2日近黄昏时，首相署却在没提供任何理由下，简短宣布解除安华在政府内的一切职务。紧接着9月4日上午，巫统最高理事会亦决定开除党内这已两度获选的署理主席。安华遭免职并被逐出巫统所带来的巨大震撼，随后更因一系列的事态发展而加剧：首先是媒体揭露，安华竟面对“性行为不检”的指控，然后他在9月20日戏剧性被捕，遭警方扣留期间又被总警长袭击，其罪名的起诉、判刑与入狱也充满争议，遑论安华的支持者和反对党人至今犹面对警方、媒体或选举运作上的卑鄙对待。

安华被黜后大部分的事态发展，我们将摆在下一章，也就是分

析安华挑战马哈迪和巫统之后形成的“烈火莫熄”运动的路线与政治含意时，再予探讨。在此我们必须先追问一项基本问题：为什么那样一段悠久、火热的政治关系，那似曾携手致力解决过马来政治和马来西亚政治当中某些极棘手难题的关系，竟会走到如此毁灭性的尽头？马哈迪与老同志慕沙·希淡(Musa Hitam)，曾因1985—86年间的经济衰退和其他政治危机期间衍生之差异，而分道扬镳。另外马哈迪即便只以微差击败他最顽强的对手东姑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数年过去后，拉沙里依然可以在1996年回归巫统。马哈迪对待慕沙、拉沙里两人，都从未像迫害安华那样施虐。

问题的答案，部分就落在前一章即讨论过的，马哈迪与安华俩在经济政策和管理的差异上。然而经济——尤其若局限于1997年7月危机时的环境，却只能提供单面向的分析。我们需要多面向的答案，既能触及外在情势与干预的影响，又涵盖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权斗所必不能免的个人算计，还有巫统领导层更迭的痛苦经验，以及最后探究安华一生作为社会运动活跃分子与政治人物的角色矛盾。

摆荡在颂赞与咒骂之间

马哈迪与安华在看法上、世界观和性情上都存在差异，是一回事；这些差异之所以在1998年爆发为两人之间的惨烈对决，却又是另一回事。毕竟马哈迪与安华俩从1981至1997年，都一直共事良好。自马哈迪1982年将安华带进巫统以来，不论在党内外，安华都忠贞地追随着马哈迪的主要奋斗路向。1983—84年的宪政危机和1987年的巫统党选，就是当中的两则显例。马哈迪的回报，则是不断为安华提供机会，让他在党、政职务上迅速窜升。这在长期互信下培养出来的忠诚、和睦的私人情谊，究竟是如何迅速地被突如其来的猜疑所撕裂？马哈迪与安华各自在紧迫压力下所作的盘算与计策，无疑是关键。但他们的决定，却难免受到“资讯币”(information coin)的正反两面所影响。这“资讯币”对两人不和的预言，并将两人驱向冲突的效果，已经在1997—98年的危机期间，变得较非危机

情势下更具驱动力。

重量级的国际英文媒体，代表了这“资讯币”的其中一面。马来西亚受严格管制的国内媒体，并没办法随心所欲报道马哈迪与安华俩这所谓“父子”关系已经恶化的任何传言，但国际媒体却无此拘束，遂能突出马哈迪和安华的“政策冲突”与其他诸事。事实上，马哈迪与市场的冲突愈烈、与国际机构之间的看法愈分歧，市场就会更常冒出贬抑马哈迪、并颇昭然地偏好安华的声音。

举例来说，《时代》(Time)杂志的安东尼·史派特(Anthony Spaeth)就曾写道：“安华已经向世界保证，不论马哈迪宣布什么，其副手都会在幕后作出理性决定。但这并不总是如此，一种双重人格(Jekyll-Hyde)的领导，已渐渐浮现。”⁴ 尽管如此，史派特确信“与此同时，世界已越来越清楚的看到，马哈迪首相为保护其同伙而坚守顽抗。我们至少可以说，马哈迪医生与全球经济当前的新步调，并不一致”。⁵ 1997年9月1日，也就是在马哈迪政权实施市场所深惧的资金管制前恰好一年，《新闻周刊》提到：

“全世界的鸿儒，都给马哈迪的经济学打了个不及格(F)的分数，因为搞垮泰铢的，并不仅索罗斯(Soros)一人。惟这些饱学之士，都没真正看到重点。马哈迪和索罗斯的斗争，主要并不关乎货币，而是到底谁的价值观，将能够在东南亚胜出。”⁶

《新闻周刊》的这篇文章还说：“安华是马来西亚国内在权力上，堪可制衡马哈迪的惟一一人。”并且幸运的是，该文还暗示说，“他就快当家作主了”。⁷ 不到三个礼拜后，《远东经济评论》就在它9月18日的社论里，以肯定的语气写道：“就我们的观点来看，马来西亚若能从印尼撷取相关教训，更加戮力于市场改革，才是最佳之道。”该文接着以高姿态谈到：

“犯错乃人之常情。马哈迪医生似乎正毅然起而弥补错误，若真如此，他需要比原先所规划的步伐，更快地将国家带往市场自由化的路上。由于上个月的错误判断，他要弥补的实在甚多。”⁸

9月27日,《经济学人》报道说,“传统上原都是马哈迪医生最忠实拥趸的吉隆坡生意人,如今却担心他那非正统的方法,或将带来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与财政灾难”。该文乃下结论谓“马哈迪医生失策”,并突兀地回忆道:“这些年来,马来西亚政界的重大问题,就惟有首相是否会让安华先生接班,以及何时交班。”⁹而在类似的语气下,《时代》杂志亦于10月6日提到:“马哈迪已因管理马来西亚经济不当,而备受指责。这位一度广受赞誉的马来西亚经济荣景的奠基者,看来已是危险地和现代经济现实脱节了。”¹⁰1997年11月24日,《财富》杂志对马哈迪“糟透了的押注”(very bad bet),更是充满遗憾:

“一个比较审慎的政府在应对[危机]时,可能会削减预算、紧束货币流动、解除工商业管制并欢迎外国投资者。惟马来西亚却一样都不打算这么做。

马来西亚其实就和亚洲各地一样,也需要深入改革。但它偏偏不像亚洲各地,径自拒绝改革。”¹¹

市场方面与媒体都指出,马哈迪拒绝采取“根本改革”,且“只要一逮到机会,马哈迪就会痛斥这个世界肆无忌惮的权力宰制与无情”。¹²幸好“安华的哲学,大不相同”。¹³安华认为“我们应勇于说出本身需要进行这些改革的事实。我们的行事必须更加透明,也要有十足决心来打击贪污与过度的权力”。¹⁴

马哈迪反过来则是怪罪于国外操纵者;而曾经宣示过自己“政治上乃自由主义者,经济上却是个保守分子”的安华,对此危机则有以下深思:

“我们学到的重大教训——这教训本身,实际上也是个大转型与大革命——就是它召唤着更进一步的透明、责任和民主。

如今每个人都会去评估市场的意见、评估民众的感受,还有奖赏、补助是否给了你党内的支持者或朋友家人。这些事无一例外,都已获得公开辩论。我觉得那是非常正面的发展。”¹⁵

所以市场与其媒体遂开始建议,惟有安华,才可以“将马来西亚从马哈迪的过度影响下拯救出来,并为该区域带来新的想法”。¹⁶安华这人看来既希望撮合自由主义政治与新自由主义经济(neoliberal economics),似乎才是市场应该打交道的新领导人:

“我这一代的人,毫无疑问希望看到更大的自由空间,更贴近文学与知识,而少一点审查。我们并未执迷于对秩序和政治稳定的需求,也未经历过父辈们所曾遭遇的动荡。”¹⁷

安华既自称属于“未受殖民经验困扰的新世代”,那他希望“强调公民社会、基本自由,以及民众经教育和知识熏陶下,皆能行使的信赖与智慧”,¹⁸似乎就很合理了。简单的说,安华作为“晚近金融危机当中的一道清醒之音”,已经被“海外媒体奉为名士”,而那无疑是以“马哈迪的利益为牺牲”。¹⁹

市场与其媒体对于这一切,当然看得分明:“安华和他的支持者也都知道,老一辈的不去,新世代就无法崛起”。²⁰但迟早总要有人去告诉“老一辈的”他们“该走了”,不是吗?就在1998年巫统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一周,巴瑞·韦恩(Barry Wain)连续于6月12日、13日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上撰文,直率地问道:“马哈迪为何还不鞠躬下台?”²¹韦恩的问题,或许正明确表达了这约一年以来,许多国际媒体人脑海中的殷切期望。

就文字记录来说,国际媒体从来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和马哈迪作对;否则它们早就撇开他,就像它们撇开那些被西方强权痛斥为“贱民”(pariah)、实在令人无法接受的政权领导人那样。在体认到马哈迪终究是西方之友,更是西方在马来西亚商业利益保护者的大前提下,国际媒体已经学会将马哈迪对西方暴躁、肤浅的批判,转化成有新闻价值的“争议性看法”。而马哈迪这方面,尽管经常辱骂国际媒体,或抱怨国际媒体不公平对待他本人、马来人和马来西亚,马哈迪在其从政生涯当中,还是屡屡向国际媒体发言,接受它们的访谈,并为它们撰文。机敏如马哈迪,当然会善加珍惜他与国际媒

体的接触,因这可使他获得一种马来西亚卑微的世界角色不可比拟的政治家高大身影。马哈迪与国际媒体,就这样发展出了众所周知的爱恨交织关系。由于彼此间偶尔才向对方开炮轰击,双方的读者和支持者,自然更对他们深信不疑。

不过1997年7月后,随着马哈迪对国际货币市场的改革要求愈不妥协,国际媒体也明显改变了对马哈迪的态度。它们在这事上的作为,堪称敏锐:没有比一场经济危机,更能将即便是马哈迪与安华俩意见上的小差异,也扭转成严重分裂的时机了。另一方面,国际媒体也堪称恶毒:“不知道安华的崛起,是否正为1999年党内挑战领导权铺路?”²²国际媒体事实上欢迎马哈迪与安华俩这场体现为国家与市场相悖的对抗。而凭借着某方的不安全感与另一方的野心,来挑动“首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的冲突,国际媒体亦可谓怙恶不悛。以新闻自由的名义报道一个不怎么自由国度里的政治发展,既增进货币市场的利益,也加强了新自由主义者对资本自由流动的追求。

马哈迪与安华不睦亦直接攸关某些人的利益,他们虽同样充满党派之见,却没国际媒体那么老练世故。1997-98年间通行的“资讯币”的国际一面,具有公开、正当、权威的优势。但它的另一面,却大概都是铸造自国内各项阴暗要素,乃一贯显得隐蔽、非法、下流。这国内的“资讯”来源——其实大多是些 fitnah (诽谤) 和 tohmah (没有根据的指责)——以多种形式呈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surat layang, (“飞函”或恶意中伤的黑函)。

政治黑函偏爱的话题,就是政治人物的贪污腐败与性方面的不检点,且当事者大多都是巫统中人。由于巫统内斗艺术的精华之一,就是搬演 wayang kulit (皮影戏),这类黑函遂总是典型地在巫统党代表大会、党选和全国大选进行前或进行期间,悄悄出现。巫统高层党职的竞逐者,几乎无一能幸免成为黑函主角,遭人企图藉黑函败坏其名誉或整垮。不过据说这些黑函的内容,并不全都是虚假不实! 尽管如此,像黑函这类诽谤中伤与人格谋杀的武器,因为实在

不够直接,说来并不怎么有效,除非它所揭露的行为不检早就广为人知,亦严重到不得不予以正视的地步。

自80年代以来,或许因为这匿名污蔑之道并不管用,诽谤性传闻与黑函,偶尔倒也会因那些由私人出版、却公开流通于市场上的同类书籍出现,而黯然失色。这类作者的恶毒毁谤,的确是针对特定对象而发。《挑战者:到底是谁在和谁交手?》(Challenger: Siapa Lawan Siapa?)就是这当中恶名昭彰的一例。该书曾在1987年巫统党选前,刻意诋毁慕沙·希淡。

1997年8月,安华也成了“来路不同的七、八封信函”的抹黑对象,其中“有些署名,有些则匿名”²³——部分信函还直接送到了首相那里。它们指控安华道德不端,尤其针对他据说在性方面的胆大妄为,和异性、同性都扯上关系。这些信函的出现,一般来说意味着:

“少数安华在巫统党内的反对者,已经诉诸极端手段来制衡副首相……很少人会相信那些信,但这已鲜明昭示着安华的敌手们,是准备如何不顾一切地蛮干了。”²⁴

马哈迪本人,就是不相信这类信函或信函作者的头号大人物。他在1997年8月2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曾斩钉截铁地斥之为“不过是些老套的诽谤”,用来对安华“搞破坏”,“显然因为大家认为他很可能将[原文如此]继承我”。²⁵部分信函的作者,或许为了让人更相信他们所写的内容,根本就不屑遮掩其身份或目的。当中直接写信向马哈迪告状的两人,就是安华机要秘书阿兹敏·阿里(Azmin Ali)的妹妹乌米(Ummi Hafilda),和安华的前任司机阿兹占·阿布巴卡(Azizan Abu Bakar)。马哈迪曾对某项诋毁安华的举动,一笑置之:

“作者自己都否认了信的内容……没错,此人是写了这封信,但那是在某人指使下写的信。信里头所使用的语言,已经超出某位作者的能力范围。显然有人正到处活动,议论着要如何置某人于死地(talkin,译注:指回教徒为下葬者所作的祈祷)。这纯粹是政治攻击,毫无事实可言。”²⁶

然而马哈迪毫不怀疑这些幕后黑手的政治动机，是在藉指使他人“抹黑安华，让他没办法继承我”。²⁷

这类五花八门的黑函内容，虽曾让巫统党内争执的各路人马或恼怒或痛快，却罕有针对其真实性，认真展开过调查。不过或许因为反安华的材料，是公开冲着首相的“钦定继承人”而来，并且就像安华所观察到的，“这回它筹划得更周详、更有组织也更加细腻”，²⁸警方乃对此展开调查。当时身兼内政部长的马哈迪，宣布“警方已查过[这事]，惟至今发现都不确实”。²⁹然而反安华的文献，还是不断涌现。除了信函，连书也出现了——《安华依布拉欣的挽歌》(Talkin Untuk Anwar Ibrahim)和卡立·杰菲里(Khalil Jafri)的《安华不能当首相的五十个理由》(50 Dalil Mengapa Anwar Tidak Boleh Jadi PM)就是。其时安华或许仍“未受对付”，观察者却已怀疑“对他的攻击，恐怕亦难止息：据内部消息透露，有人正加紧努力，要不惜一切遏阻安华登上大位”。³⁰那确实是场阴谋，就连未卷入马哈迪与安华分裂一事的前副首相慕沙·希淡，都证实了这一点：

“我确实知道某些人牵扯其中，他们着手筹划且事实上还告诉我，要对安华如何如何，以确保他必垮台。所以就此意义来说，没错，那的确是场政治阴谋”。³¹

党代表大会前的发展

安华的地位颇见不稳：一方面，国际媒体颂赞其“德行”；另一方面，反安华的信函与书籍，则暴露安华的所谓“邪恶”。这两个方面，不论就其文字或资讯来说，都不是处于相互平衡的对立位置。只要有人想刻意挑安华的毛病，那他在这两项罪状里都是难逃谴责。对安华来说，倒楣的是，1998年6月巫统党代表大会召开时，马哈迪正是亟欲找他的麻烦。

这里头原因之一，乃是维持个人权势的实力政治(realpolitik)考量。嘉尼·伊斯迈(Ghani Ismail)认为，马哈迪总是关心如何分

化其潜在的挑战者，而这解释了1981年时，马哈迪为何要支持慕沙与拉沙里竞夺巫统署理主席职。拉沙里当时本该顺利就位，并成为副首相的。³²慕沙曾解释说，他是在马哈迪指控他私下败坏首相信誉以企图“整垮他”后，才辞去副首相的。慕沙否认涉及“反马哈迪活动”，惟马哈迪却说：“有太多政府高级官员和记者都报告及报道过这事”。³³后来经一事长一智的慕沙，还劝安华绝不能让马哈迪对他的忠诚起丝毫怀疑。

马哈迪对安华态度转变的另一原因，则是与马哈迪个人的性情、经历有关，以致对他眼中安华的意图，还有安华与媒体、货币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感到极度不安。我们若考虑到马哈迪曾在1969年时被逐出巫统，1976年又在巫统迫害异己的浪潮中遭政敌企图打成“共产党人”，还有慕沙的“不忠诚”、拉沙里那几乎得手的挑战，就可明显看出马哈迪的政治生涯里，深烙着他对一批批不同政敌的意识形态憎恶与猜疑。

马哈迪攀上政治权力的顶峰后，对他而言最敏感的议题，莫过于他的继承人选和引退时机。马哈迪没说他永不退休，但曾警告他不会在屈从于别人的条件下让贤。可以理解的是，马哈迪点出的这项区别并未引起关注，因为他老是顽强地守着大位不让，即便当他在巫统党内声望下坠时，如1985—86年经济衰退期间和1987—88年巫统分裂期间，也不例外。在马哈迪视为外部操纵引发的1997—98年危机当中，他更是不会言退。马哈迪显然打算保护其重要利益。即便如此，他还是可以诉诸于“较伟大的”动机：“马哈迪已经投注了十七年的不懈努力，来营造经济繁荣、现代化愿景及巫统霸权。他并不愿见到当中任何一项，因国内这不确定的时刻而牺牲。”³⁴

马哈迪已经太广泛地涉足这场危机的管理当中，还正专注于和货币市场开战。此时如果撤退，当然只能意味着战败且颜面尽失。别说像东姑阿都拉曼在1969年5月族群间暴动后逐渐失势逊位这类情形，马哈迪更难以想像的是，他该落得与1998年5月被赶下台的印尼前总统苏哈多同样下场。而我们也几乎无法想像，马哈迪会

将安华“太过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策”一事，和安华以谈论透明度、朋党、优良管治及创造性破坏等清楚表达的“新世代”感受这另一件事，看成纯属巧合。对马哈迪来说，那正是敌视他的国际媒体所使用的部分语汇，是“战斗语言”。黄仁元 (In-Won Hwang) 在安华被黜后与慕沙·希淡访谈时，后者就回忆说，他曾：

“亲自与安华谈过，对他说：‘你要有麻烦了。’但他总是说：‘没事，我已经和首相谈过，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他了。我向来都会让他知道我的想法。’这不禁让我更加担心，因为那正是我当副首相时，同样说过的话。”³⁵

以马哈迪如此的性情与经历，还有当时被逼到墙角的处境来看，他之所以将这些巧合视为阴谋，也就不足为奇了。安华遭免职后，曾说，“挑战 [马哈迪] 并没任何用处，尤其是当此经济转坏的时刻”；惟安华承认：

“我也希望 [让马哈迪] 了解国内的暗流。我指出我们应现在就作调整，或最终让一个平顺的转移过程 (transition) 发生。但我从来没威胁过他。我希望让他自行决定转移的时机安排。他却觉得我这人实在太过讨厌，或碍手碍脚。”³⁶

“暗流”、“调整”、“平顺的转移过程”、“时机安排”——这些话不论在什么时候说出，听到马哈迪的耳里，除了不忠、挑战、威胁与继承外，还会意味着什么？更何况那是在 1997-98 年。

1998 年 6 月，安华的支持者终于在巫统大会召开前一天进行的巫青团大会上，作出了无法回头的举动。尽管马哈迪已事先警告过巫统党员，不要受外国人攻击亚洲“朋党徇私与裙带攀附”的言论所摇摆，巫青团团长阿末·查希 (Ahmad Zahid)，还是出言批评了经济管理当中的“朋党徇私”与“裙带攀附”。当时巫统内外都有很多人对马哈迪处理危机的手法，感到极为忧虑。据未证实的报道指出，甚至连资深政治人物，都要安华“阻止这老人家”；还有人则呼吁安华

“带领我们走出这黑暗”。³⁷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确定，安华是否真的指使过阿末·查希和巫统党内的安华人马，对马哈迪的经济管理发动这场蹩脚批判。惟不论阿末·查希在巫青团大会上的演讲是如何温和、细腻或契合当时的背景，它毕竟是与 5 月间才推翻苏哈多的印尼反 KKN (kolusi, korupsi dan nepotisme, 亦即串谋勾结、贪污腐败与裙带攀附) 改革运动相距太近，因为那不过就一个月前的事。马哈迪的反击，则是典型地大言不惭宣称：他的“朋党徇私”与“裙带攀附”，已经帮助过“六百万朋党”，意指新经济政策下的马来受惠者。马哈迪交给媒体公布的官方资料，亦显示阿末·查希与安华的家人，都曾经从新经济政策中获益。阿末·查希的挑衅之举，结果落得虎头蛇尾，既无安华接续呼应，也不见巫统党内有什么支持动作。这事难免让人兴起疑问：安华阵营到底是已经准备面对阿末·查希发难的后果，还是在看到阿末·查希发难后没办法产生预期效果，才惴惴不安地后撤？

经过这事之后，安华再怎么声称自己对马哈迪效忠，皆已徒然。安华到底是天真还是自满？安华有没有受人误导或者施压？就马哈迪来看，这间接的证据，已经够清楚了：阿末·查希的演说，就是密谋在巫统大会上败坏马哈迪信誉的证明，而这或许已达到逼他下台的程度。³⁸ 阿末·查希正是“安华的人马”。马哈迪 2000 年 1 月为日本的《每日新闻》(Mainichi Daily News) 撰文时，就曾指控安华“建立个人的追随者，准备把我从巫统主席和首相职务上推下来”。³⁹ 他后来还叙述道：

“安华欲推翻首相的阴谋，早已是人尽皆知。我早就收到有关安华阴谋的不少情报，也知道他就是唆使阿末·查希向 [原文如此] 我发动指控的主谋。”⁴⁰

马哈迪后来宣称：“当时我仍希望看到安华接下我的位子，因我早已决定在 1998 年后退休。”但他这番话，却是在巫统 2000 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说的。于此稍后，他还对安华的密谋作了详细说明：

“此人是我一手拉拔，并且一路提携至成为我的副手的。但他由始至终，都是在为自己工作。以他个人的倾向来说，他原该加入回教党。但结果他却加入巫统，因为预见到回教党并没前途。回教党是绝不能让他当上首相的。他之所以进入巫统，不过是因为觉得，他将能藉此平步青云。由始至终，他都是在盘算密谋。我实在低估了他制造麻烦的能力。”⁴¹

当被问到当初把安华带进巫统，是不是“因为你需要给巫统一张回教面孔”时，马哈迪继续说：

“我把他带进巫统，是为避免他加入回教党，造成危害。唯一一旦身在巫统，你就必须接受巫统的斗争方向，更不能为了遂己意而利用巫统。他在每一个组织里头——警察、武装部队、民事服务、学生当中、大学导师当中还有海外，都建立起亲信小组。他这是在利用权力，建立群众对他个人的忠诚。而一旦成为副首相，他的下一步骤，就是推翻我。”⁴²



安华·依布拉欣：一般公认的反马哈迪主义者

马哈迪遂下结论说：“我无法想像一个我曾协助过的人，竟会这样做”。⁴³ 惟既然如此，马哈迪为什么不以“策划阴谋”、“背叛”及不当利用巫统这类理由，来罢黜安华？就这事而言，马哈迪又为什么不进一步指控，安华是外国利益的马前卒？或许那是经阿末·查希挑衅后，愤恨不平、拒绝被人羞辱地撵下台的马哈迪，才重新以“背叛”角度，诠释他和安华的关系；又或者在痛苦地重建过去的记忆后（这是人们吵架期间，常有的事），马哈迪内心的转变，终于让他相信了不过一年以前，他还不屑理会的有关安华“不道德行为”之严厉指控。

然而重点是，《五十个理由》这书，曾被人塞进1998年巫统大会分派予党代表的公事包里。那些赞助黑函的写作与散布、赞助写给首相的署名信，还有赞助《安华依布拉欣的挽歌》及“明星出版品”《五十个理由》的人，终于盼到了一个实现希望的最佳情势：他们的议程，如今竟也成了马哈迪的议程。

继承希望渺茫

在巫统大会结束后至国庆日（8月31日）这段期间里，开始有谣言流传，说安华将会辞去副首相职。结果谣言错误，而这点其实正是关键所在。马哈迪和他的某些中介人，包括达因，曾私下要求安华辞职，要不即面对严重的刑事控诉。没有人披露过马哈迪要安华辞职的其他条件，包括此后他将在政治上如何无所作为。安华拒绝接受，而接下来的发展，就可以纳入“烈火莫熄”史了。这段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至今已有多人着墨。

安华被黜，也让巫统、马来社会和马来西亚政界感受到一种静默、创痛的震撼，因这已是马哈迪任内第三位殒落的副首相；何况突然丢官的这位，还曾广被外界欢呼为马哈迪巫统主席及首相职务的“钦定接班人”。就这个意义来说，安华去职，无异证实了巫统在党内领导权继承问题上，既深邃难测又极折腾人的一段历史。

巫统众领导人和媒体主管，并未轻率使用安华“钦定继承人”的

绰号。不过安华的“钦定”地位，并非唯有其支持者在卖力鼓吹，巫统1993及1996年的党选结果，也给了这个地位正当性。如此的钦定地位，的确缓和了多年以来，巫统因内斗而使马哈迪无法确实交班予某人所引发的不确定性。这些“某人”，到头来总会从舞台上消失。马哈迪的第一任副手慕沙·希淡，1986年辞职，此后就再也无法保住他在党内的强大影响力。马哈迪内阁的第一任财长拉沙里，则是在1987年挑战马哈迪的巫统主席大位失败，1988年即沦为边缘的反对力量。至于马哈迪在慕沙辞官后委任以代的嘉化·峇峇，1987年险胜慕沙，当上了巫统署理主席。惟嘉化·峇峇1993年时，即又为安华所败。所以到了90年代中期，唯有安华，才能够连续经过两回党选后，稳住党内深厚的支持力量，以继承人之姿冒出头来。马哈迪对此似乎也能接受，因为有一次，当他对媒体老是在猜测他退休的事感到厌烦时，曾说过“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或者伤残”，安华“可以马上接手工作”。⁴⁴

众人的预期是：从1981年以来即执政迄今的马哈迪，不久就会引退，而安华也会在此刻来临前，继续效忠马哈迪。惟马哈迪到底会不会走或什么时候才走？还有安华是不是能耐心等到接班？又或者他会因支持者施压，而出面挑战马哈迪？这些都是1994至1995年间，笼罩在几乎所有巫统事态发展上的重大问题。⁴⁵马哈迪与安华俩都对这类想法提出抗议，但显然无济于事。很多人恐怕宁可相信，这两人是在刻意高调抗议。然后传言出现了新的转折：马哈迪将会支持一位新的竞逐者投入巫统署理主席之战，以暗中削弱安华在党内的影响力。这可能的挑战人选，偶尔有人会提到是安华1993年时的盟友——教育部长纳吉。但有时候就连马哈迪的宿敌，从四六精神党回巢的极不可能人选拉沙里，也都有人提及。⁴⁶

不论这些传言真实与否，1996年巫统党选的大谜，还是安华到底能不能扩张其党内影响力。马哈迪以促成最高理事会先通过三项有关党选的裁决，解了这道谜。第一项裁决乃源自1995年的巫统党代表大会，当时大会曾通过决议，不让两项最高党职面对竞争。所以

这一回，党内各区部就只能提名马哈迪为主席、安华为署理主席。党会拒绝任何有关这两项最高党职的其他提名或提名组合。至于第二项裁决则是规定：有意竞逐三席副主席、廿五席最高理事，还有巫青团、巫统妇女组所有职务的候选人，都必须在大会召开前五个月，就登记其候选资格。这项规定，明显有别于巫统一向允许竞逐者远在表明其参选意愿前，就投入各式竞选活动的传统。在此之前，竞逐者大多都会先隐匿参选意愿，一来作为扳倒对手的有利战术，二来则是为避免冒犯到所谓马来文化不喜欢过早展现个人野心的禁忌。拉沙里就曾经在1987年善用了晚表态的好处；而安华挑战嘉化峇峇之役，更是如此。然后，就在竞选期正式开展后不过五天，最高理事会竟裁决禁止竞选活动。以马哈迪的话来说，这项禁令是：

“党为确保对所有人公平所采取的办法。这是因为有些候选人负担得起竞选经费，有些则否。党员们会走向某些清廉的候选人，对他们说：不给我们钱，我们就不支持你。禁止竞选活动，就是要让大家机会均等的一项办法。”⁴⁷

党选的结果，安华阵营横扫了巫青团与巫统妇女组的选举。阿末·查希崛起为巫青团团长，而来自安华阵营的关键性支持，亦使西蒂·查哈拉（Siti Zaharah）击败现任的拉菲达·阿兹（Rafidah Aziz），当上了妇女组主席。然而安华阵营却未如外界所预料般，也席卷了党母体的选举。在副主席争夺战中，安华的重要盟友并没能保住斯职。纳吉与莫哈末·泰益成功连任，而阿都拉·巴达威则是于1993年丢掉该职后，卷土重来。纳吉与莫哈末·泰益都是1993年宏愿队伍的成员，惟阿都拉·巴达威这慕沙当年的同伙，则是位凭己力出头的受欢迎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向来被视为安华牢靠人马的慕尤汀，虽曾在1993年副主席之战拿下最高票，这回却无法连任。马哈迪的人马，主导了新的最高理事会。

马哈迪1996年登峰造极的光荣表现，并不仅仅在于他对党的控制，而是他已将继承问题的负担，从他这里转移到安华身上！马

哈迪已清楚表明，他会继续担任党主席和首相，并拒绝定下一个“继承时间表”：

“我为什么要清楚交代一个时间表？只要你一提出时间表，你就成跛脚鸭了。西方领导人面对的，就是如此。……不，我才不要交代什么。我也不说什么。我可以现在随时就走，或十年后才走，或随我怎么样。这要视情况而定。我告诉你，只要谁在当我的副手，谁就会继承我。”⁴⁸

1996年巫统党选后，安华的主要关切，已是如何确保其“第二号人物”地位。这场选举证明了安华其实并没像外界所推测的那样，牢控着巫统。惟随着他开始在党内广布影响，安华似乎握有时间上的优势。事实上到1998年时，随着巫统各区部完成区党职和参加1999年大会的党代表选举，外界广泛认为，安华阵营掌握了党代表的相对多数。这样的坚实支持，若再辅以党内其他派系的支援，或即足使安华一旦必须在1999年和马哈迪对决时，成功夺下主席高职。

直到1997年中期，从马哈迪至安华的平顺权力转移，看来仍非常可能。⁴⁹然而1997年7月的危机，却毁了这个局。⁵⁰安华被黜，结果竟成了巫统四十年的领导交接史中，最惨烈的败笔。从1957至1976年，该党通常都会尊重其主席兼首相自行决定继承人选的特权。巫统党员默许这项领袖特权，到底是证明了他们对既定程序的民主顺从，还是证实了巫统和马来西亚的“半民主”或“准民主”（‘semi’ or ‘quasi’ democracy）状态，尚有待讨论。无论如何，领导人因为能不受窒碍地行使其特权，确实有利于在各种情况下，都能达成相对平顺的权力转移。1969年5月以后反东姑阿都拉曼的不流血宫廷政变、1976年敦拉萨猝逝，以及1981年敦胡先翁自愿引退后的权力交接，都是如此。

接下来从1981至1987年这段时间里，巫统的领导权移转问题，却随着党内各敌对权力中心间无限制的竞争，加上党又恰好掌握了决定马哈迪继承者的能耐，而具有尖锐斗争性质。不过同样地，党

所能掌握的这项授命大权——即所谓对领袖特权的民主改良，究竟是否更为允当，亦犹待讨论。因为某某人为确保授命，却会让党付出体制不稳定的代价。

至于从1993至1996年的这第三个阶段里，领导人与党全体之间的权力消长，则似乎陷入僵局。从马哈迪所有政治上审慎的谈话来看，他已不再信任党对其接班人选的安排。何况经济危机之际，那更已是攸关其个人存亡的大事。

在1998年的紧要关头里，马哈迪对国家权力的实际主宰（或说拥有），使安华那据称掌控着党的力量，显得无足轻重、徒具形式。马哈迪与最高理事会藉开除安华，试图回到党过去的时光。这是在预防安华挟当年慕沙式的“官职不再、党职犹在”之利，卷土重来——副首相一职固然可由首相予夺，巫统署理主席一职，却唯有待下届党选时才能将之剔除。1999年初，最高理事会还无限期推迟了该年的巫统党选。

安华虽掌握党代表的多数，却已毫不管用，只好被迫于巫统之外继续其反对行动，就这样开始了许多观察家称作“安华再创造”（reinvention of Anwar Ibrahim）的过程。不过回顾安华的个人历史，当可发现这再创造的源头，其实并不在他所激发的“烈火莫熄”运动，而是落在他三十年来，投身社会运动与从政之路的矛盾上。

四个阶段和一项矛盾

安华从社运活跃分子、从政一直到遭马哈迪罢黜，可说经历了四个不同阶段。在横跨1969年这分水岭年份的第一阶段里，安华是马来亚大学的学生领袖。当时校园学生政治仍生气盎然也相对自治，意识形态光谱亦宽广不拘于一格。安华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领导“马来语文学会”（Persatuan Bahasa Melayu）和“马来西亚回教学生全国联合会”（Persatuan Kebangsaan Pelajar-pelajar Islam Malaysia）。安华的第二阶段，则是从他1971年毕业后开始。安华和另几个人共同创办了“马来西亚回教青年运动”（Angkatan Belia

Islam Malaysia, 简称ABIM), 并将它建设成推动回教复兴的一个重要载体。当时回教复兴可是新世代的马来回教青年里, 最强有力的声音。至于最漫长的第三阶段, 则是安华身在巫统和政府内的时期。自1982年获选为檳城峇东埔(Permatang Pauh)国会议员开始到1998年, 安华从被招揽入草创不久的马哈迪政权, 一路窜升至俨然已成马哈迪的“钦定继承人”, 且窜升速度极快, 让他在巫统党内的许多对手警觉不已。至于现阶段, 则是从1998年9月以来, 安华遭迫害并起而反抗, 加上民间的广泛异议, 共同将他重塑为“烈火莫熄”偶像的时期。

以上所勾勒的安华从投身社会运动、仕途顺遂至政治垮台的生命历程, 究竟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最显著的一个事实是: 安华在他四个阶段里的其中三个, 都是采取了反体制的姿态。把话说白一点, 就是安华在1969年以后反东姑阿都拉曼, 70年代中期反国阵, 并从1998年9月以来, 既反马哈迪也反巫统。唯有在那漫长的第三阶段里, 安华才是体制内的要角。

安华在那些反体制阶段里所献身的意识形态, 如果分开来看, 似乎颇有不同。60年代晚期的“马来民族主义”, 是与他偶带夸张地提倡马来语作为国语的热忱有关。这套意识形态, 同时也关注一类不久即为新经济政策所涵盖的经济问题。安华“马来语文学会”的立场、活动与形象, 在在让他向马哈迪这样一位刚被逐出巫统、且马来人普遍景仰为自我牺牲之“马来民族主义者”的人物靠拢。安华在将近三十年后, 还曾追忆他1970年前往吉打拜访马哈迪一事, 是“伟大的会晤”, 而他当时对马哈迪的观感则是: “这是一位能够清楚表达马来人立场, 也敢于这么做的马来知识分子。”⁵¹ 安华有点像是成了被孤立的马哈迪在马来亚大学校园内之盟友, 和他的伙伴们“将整个大学体系, 都交给马哈迪来当论坛”。⁵² 而马哈迪这方面, 则是让安华阅读他后来出版为《马来人的困境》一书的初稿。

1970年代安华投身ABIM, 他的努力, 最初可从“您的基金”(Yayasan Anda)和初兴的校园宣教(dakwah)运动看得出来。前

者旨在透过教育活动协助马来回教学生, 后者则是同时在国内大学及拥有众多马来官派留学生的某些国外大学里兴起。从某个意义来说, ABIM不过是接续安华早在校园时, 就已尝试“结合马来民族主义者和马来学生政治当中的回教流派”之下一步努力。⁵³ 惟随着新经济政策实施, 马来学生不论是在国内或留学人数都大大增加, 安华乃得以藉其日愈突出的形象及领袖魅力, 协助将ABIM带向更宽广的社会、政治参与。随后ABIM的规划变得更为多元, 但无论如何, 回教仍是安华与该组织针对某些马来人、回教徒和道德问题, 赖以批评国阵政府的政策及其结果、冲击与滥用的首要泉源。安华本身对于新经济政策下贫穷、经济不平等与社会失序的立场, 确实使他和其他政治人物及学生, 于1974年时前往华玲(Baling)声援大规模的马来农民示威, 紧接着并在内安法令下不经审判, 就被关入甘文丁扣留营(Kamunting Camp)达廿二个月。⁵⁴ 在安华回教阶段的最后岁月里, 亦即他加入巫统前, ABIM曾领导过一个全国性的社团联盟(这些社团[societies], 也就是我们今日惯称的非政府组织), 大规模地运作反对更具钳制性的社团法令修正案。最后, 从1998年9月2日安华丢官并随即遭巫统开除到9月20日他身为自由人的最后一日, 安华更激起了一场追求民主、改革与社会正义的广泛运动。由于自9月20日起即身陷囹圄, 安华只能为这后来促成替阵于1999年11月大选前成立的跨族群异议运动, 提供一种象征性的领导。无论如何, 安华高举拳头、脸孔被殴且单眼浮肿的形象, 自1998年末以来, 就已在公然反抗的“烈—火—莫—熄!”声声呐喊中, 被召唤出来。

安华的意识形态和他本身对这三个“反体制阶段”的投入, 从来就没人清楚充分地说明过, 而这也是他为什么常被人视为可塑性大——如果不是个彻头彻尾机会主义者的话——的原因之一。不过总体来看, 安华所献身的理想, 包含了三道值得注意的线索。

第一道线索, 是与他不同阶段里的族群立场有关。它始自安华校园时代的马来民族主义。这项立场随后修正为ABIM的标记——

非族群的公民实践主义 (non-ethnic civil activism)。“烈火莫熄”运动正是承袭了这股精神,激发一场跨族群的政治实验。我们从这第一道线索,当可看出安华已逐渐从“马来民族主义”,转换到了90年代之际,最常被人唤作多元文化主义的某种针对马来西亚族群关系之意识形态立场。

第二道意识形态线索,则是发展自ABIM对于经济不平等、社会不义及公民自由受到钳制的道德批判。时间一久,这类批判已经从保卫华玲农民,扩大至反对社团法令的全国运动。安华遭罢黜后,又将它们从巫统岁月里尘封已久的架上取出,成了替阵反对朋党、贪腐与裙带恶风的诉求。

至于重要的第三道线索,则是与安华为何而战不太相关,而攸关他最乐于和谁并肩作战,还有谁会在他严峻的患难当头,始终不离不弃。这个“谁”,就是学生、年轻人与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学生们,尤其是身在国内外的学院生与大学生,以及“关怀社会的年轻人”,乃安华所有反体制实践阶段里的显著特色。至于公民社会,则显然是在他的回教阶段与“烈火莫熄”阶段里举足轻重。随着安华1998年9月被黜,这批人支持安华,让他得以自我重塑为政治活跃分子,并重建他与那些就社会、政治观点来说,倾向浮动、短暂与边缘化的团体和民众的亲密关系。

三道线索交织的结果,自然就织出了一套镶饰着文化主旨、公民社会关怀与道德复兴热望的意识形态。而这恰恰是安华在他体制内阶段的巅峰时期,所出版的《亚洲文艺复兴》(The Asian Renaissance)一书的知性架构。

颇有意思的是,安华的巫统阶段,几乎由始至终都埋着深刻矛盾。安华1982年3月加入巫统的决定,曾导致ABIM分裂,主要是因为许多ABIM领导人及成员,要不曾明白表示过不愿直接涉入政治,要不即认为他们在政党中的天然盟友,应是反对阵营的回教党。而安华领着部分ABIM成员一道入党的结果,也加剧分裂巫统,这主要则是因ABIM与巫统双方早就存在的敌意,以及安华利用其前ABIM

战友,建立党内的影响力。另外对ABIM的安华来说,回教直到那时为止,都滋养着一类对资本主义下马来西亚社会的道德批判。可是到了巫统,安华却同意马哈迪的观点,即认为回教最重要的意涵,是契合马来西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套工作伦理。而从ABIM出走至巫统、从反社团法令运动到进入政府当官,安华实际上也是遗弃了公民社会,转投国家机关。但“请叫我兄弟(Saudara)”,安华又老爱以一种温情的口吻说话,好像国家机关也能表现得像个“关怀备至的公民社会”。所以在公民社会里的前盟友、前同志眼中,安华被马哈迪收编并无不当,因为这是他“从体制内改变事物”的个人使命。无论如何,国家权力行使的必要,终会使青春理想及个人的允诺动弹不得:到头来竟无一事——社团法令也好,内安法令、官方机密法令也罢——从内部获得改变。

诸事不变,唯一变的,或许就是安华的使命已个人化。这其实是政治新秀上攀顶峰时,甚常发生的事。于是从1982至1998年的整整十六年里,安华就在巫统安顿下来,并平稳地逐级跃升。这意味着随着巫统政治愈趋污浊,安华也同化其中。当他加入巫统之时,或许也未料到该党的派系倾轧,刚开始闹得失去控制。巫统作为政治舞台,已经转变成你死我活的竞技场:一个人在党内的位置,由他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党内影响力及企业财富多寡,以及他如何筹划、配搭和操作,即可决定。党内的派系、队伍总是不断组合再组合,别说大展鸿图,为求生存,当事者只好越来越倚重敌人的敌人为友。安华凭着马哈迪的支持,1982年就扳倒苏海米(Suhaimi Kamaruddin)当上了巫青团团长。1987年造成党分裂的那场党选,安华则是A队的得力副将。到了1993年,当安华领著其“宏愿队伍”赢得巫统党选并当上署理主席时,他已毫无疑问成了巫统派系政治的老手。

在这样的无情世界里,一个人又能上哪去为自己的灵魂,找一处安息之地呢?只从政治角度而不再从精神角度发表言论的安华,或许以为能够在无法遏止的政治需求与无法达成的个人冲动之间,

腾出这样一处安息的空间。举例来说,安华意识到他并没办法扭转马哈迪晚期工业化规划的方向,却会试着让这项规划呈现慈祥的面貌。还有安华虽无法避免一切社会、经济与政治上的不正义,特别是弱势温顺者所遭受的不正义,却会向他们表示同情。另外安华虽不能完全控制马来西亚大宝号下,企业大老板在他们全盛时期之贪婪妄为,却仍不忘为社会上的其他阶层着想。质疑他的人,当然会说这全是伪善造作。不过我们若以中肯的角度来看,倒可将以上种种,看成大多是良心不安下的政治表现,而这正是那些已“身入体制内”、却仍相信他们“没出卖自己”的人,常有的作为。

然而就算想要如此,一个人终究没办法在党、国权位之巔继续这场政治游戏之余,还能够不沾染“Kay-el”(吉隆坡)浮夸、不真诚的习气,或 balik kampung 去重温乡间纯朴及草根民众的热情!情势大好时,这样的人,容易让人感觉像是庸儒之辈。情势吃紧时,这样的人,又会被人唤作“不参伙的玩家”(non-team player)。而当心意已决、筹码已下,这样的人,又可能遭人怀疑变节。然后就会有人用巫统圈内特有的说法,来奚落他: Mahu makan taukeh ke? (你要把老板吃掉吗?)

可以确定的是,对安华来说,这全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守在马哈迪身畔,安华早就目睹过慕沙如何败在这类“头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作风迥异、很可能还是对着不同听众各弹各调的游戏上。譬如慕沙这人不论是在其支持者或贬抑者口中,似乎都是自由作风、平易近人,和马哈迪的威权与直率形成鲜明对比。还有慕沙也常喜欢回到草根民众当中,关心他们日常生活中或地方上碰到的困难。反观马哈迪,则是倾向于花时间和 tokoh korporat 开怀畅谈霸型计划。

安华因重复着慕沙的“习惯”,故早在事情恶化得导致1998年9月的悲剧以前,就已经为马哈迪与安华之间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安华很可能就像其前辈慕沙一样,从来就没完全认同过马哈迪对这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事业的构想。至少安华大概不会以同样的冲劲,来

追求这项事业。马哈迪强烈的企图心、自尊心和历史使命感,意味着他将义无反顾,绝不因任何人而偏移他对企业世界、货币市场和全球经济的固执专注。从60年代至90年代,马哈迪经历过一段极漫长的过程,才终于从“人民代言人”(a man of the people)蜕变为工业领袖的龙头,以及马来西亚商业和政治世界的风云人物的守护者。对2020宏愿的马哈迪来说,民众就是因宏愿的无限雄心而奋起,因宏愿的激励而投身于无止境的竞争,并因其实际成就而大受鼓舞——若非如此,他们即注定失败。

安华藉涉足于一类含糊的、或可粗略称之为“安华议程”的道德经济,似乎可说是在代表马哈迪致歉。但这“安华的议程”,基本上不过就是希望伸出援手,阻止恶势力吞噬掉社会最弱勢的阶层。那不必然就是个不真诚的希望——即便安华已越发显赫;即便没有人曾丈量过这“安华的议程”,除了言辞上满足了大众对普及廉价屋及廉价医疗照护、扶助贫者并援助生活失序者的关注外,其真实成就到底为何。安华大概又像前辈慕沙一样,以为这是平衡不同作风之道,正如旺·阿兹莎(Wan Azizah)在安华遭免职后所说:

“我们国家本来运作得如此美好:你看,首相盖了世界最高建筑,还有最高的这个、最高的那个。你看,首相还有宏愿,这对我们国家很棒,没什么不好。然后安华则是谈论普罗大众,谈论廉价屋供应、工人照护,诸如此类。这也没什么不好。那其实是个良好组合,是我们国家应有的运作之道。”⁵⁵

就这事而言,1997年7月以后,主要是出于必要而非个性使然,使安华想要去照顾经济体系里那些“小人物”的财政需要。这包括将钱分配给小农,扩大为小贩、商人和小型企业主提供的微型贷款,向“最贫困者”施援,改善乡区与城市的保健设施,并确保乡区得到基础建设及各种设备的拨款。⁵⁶晚近的一则实例,更透露出某些新鲜事。话说在马来西亚大宝号与2020宏愿风风光光的岁月里,马哈迪通常都会带着许多本土企业集团的龙头作官式外访,敦促或协助他

们征服遥远的海外市场。财政部长安华，自然也是一道与企业菁英为伍。惟安华却似乎由衷地对派遣“和平基金会”(Yayasan Salam, 马来西亚仿自美国“和平工作团”[Peace Corps]的初期组织)人员到贫困国家的前景,感到兴奋。有人或许就会想:在安华对事情的谋划里,这是不是很像是在利用国家机关,将ABIM的“您的基金”,推广到世界上极穷困的角落?

换句话说,前述安华的三道线索,恐怕也都贯穿他整个巫统阶段,其结果则是导致他出现亲体制、反体制两个部分的矛盾共存。安华十六年的巫统及当朝岁月,大多都在支持马哈迪的议程。他本人并没有——或者还没有机会提出——一个清楚界定的、替代性的社经规划。安华倚赖马哈迪的2020宏愿计划,并大体追随他这位导师的脚步。安华基本上也并未反对马哈迪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事业,尽管他回避了该事业的反西方面向,而甚偏好其经营族群间关系的雄心。同样地,安华也从未诅咒过马哈迪以经济手段解决马来西亚文化问题的方法,只是他本人倾向于为政经问题提供文化解决方案罢了。

我们可以说,马哈迪的民族主义,是严格局限于经济的。那不过是将老式的反殖民主义,重新表达为后冷战时代和西方国家的竞争。安华的民族主义,则是选择探寻亚洲各国共同的历史、哲学与文化根源。就此歧异程度而言,或许“东亚奇迹”盈满物质财富的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中国报提供照片

现实,并不如讲究文化丰饶的“亚洲文艺复兴”之未来展望那样,较能让安华感到兴奋。在国内,马哈迪相信唯有搞好经济,才能真正解决族群间的争执。惟安华却经常说得好像他可以藉回教与儒学间的文化共融,来消解这类争执,又仿佛他能从“文化联营”(consortium of cultures)⁵⁷当中,寻回彼此间的共同属性,重新评价亚洲众思想家的贡献,并最终促成文化传承多元的马来西亚人,能够体认到“我们都是一家人”。

最后,马哈迪于90年代初期,曾希望建立东亚经济集团,并以严厉语调谈论威权的“亚洲价值观”。反观安华,则是出版《亚洲文艺复兴》,并逐渐掌握一套配合其“道德经济”的惯用语:公民社会、普世价值、赋权于民(empowerment)及永续发展。和马哈迪这类选择性的“亚洲价值观”对照,安华不必太过伤脑筋构思,也能够提供其他“同样亚洲”的价值观:

“亚洲价值观并不仅仅是[威权主义]。这里头不是还有德行吗?不是还有对贪污腐败的憎恶吗?不是还有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吗?不是还有基本自由吗?不是还有对知识的谆谆教诲吗?这些本质上也都是儒家伦理,却一直不获彰显。人们一再强调的,就唯有孝顺父母、尊敬长者、尊重权威。”⁵⁸

某种程度上,安华似乎可以将他和马哈迪之间的这类差异,以彼此年龄和社会经验上的代沟来作解释:“以我所出身的世代,自然会去强调这样的议题:公民社会、基本自由,还有民众经教育和知识熏陶下,皆能行使的信赖与智慧。”⁵⁹而某种程度上,马哈迪也更加对安华老爱说些华美、抽象的话,感到困惑。在某个紧要关头里,马哈迪与安华的世界观,终于出现了危险分歧。1997年中的情势,看在马哈迪眼里,就唯有阴谋,而他恨透了危机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安华的意识形态思路,却使他对于东亚的“大祸”,有着“创造性毁灭”的观点,预期它“将会清除掉社会上的串谋勾结、朋党徇私与裙带攀附”。⁶⁰



安华垮台：大马政治史上最复杂的一宗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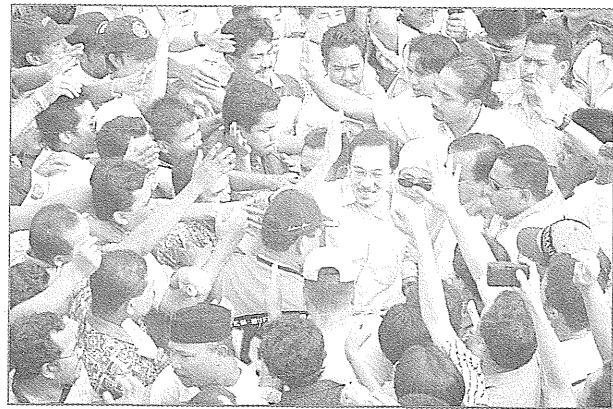
如此见解下，两人彼此遂成对方的“他者”（Other），而安华也早在东亚蒙难前，就成了公认的反马哈迪主义者。

如果没有1997年7月的那场危机，1998年9月2日的事就不会发生——至少不是以导致往后发展的那种方式发生。一如1987—88年的巫统危机，因经济情势不佳与政策分歧所衍生的孤注一掷的政治，又开始和个人的猜疑与权力算计，搅到了一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家权力行使上的必要、巫统派系斗争与商业上的利益，也是乱七八糟又极不稳定地牵扯在一处。安华的垮台，并不只是场好戏，它更是马来西亚政治史上最复杂的一宗事件。这里头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攸关存亡与政治权力的个人算计，且因先前的国际情势发展，而变得更复杂、精彩。这些发展包括外国媒体的干涉，以及印尼“烈火莫熄”运动推翻了苏哈多所造成的影响。如此复杂的政治危机，难免就会催生复杂的社会后果。安华的惨况，结果并没导致他迅速遭人遗忘，着实让其诽谤者深恨不已。相反地，安华所遭遇的苛刻羞辱和他奋起反抗的豪壮之举，竟激发一场政治、文化异议，催生了民间勇于表达意见的浪潮，而它所达致的规模，已非众人所能预见。

安华垮台前，有野心的巫统、国阵政治人物和企业大老板，都在经营他们与这位准首相的关系，而那些擅耍手腕的精明商人，更是

排着队要接受其祝福。安华的亲信一旦伺机在哪里掌了权，也都不畏于使用“金钱政治”手法，砸更多的钱来排挤、压制党和政府内部的敌手。安华的智囊团与学术顾问，则是利用公共机构、大学和基金会来进行带有政治动机的研究。安华若真顺利当上首相，这些人很多都会拥有超乎他们梦想的影响力；而他们推动安华议程的方式，也将变得制度化。不过在1998年9月初安华亟需支援的那段日子里，曾经争相与这位“钦定继承人”交好的重量级政治人物和企业大亨，还有常和旺阿兹莎 berpeluk-peluk⁶¹的上述人物配偶及国阵的女性从政者，却都明显缺了席。由于惊骇、自身的脆弱、贪婪或所有这些因素的凑合，有权有势的巫统或国阵政治人物、企业大老板和主流媒体的主子们，本来从未能挑出“第二号人物”有任何毛病，如今却突然来了个史达林式（Stalinist-type）的大逆转。9月2日以后，除了安华的缺失，他们竟已全然不记得过去和安华的交往。

然而就在安华看来大势已去、就连他自己似乎也也对下一步该怎么走举棋不定之际，成千上万的寻常百姓——没有名堂的学生、青年与公民社会成员，却都冒出来捍卫安华，并在他选举的理想下集结。面对安华遭遇到的迫害，这些平凡公民也重新诠释了过去与现在。只不过这一回，他们已经有了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意识，再也听不进承平时期的那类宣传了。诚如拉惹·贝特拉·卡马鲁丁（Raja Petra Kamarudin）所言：



就在安华看来大势已去……

“许多‘烈火莫熄’的支持者，过去甚至不是安华的拥趸。他们当中，不少人还认为安华不过是国家机器的一环，甚至责备他就是构成问题的一部分。他们还说安华在朝为官时，本就可以为纠正所有这些滥权与不公不义现象做点事，但他却没这么做。有人更冷嘲热讽地说，安华如今倒成了自己拥护十七年的体制下的受害者了。安华为何不在当初有机会改变体制时这么做？这下可好，‘活该’(padan muka)，他也成了这体制的受害者。”

但眼下大家把这全都忘了。很多人甚至已原谅安华也曾融入该体制，而不选择与它战斗。安华宁可面对逆境，也不愿以轻松逃避的方式，安享财多望重之余生的壮举，让他赎回了自己。安华已经付出远逾其罪行的赎罪代价。

对人民来说，安华‘已死’。安华成了只要你反对马哈迪，就会如何遭殃的象征。安华更是反抗精神的化身。”⁶²

安华在峇东埔发起“烈火莫熄”运动时，曾详述过他对“谁站在哪一边”的理解。安华宣称他终于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这些朋友并非有权有势、身在政界或富裕企业的那一类。他曾帮过这些人，但这些人却轻易将他遗弃。安华说，平民百姓才是他真正的朋友，就因为平民百姓的支持，他才能够重塑自己。后来在“烈火莫熄”圈内，人们开始流行唤他作“DSAI”，亦即“Datuk Seri Anwar Ibrahim”的简称。就政治术语来说，安华已称得上是位民粹主义者 (populist)。不过民粹主义一词之难以定义，早已是公认的事，因为民粹主义者总是以许多不同的形貌出现。有民粹主义者投射出来的潜在恐惧与偏见，不仅相当怪异，还甚具毁灭性。至于比较有出息的民粹主义者，则会声称是在为老百姓、“草根”民众与需要援助的社群的基本利益代言——这当然就是与大企业和不真诚的政府对立，但却不会妖魔化 (demonising) 其他的人，如外国人或各类少数群体。安华民粹主义的某个部分，当能透过他对公民社会的关怀看出：协助穷人、同情弱势者、为迷惘失落的年轻人提供道德指引。而1998年后，安

华民粹主义的另一部分，则是表现在他针对贪污腐化、威权作风与对人权缺乏尊重的反体制批判上。随着“烈火莫熄”运动来临，安华的民粹主义，也为危机过后的社会关怀发声。这类关怀，不仅超脱了民众对快速成长与隆股市指数高涨时代的怀旧之情，同样也落在政府试图恢复投资者信心的改革之外，因为改革的幅度，就只及于增进有影响力的国内公司利益与外国投资。

如果说安华悲惨的经历值得回顾，那是因为它的终点，浓缩了马来西亚政治体系里那确实肮脏卑鄙的景象。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它竟也暴露出马来西亚社会许多充满希望的事物，共同汇聚于“烈火莫熄”运动。这当中显而易见的，就是对安华生涯主旋律的回响：多元文化主义、回教色彩的异议、反威权的“亚洲价值观”主张，以及公民社会开始介入政治运作。安华垮台前，很多人恐怕还对这部分的安华议程存疑。“烈火莫熄”之后，他们却都已坚信不疑。

- 1 'Dr M: Anwar has done a good job as acting PM', *Business Times*, 1997-7-22.
- 2 “彼此间的风格总难免存在差异。不过在我们的政府体制里，作决定的最终还是内阁。”(引自安华在‘A Difference in Style’一文中的发言, *Asiaweek*, 1997-12-19)
- 3 引自‘How Dare You Say These Things!’, *Time*, 1998-6-15, p.30.
- 4 Spaeth (1998: 27).
- 5 同上, p.28.
- 6 ‘Asia’, *Newsweek*, 1997-9-1, pp.15-16.
- 7 同上, p.17.
- 8 ‘Decision Time: Malaysia’s Mahathir changes cours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97-9-18, p.5.
- 9 ‘Mahathir’s Roasting’, *The Economist*, 1997-9-27, p.29.
- 10 Spaeth (1997).
- 11 ‘Mahathir Mohamad’s Very Bad Bet’, *Fortune*, 1997-11-24, p.23.
- 12 Spaeth (1998: 27).
- 13 同上.
- 14 ‘Anwar: Unfair to link economic woes to abuse of power’, *The Sun*, 1998-2-2.

- 15 安华对澳洲记者 Greg Sheridan 的发言,引自 'Crony capitalism in Asia will be reduced, says Anwar', *Business Times*, 1998-1-29.
- 16 Spaeth (1997: 18).
- 17 引自安华在 'Hard Work, Toil and Tears' 一文中的发言, *Newsweek*, 1997-9-1, p.16.
- 18 'What is Success Without Freedom?', *Time*, 1997-10-6, p.24.
- 19 Jayasankaran (1997).
- 20 Spaeth (1997: 16).
- 21 Wain (1998).
- 22 Jayasankaran (1997).
- 23 'Fitnah "teratur dan teliti"', *Utusan Malaysia*, 1997-8-26.
- 24 Jayasankaran (1997).
- 25 'Too absurd to be believed', *New Straits Times*, 1997-8-25.
- 26 同上。
- 27 'Surat layang mahu jatuhkan Anwar: Mahathir', *Berita Harian*, 1997-8-25.
- 28 'Fitnah "teratur dan teliti"', *Utusan Malaysia*, 1997-8-26.
- 29 'Too absurd to be believed', *New Straits Times*, 1997-8-25.
- 30 Jayasankaran (1997).
- 31 Hwang (2001: 241-42, fn. 24).
- 32 Ghani (1983: 17).
- 33 慕沙致马哈迪函, 1986-2-26.
- 34 Hilley (2001: 105).
- 35 Hwang (2001: 252-53, fn. 63).
- 36 'I Never Threatened the PM', *Asiaweek*, 1998-9-18, p.50.
- 37 Jomo (2001b: xix) 曾经提到:“那些非安华阵营的聚会者对马哈迪首相的批评,让我感到惊讶。我犹记得有个人还特别呼吁安华,‘带领我们走出这(马哈迪所造成的)黑暗’。但我对安华的反应更是感到惊讶。虽然他原可谨慎地保持沈默,安华却试图解释马哈迪首相某些争议性公开谈话背后的理据,并将此联系到他之前对政府政策困境的解释。就在会议结束前,我提出自己对这场政治讨论抨击焦点的不同意见。尽管众所周知,我对马哈迪的政策和角色向来诸多批判,这回却力陈领导层应该在国家面临挑战之际,团结一致。虽然只有另一人支持我这样的立场,安华却丝毫没显示出对多数意见的赞同,然后即结束会议,去见一位客人。”
- 38 *New Straits Times*, 1999-12-15.
- 39 Mahathir (2000a).
- 40 Mahathir (2000e).
- 41 'When You Grow Old, You Face Reality', *Asiaweek*, 2001-1-26, p.26.

- 42 同上, p.27.
- 43 同上。
- 44 'Interview: Mahathir on race, the West and his successor', *Time*, 1996-12-9, p.28.
- 45 举例来说,当七十高龄的马哈迪于1995年大选凯旋后宣称,“与邓小平比起来”,他还算年轻时,这话即被外界解读为马哈迪还不愿放手。另一方面,当举足轻重的马哈迪人马——沙奴西(Sanusi)与前财政部长达因,都无法在马哈迪老乡的吉打州赢得党区部控制权时,外界也把他们的失败,归因于安华的支持者搞鬼,企图藉显示马哈迪党内影响力衰退,要他早点退休下台。见 'A Man in a Hurry', *Asiaweek*, 1995-5-11, pp.26-31。亦可见 Kadir Jasin, 'Other Thots', *New Sunday Times*, 1996-10-15。
- 46 1996年四六精神党解散,拉沙里率众回归巫统。
- 47 引自 S. Jayasankaran (1996: 16)。或许并非巧合的是,安华的政治秘书,就是因违反竞选禁令而遭禁选的几位巫统重要领导人之一。
- 48 这段访谈的引文,乃取自当时刊登在 <http://www.feer.com> 上的全文,题为 'Prime Minister thrives on no-nonsense policies'。该访谈的节略版本,则可见 Kulkarni, Hiebert and Jayasankaran (1996)。
- 49 尽管马哈迪拒绝定下退休时间表,我曾猜测马哈迪不过是依马来政治风格,在1994-95年间抛出继承话题,试探各方反应 (Khuo 1997: 175-76)。
- 50 回顾马哈迪与慕沙之间的差异,应有助于我们了解问题。随着马来西亚经济于1985年步入衰退,两人间的歧异也变得无法调和,最终导致1986年的争执。所以马哈迪与慕沙分裂反映出来的,是慕沙对马哈迪领导风格与政策的更广泛不满。
- 51 Spaeth (1997: 19).
- 52 同上, p.20.
- 53 Funston (1998: 20).
- 54 有关安华扣留营经历的一些观察,可见他某位同营难友赛胡先阿里 (Syed Husin Ali) 的回忆录 (Husin Ali 1996)。
- 55 'Fighting for a Cause', *Aliran Monthly*, Vol.18, No.10 (November): 7
- 56 请注意安华1998-3-24的国会演说中,对这类规划的强调。该演说后来重印为 'Government committed to fiscal discipline', *New Straits Times*, 1998-3-25.
- 57 安华所用“文化联营”一词,包含了与西方文化的互动 (Anwar 1996: 43)。
- 58 'What is Success Without Freedom?', *Time*, 1997-10-6, pp.23-24.
- 59 同上, p.24.
- 60 Spaeth (1998: 27).
- 61 互相拥抱之意。
- 62 Petra Kamarudin (2000: 94-95).

第五章

“烈火莫熄”及 巫统霸权式稳定的终结

当着一个人暴君的面叫他暴君是危险的。在古代,这么做的人可能就此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这种强权的现代形式,就是负面和破坏性的宣传和消息,中伤国家和领袖们,妨碍其经济与政治的健全运作。

——马哈迪·穆罕默德, 1996年1月11日,
于吉隆坡“新亚洲论坛”上的致词

反正没有人能奈何得了我们的权力,我们又何必怕谁知道?

——莎剧《马克白》第五幕第一场

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惯于视政治为文化体现,最理想是敦厚折衷的精英次文化。他很少把经济事务放在心上。当对经济的普遍不满和其他因素一起助燃了1969年5月的暴动,并摧毁了东姑联盟政府的生机,东姑在党国的领导地位也就结束了。

在很多方面让东姑看不顺眼的马哈迪,恰恰把政治视为经济问题。透过他那顽强的经济学视角,马哈迪决定把马来社群从其“相对的经济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并把马来西亚打造成先进国。马哈迪对文化鲜有兴趣,主要的例外在于马来社会的文化“缺陷”。对那文化,他畏而远之,并一直想要改造。开除安华之后,马哈迪与其政权面对以马来人为主的反叛。这场反叛既源自文化敏感性,也催

生了新的文化表达。这场反叛对政治影响深远,将以“烈火莫熄”(Reformasi)之名载入马来西亚青史。

“烈火莫熄”的意涵

从1998年9月1日被开除之日,到9月20日被逮捕之时,安华是自由身。被逐出巫统的安华没有政治机器去推动其议程。然而,自发蜂拥去他吉隆坡私宅前集合的大群支持者和访客,却鼓舞了他。安华很快就重拾活动家的本领,在群众大会、回教堂聚会和匆匆召开的演讲会(ceramah)上发言,展现异议者的毅力。在马来西亚各地展开的集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潮。人潮中,有人是出于对安华所面对的指控的好奇,有人是因为对马哈迪与其政府的敌意,但大多数人对安华的处境都报以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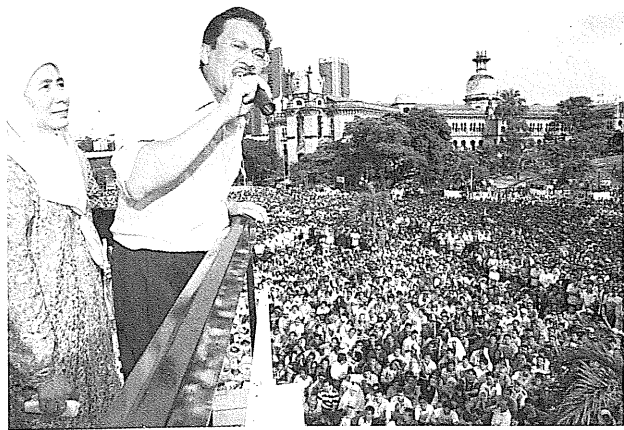
在9月8日在其家乡槟城州直落多坤(Cherok To'kun)的群众集会上,安华发表了“巴东埔宣言”(以其国会选区为名),以抗争的姿态号召“烈火莫熄”,要求社会与政治改革,反对马哈迪对金融危机的“朋党主义式”回应。¹同年5月,印尼的“反[官商]勾结、反贪污、反裙带”运动推翻了苏哈多“新秩序”政府,这不过是数个月前的事;“烈火莫熄”一词在马来语中所召唤的正是这一意象。

9月20日,也就是在吉隆坡举行的共和联邦运动会闭幕的前一天,当其支持者成千上万走上吉隆坡街头各处游行时,安华宣扬“烈火莫熄”的“巡回演讲”达到巅峰,也就此被迫中止。

就在那一个傍晚,黑帽蒙面、轻机关枪在手的突击队员破门进入安华家中,把他逮捕并带去吉隆坡武吉安曼警察部队全国总部。²

之后,安华的“烈火莫熄”诉求引起意料不及的共鸣,形成一场反对马哈迪、巫统和国阵的社会运动。

就某个层次而言,“烈火莫熄”是因为马来人深恶痛绝安华被不公平对待而产生,尚未完全成形的文化反对运动。有关安华革职的官方说法并不足以支持马哈迪的行动。在安华被逐出巫统48小时后,马哈迪只给了非常简短的解释:“我们认为他不适合,如此而



“烈—火—莫—熄”！

已。”³ 事情岂可能真是如此而已。

“没有被法庭验证过，而以一大串刑事控状加诸于安华身上”的宣誓书，引“国际特赦”组织之言，“被不恰当地公开了”。⁴ 由巫统所拥有以及其他由国家机关所掌控的国内媒体，巨细无遗地报道了有关安华被指涉及的秘闻——与多名未点名女子的奸情，与其讲词撰稿人、义弟、前司机和另一名未点名男人的同性恋关系。

举例说，9月4日，《新海峡时报》刊登警方刑事调查科慕沙·哈山(Musa Hassan)二等高级助理警监冗长的宣誓书。该宣誓书中包含多位“证人”供称涉及或受害于安华种种“不正当性行为”的供词。⁵ 慕沙的宣誓书，刚刚与总检察长、监狱总监与一位副警监的宣誓书一起，在纳拉卡鲁班(S. Nallakaruppan)要求从武吉安曼警察总部扣留室转押至双溪毛糯监狱的聆讯中，被呈上法庭。

纳拉卡鲁班是万能企业有限公司的董事，是安华口中的“偶尔一同打网球的球伴”。《五十个理由》一书点名说他是安华的所谓性狂欢活动的组织者。当时正在等候聆讯的他从7月梢开始被扣留，被控非法拥有军火，如果罪成将自动被判死刑。他也被调查是否可能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因为“其行径可能被国内外的颠覆分子所

利用”。⁶

慕沙哈山的宣誓书表示，警方对纳拉卡鲁班与安华关系的持续调查，发现纳拉卡鲁班拥有官方函件与“包含各种货币的现款……总值接近马币200万”。⁷

两天后，媒体报道警察总长的声明，指安华“曾利用其副首相的权势去干预对《为什么安华不能担任首相的五十个理由》(50 Dalil Mengapa Anwar Tidak Boleh Jadi PM)一书的调查”。⁸

9月8日，马哈迪坚称他开除安华，是因为后者的“不道德行为”，而非“[彼此之间]对政治或经济事务的……任何意见相左”。⁹

在安华被捕前一天，安华的讲词撰稿人穆纳瓦·阿末·阿尼欺(Munawar Ahmad Anees)，与义弟苏玛·达玛万·玛雅(Sukma Darmawan Sasmitaat Madja)被判监禁六个月，因为容许安华鸡奸他们而“犯了伤风败俗的污行”。¹⁰

对安华的其他指控则由一些巫统人物影射。举例说，嘉化·峇峇(Ghafar Baba)，可以假定以幸灾乐祸的心情，为安华与“外国势力”联系的谣言作了阴谋论式的铺陈：

“一些外国大使直截了当地问：马哈迪何时下台？为什么他还不让安华接手重振经济？一些，譬如美国大使，更显得非常有挑衅性。当安华造访华盛顿时，他得到红地毯式的接待，仿佛他已就任首相。这些都是讯号。我们或许没有明确证据可以证明某西方强国想安插其傀儡安华上位，但我们马来西亚人并不愚蠢。”¹¹

在1998年9月那些关键的时日中，安华面对以官方与非官方方式作出的种种指控，其牵连之广、力道之重，确实让马来西亚公众震惊不已。引安华本身讽刺的说法：

“马哈迪医生成功让我破了纪录。每一件事。女人，男人，舞弊，外国代理人，叛徒，售卖政府机密予外国代理人。而这个人竟是他所谓要栽培的接班人……他指控我犯下对人类、宗教和国家犯下十恶不赦的犬罪，这种指控堪称空前绝后。”¹²

对于权贵涉及贪污与(同性恋)桃色丑闻,频频出现的谣言与匿名信式揭秘,早已让马来西亚人无动于衷;因此,仅仅影射安华涉及类似不端行为,在政治上不会有太大杀伤力。同样的,无证无据下指责安华勾结外国,也很难破坏安华的名声。事实上,不少人都还记得,当年马哈迪接任首相那一天,其政治秘书西迪·郭斯(Siddiq Ghouse)就因为涉嫌为苏联特务机关 KGB 服务而被捕。此事的曝光当时并不妨碍马哈迪继续掌权。

以上种种都可能解释了,在有关安华所谓劣迹的滔滔布道中,何以他被指涉及的同性恋关系特别受到垂青。或许马哈迪和巫统精英们期望,有关安华犯鸡奸罪——既触犯马来西亚刑法,也违犯回教教义——的砌词指控,在一场“媒体审判”之后,可以让马来回教社群在震惊之后信服。那想法似乎是:这罪名既然如此难以置信,因此必然是真的!然而,马哈迪和巫统精英们打错了算盘。支持者涌到安华家里,并且安华每到一处公开露面,他们也就涌到那里;事实证明,那些对马哈迪的效忠动作,以及对安华的口诛笔伐,并不能取信于巫统基层乃至马来社群。马哈迪和党领袖“走入基层”,再三向他们保证有关安华“劣迹”的证据即将出现。对那些存疑的巫统党员,马哈迪回应道:“那些不相信(安华的不道德行为)的人是在自欺。我们如果没有证据,就不会那样行动”。¹³

然而,摆出台面的第一批证据——穆纳瓦和苏玛的认罪供词——在政治上并不足以昭大信。两人分别于9月6日和9月15日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扣留。在面对政治部警察盘问时,他们被切断与律师、家人或访客的联系。9月19日,穆纳瓦和苏玛被带上庭,并对把他们和安华牵连在一起的“伤风败俗”罪名俯首认罪。从他们被扣留与被盘问的处境,到审讯的突然与迅速,到通过官方指派的律师认罪,这一切不但未能取信于不信者,反而冒犯了公众的感受。只有完全无动于衷地反对安华的人,才会看不到他们是在极力威迫下认罪的事实。

在1998年9月20日的《新海峡时报》,约瑟琳·陈(Joceline Tan)

写道:“实际上,只有极少数马来人接受‘烈火莫熄’的说法。大多数人看穿它的真面目——为了帮助安华挡开那些非常严重指控的说辞”。¹⁴然而事实正好相反,马哈迪事与愿违。让只有极少数马来人接受的,恰恰是那些针对安华的“非常严重指控”。

不管他当时是否明白,一直以来对马来文化和价值观中许多层面不屑一顾的马哈迪,已经逾越了马来人深怀于心的一个文化规范。马哈迪的“亚洲价值观”带有专制色彩,无法体会到“亚洲价值观包含的远远不止于……对统治者的忠诚”,而且“在大标题下面是对名声的无言重视以及对羞辱的回避,这两者常被简化和误解作‘面子’”。¹⁵

就对尊严与名声的观念,以及在专横威势下对这两者的维护而言,“马来价值观”的“亚洲性”一点也不少。这可从史书《马来纪年》其中一节看出一斑,后者常被引申为古马来社会君臣之间存有社会契约的注脚:

“臣民们得到他们未来君主的同意:不管臣民们行为如何不端,即使该当死罪……他们也只能被处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们都不应该被侮辱蒙羞。那未来的君主倒过来要求其臣民们永不反叛。臣民们接受此求,然而带有一个条件,什么时候做君主的自己违反了这协约,那么,他们做臣民的便也不再受那协约的约束。”¹⁶

在国内的大城小镇,在公务员当中,在大学校园,在海外留学生当中,在不习惯政治不和被公开展露的妇女当中,甚至在巫统底层,马来社会舆论对于是谁“毁约”全无迟疑。

“当对手的每一丝残存的名声与尊严都被剥下”,¹⁷“当安华被拽入深渊,而且正当他刚被当成国家领袖拥戴之时”,¹⁸那协约便被毁了。何况,抛开政治不谈,就算他有再多的不是,安华到底是六个无辜孩子的父亲,是丈夫,是他妻子全心维护的“诚实、非常虔诚的人”。¹⁹在文化那无法算计的其中一种复杂情结下,安华所受的羞辱因他家人的蒙羞而放大,并进而扩大成为整个社群的耻辱。有时,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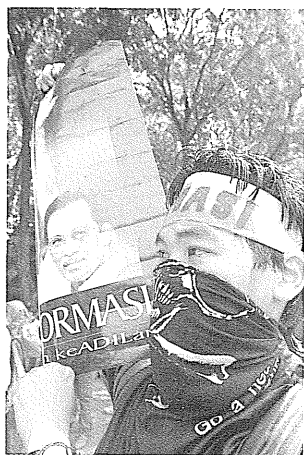
来人悲哀地对彼此也对外人说，当安华落得如此“颜面尽失”，“做马来人也真羞耻”。²⁰

许多故事如此流传：在乡下的年长马来人，因为反感媒体毫无保留地描述安华被指犯下鸡奸和手淫行为，宁可回避印刷与电子媒体。这并非乡下老人家们独有的迂腐。在吉隆坡，马来青年，马来中年人（带着孩子）与马来妇女示威抗议当政者所为，而示威的浪潮与人数，都是1974年华玲地区农民与大专学生示威以来所未曾见者。示威者在吉隆坡的“马来心脏地带”甘榜峇鲁（Kampung Baru）和警察发生冲突。一道应被尊重的文化底线被逾越了，其结果就是道德不满酿成的政治反对：“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忍耐是有限的。是可忍，孰不可忍！”²¹

在国家与公民的对峙中，一边是手持警棍的“红头盔”（联邦后备队镇暴警察）以及政治部的便衣警员，以水炮车作后盾。另一边是手无寸铁、和平抗议的平民百姓，包括“老年人、中年男人与妇女、少女……私人界的高级经理……行政人员或公务员、教师、商人、律师”乃至“穿皮夹克的摇滚族”。²² 他们林林总总的背景，揭示了改革运动的广大社会层面，而正是在他们当中，现政权的统治合法性已荡然无存。



逾整个世代未曾见的群众示威



异议的圣像

在第二个层次，改革运动成了异议和另类媒体的场域，其中的呼声、沟通和辩论创造了各种别出心裁和破陈出新的社会批评。从安华被黜到1999年2月，年轻的讽刺诗人阿米尔（Amir Muhammad）在其于《新海峡时报》的专栏“孔边书笺”（Perforated Sheets）里，让政治调侃与文学批评齐飞。中年日记作家沙比里·再因（Sabri Zain），则游走于街道与网络之间（通常与其“重要的他者”），在街头示威完毕之后就赶回家里，写下现场所见所闻，送上“另类资讯”高速大道流传。沙比里主持的网上《改革日志》（*Reformasi Diary*），为1998-99年间的各种抗议与活动以及政治社会态度的空前转变，留下最动人的记录。国家文学奖得主沙农·阿末（Shahnon Ahmad），以年长寓言作家之身，在其畅销长篇小说《粪便@干他妈》（*SHIT @ PukiMak*）中简述了对安华事件的厌恶。通过把肉体恶臭与社会贪腐的烟瘴联系起来的淫秽意象，这本“发臭与引臭的政治小说”让一句方言粗口变成反当政者的流行代号。²³ 漫画家祖纳（Zunar）则离开他所工作的主流媒体，转而创造许多造型尖刻的马哈迪漫画。²⁴

尽管当局荒谬地禁止回教党售卖每周双刊的党报《哈拉卡》（*Harakah*）予非党员们，该报仍然洛阳纸贵，发行量从“烈火莫熄”前的6.5万份扶摇直上至30万份以上。当政者的媒体旗舰，诸如《新



众声喧哗 vs. 一言堂

海峡时报》与《马来西亚前锋报》(Utusan Malaysia)则受到抵制。同时出版网络版的《哈拉卡》在没有对手下几乎成了公论重镇。新兴的马来文刊物如《文明》(Tamadun)、《点滴》(Detik)、《联系》(Wasilah)与《独家》(Eksklusif),以及网上双语刊物《目击者》(Saksi)聚合了撰稿人、分析家与艺术家,不绝地为社会提供评论与批判。

一夜之间,“烈火莫熄”以出乎政府本意的方式落实了政府的口号:“热爱资讯工艺!”(Ciintai IT!)各种各样心怀改革的人都“热爱资讯工艺”,特别是互联网。网络让他们得以张贴资讯,接触阅读材料,联络他人,而不受国家的检查;虽然许多使用者依然不能免于当局秋后算账的恐惧。政府推广多媒体超级走廊(MSC)的努力此刻竟成其批评者的赐福。资讯高速大道难以监管,因为马哈迪在向国际投资者提出的MSC十点“保证书”中承诺了表达意见的自由,当局如果干涉或封杀网站就形同食言。因此,“烈火莫熄”网站在几无障碍下如雨后春笋般冒起(虽然反“烈火莫熄”网站也同时出现)。

这其中一部分是现存组织,特别是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的网站。在政党的网站中,要数回教党的网站《哈拉卡日报》(Harakahdaily)在技术上最先进,与一般人以为回教与先进工艺不相容的偏见正好相反。另一些网站则是在国内或国外匿名运作。它们的网名——Laman Reformasi《烈火莫熄网站》、Jiwa Merdeka《独立心灵》、Anwar Online《安华在线》与freemalaysia《自由马来西亚》——却开宗明义点出其营运者、支持者和访客的基本关怀与宗旨。其他网站的站主,例如《改革日志》的沙比里·再因,The Malaysian《马来西亚人》和Kini《当今》的拉惹·贝特拉·卡马鲁丁(Raja Petra Kamarudin),则是明人不做暗事之辈。另一些网站则故意取名为Mahafiraun《大法老王》或Mahazalim《大暴君》,以公开取笑他们所耍嘲弄的对象——马哈迪。

这些“烈火莫熄”网站集体刊登了无数马来文与英文的贴文,许多时候也包括它们的英文、马来文译本。这些贴文的多元性让人惊叹。其中包括“烈火莫熄”活动的告示,转载与翻译的新闻报道,安

华案审讯的非官方笔录,文告与示威和公共活动的目击者见证录,经济与政治分析,信件、告公众求援书、请愿信与选民登记的提醒函,对官方声明的驳斥、对高官显贵的长篇谩骂、对资深公务员的谴责、对企业人物的指控,警局报案书、官方或据称官方文件的副本,诗歌、现代寓言、相片与漫画,演讲录音与录影片断。

不是所有贴文都言之有物。其中有些内容拙劣,或无异于虚构附会的网上匿名信,而不值一读。然而,观诸比较严肃的网站所造成的效果,“烈火莫熄”的网上呼声的确冲击了当政者对主流媒体的垄断。在旧有的互联网讨论圈扩大之余,新的讨论圈也冒出来。其中产生的活跃论坛扩大了“公私域”交流的疆界。尤有进者,无可计量的互联网资料被下载,通过电邮流传,转载在“烈火莫熄”运动所能掌握的印刷媒体上,并通过传真机和复印机继续流传:

“互联网文章的打印本,出现在马来西亚一些不要说电脑,连电流与电话都没有的穷乡僻壤。一位英国记者津津乐道他在一场示威中的见闻。他惊喜地发现本身所写有关安华的评论,其翻译本竟在那里被派发并被示威者争相传阅。”²⁵

通过这些方式,网络空间与地理空间的边界,城市与乡区的距离,资讯工艺受惠者与那些绝缘或不精于资讯工艺者的数码化鸿沟,都被跨越了。不管这“改”字通过何种方式传播,互联网的“烈火莫熄”事功有其明确的最终目标:为安华争公道;争民主;争政治改革。

在第三个层次,“烈火莫熄”因此意味了当政者对公民社会的霸权已被严重侵蚀。²⁶危机前马哈迪式政治的成功建立在三个基础上:高速增长与持续繁荣,民族主义愿景与群众支持,强势领导与有序接班。当政者宣称能确保高速增长与持续繁荣来追求2020宏愿的说法,在1997年7月的危机冲击下显得满目疮痍。1998年9月的危机,则破坏了强势领导的正当性,并让巫统的接班计划陷于混沌之中。而反马哈迪的示威浪潮,伤害了政权的支持基础,让其民族主义愿景靠边站。

马哈迪政府的这三个基础，至此反而沦为“烈火莫熄”支持者的笑柄。他们继续阿末·查希（Ahmad Zahid）在巫统大会前夕的未竟之功，指控政府已成为“贪污腐败、朋党徇私、裙带攀附”的禁裔。他们越来越勤于辩称安华是因为挡住“朋党们”的财路才受迫害。他们要马哈迪退位，并拒绝受委副首相的阿都拉·巴达威作为其接班人。在安华落难前，马哈迪那反投机客、反西方与反索罗斯的论调在民众之间还有一定市场；此时，“烈火莫熄”支持者则集中火力攻击国内弱点与滥权，认为那是1997年7月与其后危机的根源。这样的立场并非出于任何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因为“烈火莫熄”在意识形态上比马来西亚任何其他社会运动更加多元。

举例说，在经济课题上，尽管“烈火莫熄”基本上对政府在资本管制后所实行的经济措施存疑，其追随者中有自由市场的信徒、新经济政策的支持者、凯恩斯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要求“均全发展”的回教主义者。在政治上，“烈火莫熄”支持者非难国府和关键公共机构的行止。当安华的第一宗控罪开审时，他们既揆斥检方纯为当政者的工具，也不相信法庭能够做到它所宣称的大公无私。当镇暴警察以催泪弹、拳脚和搀有化学品的水炮攻击和平示威者时，他们谴责警方的“非专业”表现。他们视主流传媒为当政者的宣传喉舌而予以抵制。在学生示威者被捕后，轮到大学行政人员，因为共谋“管制”学生或在校园内外压迫表达自由，而被抨击。经济或金融管制机构也被讥讽缺乏专业性和自主性。“烈火莫熄”的许多回教徒支持者，更因国家任命的宗教官员与当政者共谋而唾弃他们。

政府领袖认为民意的逆转和示威的展现已经濒临“无政府状态”。当政者的回应包括让媒体在报道示威者和他们的活动时更加乖离事实，更严厉的监管，更可怖的压制。然而，“烈火莫熄”从来未曾有心要把马来西亚倒转过来，其目的只是要政治体制翻开来，以便作为其器官的各机构能在曝光后清洗干净，让它们恢复健康。然而因为马哈迪象征了关键公共机构的去势和堕落，“烈火莫熄”支

持者们因而都基本上同意政府合法性或正当性已失的结论：Undur Mahathir（马哈迪下台）！而这股民意，即使是安华的受审与定罪都莫之能改。

安华依不拉欣的审讯

安华分别在1998—99年间的两宗审讯中被提控。²⁷第一宗审讯在1998年11月2日开始。安华一共面对十项控状。前五项是舞弊罪名——一项是“妨碍司法公正”，指他利用其职权压制反贪污局对他私人秘书活动的调查；另外四项是“干预证人”，指他企图让自己免受控罪。另外五项罪名是指他鸡奸五个男人，包括安华的前司机阿兹占·阿布巴卡（Azizan Abu Bakar）、穆纳瓦和苏玛。

就安华遭革职的方式，对他耸人听闻的指控，公众与日俱增地反对马哈迪，数位与安华有关连的人被捕，以及国内外人士抗议安华被殴等方面来看，这是一场高度政治化的审讯。而这场审讯的相关形势，例如对苏玛·达玛万和穆纳瓦·阿尼斯的逮捕、火速审讯、定罪和判刑，都显得荒诞。而他们两人在被判罪成不久之后都撤回认罪，并宣称他们是在被警方扣留中并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招供的。而在同时审讯的S·纳拉卡鲁班一案中，其律师举证表示控方要纳拉卡鲁班作证，诬陷安华。

这场审讯让许多人深恶痛绝。于是，有些人参加示威向当政者抗议，其他人则在吉隆坡高等法院外守备。人们的感受是，即使在审讯开始以前，安华已经被马哈迪、巫统以及他们所控制的媒体百般羞辱地定罪。更甚的是，即便总检察长已经把安华被殴的矛头指向警方，而警察总长也已经辞职，但却没有人因为殴打安华而遭起诉。控方所采用的一些证据——例如据称沾了安华精液的床垫——激怒了多方公众人士；媒体耸人听闻地报道安华被指涉及的性行为的详情，也让他们反感。

对许多观察家而言，该案的审讯方式对辩方并不公平。奥古斯丁·保罗（Augustine Paul）法官限制辩方只能回答针对安华的指责，

并禁止辩方提出有关针对安华的高层次阴谋的反控，皆隐含了这场审讯的政治性。此外，保罗还多次裁定辩方证人的作证“不相干”(irrelevant)。有一次，安华的其中一位律师再诺·查卡利亚(Zainur Zakaria)在按照其当事人的指示行事当中，被裁定藐视法庭，被判监禁三个月。

在公众的眼中，对辩方安华最不公之处，莫过于控方在案件陈词的最后阶段放弃肛交和不正当性行为的罪状。两套罪状被分开处理后，控方其实便不再需要证明安华曾有不正当性行为。保罗更根据本身的意见，把所有这些被放弃的罪状的相关证据从记录中删除，似乎唯恐原有做法还不够让人非议。

因此，辩方原本通过盘问而质疑控方重要证人的诚信，其效果便付诸东流了；而他们就此提出的抗议也徒然无效。保罗本身就表示，“辩方在审讯过程当中，试图对这个问题继续纠缠，却被我严格制止”。²⁸对一些观察家而言，这场审讯几乎是超现实的，审讯过程充满了闹剧式(melodramatic)的情节，包括：

“政治部官员异常地承认采用‘洗脑’(turning over)的手法；至少有一位高级官员承认，愿意因为服从领导而撒谎；为时多个星期、非常公开地进行的性教育和肛门检验课程；在相当含混的脱氧核糖核酸(DNA)验证课程中，该‘老师’竟无法解释有关不同类别的简单而基本的概念；有位明星证人每天作时装表演，而另一位证人却记忆闪失；随后控方在最后阶段修改罪状，多个星期的证据被删除，而每天出现的那张床垫也就消失；再随后，辩方在他们所选择的辩护立场上所作的多次辩护努力都被裁决为‘不相干’。”²⁹

这场审讯之后，其他的形势演变接踵而来。1999年2月，安华就他在上一年9月被扣留期间遭警方殴打的事件，向特别负责调查此事的皇家调查委员会供证。前警察总长拉欣·诺(Rahim Noor)通过其律师，向该委员会承认殴打安华。1999年3月，安华的律师为了抗议该案开庭以来的审讯方式，拒绝总结陈词，而面对被逮捕的威

胁，几乎使该审讯停顿下来。当辩护律师团以保罗偏袒控方为由，向他申请另换法官聆审时，法官本人拒绝了这项申请。

安华的第一宗审讯于1999年4月14日结束。保罗判安华的所有贪污控状罪名成立，每项控状判监六年，刑期从定罪当天算起，并同期执行。³⁰安华在法庭上坚持本身清白，并赞扬其律师和感谢其支持者。最重要的是，他呼吁要让“烈火莫熄”运动继续下去。法庭以外，安华的支持者与“烈火莫熄”的支持者在吉隆坡的不同地点示威抗议法庭的判决。或许，他们主要是在抗议判刑之严——因为法官完全没有考虑安华已遭扣留并等候审讯的七个月时间——对他们而言，罪成的判决早就成了定局。“从街坊百姓的反应，就可以知道他们相信有政治阴谋”，前法官哈伦·哈欣(Harun Hashim)如此评论。³¹而这些“街坊百姓”，则不断地被镇暴警察殴打和驱散。³²

4月14日带来了控方所要的法律裁决，因而迅速地被称为“黑色十四”。“黑色十四”也带来了马哈迪有利的政治结果。安华身陷囹圄，因而在政治上无所施为。除非他上诉成功，安华将会因此丧失当国会议员的资格，并在服满刑期之后的五年之内仍无法参与选举。尽管如此，发生在吉隆坡的大规模示威乃至全国各地的抗议，以及国际间对判决的异议，在在显示了该场审讯的过程以及保罗的判决，



对安华审讯的愤懑

并没有为马哈迪和其政权带来他们所需要的道德胜利。而这道德胜利，只能来自“公正”——“不但得到落实，而且必须是眼见为实” (done and seen to be done) 者。³³

当保罗允许控方撤除有关不正当性行为的指控之时，他却规定在其余的审讯期间：

“所修改的控诉，仅仅指肛交和不正当性行为的指控，并不是指被告实际犯了肛交罪或不正当性行为。因此，指控的真实或错误在本审讯中并不是一个课题。任何已经或势将指向这个方面的证据或论点，因此也将不相干和不重要。”³⁴

法官的裁定，让受到围困的控方减轻了提出证据的负担，但控方的胜利也因此显得卑劣。对群众而言，在被保证将得到有关安华不道德行为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之后，没有任何事情，比有关肛交的指控的“真伪”，更为“相干”；也没有任何事情，比控方得到豁免而无需证明安华不正当性行为罪行，更具破坏性。或许意识到通过修改控状让安华罪名成立，并不能补救已遭腐蚀的公信力，当政者于是在1999年6月开始进行安华的第二宗审讯。³⁵

此时，安华才面对肛交的正面指控。正如第一宗审讯一样，控方尝试在第二宗审讯中排除任何政治阴谋的可能性，只求证明他“实际上犯了肛交罪”。同样地，正如在第一宗审讯中所作的论证，辩方把指控的“真伪”同政治阴谋挂钩。

第二宗审讯纵使不比第一宗来得荒诞，却肯定是一样的混乱。控方主要证人前后有出入的供词，迫使控方两次修改控状中安华被指犯罪的日期，直到控方最后索性选择不指明日期和时间。³⁶ 9月间，辩方出示国际专家的医药证明，指安华的症状和高度砒霜中毒 (arsenic poisoning) 相符，使该宗审讯突然中断。³⁷ 有关化验结果的真实性和无法即刻得到证实或驳斥。然而，由于之前拉欣·诺曾经殴打安华，公众也无法对安华的情况或人身安全放心。随着安华在狱中被下毒的猜疑与日俱增，吉隆坡再次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法官下

令把安华转送到马来西亚国民大学的医院，以便进行医药化验和检查。检验的结果最终显示安华并没有砒霜中毒，但有关医护人员也无法解释安华身上一些症状何以经久不去。

当审讯在进行的当儿，安华向警方作了数次投报，并附上官方文件的副本，声称数名马哈迪最亲近的政治人物，包括达因·再努丁 (Daim Zainuddin)、拉菲达·阿兹 (Rafidah Aziz) 和拉欣·淡比仄 (Rahim Tamby Chik)，涉及贪污。这些报案书并没有得到主流媒体的报道，但却在互联网上流传。

另一方面，国家银行前助理总裁，也是一名被认为“接近安华”并且正受到贪污调查的穆拉德·卡立 (Murad Khalid)，作出法定声明书，影射安华及许多人士和组织 (全都是反对现政权者) 持有“龙头户头” (master accounts) 和“违法基金” (slush funds)。³⁸ 媒体大事报道了穆拉德的法定声明书，而反贪污局主席则公开表示其机构已经准备对穆拉德在其法定声明书中所作的指责进行调查。然而，穆拉德却在这个时候出国，去向未明，丢下被“影射”者——其中以赞德拉·穆扎法 (Chandra Muzaffar) 以及非政府组织“国民醒觉运动” (Aliran Kesedaran Negara) 最引人注目——对他作出的数项诽谤诉讼。

而安华的审讯则再度休庭，开始是因为法官背痛，而后来则无限期中止。第二度休庭时，1999年全国大选足音已近。安华本人则被隔离：他过去向外界发言的方式——狱中传书、报警、庭上发言与即席声明，此时都划上句点。然而，“烈火莫熄”运动至此也已经进入政治对决的场域。

替代阵线与1999年全国大选

到当时为止，“烈火莫熄”主要被当作是“马来人现象” (Malay phenomenon) 来讨论，事实也是如此，特别是在群众抗议和街头示威的层面上。然在其巅峰时期，“烈火莫熄”却成功突破文化藩篱，从而使多元族群联盟成为可能，开创了新猷。

在安华遭革职的数周之前，民主行动党的林冠英因煽动罪名成立而入狱。冠英的审讯和定罪是因一名未成年马来少女遭强暴的案件而引起。谣传当时的巫统青年团主席，同时也是马六甲州首席部长的拉欣·淡比仄涉及了这个案件。虽然拉欣本身没有因为所谣传的指控而被起诉，来自巫统内外的政治压力却迫使他卸下所有的官职。由于冠英牺牲了他的事业和人身自由来协助一名和他“不同种族或信仰”的马来少女，很多马来人因此对他产生敬意，从而减低了他们对“华人沙文主义”的行动党的传统敌意。

安华事件促使马来人进一步改变他们对长期作为主要反对党的行动党的态度。与此同时，许多主要由非马来人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和“烈火莫熄”的呼声建立联系。对它们而言，安华所遭遇的非人对待，象征着近年许多不公义事件（安华和冠英的入狱及所遭遇的其他磨难）与过去（80年代）丑闻的合流。

作为曾经同“马来西亚回教青年运动的安华”（ABIM Anwar）合作过的反对党，回教党、行动党与马来西亚人民党（PRM）在开始投入“烈火莫熄”浪潮时的犹豫态度，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举例说，一些回教党的领袖“长期以来并不信任安华所谓有实质意义的回教化可以由国阵内部争取落实的看法”，因而视安华的处境为印证。³⁹也有回教党的人士因为“回教党在安华危机以前很早就一直在推动回教价值并追求公义”，所以把“改革”的需要加以贬低。⁴⁰在林吉祥回顾安华个人于1998年5月对遭判罪的冠英的同情而支持“巴东埔宣言”之前，行动党也花了一段时间来评估“烈火莫熄”的诉求。⁴¹

很快就看得出来，“烈火莫熄”催生的是货真价实的异议，尽管其阵容可能杂乱无章。在其初期，“烈火莫熄”缺乏显见的政治机器或权威性的组织人才。安华身陷囹圄，而他一些最亲近的巫统同僚则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扣留。安华在巫统党内各阶层的其他支持者，大部分不是转了舵，就是在政治上瘫痪而无所作为。尽管如此，成千上万的人还是继续抗议，或者用沙比里·再因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法，就是“抢购正义”（shopping for justice），响应口头或网上私人相传的

示威号召。各政党或非政府组织皆不能置身事外，也无法期望能左右这一场运动的走势。

安华的夫人旺·阿兹莎（Wan Azizah）、赞德拉和其他人试图透过成立“社会公正运动”（Pergerakan Keadilan Sosial，简称ADIL）来为这运动提供组织架构。⁴²推动人权的非政府组织“马来西亚人民之声”（Suaram）则采取不同的方式，组织了人民民主联盟（Gagasan Demokrasi Rakyat，简称GAGASAN）。同一时候，回教党协调成立了人民公正运动理事会（Majlis Gerakan Keadilan Rakyat，简称GERAK）。GAGASAN和GERAK都是由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为免落在“烈火莫熄”运动之后而组成的临时团体。它们尝试主导“烈火莫熄”从未成形的抗议运动，将它构成政治媒体。从某个意义上来看，正如安华的盟友依占（Mohamad Ezam）所言，这关乎意识“人民、‘烈火莫熄’运动，要的是参与政治过程，而非仅仅在街上发出不满的声音”。⁴³政治色彩较浓的GERAK对此较为胜任，迅速超越了“公民社会”性格较强的GAGASAN。

GERAK这联盟兼容并蓄，吸纳了了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异议分子：“安华派人士”（安华的支持者以及弃巫统而去的关键盟友）；来自回教党、马来西亚回教青年运动（ABIM），以及马来西亚改革理事会（Jemaah Islah Malaysia，简称JIM）的回教主义分子；民主行动党的“马来西亚主义者”；人民党的社会民主派人士；非政府组织的活跃分子；妇女组织的代表；关怀时局的基督徒；以及学生。这些新兴和再生的异议领袖，因他们的原则并非肤色而受到支持者认同，显示“烈火莫熄”已模糊了族群之分。他们包括旺·阿兹莎，反对党领袖，安华的律师团，重要的非政府组织活跃分子，以及自愿协助被捕示威者的律师们。

GERAK因此在体制上赋予了“烈火莫熄”一种表达形式。在“黑色十四”之前一周成立、由旺·阿兹莎所领导的公正党（Keadilan）加入了GERAK之后，形势更是如此。

起初，GERAK似乎仍处于试验性阶段，而且反映了“烈火莫熄”

的不稳定。正如其他地方的社会运动，它混合一些未来和过去的成分于一身。GERAK 的运作建基于成员之间的定期协商，但其本身的对话却经常是各伙伴之间的意见相左。GERAK 追求具有广泛基础的多元族群合作，但这新愿景却经常要解决之前各敌对党派（还有各非政府组织的固有纲领）的旧嫌故隙。其联盟还未曾经过选举的考验，但这时候已经显出其重重困难。

GERAK 其中一些最大的障碍是来自意识形态。GERAK 内的政党各有各的传统支持者。回教党的支持者几乎全都来自马来选民。惟其回教纲领和其欲设立回教国的“终极目标”，却普遍受到非回教徒和“自由派”回教徒的抗拒。行动党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纲领过去一直依赖非马来人的支持，也因为该党不甚掩饰地代表华人反对新经济政策，而长期以来让大部分的马来人不屑一顾。人民党则拥有不同类型的激进马来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纲领。公正党同安华的关系最密切，威信崇高，但其未经考验的多元族群政治，在“国民公正”和“改革”的号召下是否能够从巫统那里吸引很多安华支持者或马来人支持力量，却是未知数。因此，不只是当政者或巫统的发言人，其他人也一样质疑，GERAK 把回教党的回教纲领、行动党的多元文化主义、人民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公正党的“国民公正”熔冶于一炉的做法，在意识形态上是否能够持久。

由于大选预期将在 1999 年内举行，GERAK 必须在此之前解决其他课题。GERAK 两个主要的党派却似乎在选战目标上有所分歧。回教党目标最大，要取代国阵政府，而行动党则主张否决国阵在国会中传统的三分之二多数议席。回教党信心增长，源于三个因素：它在 1990 年和 1995 年的选举中大有斩获；它感觉到马来社群对巫统的不满与日俱增；以及它能合理地论断，GERAK 若不准备执政，就无法把本身定位为国阵的替代性选择。行动党的谨慎，既源于其在 1995 年尝试夺取檳城州政权不果后所遭遇的重挫，也因为非马来人对于国阵败北而由回教党掌权的局面忐忑不安。

如果 GERAK 想把本身标榜成为一个团结的反对党阵线，它就

必须达致一个权力分享的框架。在选区划分受族群因素影响的现实情况下，回教党和行动党各有其自然的争取对象而不重叠。对回教党而言，其重点是明显以马来人为主的选区，而行动党则放眼显然由非马来人（主要是华人）占多数的城市选区。人民党作为最小的政党，不会竞选太多的议席，但它在之前曾经在城市的中产阶级、由非马来人占多数的选区参选，而这些选区有可能同样是行动党的目标。⁴⁴ 公正党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它初出茅庐、羽翼未丰，党员绝大部分为马来人，而基础却是一个未经试炼的多元族群“烈火莫熄”运动。公正党或许能够以一些马来人为主选区搭配着另一些非马来人为主选区作为竞选目标，但如此一来也可能会同回教党和行动党在选区分配方面产生冲突。最后，GERAK 当中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有意派本身的人选上阵，或是想为一些政党提供候选人。

面对着国内外不同的批评，GERAK 相当有创意地克服了其内部的难题。到 1999 年 8 月时，GERAK 已经在三项紧要课题上达成了协议：共同的竞选宣言；“一对一”的策略，即在任何其参与角逐的选区只派一名反对党候选人上阵；以及透过制度化的程序来解决未来可能浮现的分歧。反对党之间这次空前紧密的合作与集体领导，促使 GERAK 被称为“替代阵线”（Barisan Alternatif）。从“烈火莫熄”到 GERAK 最终到替阵，这一条路上内部问题之多，远非一个概述所能记载。尽管如此，到 1999 年 11 月时，替阵已经有足够的团队精神，准备踏上取代国阵的征途。

1999 年 10 月 24 日，替阵公布了其竞选宣言，《朝向公正的马来西亚》（*Towards a Just Malaysia*）。⁴⁵ 在其政治分析中，该联合竞选宣言把安华事件与当政者于 1997 年 7 月之后，特别是 1998 年 9 月之后的经济政策联系起来。它也就安华的审讯和定罪、林冠英的入狱以及其他争议性官司，质疑整个司法系统。该竞选宣言辩称，这一切事件的处理手法已把司法机关转变成行政机关的政治工具。替阵的竞选宣言抨击，当政者容不下异己并利用警力对付和平示威者。该宣言也提出一系列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改革项目，以便调查涉及高官

显贵的贪污指责,重新检讨私营化的惯常运作,并恢复公民权利和自由。虽然 GERAK 没有明确处理回教党的回教理念和行动党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两者之间的差异,替阵的竞选宣言却肯定了宪法框架之内让回教徒和非回教徒进行对话的重要性。

到11月时,替阵更进一步提呈了《人民预算案》,厘清了替阵在一些经济和财政问题上的立场,包括资金管制、税务、投资政策以及发展的优先秩序等。其基础是符合民心的一连串承诺:铲除“贪污腐败、朋党徇私和裙带攀附”,为受忽略的社会群体提供安全网,扭转涉及核心社会服务的私营化政策,恢复规划和管制机构的专业操守,和中止当政者偏好的霸型计划。

替阵竞选宣言和预算案中所制订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实质上并非全新的课题。大部分的改革主张,早在80年代的危机和斗争当中,就由各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提出。“第二联盟”这样一个概念本身也并不新颖。这个概念通过反对党的两个联盟,即四六精神党和回教党组成的“回教联合阵线”(Angkatan Perpaduan Ummah),以及包括了四六精神党、民主行动党、沙巴团结党和其他小党的“人民团结阵线”(Gagasan Rakyat Malaysia),角逐于1990年的大选中。

替阵这两份文件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也表现在其他层面上。首先,《朝向公正的马来西亚》在原则上去除了国阵政治中“以马来人为主导”的特性,让人可以一窥替阵在建立一个“彩虹联盟”的意愿能够贯彻多少。再者,四六精神党在1990年的领导角色印证了一个政治假设——任何挑战国阵的联盟,仍然必须以巫统的一个主要派系为中心才能建立起来。然而,到了1999年,除了安华阵营中的核心分子出走以外,巫统精英的分裂并不像1987年之后那样严重。在那样的对比之下,马来人对替阵的普遍支持,反映出马来选民当中萌生了向来“不可想像”的意愿——投选一个不是由巫统所领导的政府。同样地,替阵的《人民预算案》也不是详细的“预算案”,而是替阵上台之后,通过经济发展的替代性计划所带来的“愿景”。⁴⁶在这方面,《人民预算案》的重点和方向显示了替阵诉求的社会基础:乡区

民众、城市贫民、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中小型企业,以及公务员。他们所形成的社会基础如此广大,以致替阵伙伴之间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应彼此不同的纲领。

第十届全国大选于1999年11月29日举行,比宪法所规定的最后期限早了大约八个月。被竞逐的国会议席共有193个。马来西亚半岛所有州属的州议会也同时进行选举,砂朥越和沙巴则没有州选。砂朥越已经于1996年举行过州选,而国阵在1999年3月12-13日赢得了沙巴的州议会选举。

经历了十四个月的后安华震荡,国阵的竞选目标很直截了当:保住它在国会内传统的三分之二多数,保住各州(除了吉兰丹)政权,以及打击替阵企图作为可信的“替代联盟”的努力。替阵的目标是赢得至少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席,保住吉兰丹的控制权,在其他州属击败国阵,并且为马来西亚政治带来更具活力的异议。

敌对阵营之间竞选活动的基调,反映了彼此的目标。国阵强调只有其联盟才能确保持续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以及最重要的,安稳无忧的族群关系。国阵利用族群间的疑惧进行警诫式的竞选运动,它告诉马来选民只有巫统才能保住“马来人的主导地位”,尽管它也同时警告非马来选民只有巫统领导的联盟能够保障他们不受“种族暴力”和“回教国”的威胁。另一方面,替阵呼吁终结国阵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同时制度化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步骤,作为宪法壁垒,以对抗国阵政权与日俱增的威权主义和贪污腐败。

正如以往的选举一般,这场大选在“不对称的条件下”进行。国阵牢牢地掌控选举过程、国家机器、公共资源和大众传媒。主流媒体为国阵进行其习惯性的宣传轰炸,对反对党的竞选新闻不是负面报道就是封锁。由国家或与巫统亲密的公司所拥有的电台和电视台,不但没有给予反对党足够的报道和播报的时间,而且全部成了国阵竞选机器的一部分。短暂的竞选期加剧了替阵在媒体宣传上的局限。在八天的过程中,替阵的候选人既不得不为举行群众大会与警方周旋,也要解决“看守”政府拒绝让反对党使用公共集会场所的问

题。尤有甚者，在选举委员会宣布无法在1999年大选之前完全更新选民册之后，替阵更如手足被困，处于下风。选举委员会在1999年4月与5月之间进行了选民注册活动。这次活动吸引了68.1万名合格公民前来注册，远远超过了以往选民注册活动通常吸引的20万人数。人们普遍相信，这额外的48.1万新选民，绝大部分是年轻和/或倾向反对党的。他们首次注册成为选民，目的正是要“给国阵一个教训”。然而，选举委员会却以无法在2000年1月之前准备好新的选民册为由，不顾国阵以外各方的反对，否决了这68.1万名新选民的投票权。

尽管如此，如果选举是根据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进行，“烈火莫熄”的冲击和替阵团结的反对力量，将可把现有的政治制度转变成为有意义的“两线制”。替阵取得了40.3%的有效选票(所有反对党共得43.5%)，而国阵的得票率则为56.5%。同其1995年的表现相比，国阵的得票率下降了9%。然而，由于采用的是“简单多数制”(first-past-the-post)，加上选区划分不均和资源倾尽一方的恩庇政治(patronage politics)的扭曲性影响，国阵在实质权力方面获得极大优惠，以至于国阵夺取了148个国会议席(几乎是全部193个议席的77%)，而替阵只得到42议席。(沙巴团结党得3席。)

国阵因此再度掌权。这个事实若单独视之，就会蒙蔽了巫统所遭受的严重损失。在吉打州，国阵失去15国会议席中的8个，而巫统在它所竞选的13个席位中只赢得5个。国阵也再度于吉兰丹州遭受重挫，在13个选区败北，只有前四六精神党的领袖东姑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为国阵取得惟一的胜利。在丁加奴州，国阵蒙受了显著的失败，在其所竞选的8个国会选区中全军覆没。巫统在国会中的代表议席减少了23.4%，从1995年的94个席位滑跌至72个席位。在州选举方面，国阵在半岛总数394的席位中赢得了281个议席。后者意味着国阵从1995年的339个席位下降了17%。在国阵所失去的58个席位中，巫统本身就占了55个(恰好是1995年反对党所持有的州议席总数)。在吉打，替阵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州议

席，是反对党历来所赢得的最高比例。巫统再次在吉兰丹几乎溃不成军，只赢得43个席位中的两个。在丁加奴州赢得了32个席位中的28个后，回教党自1959年上一次胜利以来，首次在该州取得执政权。在被击败的候选人当中，包括了一名州务大臣、四名巫统内阁部长和五名副部长，成为巫统受挫这一幕戏的焦点。人们相信巫统没有取得50%的马来选票，也暴露了这个“马来人的政党”受创之深。

纵然如此，替阵还是无法否决国阵在国会里头三分之二的多数。将其成员党各自的表现同以往反对党在选举中的成绩加以比较，我们就可以了解替阵相对失败的程度。公正党赢得了五个议席。对于一个只成立了七个月、其精神领袖又身陷牢狱的政党而言，这个成绩并不丢人。然而，公正党的五个议席，比四六精神党的巫统异议分子在1990年选举中取得的八个席位要来得少。旺·阿兹莎在安华的选区峇东埔获胜，但一些公正党最知名的“烈火莫熄”领袖——赞德拉、蔡添强和再诺·查卡利亚——都以微差功劳一篑。人民党再次无法赢得任何议席。行动党赢得了十个席位，比1995年大选要多出一席，但仍然只是1990年它所赢得的席位总数的一半。更糟糕的是，行动党的秘书长兼多年的反对党领袖林吉祥，还有元老级的国会议员曾敏兴和卡巴星(Karpal Singh)，都被击败。只有回教党真正取得进展。相比于它在1990和1995年两次各获七个席位，回教党这次夺得了27个议席，不但保住了吉兰丹，还在相隔了卅七年之后，再度攻下了丁加奴州的执政权。

对许多观察家而言，导致替阵无法取得至少三分之一国会议席的最重要因素，似乎是非马来选民因为担忧“由回教党主导”的替阵将会伤害“非回教徒的利益”而不愿意投选替阵。非马来人所给予国阵的强大支持于是抵消了马来选民对巫统的唾弃。这样一个现象显示了，国阵以媒体支持和形象咨询为后盾的竞选运动，传达了“票投替阵，等于票投回教党”的信息。讽刺的是，行动党对于同样的推理提出其本身的版本。行动党一直公开表示担心本身正在进行一场“豪赌”，如果非马来选民不赞同它与回教党进行任何形式的结盟，

这场豪赌将以该党“最大的灾难”告终。

选举的详细成绩，并不符合任何“马来人倒向替阵”和“非马来人倒向国阵”互相抵消的简化推理。尽管如此，选举领域还是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但却关键性的改变。在1995年和1999年之间，巫统的得票率从36.5%下跌至29.5%。这7%本身是很可观的下滑。尤有甚者，正如马兹娜(Maznah Mohamad)所观察到的，巫统关键性地输掉了“马来选票的竞逐”。在马来选民超过三分之二的58个半岛国会选区当中，巫统的得票率从62%下跌至49%，47个别州属的下跌幅度则介于6%与32%之间。在这个象征性而非地理上的“马来心脏地带”中，相较于巫统的27个席位，回教党和公正党一共夺得31个议席。而在巫统和回教党之争历来尖锐的地区，特别是吉兰丹州和丁加奴州，反巫统的情绪使回教党大大受益。⁴⁸在其他地方(巫统囊获全部议席的柔佛州尤然)，巫统相对于回教党的显著主导地位，则减轻了马来选票流失所带给巫统的损失。

至于非马来选民(尤其是华人)，情况则不一样。行动党是反对阵营中非马来选票的主要得票者，在得票率方面有些微上升，从1995年的12.1%增至1999年的12.5%。⁴⁹在24个华人占多数的国会选区中，国阵赢得了51%的选票。然而，在6个华裔选民超过80%的选区中，行动党赢得了5个，保持了它在非马来选区的强势。即使在檳城州的升旗山选区，尽管林吉祥卅年来首度在国会选举中落败，他却几乎完全扭转了民政党原任议员谢宽泰于1995年所缔造的多数票。而在一些由公正党和人民党候选人对垒国阵的竞选中，尽管非马来人倒向国阵的程度没有像马来人反国阵的风向那样强，非马来人对国阵的支持还是有一些增长。⁵⁰简单来说，非马来选票在从1990到1995年大举流向国阵后，并没有在1999年回流向反对党。似乎大部分的非马来选民，为2020宏愿所收服于先，冷对“烈火莫熄”于后，终究因为害怕破坏所期盼的经济复苏而拒绝抛弃国阵。

因此，对马哈迪主义政权进行了14个月的挑战后，狂暴式的异

议浪潮似乎只能在政权的稳定上敲凿出一些小裂口，当政者依然固若磐石。但即使1999年的大选没有造就足够强大的多元族群反对力量来确立有意义的两线制，形势却不可能再回到“原点”：巫统向来声称本身是政治稳定的主要源头，安华事件和马来选民的反应已经暴露了这种说法的脆弱性。

巫统霸权式稳定的终结

作为一个政党，巫统的稳定在1996看来显然已经是“天命所归”。四六精神党俯首称臣自行解散，拉沙里和他的盟友回归巫统，意味着巫统成功按照马哈迪的意旨重整旗鼓。马哈迪在不受挑战下继续担任党主席；安华也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当选署理主席，并被认为是马哈迪的“钦定继承人”。巫统同时也没有面对严重的外来挑战。行动党在1995年蒙受最惨痛的选战灾难。随着四六精神党背叛盟友回归巫统，回教党的处境岌岌可危，因为1996年之后，吉兰丹州议席的权力平衡，已经从1990年的巫统全军覆没，转变为回教党和巫统各占25席和18席。巫统在马来西亚的政治体系中的霸权，俨然是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除了“震撼”两个字，我们无法形容，安华事件的爆发对马来政治和马来西亚政治所造成的混乱。不管1998年9月2日还有什么释义，这次事件再度使巫统内部的倾轧升级，并迫使巫统的长期派系斗争一决雌雄。该党的派系斗争可以一直追溯到50年代。当时巫统内部因纲领和领导出现严重分歧，导致一个派系出走，并重组为“泛马来亚回教党”(PMIP，回教党早前所用的英文缩写)。此后，巫统的内部斗争就没有停止过，这点可以简要地从阿兹·伊斯哈克(Aziz Ishak)被扣留、马哈迪和慕沙·希淡反叛东姑阿都拉曼的领导、哈伦·伊德里斯(Harun Idris)在敦阿都拉萨政府后期遭提控，以及胡先翁任期初始爆发的“剿共狂潮”(communist witch-hunt)一一得到印证。从80到90年代，巫统的派系斗争更为猖獗。慕沙和拉沙里为了争夺署理主席职位，分别在1981和1984年展开了两场元气大

伤的战役。A队和B队在1987年让巫统一分为二，它们的对抗并在后来演变成新巫统和四六精神党之间的斗争，从1988年一直持续到1995年。1993年，安华所带领的“宏愿队伍”击败了嘉化·峇峇、阿都拉·巴达威和沙努西·朱聂(Sanusi Junid)。三年之后，安华阵营的支持力量让阿末·查希(Ahmad Zahid Hamidi)在巫统青年团的竞选中获胜，并协助西蒂·查哈拉(Siti Zaharah)在巫统妇女组的选举中击垮拉菲达。因此，安华事件只不过是巫统派系斗争历史中最新——可能也是最荒诞的——一幕。

针对这次事件，有两件事情应该一提。首先，这次事件显示巫统在长期派系斗争之下，已经到了内爆的地步，虽然巫统本身没有像1987年B队挑战马哈迪的A队时那般立刻分裂。一方面，马哈迪从慕沙1986年的辞职和他自己在1987年应付拉沙里挑战中得到了教训，因此不允许遭革职的安华保留党内基础。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因为安华被认为已经在1998年的区部选举后建立了强大的基层，能够在预定于1999年举行的党选中代表投票。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哈迪不能够仅靠运用首相权力以“完全不适合”或政策分歧的名义革除其副手。那样安华肯定会在1999年挑战马哈迪。马哈迪必须把安华彻底从党内根除。这就是为什么最高理事会根据安华涉及不正当性行为的指责，将他开除。另一方面，安华的人马大部分都还留在巫统，他们或者是被吓得服服贴贴，或者是感到困惑，但都保持沉默。最重要的是，安华事件显示巫统的派系斗争不只是长期的，而且已经变成是体系性(systemic)的。或许有人会说，巫统的派系斗争已经变质成为一种党内部管理的机制，而这一切都与新经济政策、土著工商社群(BCIC)和马来西亚大宝号(Malaysia Inc.)黄金时期的恩庇和“寻租”(rent-seeking)行为有关。作为派系权益，巫统的派系斗争本身在经济高度成长的条件下是可以受控的，这时候不同派系“分赃”不平均的现象也许只是程度上的问题。然而，在经济萎缩的时候，派系斗争作为一个机制就失灵了。结果，“巫统内部的政治文化”就如以下描述般发展：

“输赢双方都意识到，输者的政治前途会被赶尽杀绝。输的人所面对的诅咒、谴责和阻力，不仅制裁他们的政治活动，还会威胁到他们的饭碗。这种命运并不限于那些参加竞选的人，还包括他们的支持者……”

毫不令人惊奇，这些竞选会如此激烈，而且最终能造成那么大的分裂。仇恨在持续，敌意在持续，清剿在持续。在这样的情况下，巫统里头的竞选真的已经成为生死之战。”⁵¹

没有人比慕沙·希淡更能够确切地谴责巫统这种分裂党的“政治文化”。慕沙本身对巫统的派系斗争一点都不陌生，他甚至曾经在1984年的巫统党选之后，要求马哈迪将拉沙里踢出内阁。

再者，巫统向来宣称本身能为国阵，乃至整个政治体系，提供“霸权式稳定”；安华事件，以及马来选民对马哈迪以及巫统的倒戈相向，象征了巫统这个自封角色的终结。诚然，自从国阵成立以来大约廿五年，政治危机的主要源头既不是所谓族群沙文主义的行动党，也不是所谓宗教极端主义的回教党。1987年的种族对峙和1998年的“烈火莫熄”蔓延，戏剧化地显示了，巫统才是政治不稳定的祸首，因为它内部的派系斗争不断向整个政治体系扩散。结果，我们不能再从政策分歧、个性的冲突、权力倾轧或领导人的继



巫统霸权式稳定的终结

承这些有限的角度来理解巫统内部的政治。有鉴于经济和政治代价的增加,巫统激烈的派系斗争经常都同时涵盖以上种种成分。这本身就显示巫统正快速趋向体制失灵的状况。这个“属于马来人的政党”被困住了。它既无法恢复它那历史性使命所赋予的马来民族主义理想,也无法清除党内对政治封赏的无尽追求,这些追求滋生于它培育马来资本主义的“企业使命”里。

在巫统失利和马来选民转向支持反对党后,约翰·方斯顿(John Funston)注意到,“绝大部分巫统领袖和亲政府的分析家最初的反应是承认:巫统需要改革并听取选民的声音”。⁵²正如所料,马哈迪的回应与众不同。他“拒绝这个分析,并把选战失利归咎于马来人的忘恩负义,由安华、其他替阵领袖、乌拉玛、《哈拉卡》和互联网所散布的谎言,因安华而起的巫统内部派系斗争,以及回教党向其支持者承诺天堂的行贿行为”。⁵³因此,在2000年,马哈迪表明他的政权或巫统都无意寻求和解或改革。他们的困境不只在恢复所流失的马来人支持。他们必须重建霸权,如果大部分马来选民不同意,那么就对他们的主要对手实施惩戒。

因此,当政者在2000-2001年间开始了一系列的镇压行动。所有形式的国家权力——法律、警察和行政管制——都被广泛用来打压公正党、围堵回教党和控制公民社会。根据不同的罪名——非法集会、煽动、拥有或泄露“官方机密”,有关当局提控了一些在选举中落败的替阵领袖,包括卡巴星、玛丽娜·尤索夫(Marina Yusof)、蔡添强和依占。警方惯性地驱散或禁止替阵在全国各地的讲座。支持安华、反对内安法令、纪念“黑色十四”的示威者都屡遭警方殴打。内政部限制原本每周出版两次的《哈拉卡》此后只能每月出版两次,并以煽动罪名提控其编辑朱基菲利·苏隆(Zulkifli Sulong)和印刷商谢林泰。一些杂志,例如《点滴》、《联系》与《独家》的出版准证则不获更新。即使售卖《哈拉卡》、《激流月刊》(Aliran Monthly)以及其他让当政者看不顺眼的单期杂志(特别是由阿末·鲁地·奥斯曼[Ahmad Lufti Othman]所出版者)的人士,也遭到骚扰和威胁。查

哈隆·纳因(Zaharom Nain)解释道,内政部发动这场对付“另类媒体”的行动,似乎是在替严重遭群众唾弃的主流媒体进行“复仇政治”。⁵⁴在公立大学的校园,校方对学生作出警告和威胁,而且在一些事件中,被怀疑介入学生会的竞选活动。尽管如此,据称同回教党和其他回教团体有关的“反对派学生”,还是在选举中横扫千军。马六甲州政府还可笑地禁止任何到吉兰丹和丁加奴的官方访问。同一个政府也复仇似的将其存款从一些银行撤走,只为这些银行有一些职员明显支持“烈火莫熄”,同时把“‘烈火莫熄’的医生、律师和承包商”列入黑名单,指责这些人以怨报德,以支持反对党来回报政府的协助。

或许没有任何单一措施,比联邦政府突然中止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简称“国油”)赋予丁加奴州政府的直接款项的做法,更能显示巫统急于打击马来人的反叛或停止其扩散的决心。过去廿二年来,国油每年都就它在丁加奴岸外开采石油活动,向巫统领导的州政府缴付款项。这笔钱是根据国油和州政府分别于1975和1987年所签订的合约制定,而且普遍被看作是“石油税”。从来没有人争议过这些款项的合法性,或者国油对州政府的合约责任。然而,到了2000年,联邦政府单方面停止了国油应缴付给回教党所领导的州政府的款项,那年款项总额高达8.1亿马币。联邦政府宣称之前的付款是自愿性质的,而且是为了协助发展贫困的丁加奴州才发出的特别款项。如此一来,就没有了所谓的“石油税”这一回事,而国油也就没有任何合约上的责任继续缴付款项给丁加奴。联邦政府,在阿都拉·巴达威形容为“所有政党中最温柔敦厚——非常善良,非常懂得回应人民”⁵⁵的巫统领导下,将从国油那里挪出一笔“善意拨款”(wang ehsan),透过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付给丁加奴。丁加奴受到的这个待遇,遵循了联邦政府长期以来的一个做法,就是令反对党领导的州政府苦无发展基金可用。团结党执政的沙巴州和回教党掌权的吉兰丹州,以前都吃过这样的苦头。然而,联邦政府于2000年对丁加奴的“财政打击”不只是取消一个州政府的基金这么简单。其

目的在于迫使回教党因缺乏资金而没有能力展示在丁加奴和吉兰丹所可能落实的“回教发展”理念。回教党之前被迫在一个贫穷的州属“建设回教”，现在也只能“把回教扩张”到另一个穷困的州。

或许没有任何单一形势演变，比澳玛乌那(AI-Maunah)事件，更能够彻底暴露现有政权广泛地丧失了公信力。在其中一些成员于2000年7月从两个军营攫取了一批军火和弹械之前，澳玛乌那是个不为人知的(“回教极端分子”)组织。在同保安部队人员的一轮枪战之后，该组织枪杀了两名掳自保安部队的人质，却在失去本身的一名成员之后遭逮捕。当被捕的澳玛乌那成员被带上法庭接受审讯时，对于该事件如何发生、谁牵涉其中等问题，官方和传媒说法的真实性受到相当程度——程度之高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质疑。主流媒体把澳玛乌那称为“军火抢劫”，但另类媒体的尖刻说法则指它不过是“一出戏”(sandiwara)，按照其中阴谋论最强的版本，根本就是当政者自导自演的。替阵成员党或其领袖，特别是(如果与“回教极端主义”扯上关系将蒙受最大损害的)回教党人士，都没有把整个澳玛乌那的审讯过程看成笑话。反而是当政者本身竭尽所能要消除人们的疑心，以否定澳玛乌那事件是它精心炮制的一出戏。国防部甚至还把这件事重新“演出”一次，并广为宣传，以显示这一场抢劫确实有可能发生，而澳玛乌那袭击者能够用他们的交通工具载走所劫军火并非虚言。

简而言之，巫统和马哈迪政权不断提高两方对立的规模：持续迫害安华、对落选的反对党人士采取其他法律行动、警方攻击替阵的街头示威者、大学对异议学生采取“纪律行动”、州政府把“异议分子的业务”列入黑名单、进一步钳制《哈拉卡》、骚扰另类媒体、驱散出席讲座的人群，以及中止支付丁加奴的石油税款。所有这些行动加起来，其实就是当政者以手上所掌握的大部分国家权力所进行的多方面政治战争。

尽管如此，马来人反政府的情绪使他们抗拒“被洗脑”。“反对派”学生在校园选举中横扫千军。在街头，替阵仍然可以号召大规模

的示威。在马来心脏地带，回教党的演讲继续吸引大量人潮前来聆听。以马来人为主的公共机构对巫统有多效忠，还是未知数。马来人的反抗姿态以嬉笑怒骂的方式强化：巫统已经“不相干”，马哈迪是“大法老王”，当政者的动作大多是在演戏。

为了给持续的“马来人分裂”寻找一条出路，马哈迪尝试玩弄一套巫统在面对困境时惯用的伎俩：打出“华人的威胁”侵犯着“马来人权利”这样一张牌。巫统为诉诸族群政治所挑选的最新目标是，临时成立的“华团选举诉求工委会”(简称“诉求”)。诉求所提出的“十七点诉求”得到超过两千个华团组织的联署，而且在1999年11月的大选之前已经为内阁所接受。马哈迪后来不止承认这一点，还直认不讳说国阵当时是“没有选择”，不得不接受诉求的“诉求”，以争取华人选民的支持。然而，到了2000年中，当诉求呼吁落实其中一些建议之时，马哈迪却抨击诉求侵犯了马来人的“特权”与“优惠”。《马来前锋报》和《每日新闻》等报章炒作诉求的“要求”，并挑衅地警告非马来人勿违反宪法中的协议，莫企图趁“马来人软弱”而从中博取利益。在他2000年的国庆致辞中，马哈迪把诉求比喻为共产党和其他的极端分子，包括澳玛乌那。支持马哈迪反诉求立场的是一些边缘的马来组织，以及急于挽回颓势的巫统青年团。后者恫言，如果诉求不撤回其要求，将不惜把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烧毁。为了“避免暴力冲突”，诉求最终根据民政党政治人物居中促成的协议下，作出让步。诉求于是不再是课题。尽管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诉求明显的投降还是无法为“马来人大团结”造势。诉求得到替阵“马来领袖”公开和相当坚定的支持；这些领袖们并不觉得诉求的“十七点诉求”有任何“种族性”、“极端”或“反马来人”的成分。其实，人民党的鲁斯丹·山尼(Rustam Sani)公开表示，他本身对诉求感到失望，因为当马来异议分子还坚定地支持着诉求的时候，诉求竟然屈服于巫统青年团的威胁。

2001年1月，马哈迪旧瓶装新酒，再尝试另一个在A队B队分裂时期所使用过的伎俩。他邀请回教党和公正党领袖参加由巫统所

主催的“马来人大团结”会谈。公正党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巫统的邀请。对旺·阿兹莎而言，“马来人分裂”并不是课题：

“马来人只不过转而支持反对党……今天主要的课题是对领导层的信心危机，以及诸如滥权、贪污、警方暴行、积弱的经济管理和唯唯诺诺的司法机关等其它课题。”⁵⁶

回教党的领袖没有即刻拒绝马哈迪的呼吁，但他们暗示了同巫统会面的先决条件，使任何实质的会谈变得不可能。令人感到讽刺的是马哈迪的抱怨，“为了取得华人的选票，回教党要把巫统说成是反华人的政党，并指出这就是为什么回教党要谈全民团结，而巫统要谈马来人的团结”。⁵⁷ 马哈迪在2000年5月的巫统党大会上说道，“如果巫统在过去成功团结了马来人，现在难道不可以再做一次吗？其实，我们不知道。或许可以，或许不可以。但无论可能与否，我们必须尝试”。⁵⁸

明显地，没有公正党和回教党的参与，“马来人大团结”会谈就无法进行。这样的情况下，“马来人大团结”会谈就不能成为“马来人分裂”的解药。马来社会严重分裂，以及马来人对马哈迪、巫统与政府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的问题，与1998年9月的危机密不可分。如果要继续假装没有任何人特别需要对此负责，安华遭迫害所引起的分裂就不能处理，遑论弥补。因此，马来人中的异议观点是：马哈迪对团结的呼吁不过是明明白白的投机手段，尝试要缓和广大马来社群对巫统的愤怒，仿佛这愤怒可以为一个政治家的精明手段所安抚：“我问他[回教党主席法兹诺[Fadzil Noor]]，我们是否可以谈谈这四个条件……他说不……如果他说可以，所有事情早在昨天就解决了……那只会花我五分钟的时间。”⁵⁹ 所以，建议中的“马来人大团结”会谈并没有进行，这一点不会让人感到意外。该建议本身甚至可以说是在2001年2月不光彩地告终，因为，一个起初支持马哈迪并大力维护“马来人特权”的边缘组织“马来人行动阵线”(Malay Action Front)，此时竟公开表示：是时候马哈迪“清理”其政府和

“恢复公信力”了。⁶⁰

有关马来社群付不起“分裂”的代价，因为他人将会趁虚而入的说法，已经成为巫统的政治迷思之一。“马来人的分裂”被认定会对马来社会造成极深的困扰，过去——特别是1969和1987年——曾经发生过。无论之前这两次“马来人分裂”的情形有何不同，它们都有一个关键性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在族群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发生的。

如一些分析家所回顾，尽管巫统1969年的国会议席只减少7个(1964年有59席)，它所得到的马来选票还是大幅度地消退了。关键的是，根据拉特南(K. J. Ratnam)和米讷因(R. S. Milne)的估计，泛马回教党获得了52.3%的马来人有效选票，相对于巫统的47.7%。⁶¹ 如果5·13事件没有发生，巫统要如何处理“马来人分裂”的问题，现在看来当然是没有答案的。然而，在暴力冲突之后，政治上联盟(Alliance)由国阵这“宏大联盟”取代，以及新经济政策的推行，皆显示了敦阿都拉萨再造政治体系的要旨：“马来人团结”将在“国民团结”的范围之内复辟。在一段相对短暂的时期中，这个策略还包括在1974年的大选之前把泛马回教党收编入国阵旗下。

1987年“马来人分裂”的根源在于巫统A队和B队之间两败俱伤的党争，而这场党争的高峰，正好也是马来人和华人的紧张关系在操纵下升级到极点之时。1990年大选，巫统压倒四六精神党的重点乃是，警告马来选民：未来马来人的政治权力可能会因为非马来人同四六精神党结盟而遭到破坏。只有在2020宏愿大奏凯歌之后，“马来人分裂”才被撇开一边，不再成为政治课题。相对于1969年和1987年的情形，对巫统而言，1999年大选之后的情况的异数正是，缺乏可信的“非马来人威胁”。如果“马来人分裂”真有其事，那也只是“马来人的事情”；因此，打压和抗争几乎只在纯粹是马来人的社会和政治层面上起落。

这点或许可以大体上说明，为什么马哈迪和巫统都不肯“听取选民的声音”或“进行改革”。可以说，他们承受不起如此做法。如果他们真心要向马来社群中不满的大多数伸出橄榄枝以求和解，巫

统必须同公正党和回教党达致广泛的妥协，并因此迅速地把安华从监牢里放出来。与此相反，安华的第二宗审讯在2000年重新开庭，并在8月结审，安华被判罪名成立，监禁另外九年。如果巫统真的有心改革，马哈迪必须下台，而个人诚信遭“烈火莫熄”运动严厉抨击的一些党领袖也必须随之挂冠而去。可是，安华的落难是整个巫统的领导层所默许的，对于给巫统造成如此破坏的“安华因素”，从上到下没有任何人敢要求个别领袖负责。像沙里尔·萨末（Shahrir Samad）这样的独行侠，据称并非安华的朋友却能得到足够的敬重而当选最高理事会成员。他或许会发表一些“相左的观点”，但其“独立的声音”却是无效的。⁶²四十多年来，吉打州的鲁乃州议席一直是国阵的强区。当国阵在补选中输掉该议席，沙里尔把失败归咎于“我们领导人马哈迪医生的个性”。⁶³然而马哈迪较早前才评论沙里尔的意见说，“那不是我会注意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我只会把它丢进垃圾桶”。⁶⁴

其他认为党需要改变的抱怨，最终只变成是呼吁改变领导“作风”的低层次请求。和5·13事件之后的1969年，或巫统AB队分裂之后的1987年不同的是，党内没有志在更换现有领导层的强大异议。在缺乏公开异议的情况下，安华的遭遇让巫统党内人人深以为戒，使他们不敢如马哈迪在三十年前要求东姑阿都拉曼辞职那样，坚决高喊“Undur Mahathir”（马哈迪下台）。巫统自诩在党内实行民主，可是现在“大法老王”本身竟成了“最后一个马来造反者”（the last Malay rebel），这个评论一点也不夸张。⁶⁵

只有像慕沙·希淡这样一个老手，而且还是党性非常强的人士，能够清楚表达党内压抑着对党变成“不相干”的不安。慕沙警告，1999年的竞选活动证据确凿地，证明巫统必须自我中兴：

“我的经验非常不寻常，是我一生中不曾经历过的。在马来人占多数的选区，国阵的领袖和党工看起来筋疲力尽，压力重重。

这是因为这么多的马来人——年轻的、年长的、劳工、有知识的、富有的、贫穷的——都坦然、无惧、义无反顾地为反对党竭力

助选，不管那是回教党、行动党、人民党或公正党。只有在华人占多数的地区，国阵和巫统的领袖和党工才能松一口气。他们风趣地告诉我，‘丹斯里，这里没问题’。”⁶⁶

慕沙气馁的观察被祖纳在大选之后的一幅漫画中，画龙点睛地描绘出来：画中一人表示，一个马来人和一个华人之间的不同，就在于那个华人是支持巫统的！慕沙为巫统所构思的是一个由精英主导的“中兴”过程，其基础是党领袖自愿改变态度。慕沙特别呼吁党允许2000年的党高层选举中出现自由竞争，以此正视基层对领导层的失望，但慕沙的呼吁终告徒然。巫统领导层反其道而行，几乎取消了任何对阿都拉巴达威的挑战，更别说对马哈迪了。结果是，2000年党选之后产生的党最高层领导班子，竟然和1996年的一样，只是少了安华！此外，巫统的领导层也修改党章，以“大选后12个月内”举行党选，来取代原本每三年一次的党选。修章的表面理由是要防止任何足以分裂党的权力角逐，实际效果却是使现有的领导层能够更牢牢地掌控党选。

巫统中兴另一个比较平民化的做法是吸收新党员，阻止选民的支持力量流向回教党和公正党。这个做法在原则上仰赖巫统过去“吸纳不同倾向的马来群体的能力”。然而一如马兹娜所作出的正确判断，其实际的成功机会甚微。在“依靠马来教师和宗教领袖……积极拥抱马来医生和律师……引进激进的回教分子……带进了马来商人”之后，巫统已找不到新的票仓。2000年巫统女青年团的成立间接印证了马兹娜的这个观点。这是巫统青年团的女性对等组织，目的在于招募年龄在四十岁以下的马来妇女。日益严格和保守的回教化进程对她们社会地位和人身自由构成的影响，让一些年轻马来妇女感到不安。她们有可能会支持巫统，特别是马哈迪自由的妇女政策使然。事实上，一些受欢迎的女性歌手和明星于大选前早已积极地让国阵在电视上的宣传攻势借用她们的形象。巫统女青年团的成立达到了一个即时但消极的目标，就是阻止了年轻马来妇女对回

教党的支持。⁶⁷ 和以往吸纳新的策略性选民群体的浪潮不同,女青年团这个臂膀的成立,并没有促使巫统“像过去那样充满活力地自我演变”,反而让现有巫统妇女组感到不安。⁶⁸ 就此而言,我们看不到中兴、改革或再造倾向的迹象。

- 1 事实上,早在9月6日,马来西亚回教青年运动(ABIM)、马来西亚改革理事会(JIM)、全国伊斯兰教徒学生会(PKPIM)与马来西亚回教科学院(Malaysian Academy of Islamic Science)就已成立‘改革运动’,“明确地以唤起公众对拿督斯里安华伊不拉欣所受‘不公正’的醒觉为宗旨”。请看“Four groups launch ‘reformation movement’”, *New Straits Times*, 1998-9-7.
- 2 要参阅不为本地媒体所报道的目击者见闻录,见 Matthew Moore, ‘The Day That Rocked Malaysia’,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1998-9-22.
- 3 Suh and Shameen (1998: 41).
- 4 Amnesty International 文告: ‘Malaysia: Trial of Anwar Ibrahim: a defining moment for human rights in Malaysia’, 1998-11-1.
- 5 ‘Police officer: Investigation must be carried out without fear or favour’, *New Straits Times*, 1998-9-4.
- 6 同上。
- 7 同上。
- 8 ‘IGP: Anwar interfered with investigations’, *New Straits Times*, 1998-9-6.
- 9 ‘Anwar sacked for “moral misconduct”’, *New Straits Times*, 1998-9-9.
- 10 ‘We were sodomised’, *New Sunday Times*, 1998-9-20.
- 11 ‘Anwar has no support’, *Asiaweek*, 1998-9-18, p.51.
- 12 ‘Blowing hot and cold’, *Asiaweek*, 1998-10-2, p.30.
- 13 ‘Dr M: The truth will finally prevail’, *New Sunday Times*, 1998-9-13.
- 14 Joceline Tan 撰, “‘Reformasi’ a camouflage for the man of many contradictions?”, *New Sunday Times*, 1998-9-20.
- 15 Philip Khoo (1999: 6).
- 16 同上。有关这文化规范作为“社会契约”的学术性讨论,见 Cheah (1998).
- 17 Philip Khoo (1999: 6).
- 18 Musa Hitam (2000: 9).
- 19 Wan Azizah Wan Ismail, 引自 Suh 与 Shameen (1998: 49).
- 20 蒙羞的正面影响,见诸于群众对旺·阿兹莎与安华长女努鲁·依查(Nurul Izzah)的爱戴。后者尤然,许多人称之为“改革公主”。
- 21 Sabri (2000: 129).
- 22 同上。

- 23 有关阿米尔的专栏、沙比里·再因的日记与沙农·阿末的长篇小说的评论,见 Khoo (2002a).
- 24 特别参阅 Zunar (2000).
- 25 Sabri (2000: 158).
- 26 Farish (1999)为“Reformasi”提供了后现代解读。
- 27 这里不可能充分列出有关安华案的详细报道。英国广播公司(BBC)对此案,‘砒霜中毒’事件和1998年9月至1999年11月间的群众示威的系列报道,非常实用。请看‘A crisis unfolds: Timeline’ (http://news.bbc.co.uk/hi/english/special_report/1998/10/98/malaysia_crisis/newsid_204000/204632.stm).
- 28 *Malayan Law Journal* (1999:33).
- 29 Philip Khoo (1999: 4).
- 30 欲知判词全文,见 *Malayan Law Journal* (1999).
- 31 Suh, Ranawana 与 Oorjitham (1999: 24).
- 32 Sabri (2000:122-29).
- 33 关于“安华事件”、第一宗审讯的裁决、安华的刑期,以及尤以马来人为最的积怨等的政治效应,Philip Khoo (1999)提供了一个具有深刻思考性的评论。
- 34 *Malayan Law Journal* (1999:33).
- 35 当然,从法律的逻辑来看,总检察长在争取了穆纳瓦和苏玛肛交罪成立之后,他很难不提控安华。
- 36 Case (2003).
- 37 CNN, 1999-9-10, 取自 Sabri (2000).
- 38 欲知主要“烈火莫熄”运动分子对于 Murad 的宣称的怀疑,见 Petra Kamarudin (2000: 76-79).
- 39 Hilley (2001: 200).
- 40 同上, p.201。据报道,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Nik Abdul Aziz)说过“最好是让寻求改革的人加入回教党……好过让他们组织本身的运动”(‘Those who want change should join Pas’, *New Straits Times*, 1998-9-7).
- 41 *New Straits Times*, 1998-9-17.
- 42 欲知社会公正运动的宣言,见 http://www.geocities.com/SouthBeach/Palms/3277/adil/istihar_adil.html.
- 43 依占(Mohamad Ezam)于1999年3月结束海外流放回国后发言。(‘New and More Moderate’, *Asiaweek*, 1999-4-2, p.29).
- 44 柯嘉逊, Kua (1996).
- 45 *Towards a Just Malaysia*, 见 <http://www.malaysia.net/dap/ba-ind.htm>
- 46 替阵的预算案策略, Belanjawan Rakyat 2000: Demi pemulihan, pembangunan dan keadilan 《人民预算案 2000: 朝向复苏, 发展和公正》, 并没有正式的英文翻译版。(<http://www.malaysia.net/dapmnet/bljw.html>)

- 47 Maznah (2003).
 48 Halim (2000).
 49 行动党可能在1999年的大选中获得比以往更多的马来选票,虽然其受支持的程度无法获得证实。
 50 槟州马章武莫 (Machang Bubuk) 的州议席是个最好的例子。在那里,华裔选民支持的增加使民政党当任议员杜乾焕得以克服马来选票的流失。见杜乾焕, Toh (2003)。
 51 Musa (2000:10).
 52 Funston (2000:56).
 53 同上, p.56-57.
 54 Zaharom (2000:4).
 55 'UMNO is known to change', *Asiaweek*, 1999-12-10, p.32.
 56 Wan Azizah, 取自 'Mahathir Reaches Ou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01-2-1, p.29
 57 Mahathir, 取自 'Dr. M: Fadzil refused to discuss Malay rights', *The Sun*, 2001-3-1
 58 Mahathir, (2000e).
 59 Mahathir, 取自 'Dr. M: Fadzil refused to discuss Malay rights', *The Sun*, 2001-3-1
 60 'Asiaweek Newsmag', *Asiaweek*, 2001-2-16, p.18.
 61 Ratnam and Milne, (1970:219).
 62 见 Elegant (2000).
 63 Zakiah Koya, 'Dr. M to blame for Lunas defeat: UMNO veteran', *Malaysiakini*, 2000-11-30。
 64 'Laporan Suhakam jejas peranan polis', *Utusan Malaysia*, 2001-8-24.
 65 Maznah (2000:6).
 66 Musa (2000:8).
 67 Maznah (2002).
 68 Maznah (2000:6).

第六章

结盟建构的文化驱策

用任何方法抹黑善待你的人,使他们渐受憎恨。匿名信、报章、互联网,这些全可派上用场。给他们[原文如此]侮辱性的标签,因为这样可以激发对某些人更大的憎恨,称呼他们“大暴君”(Mahazalim)、“大法老王”(Mahafiraun)。我们喜欢独裁者、法老吗?当然不,所以憎恨那些被称为“大暴君”或“大法老王”的人吧。没有什么比憎恨的感受给人更大的满足感,因此憎恨的政治取代了发展的政治。憎恨他而投选我!

——马哈迪,巫统常年大会演说,吉隆坡,2000年5月11日

广大群众的政治生活突然觉醒了。他们意识到事情并非应当如此而它们是可以被改变的。他们被新的经验冲昏了头而准备冒犯天庭。而他们天真地以为“每个人”都经历了同样的转变——这是人性自天少有的例外情景,人们愿意摒弃走在前头的优越感。

——Rosa Levine-Meyer, 引自 Joseph Schwartz (2000年)

历史学家可能会把1999年的选举视为没有定论的乱七八糟的比拼。对于组成替代阵线的成员来说,这尤其正确。“烈火莫熄”的深刻社会意义、人民公正运动理事会(GERAK)的跨文化突破,以及替阵的宏图壮志的实验,融合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它的冲击大大超越了替

阵的选举表现。然而，并非只有巫统必须面对选举后不明朗的局势。

回教党是成绩最好的替阵成员党，它准确地估计到争取马来人选票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成为带领替阵打败国阵的健力。无论如何，回教党的扩展正好标示了它的影响力的界限：在马来人中心区域之外回教党无法抗衡巫统。替阵的另一主要成员党——民主行动党，事前忧虑非马来人对它和回教党一起参与“替代政府”的保留心态，也没有错估。然而行动党的“灾难性损失”，不只被认为是造成了非马来人的最糟处境，也反映了它试图东山再起和掌舵反对党政治的失败。诞生于“烈火莫熄”之中，公正党延续了“烈火莫熄”对巫统的威胁，颇有一些成效。但公正党无法赢取更多国会议席来增强民意代表性，从而取得政治突破，意味了强加在安华身上的不公，不会通过直接的政治胜利获得足够的平反。

简单地说，政治格局动荡不定而每一个政党都进退维谷。如果说所有政党都必须适应不熟悉的境况，替阵的成员党尤其必须展示“烈火莫熄”可以持续其推动力，以及替阵会维持它的整体性。

行动党和少数政治的钟摆

在1999年的选举中，如果说巫统遭受的挫折来自马来人的背叛，那么行动党的困境可以说是肇因于华人选民的相对被动性。选举成绩显示华人选民的“分散”，可能不下于马来人的“分散”。作为粗略的征象，国阵的“华基政党”（马华和民政）在二十四个人占多数的国会选区中赢得了十五个，但只拿下51%的总选票。在象征“华人中心地带”的六个非常大的城市选区中——每一选区的华人选民超过80%——行动党赢得了五席和53%的总选票。¹虽然这些成绩不足以为华人的投选模式作出定论，它们证实了华人社群持续地在政党、社团和选民中分化成两大阵营。

一个阵营由马华和民政的支持者组成，他们偏爱国阵内部的“协商政治”；另一个阵营包括了集合在行动党身边的反对派，他们倾向于对政府施加“压力政治”。²虽然这些政党表面上有不同的政治

理念，大多数华人选民的特定课题却是如何最有成效地维护“华人社群”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权益。因此，这些敌对政党在每一次选举中受支持的程度都会有变化，基于下述的因素而定：普遍的社会经济状况、当时的政策、政治性争议和选民对于巫统领导下的政权是敌视还是通融“华人权益”的感受。这种情况形成了被普遍称为“钟摆效应”的关键变数，它反映了华人选民的趋向：在一个大选中大力支持国阵，而在下一个大选中转向行动党，照此循环。许多观察家用这种钟摆的概念来解释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华人投选模式，提示了华人选民会在一个大选中投选“协商”作为更有效保护华人权益的方法，但在接下来的大选中因对政府的幻想破灭而转向“施压”。政治人物面对华人选举行为的这种摆荡模式，很容易把它正面地形容为“策略性”和“务实性”或负面地形容为“投机性”和“不可靠”，全看他们的机运如何受影响而定。例如，当华人选民在1982年投向国阵，而在1986年大举转投行动党，马哈迪痛斥后一个转向为证明了“城市[解读：华人]选民对任何政党都不忠诚”。³

“协商”和“压力”并非不能结合，惟它们形成一个谱系的两端。对许多华人分析员、政治人物和选民来说，“华人政治”的目标就是要沿着这条谱系找出一个理想的方位，或是在这两种政治形态之间调和出一个最有成效的平衡。无论如何，我们不应把所谓“钟摆”具体化。它在这里是被引用来喻指行动党在1999年大选中的困境。到了新经济政策的后半期，在1986年和1990年的大选中，“钟摆”似乎停留在对行动党有利的方位，这可从表6.1看出来。（行动党在这两个大选之间的明显下滑，可说是肇因于它从沙巴的策略性退出，以辅助它的“人民团结阵线”〔Gagasan Rakyat Malaysia，简称“人

表6.1 1974—1999年大选中行动党的国会选举表现

| | 1974 | 1978 | 1982 | 1986 | 1990 | 1995 | 1999 |
|------|------|------|------|------|------|------|------|
| 席位 | 9 | 16 | 9 | 24 | 20 | 9 | 10 |
| 得票 % | 18.3 | 19.1 | 19.5 | 21.1 | 16.5 | 12.1 | 12.5 |

资料来源：大选选举委员会(个别年代)

阵”盟友，沙巴团结党。)

在1986年和1990年之间，城市华人选民对政府的抗拒使行动党继续成为主要的反对党。无论如何，1995年和1999年的后新经济政策下的选举显示了亲国阵的反向摆动，这个反向摆动反映了，两项社会政治性发展侵蚀了政治对抗力。

首先，人阵在1990年推动一个大胆的双结盟制度以取代当权的国阵，这项企图失败了。尤其是槟城，作为“第二个结盟”的人阵组合获得很大的鼓舞和期望，而行动党只欠三席就可以拿下槟州政权。尽管林苍佑领导的国阵政府的政绩得到广泛的肯定，大多数槟城的华人选民准备以行动党取代民政。马华在当时华人不满意的冲击下输掉槟城的所有竞选。巫统虽然在吉兰丹也输掉所有席位，四六精神党却在槟城交出大伤士气的零蛋！当人阵无法在国会选举中重创国阵，更恰当地说是在槟城，华人选民对国阵的抗拒就下滑了。

其次，90年代带来了物质繁荣，政府对华校和马华主导的教育项目提供了资助，这两件事情让华人选民觉得有理由放弃似乎没有利益的顽抗，以换取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收获。到了1995年的大选，一个对国阵有利的社会政治变迁已经稳固下来。行动党领袖没有忽略这个变迁，只是低估了它的意义，或是一意孤行。⁴ 行动党退出人阵，试图自己拿下槟城。也许行动党领袖希望那些曾经在1986年的“丹絨”和1990年的“丹絨2”战役中热心支持它的非马来选民，会再度拥护“丹絨3”的壮志。但是即使行动党的进攻有更好的包装和操作，那只是在全国性战役大势已去之下试图在地方战场交锋胜出的方略。“丹絨3”以行动党的溃败告终，也使它在全国全面性地失去据点——这就是继续押注在变节的种族战马的后果。

要在1995年失败后的几年内恢复80年代的半挑衅半观望式抗衡，行动党必须迎合一些条件。其一是大幅度的党内重组和动员，这是行动党不曾有过或无法推动的。行动党的核心结构使它非常倚重领袖的勇气和自我牺牲来激发选民。行动党领袖时常因为各种指控被起诉或拘留，而这并非自讨苦吃。行动党国会议员黄朱强和林

冠英的被控和定罪，显示该党领袖仍然体现这两种个人素质。即使在一些重要领袖退出行动党之后，它也没有在1995年大选后进行改革。⁵ 更糟的是，在1999年初，当黄朱强、张德发和其他人发起他们的“踢走吉祥”运动，行动党还被这个偶发性的党内斗争摧毁。第二个条件关系到行动党的有限党员人数，这使行动党的声望高度依赖它和传统华人异议中心——教育机构、同业协会和宗乡会馆——的互动。然而，行动党并没有维持这些联系，而马华和民政却扩展和巩固了它们在这方面的控制。第三个条件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要克服它自己的弱点和国阵的政治机制力量，在任何选举中行动党都需要依靠华人选民的顽强支持。那么，不管行动党领袖可以或不可以为他们的选民做些什么，他们都会通过抗议票中选。这就是1986年和1990年选举的情形，当时华人选民“要拼才会赢”的精神大力扶持了行动党。十年后，可以相比的异议浪潮已不复见。华人选民对林冠英入狱的反应只是一种在个别行动中表现的冷淡同情，而安华的人狱点燃了不能平息的愤怒，从而激发了广泛的团结一致。

在1998-99年，马来人的情绪大幅度倾向反巫统，但“烈火莫熄”的情绪却没有充分感染华人选民。非马来人对“烈火莫熄”的支持是间接的，而且局限于一些个别人物的介入（最显著的是蔡添强）、行动党加入替阵、年轻的非马来人社会活跃分子加入公正党和人民党，以及许多非政府组织支持 GERAK、人民民主联盟（简称 GAGASAN）和替阵。虽然这些是意义重大的政治发展，它们并没有深入打动广大的华人或非马来人选民。旺阿兹莎在评论 GERAK 和 GAGASAN 的跨种族参与时，暗示了这个局限：“马来人大多被殴打，印度人多数是（被逮捕的示威者的）律师，而华人是协调者”。⁶ 在“烈火莫熄”触及华人选民的层面，它重新挑起80年代有关民主和公民社会的争论，但却无法倾注类似马来人文化反叛的激情。

1997年7月和1998年9月的特定环境，以及主要的较量者也具有决定性。1985-86年的经济衰退显得严厉，部分原因是它恶化了1982年开始的经济放缓。相比之下，1997-98年的危机虽然尖锐和

来得突然，它并没有严重到引发广泛的不安或穷困。自大的企业财团在证券市场遭到摧残，而且由于汇率剧降而蒙受重大损失。然而这个危机并没有在实行资金管制的经济庇护之前引发失业浪潮，外汇定率看来不只拯救了朋党也解脱了一般商业。

像其他国内商界，华人商界起初对马哈迪的反市场词令和立场怀有戒心，但渐渐地被资金管制和1999年尾稍为见效的出口导向的复苏说服了。在政治方面，对华人社群来说，没有什么比印尼的排华暴行更具威胁性，他们在“烈火莫熄”开始之前感受到双重慰藉：马来西亚不只是安全的，他们的家甚至成为许多印尼华人的避难所，这些印尼华人因1998年5月的暴乱而逃亡。

另外，安华在某些重要情势方面不能和拉沙里相比。拉沙里领导四六精神党时，可以像一个潜在的国家领袖自由行事，然而安华却被监禁并当作政治败将铲除掉。当选举的政治交锋在新经济政策的背景下进行时，成为传闻中华人商业真正朋友的是拉沙里而不是马哈迪。安华和他在1998年12月的紧缩配套无法塑造类似拉沙里的形象，以面对马哈迪和他的“拯救、资金重组和再通胀”政策。

这些原因，和相信安华的罪状与否无关，它们解答了为何华人不愿响应安华的号召。⁷

所有这些社会、文化和经济的趋势和发展汇聚成一个政治氛围，在这个氛围里华人选民不再是固执反政府情绪的轨迹。一些较大的以华人为主的选区继续忠于行动党，然而这些只是零星的异议。没有什么能够把广大的华人选民从1995年的“协商”状况推向一个新的“压力”浪头。在这样的氛围中，“诉求”动议所带来的事件提供了赋有启示的教训。

诉求原本的“要求”在名义上是和替阵的“联合宣言”所憧憬的改革相一致的。然而马华和民政在“国阵框架”之下的居中调解把诉求的“要求”淡化为“诉求”，使到国阵在选举前可以接受，但过后却被巫统拒绝。因此，即使“压力政治”和“协商政治”之间有什么殊异，这个殊异并没有带来任何差别。要在这两种政治形态之间取

得平衡，只有在“华基政党”“华人领袖”和“华人选民”含蓄地接受“华人政治”被贬抑成“少数政治”的时候，才是有实际效用甚至可以充分理解。它可能还是最大的少数政治，但不管怎样它的政治理念仍然不能超越发展计划、公共工程和社区服务的课题，就像罗国华已经充分论证那样。结果是，“像国阵的非马来人领袖一样，非马来人社会大体上似乎已经背离了‘老套的’争议性课题，如公正、透明度、承担性，以及民主本身”。⁸

值得赞扬的是，当“烈火莫熄”和替阵对国阵的挑战正好打开这些“争议性课题”时，行动党适时地试图扭转“华人政治”的趋向。原则上和策略上，“烈火莫熄”和行动党之间的联盟是互增成效的。行动党需要一个重大的号召来重整旗鼓，而“烈火莫熄”正好可以提供一些让行动党见猎心喜的目标——政府的贪污、司法程序的滥用和公民自由的打压。“烈火莫熄”需要传播和鼓吹者，而行动党在老练的组织和动员方面有助扩张。马来人的反叛可以借助行动党的“华族形象”达到种族平衡，而行动党也可以因此争取马来人的支持。安华和冠英的相同困境象征“烈火莫熄”凸显的多元种族意识。即使是这样，行动党务实地宣扬“志不在推翻[国阵的]政权”，而志在“打破国阵的政治霸权和它不曾间断的三分之二国会多数议席，以改变马来西亚政治的范式”。⁹ 行动党在替阵内和公正党、人民党尤其是回教党合作并没有错，虽然这种合作没有帮助行动党重新获



钟摆摆向何方？

得昔日在反对党之间的显著地位。行动党的表现也不是“灾难”，即使林吉祥、卡巴星和曾敏兴的败阵是严峻的倒退。行动党的领袖也认为他们遭受重创，而该党其实多获一席国会议席，总得票率上升半个百分比和增加几席州议席。这些微不足道的收获使吉祥正确地感叹华人选民忽视了把握“烈火莫熄”的大好良机，以便在政治体系上造就历史性的突破。华人选民的意愿只是表面保留“压力”而选择“协商”，是含蓄的让步。如果说行动党的表现停留在替阵的“大气派”宏图外面，它还是处于“少数政治”的变数之内的。它的成绩只有在相较于替阵的宏大期望和回教党的重大胜利之下，才显得似乎是预示了华人对行动党的摒弃。

反对党的问题就在这里：支持替阵的华人选民很少。尽管马来人转向反巫统，在几个种族混和的城市选区，特别是在吉隆坡、雪兰莪和檳城，公正党和人民党的备受尊崇的候选人，例如詹德拉·赛胡先·阿里(Syed Husin Ali)和再诺·查卡利亚(Zainur Zakaria)，都落选了。在马来人占细微多数的选区，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的支持对巫统能够击败回教党是举足轻重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的华人选民被国阵的警告左右了，这个警告是替阵的“替代政府”将会是一个由回教党推行的“回教国”。

再一次，前后关联至大。非马来人对回教党的戒心说来话长。独立后不久，非马来人就把泛马回教党(PMIP)视为极端的马来民族主义政党。然而，在1969年的反联盟选举中，非马来人反抗情绪的深度(在这方面马来人也一样)并不受行动党、民政党(那时是反对党)、PMIP和人民进步党(PPP)的约定所影响——虽然那不是结盟。70年代晚期之后，随着回教党和巫统(以及国阵)的分裂、国内的回教复兴、伊朗革命的世界性效应，非回教徒开始担心回教党变为所谓回教原教旨主义的政党。由于策略上考虑到这种担忧，反对党在1990年组成两个盟约——一个由四六精神党、行动党、沙巴团结党和人民党组成的“多元种族”盟约，另一个由四六精神党和回教党组成的“回教徒”盟约。国阵的“华基政党”抨击行动党和回教党

联合，认为这种联合并不因为是“间接的”而减少“邪恶性”。但那时大多数华人选民决心冒险支持行动党，可能会导致一个由“四六精神党的马来人中心倾向和回教党的回教化政策”所支配的“替代政府”。¹⁰为此，国阵的“华基政党”几乎在每一个选举中言之凿凿地揭发行动党和回教党的“邪恶联盟”；因而“直到1998年，行动党和回教党双方的领袖都避免在同一个讲台上亮相和合作，以免选民和它们各自的支持者都感到混淆”。¹¹也许巫统在1999年面对回教党时(以及公正党)所显示的脆弱，比起1990年的情况挑起华人更多的忧虑——选民在1990年可以在巫统的两个阵营之间就地取舍，但当“回教党因素”成为华人选民的考量时，它并没有造就一个新的令人信服的理路，反而在他们类似1995年支持国阵时的诸多理由之上，再加多一条。

因为不久前已经改变了很多，当前的境况没有改变。社会—政治的境况对行动党惯例上争取华人选民的忠诚支持非常不利，就像巫统渴求“马来人团结”一样。在2000年，不管行动党在幕后怎样深思熟虑都无法恢复元气，在这方面它不见得好过巫统。行动党扩展了它和其他反对党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例如，把一些它向来竞选的席位让给其他候选人——詹德拉(公正党)在峇央峇鲁选区(Bayan Baru)、再顿·卡欣(Zaitun Kassim [妇女参选倡导宣言, Women's Candidacy Initiative])在士拉央选区(Selayang)、惹也古玛(Jaya-kumar Devaraj [社会主义党, Parti Socialis Malaysia])在和丰选区(Sungei Siput)。以林冠英在马来社群的声望为基础，行动党加盟替阵进一步减轻之前马来人对它的敌视。这两项演变并没有帮助行动党求取任何新的“战略选区”，行动党也没有因迫在眉睫的失败而重组它的领导层。由于行动党向来过度倚重一班有声望的元老，它无法更换一个在大选中屡战屡败的领导层。行动党的重新规划能够多激进，也有所局限。一方面，一个像林吉祥那样在替阵内举足轻重的行动党领袖，可以为推展替阵的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合作的志向，作出具体的贡献，以“抑制种族和宗教再度两极化的危险”；¹²另一

一方面,行动党要为它自己的“基层回馈”担忧,它的“基层回馈”表明“回教党因素”已经在华人选民中损害了行动党的信誉。行动党对应这两种处境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方式是,守护曾经使它成为最大反对党的政治承担。第一,这意味每当“华族大义”受到阻挠,行动党就会极力维护这些大义。在2000年,除了巫统对诉求的骚扰,还有两个这样的大义,就是华教运动反对政府的“宏愿学校”,以及一些学生家长抗议白沙罗华小的搬迁。行动党如常地攻击国阵的“华基政党”共谋破坏华文教育的独立地位。不寻常的是替阵的“马来人基础党”包括回教党,在诉求、宏愿学校和白沙罗华小事件中鼎力支持“华社”。第二,在越来越强大的镇压气象之下,行动党继续不屈不挠地维护公民自由和人权。再一次,行动党的立场也得到回教党、公正党和人民党的坚决配合,它们以勇敢和广阔的“马来人阵线”抗御严酷的法律和警察镇压。这些都是“烈火莫熄”带来的效益。

无论如何,行动党政纲较早的一个目标——为维护“非马来人权益”而反对政府和反对回教党不同的回教化政策——呈现了困难所在。从这一方面看来,在2000年于坎贝拉举行的第三届澳洲-马来西亚会议中,林吉祥在表明行动党立场时的演说是有所启示的。“替阵要成功”,林吉祥的观点是:

“它必须采取主动,以消除国阵在1999年大选中惯常用来恐吓马来西亚选民的两个阴魂:一方面行动党是反对马来人和反回教的,并且要看到回教的灭亡;而另一方面,回教党是极端分子和狂热信徒,并且要剥夺马来西亚非回教徒的宗教、文化和政治权利”。¹³

这样的一个剖析替阵真实障碍的平衡言论,不会在替阵内引起争议。但吉祥对共同肩负消除那两个“阴魂”的看法,却没有提到要应付“行动党的阴魂”,可能会开始令回教党不安:

“替阵尤其必须展示由回教党所体现的‘政治性回教’是一个宽容和公正的回教,能够和民主水乳交融,即维持公开和负责的政府及文化多元主义,以及配合人权和民主的落实”。¹⁴

在替阵领袖付出那么多心力把迥异的政治纲领调和成共同目标后,下述针对替阵缺乏谘询的含蓄评论,也不可能不令人操心:

“个别说是民主行动党,笼统说是替阵,付出它们的代价认识到,替阵内的反对党在广泛的议题上达成协议是不足的……争论性的课题,像回教国的课题,被回避或搁置了。其实在一个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社会,回教国的问题是不屈从于理性的讨论和决议的。更糟的是当选举逼近时,恐惧和情绪会受到摆布”。¹⁵

最令人困惑的是,如果“回教国的问题是不屈从于理性的讨论和决议的”,为什么吉祥却坚持:

“回教国的课题必须由替阵自己研讨和议决,以求一劳永逸;一旦议决了,替阵的成员党之间可以开展更大的信任和合作。这个课题的决议也可以作为重收失地和赢取新支持的基础”。¹⁶

大体上,这个困惑得到解答:为了“重收失地和赢取新支持”,吉祥认为“替阵的成员党必须承认许多非马来人的确害怕行动党和回教党的合作……会导致回教国的成立”。¹⁷

不管吉祥的思路还意味什么,它说明了行动党在1999年后的困境,这是那些被原来的选民背弃后的政党和政治人物的典型困境;他们不能怪罪那些选民,于是习惯精明地把失败归咎他人。例如,当马哈迪在1969年的哥打士打南区议席输给PMIP的哈芝尤索夫·拉哇(Haji Yusof Rawa)时,他没有把失败归因于马来人对巫统的不满,反而怪罪华人背叛联盟。三十年之后,行动党领袖也自圆其说地认为华人选民“对回教党的恐惧”使行动党成为“替阵内最大的输家”。不管这样的评估是否正确,它促使行动党采取“重新考虑”它在替阵去留的态度,同时更频密地批评吉兰丹和丁加奴的回教党政府没有展示“一个宽容和公正,且能够和民主水乳交融的回教”。

最后,一个政治联盟的成员党互相参议和分享是值得赞扬的原

则。然而，实际的伙伴关系，包括容纳政治理念上和其他方面的分歧的基本需要，总是依附在权力的考量上。基本的数目在起作用：每一个成员党拥有几个议席，应有几席，或它能赢几席？拥有十个国会议席的行动党仍然拥有坚实的支持，但同样也可以说，行动党再也不能依赖城市的庞大选区的“免费入场券”——城市选区以往习惯让行动党领袖当选和蝉联，不管他们曾经做过什么或没做什么。由于只有十个议席，行动党必须把反对党领袖的位子交给回教党，即使没有替阵，它也必须那么做。从这个观点看来，1999年后的行动党多少有点像1990年后的四六精神党；四六精神党在1990年的大选中获得比行动党或团结党更少的议席，这使它无法决定人阵的未来。败阵后，四六精神党倾向马来人而行动党作为国会的反对党领袖就独当一面了。这一次，由于无法推行替阵承诺的一个新反对党政治，或无法期望少数政治的钟摆重振它昔日在反对党之中的声誉，行动党选择“独行”来为“华人社群”、“非马来人”和公民社会服务。也许行动党领袖真的想那样重造行动党。也许他们的方式是简明甚至是怀旧的，以冻结复杂的社会变化和再组合；这样的方式，不啻是前“烈火莫熄”的，也是前2020宏愿的种族政治模式。但这就是再造的途径吗？或者它只是把党的将来押注在它的过去之上？

回教党的崛起再崛起？

乍看起来，回教党没有缠身的两难困境，两难困境是巫统和行动党各自失败后的遭遇。胜利了，回教党说到底明确地显示它拥有完备的组织、一体的领导和激昂的党员的优势。回教党的阶段性目标和它求取的主要选区看来也不含糊。回教党领导的吉兰丹和丁加奴两个州政府是稳固的，因为除非有不可预见的反叛，巫统在下次选举，无法在这两个州从回教党的巨大多数票之下反败为胜。然而，从回教党在选举中的斩获、影响的范围和号召力的深度来判断，它的成功的质量显示，它要从一个区域性反对党成为能够夺下国阵

政权的第二个结盟的支配性成员党时，碰到了难题。

其实，在安华失势之前，回教党在吉兰丹基地的处境已经被巫统削弱，导因于巫统1995年重夺八个州议席，四六精神党和回教党的分裂以及四六精神党在1996年的解散。四六精神党的十一个州议员只有一个加入回教党，其余重返巫统。这造成回教党在吉兰丹拥有25个州议席，而其余18个由巫统控制。回教党在吉兰丹州议会的大多数席位仍然可以维持一个稳定的政府直到下一次选举，而州务大臣聂阿兹(Nik Abdul Aziz)的施政还是深孚众望的。无论如何，只要熟悉下列情况：回教党在1962年因党员跳槽至巫统而失去丁加奴州政权、它在1978年因党争以及结束它和巫统在国阵的纷乱盟约而失去吉兰丹、还有1994年团结党在沙巴垮台，人们就会察觉回教党对吉兰丹的控制不再像1990年那样稳如磐石，那时回教党和四六精神党联手拿下了所有州议席。况且，尽管自70年代的晚期以来，传闻经常预期回教复兴会把回教党的影响力扩展遍及“马来人心脏地带”(包括丁加奴和吉打，回教党已经占有选举席位的另两个州)，回教党在选举方面的全国性表现并没有显示什么可观的进展。在1990年和1995年的两届选举之间，回教党在国会方面的总票数稍微增加了，但两次都一样获得七个议席(见表6.2)。

表6.2 1978-99年大选中由马来人支配的反对党国会议席(得票%率)

| | 1978 | 1982 | 1986 | 1990 | 1995 | 1999 |
|-------|-------------|-------------|-------------|--------------|--------------|--------------|
| 回教党 | 5 (15.5) | 5 (14.4) | 1 (15.5) | 7 (6.6) | 7 (7.3) | 27 (17.4) |
| 四六精神党 | - | - | - | 8 (14.4) | 6 (10.1) | - |
| 公正党 | - | - | - | - | - | 5 (11.5) |
| 总共 | 5 (15.5) | 5 (14.4) | 1 (15.5) | 15 (21.0) | 13 (17.4) | 32 (28.9) |

资料来源：大选选举委员会(个别年代)

最后,在1998年9月前的时期,回教党的阶段性和政治理念性的呼声并没有实质的进展。许多吉兰丹州内和州外的马来西亚人赞赏聂阿兹领导的吉兰丹政府遵行宗教戒律、诚实、不虚饰及和老百姓有紧密的联系,但吉兰丹仍旧是一个经济落后的贫民区,背负了全国最高的贫穷率(1997年是19.2%)。这个高贫穷率也可以归咎于从1978到1990年独自统治吉兰丹的巫统,以及之后不再提供发展拨款给吉兰丹州政府的联邦政府。即使是这样,吉兰丹的经济状况让州外的众多人民很难接受回教党的“发展模式”,不管一些吉兰丹人民如何诚恳地相信简单生活的德行,“注重社会集体价值、公民正义和通过回教实践的再分配”,¹⁹或接受“一个较低水平的物质生活……和人民的现有能力并不相悖”。²⁰每一次回教党(和它在乌拉玛[ulama,也译为“宗教学者”]中的盟友)试图更加严格地制度化或推行公众遵守回教法律和道德准则,包括它在1993年在吉兰丹动议制定的回教刑罚法律时,它总会碰到回教徒及非回教徒的广泛和坚定反对。

庆功心态和发展心态的前危机氛围,对吉兰丹的经济劣势加上回教党的宗教取向并不友善。回教党的计划和它的“回教品质”大多被认为是保守、没有伸缩性、甚至是蒙昧主义的——有意思的是,这是和当时马哈迪在安华的协助下推行的回教化截然相反的,马哈迪推行的回教化是自由、现代、甚至瞻望未来。然而,在回教党向来保持强大影响力的地方(特别是吉兰丹和丁加奴),不同的社会发展、文化转变、思潮趋向和政治冲突异常地交叉进行,形成一个相当均衡的巫统—回教党的分界政治,并且没有种族差异的色彩。²¹因此只要有一小部分的选民的坚定转向就可以在那两个州扭转选举成果,尤其是当一个政党的内讧在选举前夕造成许多党员和同情者变节转向。在1977年,回教党的内争使它在翌年丧失吉兰丹政权。巫统在1987—88年的分裂导致它在1990年下台。而对安华的迫害激发了反巫统的转向,这个转向摧毁了巫统重夺吉兰丹的机会并把丁加奴割让给回教党。

突然,根据警戒的反回教党和焕发的亲回教党双方的评估,回教党从吉兰丹飘摇不定的权位开展了一个看来不可遏制的崛起道路,横跨马来人中心地带甚或更远。对这个政治转变的一般看法是,既然一个回教党领导的反对阵线现在面对一个巫统支配的政权,未来政治的重点就在巫统的“世俗主义”和回教党的“神权政体”之间剧烈的马来人内争。例如,1999年选举后十天,英文《亚洲周刊》(Asiaweek)的阿杰星(Ajay Singh)发表了〈新的马来人困境〉——论及宗教极端主义现在比种族之间的分化更有可能为害政治格局。²²许多外国观察家因马哈迪的重掌政权阻止了这个新困境而松了一口气,也许阿杰星表达了这样的感受。²³

回教党在选举后的定位的寓意并非那么可怕。回教党增加了20个国会议席、保卫了吉兰丹、夺下了丁加奴和扩展至吉打,这些全都建立在巫统的损失之上。以上一次回教党的表现为准,这些都是漂亮的成绩(见表6.2),但是回教党的27个国会议席只占了总数193席的14%。回教党的得票率是17.4%,这也巧合地是1995年回教党和四六精神党相加的得票率(虽然,如果公正党没有成立,回教党的票数肯定会更高)。巫统在承受了最坏的打击之下,仍然拥有72个国会议席,回教党并不比1986年的行动党更接近统治国家的边缘;当时行动党在选举中赢得了(总数177席的)24个国会议席和21.1%的得票率。同样重要的,回教党的胜利几乎全部是在象征马来人心脏地带的58个选区得到的,这些选区的每一个都拥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马来人选民。在那个心脏地带之外的是马来人占细微多数的选区,所谓种族混和区域,这些区域都在巫统的控制之下而一直是回教党完全无法攻破的。回教党在丁加奴的国会选举中的大胜是漂亮的,而在赢取丁加奴的州政权之下,同时结束了吉兰丹作为反对党的州政府的孤立状态。然而回教党的表现的整体评价是必须加以斟酌的。回教党在丁加奴的胜利可以说是它期待已久的历史重演,回教党在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曾在那里取得胜利。三年后,即1962年,回教党党员的变节把丁加奴交给巫统。回教党的分裂导致巫统控制了吉

兰丹十二年,直到1990年回教党-四六精神党才重夺州政权。因此,冷静地评估回教党的成绩,可能就会把1999年的成绩视为回教党在几乎四十年的倒退声势之后的复兴,虽然这个复兴也清楚划出回教党进展的界限。

确实,回教党掌控之下的资源缩减,进一步牵制了它。回教党对它的回教式计划中可能制定的主要经济政策从来就没清楚阐明。回教党没有解释“回教式发展”对一个和全球资本主义结合的国家经济意味着什么。在吉兰丹,回教党实行一些经济民粹主义的方式,以特惠穷人、没有土地的人和低下阶层者,有时候依靠古老的回教式慈善、福利和再分配的管道。丁加奴方面,回教党的1999年大选宣言计划“用(石油)开采税收作为州经济生产的催化剂”和“建基于自然资源例如石油和天然气来推动经济成长和扩展”。²⁴ 宣言中专论“石油和天然气”的部分承诺:

- 13.1 向联邦政府争取更公平的开采税收,至少要获得20%。
- 13.2 确保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发展将会扩展和持续下去,这两项工业会创造相关工业的成长。
- 13.3 确保本地劳动力在服务的所有层面和水平上的参与。
- 13.4 确保国家石油公司在高等教育为丁加奴人民作出更大贡献。
- 13.5 在丁加奴所有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基础的投资必须符合一个条件,就是州政府应享有利益分配。²⁵

州务大臣哈迪·阿旺(Abdul Hadi Awang)和他的政府能够在石油税收方面达到什么目标还是未知数。联邦政府要国家石油公司停止直接付款给州政府,这使回教党的竞选承诺落空了。联邦政府把23年来在开采税务的名义下的收益重新定义为“亲善金”(wang ehsan),从而把每年大约8.5亿马币转移到在丁加奴运作的联邦机构名下。哈迪·阿旺谴责联邦政府的行动为“从宗教观点、民主观点、公认的人类道德的观点来看都是邪恶(haram)的”。²⁶ 丁加奴政府的律师,汤马士(Thomas)在高等法庭申诉“这些联邦政府和它的机构和公仆

的行动都是高压、任意和不符合宪法的”。²⁷ 但是破坏已经造成,而在可预见的将来回教党不可能恢复原状。丧失了大笔资金和面对联邦政府使“外来投资”却步的敌意,任何反对党领导类似丁加奴的州政府都无法开展一个简单说来是“现代”的经济。它接着的失败会被宣传为证明回教党的教条式抗拒或行政上无能实行“务实的”、“对投资友善的”、“促进成长的”或“扩大市场的”政策,或任何其他优选言词。后来,当哈迪·阿旺说丁加奴因为失去石油收益而无法偿还联邦政府的贷款时,副首相阿都拉·巴达威扮演圣贤为联邦政府的策略提供理由:

“如果我们要接管一家公司因为我们认为它没有得到妥善的管理,而我们认为我们更明智,那么我们应该证明它。

我们怎么能够接管一家公司而又不付出,然后却大发牢骚:‘噢,这个不是我们的’或‘那个,我们没有做’。

如果事情是那样,那么我们干脆不要消除贫穷或发展这个州,而把它交给联邦政府去应付一切。”²⁸

当前,联邦政府、国家石油公司和巫统这三大机构将决定由“亲善金”资助的发展的种类和步伐。适用于彼处的话也适用于此处,丁加奴在回教党的管理之下将会被迫依靠修补式的、零碎的和资源稀少的计划来帮助不幸的老百姓;这样的剧情曾经在吉兰丹上演过。不久,丁加奴经过25年的巫统管治之后,以它的17.3%贫穷率(在1997年),会成为吉兰丹的精神伙伴,也是“回教政府之下的贫困”的范例。

当然,忠于回教党的人可以自由地过简单的道德生活,体验回教教义,像原来那样,对惩罚性的权力嗤之以鼻。这种蔑视可以想见是以激昂的回教语言来表现的,它全不顾及物质上的利益。说到底,1998-99年聚集在回教党周围的马来人反对派主要出于道德上的厌恶感和文化反叛,这种厌恶感和文化反叛重新规范了政治行为的伦理疆界。结合了宗教教义和政治理念,回教党致志于“实践回



回教党的崛起再崛起？

教作为 *Ad-din*”，²⁹ 作为一种要求宗教和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生活整合的生活方式，以区别于“巫统的回教”，后者被视为“推动马来人进入全球（资本家）发展主流”的“现代化工具”。³⁰ 艰难的是，回教党必须展示它如何达致“把人类的发展作为发展的核心”的意识形态任务，³¹ 同时和管理经济发展的真实工作和现实困境奋斗。但是即使不是经济破坏，金钱上的损失也使回教党几乎没有“务实”的方案来证明“回教政府”的优越。取而代之的是“教条式”的支援，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注入更严峻的宗教条规、道德热情和典范行为。

在选举之前，回教党已经宣布它意图“禁止所有形式的赌博和罪恶，以及限制卖酒和麻醉饮料的场所的执照”，并“防止和扑灭社会疾病”。³² 后来，丁加奴的地方政府关闭了“卡拉OK酒廊”，减少容许卖酒的商场的数目，限制“男女理发中心”的营业，以及考虑新的方法以尽量减低公共场所的男女混合。这些处理“回教禁止但还没完全扑灭的事物”³³ 的方式是由意识形态的信念促成的，但回教党缺乏替代发展使它们看起来更为僵化。如果说“原教旨主义”阻碍回教党“面对现代”——对回教党的一个典型批评——巫统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则切断了回教党的资源，它需要这些资源来正面和专注地应对现代性在当代的各种形态。可以这么说，不会有什么

“现代发展”来平衡回教党的社会保守主义——像高成长消解了巫统在新经济政策下的种族歧视那样。回教党时常辩说它的福利计划、行政变革和没有歧视性的实践“在回教之下”保护了女性和非回教徒的权益。然而不止一次，对芝麻小事采取道德管制的个例成为从公众议论的话柄。

从选举政治的惯例看来，谁都可以争辩说回教党的行动并没有误入歧途：一个政党当权时，尤其是刚刚中选获得权位时，它就实行它的政策。但是，政治行为显示回教党的政策是分叉的。回教党在全国的层面上作为反对党，和它的替阵伙伴一起维护公民自由、人权、民主和法治。回教党的领袖、党员和支持者在对抗不公正的法律、不公平的判决、不得民心的政策和不能接受的骚扰的示威中，投身最前线。回教党漠视马哈迪建议的“马来人团结”的会谈，抗议使用严峻的法律如内部安全法令，抗拒警察骚扰，以及在白沙罗华小争论中支持“华社”。这就是说，回教党维持了一个拒绝种族政治的政治自由主义路线，和国家人权运动站在一起，和展示了对“少数人的权益”的一种新谅解。作为州层面的政府，回教党自行实施社会保守主义措施，而侵犯了个人自由，以及闯入了私人生活和个人抉择的范围。回教党的道德管制使害怕“回教国”的非回教徒感到不安，同样害怕和不安的还有“自由心态”的回教徒，和那些不愿社会地位和自由被不宽容的态度所钳制的女性。此外，回教党的丁加奴州政府动议通过回教法庭刑事（*Hudud* 与 *Qisas*）法案，³⁴ 也使丁加奴州政府更趋近“建基于可兰经和圣训（*Sunnah*）的施政”。就这样哈迪·阿旺复制了吉兰丹州政府的1993年的回教法庭刑事法典（11）法令，而回教党则试图“在两个州建设回教”。

回教党的分叉政策应如何解读呢？一个方法是聚焦于回教党在两个不同环境之下应付政治现实和权力算计所采取的策略。在全国性的环境里，回教党自身不是国阵的对手。回教党扩展影响力的希望要依赖它继续带领替阵鼓吹广泛课题的能力——由“烈火莫熄”激发的有关公民自由、宪法、法治、世俗法的课题。在州的环境里，

被挫败的巫统不是回教党的对手。回教党的政府能够实行它的计划，尽管受到联邦政府的反对。在这里，回教党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稳定和长久的行政根基，以支持“回教党式的回教”所憧憬的社会生活方式，来和马哈迪的“宏愿回教”³⁵相对照。另一个解读回教党的分叉政策的方法是，把回教党在吉兰丹和丁加奴的支持者所表现的“政治意识”，和这两个州以外的支持者所表现的“政治意识”区分开来。对主要是回教徒的吉兰丹和丁加奴人民来说，回教长久以来主导了巫统和回教党对抗的言论，而回教党受到支持者尊崇是因为它“高举和维护回教的每一方面并因身为宗教政党而骄傲”。³⁶因此，更多的人认同于回教党的意图“促进回教和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生活的整合，以创造一个替代的回教文明”。³⁷在吉兰丹和丁加奴之外，回教党至今还不能够理所当然地认为它的回教教义式的抗衡是马来人反对派的所有阶层都推崇的。回教复兴的确感染了城市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产阶级或专业的马来人，他们

“要把马来西亚回教国化的热心是对全球化的反应，这促使他们和回教党中较年长的和较传统的回教士直接联合起来。他们带来的新血以及新技术和科技鼓舞了后者……回教党现在融合了热心宗教的年轻专业人士，他们熟悉世界时事以及所有领域的新科技，包括……资讯工艺”。³⁸



然而，这个社会阶层也有众多的同辈亲巫统者或“自由回教徒”，他们视回教党的政策为诅咒。如果这第二组的年轻马来人之中有人背离了他们惯于亲巫统的投选模式，他们的行动是由“烈火莫熄”的文化反叛促成的，而不是因为拥护回教党式的回教。不管回教党的口号——“从前巫统，现在回教党”——如何动听，只要巫统解决了它的主要难题，这些“从前”巫统的选民就会背弃回教党，就像曾经发生在四六精神党身上一样。

最后，我们可以把回教党的政策分叉当作是它考虑到“非马来人因素”的策略。在吉兰丹和丁加奴以内，非马来人人口稀少以致在选举中无关紧要，而种族之间的政治分歧绝无仅有。以巫统的过去政策，或以回教党对“前回教的”马来文化习俗的敌意（特别是在吉兰丹）来判断，回教党政府遵守了它宣称的不歧视非回教徒的宗教和文化习俗的立场。甚至在它的道德管制里，回教党对非回教徒不遵守某些回教禁令也给予通融。³⁹非回教徒因素在全国性层面就意义重大。在80年代，当非马来人的异议达到顶峰，和在1998-99年，回教党都不能减轻非马来人对它的“终极”目标的疑虑。这种疑虑的结果就是非马来人对任何“回教国”的提议都誓不两立，实际上成为回教党要扩展到种族混合选区的主要障碍。这种非马来人情结的例外主要是社会活跃分子和来自行动党、人民党、公正党和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断断续续地和回教党在鼓吹公民自由和人权上合作，直到替阵的成立把他们的合作建构化。这一类型的非马来人本来就很少，而他们和回教党共事的意愿，总是以共同献身致力于世俗的宪制政府为前提。

对于回教党挑战马哈迪主义的霸权，有敏锐理解的约翰·希里(John Hilley)察觉到，回教党在1998-99年时机的策略性收获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新‘道德政治’的播种，这种新‘道德政治’融合了回教党的[回教]原则和关于公正、透明度以及良好施政的更广泛的世俗关怀”。⁴⁰对这种“新道德政治”的普遍认可帮助回教党取得了“全国性民心基础的大扩展”。但是这种“道德政治”的主要作用

是“为[回教党的]计划的论据和理念,设置可以展示关联性的空间”。因此,回教党要领导一个新“反对阵线”的实际目标——“一个包含更宽广的种族支持和知识源流的原型计划”——“仍然需要寻找方向”,建基于“和其他政党以及更广泛的‘烈火莫熄’的有意义配合”。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在辉煌的选举成果之下,回教党即使不改造,也必须调整自己来拓展它的号召力和真实地成长。回教党可能争论说,人们之所以反对回教刑事法典和其他取代民事法律的“神圣法律”,肇因于不了解回教的非回教徒的无端恐惧,或是来自没有完全奉行回教的回教徒。但是,在政治上,就像拉惹·贝特拉·卡马鲁丁(Raja Petra Kamarudin)率直地说的那样:“回教党必须决定它的政治纲领是什么:是把国家回教国化还是要组织下一个联邦政府。它不可能两样都要……”。⁴¹从这个观点看来,回教党的政策分叉既没有提供崭新的方向,也缺乏“有意义的配合”。只要回教党坚持它的“回教国”计划,它就无法看清楚它在1999年选举中的暂时性功绩,是由于马来人因安华受迫害而反叛所造成的,而不是因为有一个浩大声势要建立神权国家。

在愿景和事功之间的公正党

在所有反对党之中,人民公正党是惟一脱胎自“烈火莫熄”的。虽然它有一个微不足道的体制性前身,即“社会公正运动”,公正党并不只是因为公众对安华的痛苦的持久反应而诞生,同时也是因为安华的亲信和他们的支持者要在选举斗争中对抗国阵的紧急需要。公正党成立还不到八个月,1999年的选举就举行了,它赢得五个国会议席。以“烈火莫熄”的期望来说,这不是令人鼓舞的表现,尤其是它最有声望的几位领袖——詹德拉、蔡添强和再诺查卡利亚——都败下阵来。但这稀少的议席蒙蔽了公正党11.5%的得票率,它的得票率几乎和行动党的一样多,而且可以作为衡量马来人反巫统情绪有多强烈的可靠指标。给予时间和有利的环境,公正党的领导层可能会有办法把“安华的政党”巩固成为“烈火莫熄”永不止息的主

要政党。然而,几个因素使公正党活在痛苦中,而得把挣扎求存而不是扩展进取作为它最大的前提。

严重束缚公正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政府对公正党领导层的镇压。虽然政府不能冒险对旺·阿兹莎本人采取高压行动,其他的党领袖——包括阿兹敏·阿里(Azmin Ali)、N.哥巴拉克利斯南(N. Gobalakrishan)、洛曼·阿当(Lokman Adam)、玛丽娜·尤索夫(Marina Yusof)、默哈末·依占(Mohamad Ezam)和蔡添强——则受到警察的骚扰、逮捕,以及提控上法庭,罪名包括“非法集会”、“煽动”和违反官方机密法令。尽管公正党的领袖持续地遭受政府苛待,他们仍然不遗余力地实行“烈火莫熄”的抗议和示威的街头策略,这些抗议和示威大多发生在大吉隆坡区域。部分原因是安华在2000年的第二项审讯中被定罪和判监再多九年时,公正党不得不为“安华课题”保温。另一原因是公正党没有地盘,不像回教党在吉兰丹和丁加奴,和较小规模地在吉打,可以继续每晚举办专题演讲,通常不理睬警方的警告或抗拒警察的干扰。当政治混乱持续到2000年,公正党的领袖惯常地在内部安全法令之下面对不经审讯即拘留的威胁。

公正党也面对其他的内在难题。这些难题可以追溯到公正党的成立这件事。公正党在1999年4月4日正式运作,距离“黑色14日”只有十天,党的领导层是由三方面的主要人物仓促组成。一方面是旺·阿兹莎和其他跟安华有密切私人交往的人,例如在90年代和安华恢复从前“公民社会联系”的詹德拉。第二方面包括那些没有背弃安华的巫统旧伙伴。其中显著的是阿兹敏、依占、罗士兰·卡欣(Ruslan Kasim)和赛夫丁·那苏迪翁(Saifudin Nasution)。第三方面是在不同背景下成为“安华战士”(Anwaristas)的非政府组织活跃分子和其他公众人物:他们包括安华第一次审讯的律师团成员再诺·查卡利亚,“马来西亚人民之声”的人权活跃分子蔡添强,马来西亚回教青年运动(ABIM)的领袖之一安奴·亚努达希(Mohd Anuar Tahir),从前在巫统内的异议派旧人士玛丽娜·尤索夫。除了那些前巫统的政治人物,公正党的领袖都是有名望的人物,惟没有直接政治经验;这

包括凭自己的才能成为“烈火莫熄”象征的旺阿兹莎。此外，公正党内差异颇大的人物组合呈现了一个理念上不一致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在1999年的烦扰境况里，紧迫地需要时间和机会来解决那些因“不同议程”要求优先处理，而必然导致的难题。

公正党的党员也不是有系统地招来的。公正党的领导层落力推出一个多元种族的前线和意在吸引多元种族党员的涵盖性宣言。当公正党作为一个政党正式运作时，拉惹·贝特拉·卡马鲁丁乐观地写到公正党吸引了：

“非常强大的支持，这些支持来自知识分子、学术精英、专业人士、雅癖士、艺术界、执行员等等——这群人从前是不关心政治甚至不屑登记为选民或在大选时出来投票”。⁴²

况且，公正党的支持者，“是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为替阵提供了一个“缺失的环扣”，因为其他的成员党“只为某个部分的人民服务”。⁴³一年后，拉惹·贝特拉·卡马鲁丁察觉到善意和现实局限之间的缺口而不能抑制他的失望：

“国民公正党在远大抱负中诞生刚过一年……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政党。但是，当他们更仔细察看的时候，公正党愈来愈像一个马来人/回教徒政党。非马来人和非回教徒在哪里呢？他们看到的只是稀少的非马来人/非回教徒，这些人无法正当地宣称代表其他种族和其他宗教”。⁴⁴

一些年轻的非马来人响应“烈火莫熄”，在寻求一个多元种族政党的时候，他们选择加入公正党，而不是行动党。但非马来人加入公正党的人数并没有多到足以赋予它一个真正的多元种族性质。因此，公正党的党员是年轻、有干劲和自告奋勇的，但一面倒地以马来人为主。再一次，除了那些从巫统跳槽过来的，公正党的党员大多不习惯于政党政治。大多数党员在加入公正党之前，如果曾经附属任何组织，也是回教性质的非政府组织，如ABIM和马来西亚改革理事会（JIM）。



宣扬公正？

也许“烈火莫熄”在1998-99年的最响亮的口号：“还安华以公道！”和“马哈迪下台！”，凝聚了公正党的各种异质党员的政治理念。的确，公正党领导层实际上没有时间拟定一个清晰的或前后一致的政党纲领，除了给“烈火莫熄”的目标一个道德上的诠释，就像安华的峇东埔宣言表明的那样。在替阵拟定它的《联合宣言》和《人民的预算案》之前，公正党自己在纲领上的指向是矛盾的，它似乎无法避免被拉向两个不同的（虽然不一定是冲突的）方向。“还安华以公道”无疑是公正党最强有力的号召，连反对阵线、它的非政府组织盟友和它们的支持者都承认，没有安华就没有“烈火莫熄”。然而，他们和其他人也了解，“烈火莫熄”作为更进一步的社会变更和政治改革，只有在它“超越安华”时才能有实际的进展。

由于领导层、党员和方向是公正党主要但矛盾的力量，他们也带来组织上的压力和理念上的分歧，尤其是当公正党必须在替阵内协商它的位置和准备参加选举。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历史中，一些反对党能够“在最后一分钟”建立可行的组织结构和有效的竞选机制，因为它们吸收了大群的变节阵营甚至整个有经验的政党。例如，1990年的四六精神党的核心是1987年以来巫统的B队。当沙巴团结党（PBS）在1984年出现，它是由执政的沙巴人民党（Parti Berjaya）的大分裂的一方组成的。在1969年，民政党的成立有赖于民主联合

党、劳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的余勇和活跃于政治的工运分子。公正党完全没有这些优势。传言中在巫统内的大群“安华人马”并没有预期中的那样大量地变节。也许很多变节者,像安华在ABIM和巫统内的亲密盟友卡马鲁丁·惹化(Kamarudin Jaafar)那样,选择加入回教党而不是公正党。也许除了ABIM的领袖,那些加入公正党领导层的非政府组织活跃分子并没有众多的成员可以被吸收为公正党的新血。虽然在政治上数目并非一切,公正党很快就发现到党的结构和网络不是单靠精神就可以快速建立的。

吊诡的是,安华被监禁是公正党最大的利器也是它的致命伤。安华的命运所引起的公愤——主要是马来人的情绪——支撑了公正党;这种公愤肯定不会随着他在第二项审讯结束后被判监多九年而缓解。为了对安华的家庭表示同情,“烈火莫熄”的支持者对旺·阿兹莎毕恭毕敬而替阵也很尊敬她。然而安华的入狱,却使公正党的主要资源——它年轻而勇敢的党员——缺乏具有策略和经验的领导。其他的公正党领袖则干劲十足地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来动员支持者举行示威和抗议。如果安华是自由身,他可能会把领导层和党员的优点焊接为一个强大的党结构和组织。以他个人的才干、在ABIM和巫统的广泛经验,和公众对他的困境的巨大同情,他有可能把公正党的领导层和党员中迥异的成分、不同的议程、甚至是分歧的效忠对象,团结为一体。但安华却在监狱里,实际上被置于无法闻问的境地,而只准许出现在法庭——甚至不在那里,当他的第二项审讯在选举前被展延。安华的作用是作为号召中心,对公正党来说是当然的,而替阵也以他作为这个联合阵线的领袖,要是替阵在选举中胜出的话。在这种境况之外,公正党的领袖必须以试验性方式彼此合作,几乎就像GERAK和替阵在1998-99年的环境中必须为分歧的反对方式寻求合作的方案。

直到1999年末,“烈火莫熄”的支持者一大群一大群地抗议、示威和游行的精神以及试图建立“替代性阵线”的努力可能掩盖了公正党在组织上的压力。然而,大选过后,某些争议爆发了,这显示公

正党要自我巩固成为具有远景的政党的努力中,碰到难题。第一个受到公众注目的争议是署理主席詹德拉和副主席之一的玛丽娜尤索夫之间的不和。这个不和酝酿自2000年1月但在6月恶化成公开对抗。然后,玛丽娜和詹德拉轮流通过《今日大马》(Malaysiakini)互相指控对方有不良动机和可疑行为,但不是在玛丽娜以“健康和事业”为理由辞去副主席的职位和离开公正党之前。⁴⁵ 接下来的争议是关于替阵要参加订期2000年6月举行的直落甘望(Teluk Kemang)补选的候选人提名。表面上看来行动党有优先提名的权利,因为在这之前行动党曾参加直落甘望选区的竞选。但有谣言说公正党坚持要竞选这个议席而詹德拉已经就此事向替阵发出“最后通牒”。不管怎样,詹德拉否认曾经发出最后通牒但公正党在行动党的抗议下被允许参加这个议席的选举。公正党的罗士兰·卡欣在直落甘望输了,虽然他把国阵在1999年的多数票削减了40%。

最奇怪的一个争议是完全以没有前例的方式形成的。在直落甘望补选之前,“烈火莫熄”的五个受欢迎的网站突然被网站主人关掉几天。这种“另类资讯罢工”原来是网站主人要为“烈火莫熄”的将来举行“反省运动”的方法。虽然网站的许多常客为了网站的关闭和背后的原因而苦恼,有人认为那是网站主人要惩罚詹德拉和公正党的总秘书安奴·亚达希,因为他们“没有遵循安华的指示”。没有任何网站主人出来澄清“安华的指示”到底是什么。但据说詹德拉和安奴·亚达希反对一个合并公正党和人民党的建议。基本上这个合并的建议是希望结合公正党的较广大的接触面和人民党的稳固和一致的领导层,这个意见在各自党内都得到很好但不是决定性的支持。

也许可以说公正党的存在有赖于衍生自“烈火莫熄”的理想主义,这些理想包括推动政治改革、推动一个能够脱离难受的过去的远景,和赋予民主、改革和社会公正以新的意义来反对专制领导和政治操纵。以无情政治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看来只是“无形的东西”,但它们包含了(商业)“信誉”的政治类同,对一个新政党如公正党是有决定性影响的。但创造性地展开政治信誉需要有权威的领导层、

有效率的组织和一致的策略。对公正党来说，在一个大体上仍然是试验性的结盟框架内照应这些义务更加困难。

不管它们的特定细节是什么，詹德拉-玛丽娜的分裂，行动党在席位分配上的嫌隙以及网站主人的干涉，说明了公正党从未满意地克服严峻的组织弱点。如果“安华的指示”真的在这些争议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公正党的结构性压力就比想像中的更深重。虽说安华对公正党是不可取代的，安华在牢狱里能够管理一个政党仍然是古怪的念头，尤其是他还能够——不管是书面的或以其他方式——传达指示，制定策略、手法，或为议程设计和解决问题指示可行的细节，甚至同其他政党协商。

整个2000-2001年期间，“烈火莫熄”在替阵的护卫之下持续地抗议、示威和游行，通常由最无畏的公正党领袖带头。这些抗议的表达显示了坚定的意愿和决心，这种决心在马来西亚历史上至少有整一代没有出现过了。那么，公正党的难题仍然淹没在这些广受欢迎的异议浪潮里。但是，在没有强大组织和清晰方向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政党可以抗拒它的领导层最终身首异处——这就是公正党在它能够自我巩固之前要面临的下场。

结盟建构的文化驱策

有三个日期和它们个别的重要性值得我们回顾。1995年4月标示了新经济政策的政治时代的结束，以及在意识形态上从较早的种族之间的苦涩斗争的模式转移开去。1997年7月划下了马哈迪式资本主义合理化政策的句点，当马来西亚大企业选择使用它的“经济护盾”而不是改革自己，来走出东亚危机。1998年9月，当安华事件使巫统的帮派斗争倾泻到政治体系里，巫统也就丧失了作为霸权式稳定局面的源头这个特权地位。这三个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过渡框设了一个时局，在这时局中马哈迪式的政治基础被侵蚀了。结果，当下的政治课题可能以出乎意料之外的方式被提出来，有一些课题并不是由政党拟定的，而是由公民社会的异议人士抛出

来的。这个历史性时机等待的只是媒介，或人的介入，来塑造一个政治格局的全新重组。这个媒介的进程是以“烈火莫熄”尚未终止的抗议开始，经过GERAK的试验性联系网络而最后达致替阵的“彩虹联盟”。

“烈火莫熄”-GERAK-替阵的过程并非势不可免。在1998年9月2日前，甚至几个月以后，没有人可以预测这样一个快速且几乎是精心策划的运动；它从即时爆发的异议经过试验性的合作然后达致有组织的抗衡。它也没有什么坚不可摧的东西。总是有一些事件可能导致这个过程的流产。这些事件包括机率微小的马哈迪自动退出政治，以及较可能发生的回教党和行动党协商失败。但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进展，它之所以会发生，部分原因是“一直以来……都有事件和意外，都有暗示和指控”⁴⁶在催化它。因此可以说，过程和进展涵盖了安华下台所暴露的马来西亚社会的紧张和矛盾，这些紧张和矛盾在“烈火莫熄”中显现，通过替阵缓解以及被1999年11月的选举暂时抑制了。的确，如果支持对抗的回教党、行动党、公正党、人民党和非政府组织没有及时成立替阵以参加1999年11月的选举，马来西亚政治也会在三个基本因素之下创立一个不同形式的“第二阵线”。

第一个因素是实际性的。没有一个反对党有能力独自挑战巫统，更不用说有十四个成员的国阵。在1986年的选举中，行动党取



朝向一个替代性结盟

得辉煌成绩而回教党却被巫统挫败。四年后行动党、团结党和回教党实现了反对党的希望，但四六精神党却没有成果。由于反对党的表现不一致，如果它们不想“自生自灭”的话，连根基稳固的政党如回教党和行动党也必须“同舟共济”。因此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一个随时准备和巫统异议分子结盟的假定第二阵线，就自然而然地现身了。巫统的纷扰状况也有先兆，马哈迪两次不得不让那些想要建立第二阵线的人正中下怀，他在十年内逼走巫统的两个关键人物：1988年是拉沙里，1998年是安华。

第二个因素和1999年的政治绝境有关。国阵多年来对立法机关的支配和行政上的扩充弱化了主要的公共机构，使到政治格局看起来处于一党专政之下。因此，虽然就像伊占所强调的，“任何强大到足以抗衡国阵的阵线必须有广泛的根基”，⁴⁷但替阵并不像贬低它的人所说那样，必须保持政治理念的混合形态才能生存。只要替阵的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四党联合阵线造就惟一实际机会，去建构一个防止宪政进一步腐蚀的堡垒，那就够了。或许，回顾一下沙比里·再因(Sabri Zain)勤勉地就他自己在阵线里的体验所写下的难忘记载：

“我们四人摆好姿势合照，而当闪光眩目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里有四个人，来自不同的政党——公正党、人民党、行动党和回教党。我们手臂相交，完全不把我们的政治上或理念上的分歧放在心上，只要团结起来庆贺另一股正义力量的诞生，和为了要改变我们的国家的共同愿望而在一起”。⁴⁸

第三个因素可以被称为结盟建构的文化驱策。在紧迫的政治演变中，党派人士和观察家很容易忽略了当代事件与记忆模糊的历史的汇合。“烈火莫熄”成长为GERAK是因为公民社会发现近来的不公正(对安华的虐待、对冠英的监禁以及对“烈火莫熄”的示威者的暴行)和80年代被淡忘了的反抗(对那个时期关于金融丑闻和政治危机的异议)有联系。同理，GERAK转化为替阵，也把当前的演

变和马来西亚政治的结盟建构的深刻历史连接起来。

一个完整的马来西亚政治结盟的历史必须思考下列事件：人民力量中心—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Putera-AMCJA)，以及殖民统治的最后十年期间的联盟(Alliance)；独立后不久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Socialist Front,简称“社阵”)；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之前的马来西亚团结机构(Malaysian Solidarity Convention)；新经济政策最初几年的国阵；以及在1987—88年巫统分裂后的人阵和回教联合阵线(Angkatan Perpaduan Ummah,简称“回阵”)。即使没有进行任何仔细评估，这个结盟建构的记录也显然是参差不齐的，一些个案相对来说失败了(Putera-AMCJA,马来西亚团结机构,人阵和回阵)而其他一些则比较成功(联盟、社阵及国阵)。

对照从前这些结盟的历史纪录，要给替阵对政治体系的冲击下定论还嫌太早。暂时我们可以说：直到2001年中期，替阵仍然是“烈火莫熄”持续发酵的完整管道，以反抗镇压并且抗拒巫统企图把政治异议转移到种族之间的纷争。虽然替阵无法为政治体系带来重大的改革，它迫使政府在2000年设立了国家人权委员会(Suhakam)，即使只是一个拼凑而成的委员会。这可不是平庸的功绩，而在某个时候，替阵看来能够巩固自己成为另一个阵线，凭借深化中的马来人的异议，奋力营造一个更多元化的政治。

例如，在2000年10月28日，来自替阵成员党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两千多人在甘文丁拘留中心外示威，以纪念1987年10月27日的大逮捕的第十四周年，和抗议“长达四十年的内部安全法令”。这是近时以来最大的反内安法令示威，并且是第一次反内安法令的马来人抗议者人数远超非马来人抗议者。在这之后，11月5日在莎亚南大道的大集会就来了。公正党号召“十万人”在莎亚南集会，以保卫公民自由与和平集会的权利。警方不出所料地拒绝发出集会的准证，并且逮捕了一些受嫌疑的组织者。但是仍然有一群又一群上千的人民——根据一些华文报婉转的报道，大部分是马来人而且“多到算不清”——参加了这个集会。事后，警方把游行转移到莎亚南

大道，在那里以水炮、催泪弹、喷气棒、逮捕和殴打来对付抗议者。事后，巫统的政治人物，向来常说华裔马来西亚人可以“回去中国”和印裔马来西亚人可以“回去印度”，而马来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现在却对“替阵和释放安华运动的马来人”说，“如果他们不喜欢马来西亚，他们应该离开！”这样的论说反映了巫统的绝望。若是在替阵成立之前，这种论调就像一个不是由巫统领导的政府的概念那样不可想像。

然后，在11月29日，吉打州的鲁乃选区(Lunas)举行补选(因为国阵的原任代议士，国大党的祖·费南德兹[Joe Fernandez]被谋杀了，至今还未破案)。在举行补选的时候，国阵已经赢取鲁乃选区四十年，而这时在吉打州议会刚好拥有三分之二多数议席。替阵选择赛夫丁·那苏迪翁——他在1996年带领巫统青年团硬闯在吉隆坡举行的亚洲太平洋会议的第二次东帝汶论坛——作为公正党的候选人引起严重的替阵内部争议。预期推出候选人的行动党几乎杯葛替阵的竞选运动。鲁乃补选挑起怨气冲天的课题如“马来人特权”和华文教育的地位，如果这项补选是在80年代举行，这些课题会使亲政府的“马来人选票”和亲反对党的“华人选票”直截了当地互相对抗。令人惊奇的是，混杂了各种族的选民反叛国阵，以微差把鲁乃选区交给替阵。这是反对党在1999年11月之后那年获胜的惟一补选。

这意料之外的胜利让反对党欣喜若狂。然而鲁乃的成就划下了替阵进展的高峰。在2001年4月，为纪念安华第一次被定罪的“黑色14日”的庞大抗议计划被瓦解了，政府运用内安法令逮捕了七名公正党领袖——他们是阿都干尼·哈仑(Abdul Ghani Harun)、巴德鲁·阿敏·巴哈仑(Badrul Amin Bahron)、N.哥巴拉克利斯南、洛曼·阿当(Lokman Adam)、默哈末·依占、沙阿里·孙吉(Saari Sungib)和蔡添强——以及三名活跃分子：希山姆丁(Hishamuddin Rais, 70年代的学生领袖，新闻工作者和电影导演)、拉惹·贝特拉(释放安华运动的推动者)和巴达鲁丁·伊斯迈(Badaruddin Ismail, 来自“马来西亚人民之声”[SUARAM])。像1987年10月27日那样的

大逮捕的威胁浮现了。一个所谓“马来西亚战斗团”(Kumpulan Militan Malaysia, KMM)的嫌疑成员也在内安法令之下被逮捕了，马来西亚战斗团被指控为回教极端分子要以暴力推翻政府的地下组织。针对它最新一轮不经审讯即逮捕反对派所引起的本土和国际抗议，乃至法律诉讼，政府都不予理会。

应付这一镇压浪潮的压力使替阵内的矛盾尖锐化了。公正党最有决心和能力的组织者被监禁已经使该党瘫痪，其余的公正党领袖只能以无效率的抗议回应。“马来西亚战斗团的嫌疑分子”(包括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的儿子)被拘留使回教党更易于被指控具有回教黷武意识。这不只是对人们批评政府使用内安法令的一种视线转移的策略，它也许会使回教党更不可能软化它的回教计划，尤其是在丁加奴。接着，行动党“重新考虑”它在替阵的去留，基于回教党对“回教国”的承诺违反了替阵的《联合宣言》而不能缓和回教徒的恐惧。然后9·11到来了。它的全球性反响重大地重新界定马来西亚政治。一反过去必须为使用内安法令辩护的处境，马哈迪政府现在赞美这个法令被证明是国家安全的有效工具。马哈迪从过去因为对安华的审讯而受到克林顿政府的(象征性)斥责，现也转变为由于“反恐战争的合作”而“赢得布什总统的称赞”。2001年10月美国领导侵略阿富汗，使到回教党无法不表明支持塔立班(Taliban)政权的立场，这就让回教党的对手乘机把回教党“塔立班化”。既然行动党和回教党已经没有实际的机会恢复任何正式的合作，替阵就不存在了，尽管回教党、公正党和人民党宣称它仍然存在。

在将来的一段时刻，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启示——在某个历史性阶段被视为种族劳力分工合作，在另一个阶段被视为社会重塑，而第三个阶段是回教复兴——将继续造成政党间的任何结盟，得面对理念分歧、政治代表性和权力分配的真实问题。即使如此，而尽管曾经有过种族间的冲突，结盟建构的经验可能已经把马来西亚社会从种族分裂对抗的阴影中拯救出来。结盟建构的经验是由集体直觉激发的，这种直觉感受到在多元社会里多样化何止是一种美德；

结盟建构必须走得更远,并且认识到多样化是创造社会和政治实验的要素。

- 1 对于有关成绩的分析,可参阅 Ng (2003)。
- 2 同上。
- 3 Khoo (1995: 238)。
- 4 Kua (1996: 39)。
- 5 同上。
- 6 引自‘Fighting for a Cause’, *Aliran Monthly*, Vol. 18, No. 10 (November 1998): 6。
- 7 一个典型的“咖啡店”版本认为“安华受到马哈迪迫害,但支持安华的人是傻瓜”。
- 8 Loh (2001: 201)。
- 9 Lim (2003: 158)。
- 10 Kua (1996: 28)。
- 11 Lim (2003: 158)。
- 12 同上, p. 167。
- 13 同上。
- 14 同上。
- 15 同上, pp. 167–68。
- 16 同上, p. 168。
- 17 同上, p. 167。
- 18 同上, p. 162。
- 19 Hilley (2001: 194)。
- 20 Halim (2000: 3)。
- 21 同上。
- 22 Singh (1999: 34)。
- 23 要检阅选举前国际性和区域性媒体对马哈迪的审慎支持,见 Khoo (1999b)。
- 24 翻译自 PAS, *Manifesto Pilihanraya Umum 1999 Negeri Trengganu Darul Iman* (<http://www.parti-pas.org/Trengganu/manifesto99.htm>), Subsections 7.2 and 7.3 respectively。
- 25 同上, Section 13。
- 26 ‘Wang Ehsan: Tindakan Kerajaan Pusat yang haram—MB Trengganu’, *harakahdaily.net*, 2002–7–2。
- 27 ‘Oil royalty: Petronas acted (sic) double standards’, *harakahdaily.net*, 2002–10–2。
- 28 ‘Prove you can run Trengganu, DPM tells PAS’, *The Star*, 2002–17–12。
- 29 翻译自 PAS, *Manifesto Pilihanraya Umum 1999 Negeri Trengganu Darul Iman* (<http://www.parti-pas.org/Trengganu/manifesto99.htm>),

- Subsection 1.3。
- 30 Halim (2000: 5)。
- 31 翻译自 PAS, *Manifesto Pilihanraya Umum 1999 Negeri Trengganu Darul Iman* (<http://www.parti-pas.org/Trengganu/manifesto99.htm>), Subsection 1.8。
- 32 同上, Subsections 1.6 and 1.7。
- 33 同上, ‘Foreword’。
- 34 关于回教刑罚的主要法律纠结要点,见〈回教刑罚法令的问题和答覆〉。‘Q and A on the Hudud and Qisas Enactment’, *Aliran Monthly*, vol.22, No.6, 2002, pp25–29。丁加奴的法令在2002年7月通过。
- 35 “回教党式的回教”和“宏愿回教”用语取自 Hilley (2001)。
- 36 Halim (2000: 5)。
- 37 同上, p. 4。
- 38 同上, p. 6。
- 39 芬士顿 (Funston, 2000: 38)观察到:“正式的替阵文告重申对回教在宪法保障下作为国教的承诺,以及推动回教作为一种生活方式(*ad-deen*),并和全民信仰自由共存。它们没有提到回教国,而其实聂阿兹指出这甚至也不在回教党的党章里——它在多年前被删除,取代它的是对建立回教社会的承诺。在吉兰丹和丁加奴的个别回教党宣言承诺禁止赌博和限制酒精的售卖,但党发言人长篇大论地声明,非回教徒在回教党执政的吉兰丹并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信仰自由得到保证,而非回教徒甚至被允许继续一些像养猪之类的行业。然而,回教是替阵成员党意见分歧最明显的课题,行动党领袖公开地表明他们与回教党的一些文告毫无关系,这些文告支持回教刑罚和对叛教者处以死刑。”
- 40 Hilley (2001: 222)。
- 41 Petra (2000: 225)。
- 42 同上, p. 159。
- 43 同上, pp. 159–60。
- 44 同上, p. 223。
- 45 表面看来其他公正党领袖试图超然于这事件之外。旺·阿兹莎把它描述为“个人事件”,而公正党的常年大会毫无争议地选出一个新的副主席——再诺·查卡利亚。据说副主席蔡添强说过一些阵营想要破坏玛丽娜的地位,但后来只是说公正党的最高理事会还没有对这课题采取任何立场。
- 46 Paul Simon (1986), ‘You can call me Al’, *Graceland*, Warner Bros. Records。
- 47 依占的意见是刚好在公正党成立之前发表的。见 ‘New and Moderate’, *Asiaweek*, 1999–2–4, p. 29。
- 48 Sabri (2000: 110)。

第七章

马来人困境的重临

只是，现在我反转我的观点。我不再相信我在《马来人的困境》一书里所写的……马来人并不比别人差……实则，现在我们已成为许多其他种族的模范。他们还来这里看我们如何改善我们的境况与发展我们的国家。

——马哈迪：引自《商业时报》(Business Times)的报道，
〈首相：我反转我的观点〉，1997年5月12日

那么，什么是新的马来人的困境？他们的旧困境是，应否为了帮助自己而略为歪曲实况。新的困境则是，他们应否把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是引以为荣的拐杖丢掉。

——马哈迪：在马来西亚哈佛俱乐部晚宴中的发言，吉隆坡，2002年7月29日

在2002年6月22日的巫统大会中，马哈迪在将要结束其现场转播的演说时，突然宣布他要辞掉巫统主席及他在国阵里的所有职位。在场的代表简直无法相信这个突如其来的宣布，因为马哈迪此举毫无预兆，也没迹象显示马哈迪曾与党内、国阵或政府要员商榷过此事。一些巫统领袖，尤其是拉菲达·阿兹(Rafidah Aziz)与希萨慕汀(Hishamuddin Hussein)等冲到演讲台去打断满脸泪水的马哈迪，引



马哈迪下台：这不是演戏

起一阵骚动，然后党要们把马哈迪带领到会议室密谈，据说也恳求马哈迪打消辞意。尽管马哈迪是依据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发言，有关他的引退与政治继承的详情皆没有公布，反而是阿都拉从闭门会议中走出来，且重新向大会全体保证马哈迪不会辞职，而马哈迪本人则不再在大会中现身。之后他静悄悄地照预定计划去欧洲渡假。

三天后，巫统秘书长卡立·耶谷(Khalil Yaakob)在新闻发表会里揭示，马哈迪与党领袖之间已达致了妥协性安排，即马哈迪将在位至2003年10月，而阿都拉·巴达威将继承其位。易言之，在几个月后(可也长达16个月)，延续了22年的马哈迪时代将接近尾声。

它真会实现吗？我们把马哈迪的辞职宣言的大部分闹剧性过程和其他微妙的特点交给未来的史学家去梳理。此处须要说的是，首先，就马哈迪的性格来说，他不是那种会预先安排退休时间表的人，更遑论他会接受强加于他的安排，这也是许多观察家对妥协性引退时间表的看法。实则，在过去，他本人也曾直截了当地拒绝设定引退时刻，以免成为无实权的“跛腿鸭子”首相。其二，就大马的首相级继承史来说，从马哈迪过渡到阿都拉得费时16个月，确是不平常。惟一可比的领袖交替间隔期是1969年5月至1970年9月的过渡(很凑巧，也是16个月)。也就是5·13后东姑阿都拉曼成为名义上的国家首长，而实际的政治与行政权则已转移到敦拉萨所领导的“国家

行动理事会”(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这期间了。其三,虽然马哈迪早受到“烈火莫熄”及马来人对巫统的反叛压力,说1999年11月的大选将是他最后一次的参选;但是,这位比他前三位副手更耐久且在位二十年以上的首相,就这样放弃他战斗到底的一贯作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实则早在2000年,他已间接且毅然地拒绝由于巫统在大选中受到损失而得下台的提示。当时,他在巫统大会里说:“我尚未决定何时下台。通常,我会为此保密;因为,有人呼吁我再当三到四届的首相,也就是廿五年……”。¹在较后的巫统大会里,马哈迪还告诉记者:“如果你听听现时的辩论,将发现我似乎是获得不少的支持;因此,我可得寻觅适当的时机下台。”²其四,考虑及当时的情势,他宣布辞职的时机确也令人费解。当时的大马经济状况虽不及90年代中期那么坚挺,1997-98年后也有起色,进而使得他较易放弃控制。只是2001年9月11日的后果则较棘手。对世贸中心与五角大楼的攻击所引起的全球性冲击,虽有助于马哈迪对回教党以及其他的反对党反守为攻;但是,9·11后的国际情势也带来了各种不确定性与纷扰,为了得当地回应这些局面,马哈迪似乎有必要守住岗位。

根据上述及其他可能理由,很多人都在猜测,马哈迪在2002年大会里未完成的辞职宣言是不是他最新的戏剧性表演?

个人化霸权的极限

不论人们如何看待6月22日的闹剧,巫统对马哈迪意欲下台的明显震荡,费时的过渡计划,及看来像是又一场表演等迹象,都显示出马哈迪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积弱性格。人们时常听到或读到的报道,表示了难以置信的态度,或至少要求谨慎看待此事。毕竟,2003年10月还远得很,且马哈迪依然在位。很多人无法认真思考“没有马哈迪的马来西亚”——即便是在6月22日之后。³

这现象并不令人觉得惊奇,毕竟马哈迪已从政50年,而且掌权了21年;他安然渡过各种争端与危机的能力,已成为一种传奇。他

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是骇人的。极大多数的人——不论是在巫统党内,他的圈子外甚至是在国外——对马哈迪任期的无限延长都已习以为常,⁴除了用马哈迪本人的话来表述“因为某种原因使我突然死掉或变成残废”。⁵只要马哈迪尚在位,马哈迪式政治下的各种危机都似乎可视而无足轻重,甚至似乎是拉沙里(Razaleigh)的挑战未曾发生,巫统未曾分裂,安华安然无事,“烈火莫熄”仅存在于网络世界中。

这就是霸权(hegemony)。

马哈迪能够个人化这霸权,是因为他是位孜孜不倦的、彻底的意识形态家。他拟设愿景的能力,确是超群出众。他能凑合论辩、理念与政策,拟出一套富有威力,前后一致和具有两大持久性优点的“国家宏愿”。其一为,虽然也有另类的发展宏愿,但是,没有一个另类宏愿能在提示基本问题、表达与塑造人民的广泛期望,及寻找响应这些期望的政策形式上,可与马哈迪的宏愿争上下。此点,可从他借鉴《马来人的困境》一书制定新经济政策(NEP),以及直接表现出马哈迪最大抱负的2020宏愿宣言中得到见证。其二,这个宏愿具有足够的变通性,适应各类危机,及套句马哈迪的口头禅,足以“回应挑战”。比方说,当已宣布十年的2020宏愿目标看来已被普遍接受,但却因1997-98年的受挫而可能需要修正时,马哈迪就已提示:

“我们的目标已改变,而且变得很厉害。我们在1991年时构想的2020宏愿与今日所想像的2020宏愿已不相同。或许,在2020年尚未来临的20年内,它还会再起变化。所有阶层的大马人皆应意识到这个道理,以便处理好恒常改变的目标”。⁶

虽然马哈迪的文章、演讲与政策涉及广泛的主题,但是马哈迪意识形态的力量并非源自一个已完成的思想体系。实则,《马哈迪主义的悖论》(Paradoxes of Mahathirism,也译为《马哈迪主义的吊诡》)之所以采用“马哈迪主义”这字眼,便是要探索在马哈迪的领导与马来西亚大宝号这标题下,新兴多元族群统治阶级的富有张力且自我

完型的意识形态。

马哈迪这位意识形态家与首相所强力投射出来的世界观，尽管充满了一贯以来的矛盾，但是他却捕捉到近五十年以来马来西亚社会的核心挂虑，各类问题乃至潜能。马哈迪习惯地透过他基本上前后一致的透镜，来视察与处理快速变迁世界中兴起的问题。当他人，包括他的旧敌修改或放弃他们的观点来参与或支持他时，他没有忸怩作态，依然坚持他的马哈迪本色。虽然，某些人觉得，马哈迪看来常常随势调整其立场。就此而言，马哈迪式宏愿不得不令人信服，因为，马哈迪的思想似乎能自我更新。每当出现重大课题时，马哈迪都会毫不犹豫地描绘一个“大图景”来回应之。通常，这个“大图景”并不提供既定的意义。反之，如多媒体超级走廊(MSC)的“未来主义”或全球金融市场的“新帝国主义”等例所显示，马哈迪的“大图景”常予人一种富有雄辩论点、动态感觉或精神振奋的作用，以致马哈迪可以振振有词地强调他是务实的、灵活变通的，而非任何圣牛的崇拜者。

有时，“马哈迪主义”也松弛地被用来破译他那被视为独特的能力：诊断社会问题、比任何人都能预见即将来临的挑战、超前地对症开方。其实，我们也可从他的第一本和最重要的著作——《马来人的困境》一书的地位转变中一窥这公认的能力，即，它从一位充满郁怨的巫统弃儿的出格作品，升格为凯旋首相的杰出思想。(无疑，当上首相后，由于拥有行政权解禁此书，自也有助于促进这个转变而使它被接受)。同样道理，马哈迪善于施展其能力的本事，也可从1998年9月他实施资本管制后，国际态度从严拒转为勉强接受的转变中得到测定。诸如此类的事件，都显示出马哈迪是勇于行其所行，而不屑于各方的顽强反对。在1986年，尽管预料会在巫统内部引发分裂性冲击，他依然勇于“把NEP暂搁起来”；在1998年，他也悍然地采取有违国际金融市场正统经济理论的资本管制措施。有一次，在众多回教徒政治人物中，他是惟一公然反对立法惩罚回教叛教者的人。

即便即将脱离活跃的政治生涯，马哈迪依然不会停止指出应

“勇往直前之路”(这也是他的口头禅)，甚至是，若有必要，还挑起新的辩论与更多的异议。实则马哈迪对现行的语文、教育及NEP扶弱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全面检讨——其中，有许多是他本人帮助拟定和推行的，引发了不少争论。有些人认为，首相在即将离任的时候逆转这些政策，并不明智，甚至只会增加继承者的负担；但是，了解马哈迪者会理解，这就是马哈迪的本色。虽然马哈迪曾有言，一旦离任后，他不会再接受任何的政府角色，但是只要他尚在位，他就不会是只跛腿鸭子。阿都拉本人也已承诺，在马哈迪离任前，他将会是位忠诚的老二，而其他渴望坐上巫统高位的人，也无力反对。不管怎么说，尽管有时马哈迪的意见与立场会引起激辩，但是，由于长久以来，他已掌握了这么多实权，他的思想与政策通常都会占上风——至少在国内。

只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哈迪是位彻底的专横者。由于对自己的判断持有坚定的信念，马哈迪相信，各类的事件与历史已再次地证实了他的判断。虽然，他的发言有时予人一种不屑讨好民众或非自寻烦恼的印象，事情通常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他实在太清楚在群众政治(mass politics)里众望所归的价值。在论述“1999年的大选劣绩”时，马哈迪曾如斯地忠告巫统：

“我们不能脱离那些我们认为不支持或不赞同我们的人。我们需要理解，他们是否了解他们为何支持或不支持我们。若他们不了解，那么，我们便有责任去说明实际的情况。但愿他们得到说明后，会接受它们[原文如此]而不再反对我们”。⁷

终究，马哈迪希望能证明，他拥有领导能力，也很落力地去实践领袖所应具有超凡才能或真正标识(true sign)，也就是，“导航的能力……并且要比人们的自我导航更优越”。⁸无怪乎，除了个人的理由或策略性动机，以及尽管身处高位而日理万机，他依然不倦地大量写作与发言。因为，他需要把“不凡的创意和思想”传达开去。⁹

曾有人问过马哈迪：“真正的领导是否在于能体现你的人民的希

望、梦想与热望？”他回答：“啊，很多人认为他们体现了这些，我则不敢断定我的热望与他们一样”。从马哈迪对马来人及马来西亚人性格的无数求全责备中可知，他与人民的热望是不尽相同的。这个率直的回答不能说是自夸，而是一位精英拒绝哗众取宠的自负；因此存在于他和被领导者之间的鸿沟，必须以马哈迪主义的深刻的个人化霸权来处理。

只是，若我们认为马哈迪并没有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人民的热望，那就未免过于照单全收他的否定。他也有表达人民的热望，只是，其方式与众不同而已。马哈迪主义是由多种元素构成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回教、民粹主义与威权主义。正如我在《马哈迪主义的悖论》一书里尝试说明的，每个元素均有矛盾，而元素之间也互相抗衡。

只是，随着时间的进程，马哈迪主义里的这些共存的各类意识形态元素，竟能为马哈迪在国内(甚至是国外)带来广泛有效，与出奇地平衡的感召力。当然，有些马哈迪信徒会认为，马哈迪永远都是对的；但是，人们不一定得喜欢马哈迪的一切才支持他。

若有人不赞成马哈迪的民族主义，却也可从他对资本主义的投入中寻得慰藉；若有人认为他那尖锐的民族主义口头禅与全球化不对口，也可能转而称羨他对工艺的未来主义式的献身。有些人埋怨他栽培资本发展主义，然而无法否认这种发展背后的民族主义脉动。有者虽憎恨他的政治手段，如处理安华事件，却也可能敬重他那不屈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威吓，而英勇地采取资本管制措施。另有些人虽反对他的威权主义作风，却拥护他那宽大与温和的回教解读，以对应蒙昧或不宽容的回教释义。

马哈迪的政治本能是反民主的，且在受到压力时会采取威权主义的方式；但是，却也没有任何马来西亚的领袖曾像他那样，不厌其烦和自重地以规劝、激励、以身作则等来试图诱导、影响和改变人民。我们可以不断地观察到，半气愤马哈迪者，依然可在马哈迪身上找到足以支持他的东西。应该指出的是，马哈迪本人并无意以

这些方式来划分自己。可是马哈迪的意识形态的多种元素，以及他本人呈现的不同政治面目，合起来便构成了一种媒介，在某个可比喻为反向折射的过程中，把社会众多的期望和张力重组为强有力的“宏愿”。若这并非不恰当的写照，那么，马哈迪的个人化霸权也许就在于他那能使宏愿看起来像是出奇地完整的本领——虽然，他人会依照本身的偏好、梦想与恐惧局部理解马哈迪，进而接受马哈迪。

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意识形态感召力的特殊效应，并非源自马哈迪一人或其个人本事而已，释而言之，这种效应也源自被垄断的资源与被管制的大众传媒，因为它们只塑造马哈迪的“正面”形象。与此同时，由于马哈迪可行使几乎没有受到挑战的国家权力，自也有助于夸大了他的身影。占有了这些优势，外加上高扬的区域性成就与国内进展，马哈迪的个人化霸权似乎是永久性的。反对党或其他异议分子对马哈迪的各类零散批评，丝毫无损于他的感召力。但是，当东亚奇迹崩溃、安华倒台及马来人分裂后，群众便不再接受马哈迪的“完整性”(whole)。群众不再视马哈迪为一个可明智地评估与区别地选择其显著正负面品质的化身。他们视马哈迪为马哈迪领导的巫统与国阵支配的政治体制的所有错失的化身。个人化的霸权已到了它的极限。Undur Mahathir (马哈迪下台)! 虽然在当时



个人化霸权的多种面目

这或许还不太可能；但是，“烈火莫熄”却加速了马哈迪的“自愿性”离职。

就当前有意问鼎首相职的巫统同僚中，没有一人具有曾标示马哈迪的领导的那种霸权式素质。缺了这个素质，诸如阿都拉·巴达威、纳吉、默哈末·泰益、慕尤汀、拉菲达、希萨慕汀等，或许可在带有2020宏愿印痕的现行政策中做些权宜性改变。但是，他们将无能提供一个宏大愿景，即一个可广泛地应对时代中的主要期望与课题的主导性宏愿。反讽的是，有可能达到这个要求的人却是安华。假设安华在1997年7月危机展现时，便继承了马哈迪，他倒有可能已经把“亚洲的复兴”、马来西亚回教青年运动（ABIM）式回教、富有爱心的公民社会、经过改革的政治经济等，混合成连贯一致并具有安华特色的宏愿。如今，当然无人知道这样的尝试是否可能成功。只能追忆的是，由安华的政治经历所交织成的各类意识形态、承诺与感召力，是唆使罢免他和默许继续监禁他的资深巫统领袖向来都无法比拟的。马哈迪离去后，在广包性宏愿下努力的马来西亚社会的五十年趋向也将告终——也就是，欲达致国家建设的“独立”、旨在于重组社会的NEP、和追求先进世界繁荣的“2020宏愿”抱负的告终。缺少一个安抚人心的宏愿，而照顾特定权益的破坏性特殊政策却没有消失，将是马哈迪主义之后的过渡时期的不确定前景。

抱负、理想和失和

当然，马哈迪的创议与理念带有他个人的思想、特殊偏好的形塑，以及对政治与其他危机的情境性回应的痕迹；然而，不论其思想、形塑和回应是如何“优越”与“不凡”，若它们仅仅是马哈迪个人的产品，马哈迪的理念便很难取得和保住其霸权式威力。马克思有句说得比任何人更简洁的名言，即任何时代的主导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更小的程度上，“马哈迪思想”也是如此。这些思想，自马哈迪作为意识型态家发挥影响力到他成为首相行使监管权



为马来西亚社会勾勒恢宏愿景

力这期间，皆是支配性的。在“马哈迪时代”的大部分期间，包括他看起来很积极地处理 *bangsa*、*agama*、*negara*（种族、宗教、国家）的期望与梦想这时段，马哈迪主义代表了，在统治阶级的集体权益与渴望下的一般乃至最先进的言论。

没有一位马来西亚的领袖曾像马哈迪一样，提呈过如斯多的“宏愿”，也没人像他一样享有过那么大的支持，或招来那么多的猛烈嘲笑——不论是源自党内、国内或国外。当然，一个简单的理由是，他比任何前任者在位更久；这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与机会来记录更大的成败功过以及造成更大的民心向背。许多观察家早就间接地解释了公众对马哈迪的不一致态度，这是从他的独断性，若非对抗性脾性方面来说。虽然马哈迪本人不承认他是对抗性的，然而考虑到他对大多数课题的不屈立场与战斗性态度，这种批评自有部分道理。只是，道理并不止于这些明显的解释。更深层的理由是，马哈迪在政治上与民意上的起伏，也反映了（虽不完全是）马哈迪所坚持不懈地追求与拥护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事业的升沉与躁动性紧张。

自NEP出台以来的三十多年，官方的言辞、国阵的宣传及人民的理解，都把这事业的本质当作“发展”。可是，这个事业也可被视为资本主义驱动下的民族主义事业，或是充满民族主义抱负的资本

主义事业。不论何者为是,相继的政权都承担或扩充了这个事业,以期它能牵制马来西亚社会的阶级与族群矛盾,以及回应加速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压力。这个事业始于NEP,旨在重组社会以打造土著工商群体(BCIC)。自正式推行以来,它已被套上不同名称与标签,反映出它的各类成就与压力。1981年以后,这个事业在马来西亚大宝号(Malaysia Inc.)的框架内,通过现代化、民营化(即私营化)与晚期工业化的纲领进一步拓展。其发展曾因经济萎缩而放缓,逼使马哈迪政权“搁置NEP”,而80年代后期巫统的内部危机,也同样削减了它的进度。较后的经济复苏与高成长,在90年代中期把这个事业推到顶点,而那时它已在新马来人(Melayu Baru)企业家团的领航下。它披着2020宏愿走向“发达国家身价”的外衣,经由“亚洲价值观”与“东亚奇迹”联系起来,并通过MSC象征性地全球化了。但是1997年7月的风暴却危及了这个事业的持续推行。1998年9月的资本管制措施挽救与恢复了这一垂危的事业,只是这个事业随即又因迫害安华事件与“烈火莫熄”的反叛而动摇起来。1999年11月后,马哈迪及其政权与巫统试图去驯服这个反叛,以及恢复他们这事业的首要地位。

从这些升沉中可以看到,后1997年的危急政治局势,实源自这事业中铤而走险、不顾一切的心态,90年代的辉煌成就这时让位给成真的凶兆。我们无须重述国际金融市场造成这种状况的过程。实事求是地说,若这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事业已往的成就并未能为其未来提供多少保障,那是因为,这个由国家致力打造成的马来资本主义阶级,本身就充满了矛盾,而马哈迪本人或马哈迪主义都未能满意地解决这些矛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NEP所诱发的社会冲突,都是在可预见的族际竞争模式之下发生。但是,正如哈林·沙列(Halim Salleh)敏锐地指出,NEP的效用在于,它是种“驯服与马来西亚化非马来人的工具”,以换取华人经济分配额的增长,结果导致“社会默许”(social acquiescence)的氛围。¹¹不同领域的华人资本,只要适应重组,并与有影响力的马来权贵合作经营,依然有机会从

国家主导的高速成长中获利。反讽的是,对那些把NEP仅当作零和族际目标与配额的人来说,在土著工商群体中戏剧性地崛起的领袖,实际上反而是较难“驯服”的。

在1981年,当马哈迪成为首相时,马来政治的动力、NEP目标的实现,以及国家经济政策的整体有效性,均取决于马来“党-官-商”轴心(party-bureaucracy-class axis)的职能性廉洁。其中,巫统作为政府的掌舵政党,得提供政治权力来强行NEP的议程。日益被马来人支配的官僚体制,得为NEP计划提供行政与技术上的执行力,而新兴的马来资本家阶级则得表现出佳绩,以便名正言顺地得到国家支援与培育。然而,NEP所提供的大量寻租(rent-seeking)行为与快速致富机会,却也在政党、官僚与商界的各阶层间催生了具有影响力的结盟,形成互相对抗的权力中心。较后,这些马来人内部的对峙,最初以种族不和为掩饰,最后却原形毕露。虽说,“马来人的政党”(party of the Malays)与政府内外的其他政党协同分配政治权力,但是,巫统却额外地为它本身建立了巨大的商业帝国。“马来官僚体制”本来是为了执行与应付NEP而快速壮大,但是,其技术官僚与行政人员却借着“马来人信托权”(Malay trusteeship)的名堂掌控与管理了大量的经济资源与公共企业。另一方面,个别在土著工商群体框架内兴起或巩固了力量的资本家,对于“马来人信托权”的牵制,感到极不耐烦。渐渐地,党要、资深官僚及有影响力的资本家,形成了各自的结盟,竞相争夺权力、资源与财富,因此,他们的各类议程便日益难以安然纳入NEP的范畴内。表面上,大家都打着重组的名堂,要求这要求那;但是,所谋的却是个别的权益。结果,各类竞争与冲突的闪燃点(flashpoints)把党-官-商集合体化成了失和的轴心。¹²

或许可以说,最早的党官之争,始于NEP拒斥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于是权力就从巫统的“守旧派”转移到以敦拉萨为首的“激进派”,“守旧派”失势是因为被视为“缺乏实现社会重组的愿景与技术性技能”。¹³敦拉萨在1976年1月去世后,巫统的“守旧派”便在

党内搞一个针对敦拉萨追随者的剿灭“共产党员”行动。到了安华倒台，马来人内部冲突这一趋向最明显的政治现象，就是党内猖獗的派系斗争。

当首十年的NEP的恩赐在1982—84年的低成长和1985—86年的萧条中受到局限，以及较后的高速成长在1997年7月结束后，马来政党、官僚与商界的财富便相继地递减了。最早失势的是在70年代与80年代早期控制扩张中的公共企业与“预算外的各类机构”(off budget agencies)的官僚。事因，马哈迪前后在不同时期与慕沙·希淡及达因，以改革公共服务、民营化与结构性调整等名目惩戒官僚和整顿他们所管辖的亏损公共企业。迄今，官僚尚未收复他们在NEP早期时的权势，他们是“马来西亚大宝号”的次要伙伴，承受着各类无效率指责。马来人工商巨头，尤其是与巫统有关系的综合性企业，虽在马来西亚大宝号下兴隆起来，但是，他们的首领与舵手也随着遭殃。1997年7月使他们中的大多数失去偿债能力，虽然1998年9月及以后的措施挽救了他们，他们却因而被冠上了朋党或者更糟的污名。最后，轮到了巫统这个政党。它支配了政府，垄断了政策制定，以及建立了到处伸展的商业帝国。每当经济不景威胁到所有土著工商群体里的对立结盟时，巫统都必然地成为马来人内部冲突的主要战场。比方说，1985—86年萧条后，便爆发了巫统的分裂，而1997—98年的危机也触发了安华的被逐。约言之，马哈迪式政治里最深入与失控的祸根，是马来人的内部分裂，而这与巫统和回教党之间的纲领性或教义性差异，没有直接的关系。后1997年政治只不过严厉地确认了，只要党—官—商轴心持续成为国家的各类工程合同与项目的清算所，以及作为成功驾驭者快速致富的通道，那么，植根于NEP与马哈迪式政治经济的马来精英之间的分裂，就不会消失。

马哈迪与这三个轴心“伙伴”皆有着紧密关系，对他来说，即使他有意超然于这失和的轴心之外，也是身不由己的。由于其他的政治经济因由，即便是在他最清白及强势之际，他也无法取得这个马

来党—官—商轴心的完整性。自1997年7月后，国际金融市场与华盛顿共识便开出急进的亲市场处方，来消解东亚的朋党资本主义、庇护行为、寻租行为、缺乏透明性与缺乏“善治”的毒害作用。于此，也无必要浏览那些批判东亚政权的评论，指它们既损及外资谋求厚利也损害人民追求福利。真正的课题，并非所谓的东亚大宝号是否收留了一批资本主义的怪胎，而这些怪胎又是否只有采取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机制方能加以矫正。在大马，后殖民的社会经济成就并不能归功于任何“自由市场”。实则，若真的存在过殖民地“自由市场”，它也无法防止当时政府的巧取豪夺，制造它的朋党，及对不论是族群或阶级性质的社会重组，作出迟钝的回应。NEP与马哈迪式政治经济的真正的迷思，借用舍勒(Peter Searle)的简洁明白表述则是，国家所“孵化”的“本土企业家”，能否产生毅然抛弃“旁门左道本源”的“本真性资本家”。¹⁴

舍勒提供了一个类型学模式(类似“资本家的发展阶段”模式)，描述马来资本主义是“政府、党、私人资本家组成的复合体”，具有多样的人格类型，如傀儡型资本家、执行—专业董事、执行—受托董事、职能性资本家、官僚出身的商人、国营企业经理出身的业主、政治人物出身的商人、巫统的代理资本家出身的商人、巫统的代理资本家出身的企业巨头、寻求不劳而获利益的寻租者、过渡期的企业家和民间资本家等。是否有理由相信，在“国家保护或巫统支援的庇护网络中，寻求不劳而获之利益”的这些人当中，会有一部分转变为具有确凿的自主性、活力与韧性，且有异于习惯性寻租者的“本真性资本家”？在1997年7月之前的乐观气氛下，舍勒想像它应是可能的。对于马哈迪而言，由于利害攸关，他也得相信是可能的。

即便在那时，马哈迪本人肯定也知道，在社会工程里，孵化并不保证能成功孵出，更遑论能生出许多无缺陷的新生儿。本着这种现实观，马哈迪并不期望大多数，更遑论所有的舍勒上述分类的入局者，会高举他对“新马来人”所渴望的标准。我们常看到马哈迪批评非生产性的马来寻租活动——阿里峇峇式安排、不愿意下定决心学

习或管理生意、常把所得到的工程项目卖掉，再要求新合同等令人恶心的行为；然而这些恶心的行为依然不足以促使马哈迪放弃“坚强的官商协调”的东亚发展国处方。实则，马哈迪甚至训诫日本人，“走向西方”将无助于解决日本的经济衰退。¹⁵ 只要体制中的贪污不致劣化为彻底掠夺，有如发生在其他国家那般，马哈迪就能坚持“发展就是我们的不朽事业”。

其实，马哈迪最深切的希望是，培养出类似日本与韩国那种能在国际市场中竞争的全球性赢家。这方面的问题更为棘手。历经了22年的马哈迪式政策的经济，可粗略地划分为三部分。一为享有特权的跨国制造业公司，它们主导了出口取向的工业领域。这些跨国公司被赋予，或要求并得到各类“补贴”，却从未被经济专家或媒体指责为扰乱市场。因为，对这些跨国公司来说，全球性竞争力是决定性的。另一个大领域则由中小型企业(SME)组成；虽然有些中小型企业已成功地成为外来跨国企业的转包商(sub-contractor)，它们大部分依然是国内市场取向的。马来人拥有的中小型企业依然得靠国家的惠顾与保护，进而成了这领域里富有政治分量的部分。占多数的华人拥有的中小企业虽富有韧力和不依靠国家，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则不大。第三领域则是由马来人、非马来人与“族际性”综合企业所构成。这类企业实体多聚集于银行业、资源开发、种植、建筑、房地产、赌博、旅游、运输、公用设施与服务，及选择性的进口替代工业(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es)。它们主导了这些通过国家惠顾、保护与管制来决定成败的国内领域。

马哈迪已在根本上偏离了早期的NEP，并把官僚踢开一旁，而偏向打造类似南韩“选拔赢家”的综合企业，来引导冲向全球的策略。他希望，这些综合企业会成熟为世界级的公司。在“东亚奇迹”极盛的短暂期间，这类综合企业集团曾经成为比大马落后的国家的外来投资者，而予人一种趋于成熟的印象。只是，自那时之后，这些在马来西亚大宝号之下模仿日本财阀与南韩财团的企业，并未证实有能力或意愿脱离它们积习成癖地对国家援助的攀附。因此，这

些在NEP下备受争论的综合企业，依然是不稳定的。这一点可从以下的各类事件中推论出来：政府对马航、英达丽水集团(Indah Water Konsortium)、布特拉(PUTRA)轻快铁与星光(STAR)轻快铁等的选择性重新国有化(当这些大型民营化项目失败后)；诸如达朱汀(Tajudin Ramli)与哈林(Halim Saad)这些权贵的形象(若非财富)下跌，及达因在2001年令人费解地辞去财政部长之职；以及马哈迪在2001年短暂地攻击巫统内的“富者”的言论等(它虽未在执政党内引发全面性的政商分家，却已点出“金钱政治”的持续性)。或许，人们可以预测，1997-98年，马哈迪与安华二人针对什么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以挽救濒临崩溃的显赫马来公司的争论，会在未来引起反响，以及幽灵不散地纠缠那些明显地禁不起“全球化挑战”的综合企业。

只是，就算马哈迪未能挑到适当的赢家，他依然得在国家、外资与本土资本的分权中，为这些综合企业取得“适当的位置”。因为自独立以来，这种三方的均势便是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的基础。正是马哈迪的这种直觉，才使得他挺起资本管制的“经济护盾”与再通胀政策来顽强地护卫马来资本——或许不无争论地，更是为了护卫新兴的马来西亚资本——千辛万苦才赢得的立足点。国家资产管理机构(Danaharta)、国家资金机构(Danamodal)和公司债务委员会(CDRC)，正是在这护盾后，料理衰败公司与银行体系的特定问题。随着印尼的灾难损及了国际货币基金(IMF)干涉行动的名声，国际主流媒体轻率的“亲改革”压力累及了安华的倒台，以及面对回教党权力坐大，金融市场最终领悟到马哈迪要维系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的稳定基础的努力。由此，导致市场心平气和地接受1998年9月后的马哈迪的资本管制与再通胀措施，以迎接1999年11月的大选。

就这个意义来说，后马哈迪主义能够在1997-98年后的经济与政治动乱中，保住了这三方均衡，也可说是有所成功的。然而，正如马来西亚大宝号已无法维持朝向资本主义合理化与改革的冲力一样，后马哈迪主义也无法再提出更富远景的宏愿。

有关回教国的流言

在“烈火莫熄”、马来人1999年的投票模式、回教党的选举收获中，人们印象深刻地看到了超越政治经济的反主流的另类愿景。这些反对精英主义与国家主义话语的民粹主义与民主政府的理念，通过多种多样的富有创意与自发性的形式，在“烈火莫熄”中涌现出来。不管替阵在选举中有什么局限，这些愿景均在公民社会中有其自我持续的生命，尤其在另类媒体与互联网刊物中；其中，又以回教党的《哈拉卡日报》与独立的网上报章《今日大马》(malaysiakini)最具耐力且最为成功。一个人可以赞成或否定“烈火莫熄”现已“落败”或“终结”的论断，视他对“烈火莫熄”代表着什么的想法而定。只是，无可否认的是，“烈火莫熄”强有力地爆发了人民意识，而它针对国家治理提出的道德与文化面的要求，也无情地推翻了精英分子要公民社会尾随的期望，以及政府对马来人的效忠义务(fealty)的假设。或者，如同马哈迪对巫统所招认的：“我们习于指挥人民，人民也习于听从我们的指挥，但他们已不再如是”。¹⁷ 要恢复这种对政权的顺从，只得诉诸于行政手段，即要所有的公仆与大专生签署“向当前政府效忠”的宣誓书(Akujanji)。这一举措标示了“巫统已出现新政治，因为我们已无法再唤使和希望人民为我们完成任务”。¹⁸

这么一来，除了失和的轴心之外，又出现了另一种马来人的内部分裂。在这分裂线上，不仅有“烈火莫熄”所期望的“活跃与多元主义的民主文化”的理想，还有欲与马哈迪的“宏愿回教”(Vision-Islam)，甚至是与巫统的一贯统治一较上下的“回教党回教”(PAS-Islam)。2002年7月29日，马哈迪被邀请在马来西亚哈佛俱乐部晚宴上谈论“马来人的困境”时，他借机提醒他的听众，不要忽略了另一种困境；也就是，由马来人的内部分裂所引发的巫统对决回教党的争权问题。马哈迪说：

“马来人与马来西亚人所面对的困境是，应否允许有人利用民主的名堂来毁掉这个国家；还是保障人民不会被操纵到利用民主来破坏民主的地步。”¹⁹

之前，马哈迪已多次发出这类反对“过度”的民主的一般性警告。这次，他的发言显然是针对回教党及顾虑到回教党可能掌权的前景。这个前景被典型地描绘成，一个建立在“回教国”基础上的政治体制的未来境况；也就是，在政治上被回教党统治，由乌拉玛(ulama，也译为宗教学者)领导层塑造，及在“神律”管治下的未来境况。这种境况的描绘，肇因于巫统在1999年11月选举中的衰退所引起的恐惧，进而被2001年9月11日的震荡所强调。

表面观之，这种境况的可能性是顶低的。在可预见的将来，靠民主的选举上台，打着“回教国”招牌并由回教党支配的联邦政府，是不会出现的。若就政治论政治，而非对宗教极端主义引起的不成熟预言作出反射性反应的话，就可看出回教党在1999年的跃升已达到其极限。更何况，回教党并没有所需的资源来克服广泛的问题与障碍。实则，它有效的选举基础是顶狭隘的，它最佳的选举表现也远比不上尽管已受伤的巫统。从1959到1990年，回教党的受挫几乎从未间断，而它在1999年的斩获，也得归功于1998-99年的难得的政治机遇。只是，这个难得的政治机遇，也在当权者的压制与替阵的解体下趋于消失。

对多元宗教的选民而言，回教党声言在分裂的回教共同体(ummah)中获得大多数的马来回教徒选票，只有实现了以下两个条件之一，才能在政治上令人信服。其一，回教党能在下回的选举中取得决定性大多数的马来回教徒的支持，以全面否定巫统自称为“马来人的政党”的言论。问题是，回教党得面对部分马来回教徒的顽抗，这些回教徒有时被回教党及其宗教盟友指责为“世俗派”。其二，回教党得透过可行的“第二联盟”，与非马来人或非回教徒达致具有实质意义的联盟。就此点而言，民主行动党放弃替阵的决定，无疑对回教党的这一个希望造成很大的打击。

仅此已足以确定，在9·11事件后(若非之前)，回教党所面对的坚实的非回教徒的拒斥，会影响它与巫统的选举竞争结果。由此可见，在多元政体里，少数群体的政治作用，也并非那么无足轻重。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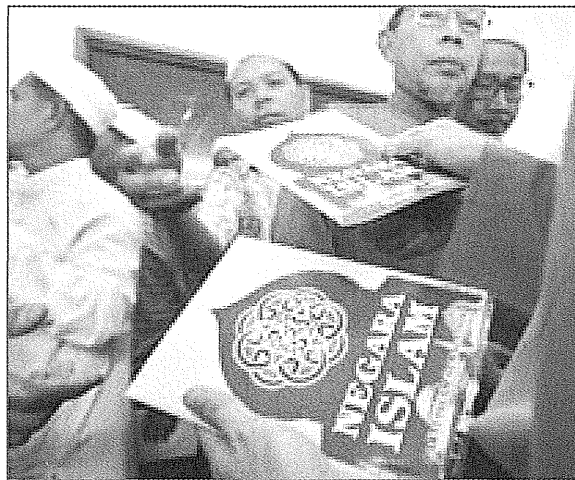
权力的角度来说，巫统依然是主流，它会更加善于运用其广大的国家权力来制止回教党扩充影响力。尽管巫统尚无法迅速地赢回已疏离巫统的马来回教徒选民（到2001年为止），回教党却已被逼反攻为守；此点，可由它失去笨筒（Pendang）国会议席及在安南武吉（Anak Bukit）的州议席险胜中看出来（这两个补选是因回教党前主席法兹诺〔Fadzil Noor〕去世而举行的）。实则，当权者已决然使出各种手段来削弱回教党的地位，包括断绝它的资源，发动更广泛的反乌拉玛意识形态运动，压制回教党领袖及其盟友。在最新的选举委员会制定新选区或重划现行选区的行动中，吉兰丹与丁加奴两州例外地没有增加任何国会议席。在下回大选来临之前，回教党的优先策略，便是保住现有的地位，而非挺进。

尽管如此，巫统与国阵，而非回教党，却依然还有一些行为会侵蚀宪政的基础，这些过分行为会促使人民舍弃世俗体制的外壳以换取“回教国”的承诺。早在1999年大选之前，一般上被视为回教党最激进的领袖哈迪·阿旺（Hadi Awang）已指出，在过去的九次大选中，回教党均和平地接受失败；哈迪接着问，巫统会否懂得如何接受仅是一次的失败！这个提问并非宣传辞令。在它从1959年至今的全程选举经验中，回教党曾经控制吉兰丹与丁加奴，1969年后与巫统和解，在参与国阵时犯错误，在80年代的激进时期被迫后退，在90年代恢复常态，一直到1999年方挽回它过去的成就。在持平地论及回教与民主之间的潜在与实际趋同时，赛阿末（Syed Ahmad Hussein）认为，回教党在民主惯例的框架内展开的选举承诺，与对回教纲领的拥护，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回教政党无法相比的。²⁰ 无党派的分析家会认为，若考虑及回教党像所有马来西亚的反对党一样受到亏待与骚扰，回教党对民主政治的依法参与就更难能可贵了。

尽管如此，同一位分析家依然不得不顾虑，掌权后的回教党，会把握最先的机会“用民主来消灭民主”。据此，即可看出非回教徒及“非回教党回教徒”对“回教国”的恐惧程度。由于这种恐惧，他们反而轻易相信，或消极地接纳，巫统会“遵守游戏规则”。其实，至

少有一半的马来回教徒选民认为，1998-2000年的诸事件显示，当权者对宪政的原则与惯例的尊重是很淡薄的。有二个案例比任何神学或法学的论述更为有力地说明这一点。其一，很多回教徒均不言而喻地认为，安华若在回教法庭受审决不会被判有罪。安华虽被判了二项罪名和共十五年的有期徒刑，许多人依然不信他真的犯了法和搞鸡奸。反之，他的败诉，包括迄今为止的每一项被驳回的上诉，都使人认为，他是当权者利用法治，在“世俗”法律下执行的最严重枉法的受害者。其二，联邦政府与国油（Petronas）违约，没有交付石油税予哈迪·阿旺领导的政府——而这石油税可是这25年来都发给国阵领导的丁加奴政府的。巫统的这一行径，使政府和它的支持者所宣称的，植根于法治的宪政之优越性，成为虚妄；而回教党可以反驳说，那些法律都是“人为”的。

在马哈迪政权的早期，马哈迪曾以信心十足的改革冲劲回应“回教的召唤”。他大胆地塑造一个相对一致的“中庸的”、“现代主义的”、“世俗的”意识形态与实用的“宏愿回教”，以别于“回教党式回教”，或某些偏离教义的教派，如阿尔干（Al Argam）。当时，马哈迪意图把回教价值，与马来民族主义的魄力及东亚的工作伦理整合起来，以便推动与控制公共生活中更强烈的宗教倾向。虽然回教



有关回教国的流言

党与其他的回教团体对“宏愿回教”的正当性表示怀疑,马哈迪却成功地收编了安华(及随他加入巫统的ABIM盟友),结果使得政府的回教化政策与制度获得了颇大的支持。随着安华的倒台与回教党对安华运动的支持,异议的回教观点认为,马哈迪式回教只是对选择性“回教价值”的工具主义的运用,更不必说是“世俗主义”的运用。在2001年9月29日,马哈迪声称大马是回教国;只是,这个言论并未唤起令人信服的共鸣,它只引发国阵里的非马来人政党的含糊支持,民主行动党的强烈反对,及回教党不屑的漠视。九个月后,马哈迪在2002年的巫统大会里解释道:

“当我们说马来西亚是个回教徒国家(Muslim nation)时,用意在于避免它成为政治课题,以致分裂马来西亚的回教徒。我们这样说,是因为马来西亚具备了遵循回教教义的回教徒国家的所有条件”。²¹

在有关“回教国(Islamic nation)的辩论”中,马哈迪是把“回教徒国家”(Muslim nation, Muslim state)与“回教国”(Islamic state)当作可互换的用语。²²这证实了,在危机时,“宏愿回教”就像后期马哈迪主义的其他元素一样,已失去其论证上的清晰性,更别提其意识形态力量的消失。

那么,有什么其他方式的“政治性”回教(‘political’ Islam)是具有说服力的呢?尽管它还未出现?虽然这种预测是危险的,有三个取决于某些发展的因素,是值得考虑的。

其一,在过去的十多年来,“新马来人”被宣扬为NEP的成功事迹,因而被夸耀为马哈迪主义式模范角色,然而这些新马来人却有惹人非议的弱点。马哈迪大可指责“恶魔的创造”,把“新马来人”刻划为“酒鬼、玩女人者与赌徒”,并且对他来说,“新马来人是那些坚信回教与实践高贵价值,遵守纪律者”。²³不管怎么说,在1997年7月危机之前被过度吹捧,在“烈火莫熄”中却被痛责的新马来人精英的奢侈,与回教党的简朴生活之间,确是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当权者虽迫使吉兰丹与丁加奴二州实施严厉的经济与财政措施,但是

十多年来,回教党的支持者,已在吉兰丹把节约与紧缩当作对抗的象征。实则,这十多年来,回教党的支持者就不时投诉当权政府、国家官僚机构与巫统,在社会与经济福利的分配上系统性地歧视他们。或许——虽然不一定是实际的——在经济困苦时期,接近“回教生活方式”的简朴生活,可能是处理当代政治经济问题和对付贫困的可行方式。这种生活的魅力来自道德上的取向、宗教上的高洁、以及政治上的均等。

其二,假设马来党—官—商轴心再进一步分裂,那么,这个分裂的异议分子,就会透过组织得最良好的反对党,即回教党,而非任何其他现存渠道,把他们的不满表现出来。在1998—99年时,那些在政治上现实精明的巫统失势者参与回教党,可以说是作出了正确的抉择;因为,只有回教党,而非公正党或人民党,才能给予巫统重击。无疑,巫统可采取严苛措施暂时抵制这种趋势,惟惯常与强化的压制,可能会把政治活动引向更危险的恶性循环。

最后,尚有个难以捉摸的要素。或许,我们可视其为回教党窘境国际化。它与美国对激进回教徒、对冥顽的回教国家以及实际上是对回教本身展开的反恐战争之下的全球性回教共同体(global ummah)的处境有关联。即使不提它的内部分歧和自相残杀战争,“回教世界”也和近时任何其他相对突出的国际社群大不相同。这个全球性回教共同体身受令人心寒的苦难、掠夺与彷徨,任何可以想像得到的政治动乱均见于此:巴勒斯坦的起义运动(Intifidas)、对撒拉折沃(Sarajevo)的围攻、喀什米尔(Kashmir)与占姆(Jammu)的分离运动、车臣(Chechnya)的分离运动、阿尔及利亚(Algeria)的国家恐怖主义现状、对阿富汗的侵略、印尼马鲁古岛(Maluku)的宗教冲突、在印度的大屠杀、以及最近的对伊拉克的战争等。整体上言,无休止的战争循环、残杀与殉教行为等,已把回教徒卷入漩涡中——不论他们支持或反对回教抵抗运动(Hamas)、真主党(Hezbollah)、回教圣战、塔利班、回教军团与基地等。卡琳·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有力地指出,回教徒共同体向来回应危机与威胁的一贯

特征,不是去促进神学上的创新,而是寻求打造公正的“回教国”的政治解方。若全球回教共同体的社会政治状况进一步恶化——实则对危急中心如巴勒斯坦、车臣、喀什米尔、伊拉克以及中东的许多其他地区来说,结论已不言而喻——那么,有什么理由使人相信,它的反弹不会导致更多马来西亚回教共同体内的人,排除与“世俗主义”妥协而用更严苛的回教观点来诠释这些形势?

早在70年代,马来西亚国外的回教世界的政治发展,包括伊朗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现在的回教党领袖,把早期的马来民族主义立场的党纲转为更严格的回教取向。这些领袖之中,包括在沙地留学的哈迪·阿旺与在印度留学的聂阿兹(Nik Aziz)。类似的情况也发生于NEP这一代的身上,他们是留学外国、受过西方训练与添上了工艺能力的马来回教徒专业人士与技术官僚。至于那些到非西方或回教国家留学者更不必提了。许多年轻的一代,也会发生类似情况。他们的政治体验奠基于安华的倒台与国内的“烈火莫熄”,以及国外的9·11事件与对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争。其中,对政治不热衷的人,可为一系列的回教非政府组织招揽成员及提供领导人才。热衷政治者,则已被回教党吸纳,不论成败地献身于它的政治法学纲领、组织与寻求选举上的影响乃至胜利。对于其中最极端者,我们所知不多。公正地说,政府利用内部安全法令来逮捕所谓回教战斗分子,由于这些行动的性质是秘密的、危言耸听的、且常具有私心,其实情自难得知。据说一些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扣留者,与以阿富汗为基地的“极端主义者”有联系;但是,在8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也曾援助同一批抵抗苏俄占领阿富汗的“自由斗士”。

在9·11发生的前一年,即巫统在马来选民中失去号召力及安华被投狱时,与马哈迪尚心存芥蒂的《亚洲华尔街日报》还会这样提议:

“若回教党要为集合的反对力量提供领导及扩大其基础,它就有必要发展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意识形态与思路。我们不能期望回教党会损害它对回教的忠诚,但它必须远离困扰许多非马来人及其他人的回教国目标”。²⁵

但9·11事件后,回教党不能不担心“新帝国主义”的外国强权,对“政治”回教、“激进”回教或“原教旨主义”的敌意。因为只要任何上述“恐怖”标签符合回教党,或可以用来形容回教党(与巫统的“中庸”对应);那么,美国就不大可能会坐视回教党透过宪制手段取得权力。回教党的领导层不会短视到看不到,自9·11事件后,美国如何快速地对安华的命运失去外交关怀。反之,马哈迪政权则因与美国在全球打恐活动中“合作”,甚至同意在马来西亚建立区域性反恐中心,而“赢得了布什的赞扬”(借用国际媒体的诡诈用语)。

对多少要面对政治现实及酌情施展外交手腕的马哈迪来说,反对美国领导的对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争,及呼吁实际地纠正导致全球回教共同体中的政治极端主义的“根本原因”,是一回事:“惟一能阻止恐怖主义的是,消除导致他们斗争的各类起因”。²⁶只是,要求马哈迪正视国内的回教异议的“根源”又是另一回事:“一些马来人之所以会如此敌视巫统,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回教党对巫统的极端憎恨的影响。他们自小便耳濡目染了这些憎恨,以致它成了这些人的文化的组成部分”。²⁷马哈迪与巫统就如同历经9·11事件后的美国统治者一样,无法以理性与自省的态度去审视“为何他们憎恨我们?”的核心问题。若只听马哈迪在哈佛俱乐部的一面之词的辩解,人们可能会忘了,在当前的世界,典型的“以民主来破坏民主”的做法,是民选政府变成极权政府,以及它无情地粉碎合法的异议。正是这种认识和对极权主义倾向的反抗,为“烈火莫熄”的网络评论指责马哈迪为大暴君(Mahazalim),提供了暗含深意的文本,以及替阵总体上的重大意义。若只聚焦于回教党的跃升,我们可能会陷入一种普遍的观点,即为了维系政治体制的稳定,严厉强势的马哈迪手腕是必要的。肯定有人会注意到,就第三世界的标准而言,马哈迪并不算残暴;或者为了避免双重标准,与“第一世界”那个采用极度暴力来强施帝国统治的大法老王(Mahafiraun)的行为比较,也是一样。

当马哈迪履行他的历史使命时,他是一位极其重视稳定与奉公守法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因此他总是认为,任何对他的领导权或其政

权的挑战，都是无政府状态的预兆。反讽的是，自马哈迪掌权以来，正是他自己引发、催生或卷入巫统、马来社群及马来西亚社会中衍生的主要动荡局面。

马哈迪的最终困境

这个最终困境自有其复杂的成因；但是，有两点是其理自明的。首先，过去的22年，并不是马哈迪的保证压得住的平静时期。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经济转换期，间中不时会发生政治动荡。要领悟这一点，我们只须回顾马哈迪出任首相后，所发生的各类事件，如巫统内部斗争爆发；行政与立法部门对决皇室的宪政危机；行政部门对司法部门的侵蚀；内部安全法令下的主要扣留事件；以及“烈火莫熄”等。其次，回顾起来，这些“不稳定”事件可视为马哈迪式政治的危机——虽然，若与其他地方比较，其暴力规模是温和的。这些政治活动都奠基于NEP下马来社会的极大重组过程中，而这些重组在马哈迪时期更为加速推行。由此可见，除了1987年10月27日大逮捕之前的族际紧张外重大的危机都涉及了“马来人政治”。

因此，他与马来社会的许多问题扯上紧密关系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1997年7月后，更是如此。只是，于此，令人万分惊奇的是，马哈迪重新检视了1997年后的政治经济，及过去几年来的马来人反叛后，竟导致他把他的政治志业实际上终止于他的起点的结论：即重召“马来人困境”的幽灵；惟这次他谈及也警示了“第二个马来人困境”。²⁸

马哈迪到底要说什么呢？首先，他显然认为，马来人已在退步，也像往常一样认为，他有义务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之中有太多人似乎对此事一无所知：

“或许，我们会认为，马来西亚肯定会永久独立自主，而马来人也肯定会掌权，国家也将会富裕。或许，我们相信在我们的国家一如既往的条件下，我们可在拥有独立与主权的情形下迈入新世纪与新千禧年。

但是，前殖民主已预谋再殖民化我们。只是，这次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占领我们的国家。这个方法就是所谓的全球化与无疆界世界”。²⁹

马哈迪最近并未参与流行的世界性反全球化运动。毋宁是，他对“无疆界世界”的态度，已失去了在1997年前隐含于MSC概念中的，全球性机遇与威胁的平衡感。但是，一如往常，当他要挡开外来威胁时，他会先针对尚未克服的内部弱点。在他偏爱的其中一个“大图景”(big picture)中，马哈迪指出：

“马来人刚兴起为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的种族。在这段[44年]时间里，一个有尊严和受尊重的民族已被塑造起来；但是它尚不够成熟，尚未达及它可能达及的顶点。可惜的是，已有迹象显示，这个新而脆弱的文明已在快速衰退”。³⁰

把政治独立与“现代文明”合为一体是种奇怪的谬误，只是，马哈迪的意图在于警惕自鸣得意的马来人；提醒他们不要忽略了，若“与这个国家被多个外国强权殖民过的四百五十年相比”，四十四年的独立只是一个瞬间。³¹根本上言，使马哈迪不耐烦的是，马来人似乎有一种把其政治权力视为永恒保障的幻觉倾向：“我们动不动就说马来人的权力优势，但是，仅仅不再被殖民，就等于我们已是‘主人’了吗？即使我们被称为‘主人’，活得像个乞丐就不配称为主人”。³²或用一种惹恼许多马来人的自我鞭挞方式提问：“如果我们一边谈论[原文如此]马来人权力优势，一边为人擦鞋，这样又有何意义？”³³马哈迪的论点是：

“我们不会因为想成为主人，就会心想事成地成为主人。若我们真想成为主人，就须具有明确的能力。我们必须拥有知识、能耐，能在人生的竞争中出人头地，及拥有适宜的资产财富。为此，我们必须努力”。³⁴

但是,历经三十年的NEP、国家发展政策及2020宏愿,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努力以及需要谁去努力?对马哈迪来说,终极的努力就是“学习”——学有用的知识、经商之道、历史的教训、纪律的重要性、回教的实质、驾驭英语,以及最重要的,“我们失败”的原因。举个引起他痛苦回忆的例子,若商店不全是“无处不在的华人商店”,那么,马来人就得进入零售业和学习其经营之道;只是,这可得要求马来人调整其文化以适应其顾客,而非把自己局限于马来人市场而已。³⁵ 同样道理,马来企业家也应由小慢慢做起,“得自我评估及在确定本身有足够的资本、技巧、与有效率的管理能力后,才向大企业伸展;若否,他们不但会在营运中面对许多问题,最终还会被逼关门大吉”。³⁶ 马来人必须领悟到“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文化差异”,马来人由于“求富心切”而急于把他们手中的“股票、许可证、执照、木业利权(采伐权)或什么”脱手,而“其他民族虽然必须承担购买利权的成本;但是,他们依然有利可图和成功”。³⁷

在马哈迪最严厉的责备中,矛头指向两种人,一为马来学生,另一则为只专注于回教的“形式”而非“实质”的马来回教徒。马来人虽从政府的教育政策与援助计划中受益,但是,他们似乎没注意到:

“华人文化极重视获得知识,华人学生及其父母都很专注于子女的学习。许多华人父母甚至牺牲其收入的大部分于子女的教育上。马来人父母虽也有这样的牺牲精神,但是并不多”。³⁸

马来人似乎也不怎么关心“马来人在大学里的表现并不是那么好”;³⁹ 而其说词,也是难以接受的:

“若我们说错在教育制度,而有必要纠正它,可是,华人也在同样的制度下受教,他们又怎么表现得那么好?

若我们说老师不好,可是,教华人的也是同样的老师,且教学媒介也是国语,为什么我们马来人就表现不佳?”⁴⁰

然而,“较负责任”和“不到处溜达”的马来女学生则免于受到批评。

⁴¹ 马哈迪肯定,马来男性大学生“并未把他们的时间与努力用到学习上”。⁴² 据此,他问道:“马来男性学生要到什么时候方会领会到他们对其种族、宗教与国家的责任?难道他们认为社会得永远扶持他们吗?”⁴³ 马哈迪还以讥讽的口气责问他们的无知:

“土著男性学生去了哪儿?他们是否对教育没有兴趣?或是,他们进入大学的资格太低?

难道这些男人认为女人得工作来供养他们?他们是否认为,若未来他们没有钱,他们可以娶个受过教育的女人,然后在经济上依存她?

这就是我们下一代的男人吗?”⁴⁴

显然,他们招来马哈迪的如斯严厉的评语并非仅仅是他们缺乏学习,而是这些男性马来学生“投入了其他活动”。⁴⁵ 或许他的本意是,有相当部分的这些未来的一代已投入当前的反对阵营里。

马哈迪本人是不屑于那些认为“回教是用来穿戴”而非“实践”的人。他对那些执着于回教教义的“形式”而非“实质”的态度,很早就表现于以下的一段演说里:

“我还记得,当我小时,发生了有关回教堂应否装电灯的剧烈辩论。吉打州人说,使用电灯是“忌讳”(haram);尸体也应由人来抬,而不可用装有引擎的车来载,因为引擎是给异教徒用的”。⁴⁶

同样地,他也不屑于某些人相信阿拉伯文化的优越性,只因回教源于阿拉伯进而模仿那些阿拉伯文化遗风。马哈迪还指出:“回教徒被要求培养兄弟情谊,但是在阿拉伯世界……他们却经常自相残杀”。⁴⁷ 马来人或回教徒对纪律的轻慢态度,让马哈迪愤怒地改变了他通常不批评其他(非西方)社会的作风,而大声指责:

“看看那些阿拉伯人,他们完全不会把握时机,也不尊重时间。这是何以,如果他们与犹太人打战而计划于早上9点展开攻势,他们实际上会在早上10点才行动,有些甚至是在早上11点或中午。有

者甚至拖到次日。试问,他们如何可能战胜?他们根本无纪律……因此,他们时常打败仗”。⁴⁸

对于马哈迪的这种思路,尚可举出跟上当前发展的更多新例;只是,马哈迪的基本观点,可从其《马来人的困境》与《挑战》二书中的论据找到。⁴⁹由于迫切地要保障马来人的生存,马哈迪甚至准备放弃马来人的特性(Malayness)——虽然,其他人可能要保存它,在语文或教育或甚至是宗教方式上。

有时为了要言之成理地脱离现行政策,马哈迪还得回归历史。比方说,当他要复办已被马来文教育取代了三十年的英文学校时,他会部分依据他所得知的一件事,即他父亲企图说服马来人父母,让他们的子女就读于当时吉打州第一间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政府英校的事例,而回忆起:“当华人与印度人在英校求学时,马来人则因害怕被基督教化而拒绝英校;因此,马来人变得更虚弱和更贫困”。⁵⁰只是,马哈迪的复办英校的计划并不能如愿!巫统最高理事会在2002年5月不接受此计划,而选取了弱化的妥协方案,即采用英语教导科学与数学。有时,马哈迪会为了挡开“历史的恐怖”,而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周旋,正如当他为“驾驭英文并不会削弱马来性与回教性”辩解时说:

“英语是普世性语文。若我们不学习它,我们就无法阅读。若我们要等[马来文]翻译版本,则很费时。

我们不可让这狭隘的马来语文观,使马来人坐失信息革命,进而让马来人退化,被轻视和看起来像个笨蛋。

相信我,若马来人不掌握好英语,他们将会再次被殖民化”。⁵¹

即便是接受“世界上的人不会因为要了解马来人而学习马来语文”⁵²这个观点,并同样支持新政策以逆转英语水平衰退的人(尤其是马来人),也会为这种马哈迪式的阴惨预测而光火。尽管如此,这种预测却是马哈迪的一贯思路。马哈迪从未消除掉,若马来人“失败”,就

会被再殖民的梦魇。

其实,马哈迪是怀疑马来人已失败。在2002年的巫统大会开幕礼上,马哈迪还因为辜负了马来人而相当激动地向他们致歉,一个月后,他在马来西亚哈佛俱乐部的晚宴中,似乎要彻底倾诉他的失望。他难受地提出:“若我们排除了非马来人对这个国家的经济贡献,马来西亚将不会比一些非洲的发展国家好到哪里去”。⁵³马哈迪这番话若发表于1969—70年,或许会得到同情的认可,就像他的《马来人的困境》般在马来社会内部引起共鸣——尽管书中有关马来人弱点的核心论证,受到各式各样的反驳。或者,若马哈迪在70年代中期发表这番话,人们会认为他在期待马来人的重大使命的到来,就像他的《挑战》一书里的文章一样,为NEP下的马来人展示新方向。在2002年中期听到这番话,许多非马来人(包括外国人)为马哈迪向来自负的率直喝彩;但是,我们试想一下,大多数耳闻这番话的马来人,不会因此而被激怒或觉得羞愧么?不管怎么说,我们应把这一番话视为马哈迪在1999年后,对“马来人的状况”所作出的长期反思的总结。那么,马哈迪这一明白无误的失望究竟因何而发?

有一个因素是可以马上排除掉的,由于时移势转,马哈迪所构想的“第二度困境”的背景不同于当初他构想“马来人的困境”(实则,可溯及1950年)⁵⁴时的背景;因此,不宜把他的第二度困境归因于当前的族群政治或关系的状态。虽说,族裔性难以从马来西亚的政治中除掉,但是,有迹象显示,类似过去的族际政治,即马来人与华人在经济、文化、语文方面严重失和主导政治局面,将不会重现。自1995年的大选以来,已可清楚地看到,非马来人政治已发展到历史性的死胡同,或安于现实(settled realism)的阶段。其中,“华人政治”已被削弱至“少数群体政治”(minority politics)的地位;“华基政党”因此会策略性地支持最强的马来政党——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巫统。易言之,虽然马哈迪引人遐思地说,“有朝一日,我们将会有一个非马来人首相”,⁵⁵华基政党实质上已难动摇大局。实事求是

地说,最大的华基政党马华公会能在1995及1999年的选举中表现不俗,正是因为它已降低了其政治要求与抱负。作为巫统的副手,及尔后的“华人的保护者”,马华公会只能扮演“吹一吹、闹一闹”的角色而已。民政党连这个角色也扮演不了,它在槟州的那个没保障的首长职位,补偿了它在全国性政治中失去的分量。至于缺乏马来选票的行动党,也只能在与主要的“马来基础政党”建立坚实的联盟上,方可取得有分量的马来选票;否则,只好自囿于一贯孤军作战的抗衡中。

要把非马来人同化于马来文化中、而引起非马来人的恐惧与抵抗的历史条件,也已成为过去。巫统已充分地缓和它在语文、教育与文化方面对华社的施压;而回教党则已实质上支持了这方面的“少数群体权利”。若这方面有时出现争论,它也不过是“协商-施压”(negotiation-pressure)连续体上的处理失误,而不再具有过去那种难以解决的族群政治的特征。比方说,有关宏愿学校(Vision Schools)和在华校用英文教数理的争论,无非是小争端。引发这些争端的主因,在于政府与董教总之间心存疑虑,以及官僚可能做出的不适当言行,而非在于政府意图“改变华校的性质”。即使马哈迪在2000年抨击“1999年华团大选诉求”(简称“诉求”),若考虑及他对华人父母和学生,以及华人文化和商业的惯常赞许,再与他对马来人的态度与依附的刻薄评语相比,就显示出抨击“诉求”并非什么大事。他猛烈斥责“诉求”是因为,当时他想专注于他仍然在唱独角戏而又徒劳无功的马来人团结课题。

要领会马哈迪对马来人致歉的用意,真正的线索在于,把他的致歉反过来解读;也就是,不是他对不起马来人,而是马来人太过让他失望!马来人庞大而未完成的任务,再次使他对马来文化与价值观缺乏信心,甚至是厌烦。此点,也可由以下的演说中见其端倪:

“少数人有志于打造一个顽强、独立且不必依靠拐杖的马来民族,但他们所面对的困境是:他们很可能就此不受马来人欢迎,也因此失去能力影响马来人在文化上与价值观上作出必要的改变”。⁵⁶

于此,我们不必深究,马哈迪在论及他和巫统失去民心时,竟狡赖地没有提及安华被殴打之事。在《马哈迪主义的悖论》一书里,我已提示到,“马哈迪认为”,除了“新马来人”之外,“马来人的未来无人可托”。这群“新马来人”,“从历史发展来看,是大体上由政府‘塑造’的马来资本家的‘新’阶层以及‘新’马来中产阶级。这些‘新’阶层的‘塑造’是依据这样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里,马来人要与非马来人平起平坐”。⁵⁷就此点而论,马哈迪把他的遗憾的矛头指向由国家资助以及与巫统有关联的综合企业,才会符合他的宏愿与分析。被他挑选并纵容的赢家,并未能实现马哈迪的宏伟抱负。但是,尽管马哈迪痛责马来社群中的许多阶层,他依然护卫这些综合企业的巨头与舵手。在马哈迪看来,他们都是优秀商人与经营者;他们的地位动摇,是由于货币投机者的破坏。

由此可以确定,马哈迪既是其阶级的化身,也是其种族的化身。对他来说,推动这个阶级的抱负,也就是推动民族的理想。在顺境时,他满怀信心地说:

“今日的马来人,与往昔的马来人不同。我们与我们的文化已改变[原文如此]。现在,我们已有能力做以前我们做不来的事,我们开拓了很多领域,也取得了成功”。⁵⁸

当逆境降临时,他又会反过来把这个阶级的失败推卸给文化上的弱点。在这“第二度困境”,马哈迪把这些综合企业的特定缺点,一般化为马来种族的不足。

因而不难理解,何以马哈迪认定,在这么一个美好的马来权力至高无上、重组目标、NEP的各类配额及“双轨实绩制”(dual track meritocracy)的形势下,那么多的马来(男)学生、学者、公仆、专业人士与小商人竟然“力有不逮”。然而,并不仅马哈迪一人这样想。经过反巫统的兴起,他本人也对许多这些反巫统者怀有私心。但是如果把“力有不逮”视为,由“建设性保护”(constructive protection)塑造的“软政治环境”下的副产品,那么这种“力有不逮”就不会令人惊讶,

而这正是马哈迪在其《马来人的困境》一书里所预测的。同理,这些“土著工商群体”也如其他得势社会团体一样,不会自愿放弃他们长久以来享有的特权。假设,“不幸地,他们把这些拐杖视为他们在国内的优越地位的象征”,⁵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思维定势源自合理化NEP扶弱行动的意识形态架构;也就是,由于马来人“相对落后”,因此需要在巫统的政治支配下保证为马来人提供所需的“特殊地位”。

较不明显和潜在地更棘手的则是,被1997年7月蚀刻并潜伏于马哈迪诊断后面的未来轮廓。本来,NEP的构想在于透过消灭贫穷和重组来实现社会平等。就当时的全球环境言,“改革”即意味运用政府的介入来减缓社会经济不平等和改善民众的生活状况。此点也可由敦拉萨在一个巫青座谈会中对NEP的辩护中得知:

“在50和60年代,我们让民营企业(private industry)来达致那个时代的目标;但是,现在,我们得用‘政府参与’的手段,来实现适宜我们的情况以及土著所渴望的各类目标与目的。

若这就是所谓的‘福利主义的宗旨’,那么,我们不仅坚持,而且落实了这个‘福利主义的宗旨’。它是透过土著银行、国企(Pernas)、玛拉(MARA)、农业银行、国家电力局、马来亚铁道局,以及诸如城市发展局及其他即将设立的机构,得以落实”。⁶⁰

作为NEP的总设计师,敦拉萨并不怯于争辩NEP比“政府参与”或“福利主义”走得更远:

“我们的[新经济]政策,在概念上与锡蒙(Paul Sigmund)所谓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并无二致。按照锡蒙的说法,这个社会主义,是‘向往社会平等和渴求快速经济发展的激情所推动的……它是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nationalist socialism)……’。”⁶¹

拉萨在英国留学时,已是英国工党与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成员。当他在1971年,也就是冷战时期发表上述论辩时,必须解决大量贫

穷与族际经济不平衡,他自然会“拒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而选择在NEP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外衣下,提出他的国家资本主义。⁶²这样说来,敦拉萨的NEP概念与现行的“改革”概念,并没有多少共通性。现行的“改革”概念已被执迷于新自由主义的竞争所腐化,因而一贯地采取亲兄市场和反福利措施。更直截了当地说,在接近马哈迪时代的尾声时,早期NEP之下依赖政府引导的“马来信托机构”(Malay trusts),已让位给马来西亚大宝号之下受政府庇护的“马来人综合企业”。同理,对社会平等的重视,也已让位给对竞争的执迷。若马哈迪现在要马来人抛弃政府提供的“拐杖”和变得具竞争力,那么,他惯说的“马来人自助”确是与民营化时代的步调更合拍,而非NEP早期的“政府参与”。

要理解马哈迪无休止地给“马来人的状况”把脉的转折现象,最要紧的是必须想像,马哈迪是在为马来人——那些尚未成功或足够安稳的马来人——作出意识形态上的准备,以便放弃他们曾视为当然的大规模补助、目标与配额。其基本的理由是经济性的。过去的三十年为马来人最大的社会流动时期,但是,很清楚的是,尽管有着2020宏愿的成长预测,过去三十年的那种社会流动速率,恐难以保持。换言之,未来的马来人恐难再享受到类似NEP下政府主导的高成长、民营化与马来西亚大宝号所提供的同等社会经济收益。1985-86年的经济萎缩,是NEP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当时,马哈迪政权采取“搁置NEP”、削减政府开支与吸引大量(东亚)外来直接投资(FDI)的方略来消除危机;之后,马哈迪政权就选择有利于马来大企业的“成长”先于“分配”方针。这一政策选择的主要政治后果,便是巫统的内部动乱。1997年7月的崩溃,可说是NEP的第二次,甚至可说是最大的危机。其结局则是,为了挽救NEP而保住了那些综合企业。其政治余波则是,安华命运的转变以及“烈火莫熄”对巫统的挑战。

尽管如此,按马哈迪的估计,个别马来人对企业资本的占有率仅占7%。⁶³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对策——严厉的结构性的



漫长的过渡

调整与猛烈的亲市场改革，马哈迪的揶揄则是正确的；因为，若采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措施，它将会动摇乃至结束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事业，而且像印尼那样，不能为那些被波及且脆弱、广大、非企业领域的民众提供救济。只是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当权者的“经济护盾”预示了，在下一个经济危机时，它与全球经济的接合将更具争议性。考虑及全球性FDI在流量与结构上的变动，以及工业从昔日受重视的地点如大马迁徙出去的趋势，到时政府恐不易寻求一个在政治上可被接受的解决方案——若其经济依然建立在增长的FDI流入额的基础上。一个小的开放经济体如大马，很难持续利用半自立更生的措施来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多变与循环。就国内而言，马来人向来就有一种NEP下的防卫性观点；就是，不论在哪一方面，只要马来人“尚未准备就绪”，就应“抑制”非马来人（即华人）。在马哈迪宣布辞职的二天前，他坚定地指出，他看不出抑制非马来人社群会有助于马来人克服其弱点，正如他说：

“如果我们扣除华人，及所有华人所建设的与所拥有的，那么，马来西亚就不会有大小城镇，就没有商业与工业，也不会有资金给马来人提供补贴、支援与设施。”⁶⁴

当马哈迪不是要装腔作势时，很少马来政治人物像他那样理解到（或会公开承认），自怨自艾于本身的不足、过去的受苦或现在的痛苦，

并不会为自己赢来尊重。要赢得别人的尊重，便须达到别人已经到达的标准，如发达国家、成功的社群、进步的种族、富有竞争力的个人标准。当然，“为了帮助自己”，一个人可以悲叹自己的“相对落后”状况，依靠国家权力，及运用社会工程，来“略为扭曲实相”。但是，直到完全依靠努力达到真正的成就之后，他才会有自尊与自豪。而且最重要的是，马哈迪本人极珍惜自尊与自豪，如同他于2002年的巫统大会中再次提示：

“大约在六十五年前，我意识到我是位马来人，那时我也意识到，我是来自一个被人看不起而且被殖民化的种族，一个没有荣誉的种族，一个当与他族比照时，会感到自卑的种族。”⁶⁵

现在，情况是否有所不同呢？尽管在这个世界里，马来西亚在政治上分量不大，但是，马来西亚也可声称它略有所成：它不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么贫困无助；它的社会也较其他回教徒社会来得“进步”；而亚洲若真能趋向兴隆，马来西亚也可能和亚洲的兴隆并驾齐驱。反讽的是，在马来西亚国内，尽管马来人掌握了政权优势，他们若无“拐杖”，在事实上或想像中，便不能与他人竞争。马哈迪没有拒斥NEP，尽管在哈佛俱乐部晚宴中的一些听众灵敏地希望和赞同他这么做。马哈迪预见了一个越来越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局面，以致“马来人的政党”（巫统）可能不得不作出以下选择：要么，现在就对大部分的马来人采取强制他们“自立”的措施；要不然，就冒险面对一旦巫统丧失“实现发展”的能力、便会遭受身败名裂的未来。《新海峡时报》便提出以下警告来呼应马哈迪：

“后 NEP 时代的马来人不应全面抱持受害者地位，以至于把所有的失败均归咎于他族、精英层与政府……政府的扶弱政策从未有意把马来族幼稚化。自立更生，是的，以及自助型资本主义，将为马来人的集体公民我（collective civic self）增添尊重与荣誉。马来人必须勇于迎接和克服自立与竞争的挑战”。⁶⁶

拐杖与幼稚现象、自立更生与自助型资本主义、尊重与荣誉、“集体公民我”与竞争,这些话究竟隐含了什么?痛苦地摆明来说,原初的“马来人的困境”,就如马哈迪在1976年开门见山地坚称,“为了要提升马来人,而得牺牲一些非马来人”,⁶⁷但在“第二度困境”中,他预见,得要牺牲一些“后NEP时代的马来人”,以便提升其他人。

就马哈迪主义而言,若第二度马来人的困境是,得在无拐杖的竞争与自立性牺牲中作一无奈的选择;那么,还有什么比这个宏业的解体更令人感到悲哀呢?或许,马哈迪抵达这个可悲的结论,源于马来综合企业的崩溃所带来的挫折感,或被马来人对他的顽抗(源自于“烈火莫熄”对他的报应)所激怒。不管怎么说,也只有在其政治生涯中,随着世界的不时变动,努力观察并解决一个又一个马来人困境的马哈迪,方会作出如此的演说。

自1998年的“烈火莫熄”以来,马哈迪就不时地批评马来人易于忘恩负义,以及他们在年轻马来人中对巫统“灌输憎恨”。不管怎么说,马哈迪本身极重视历史。他是最不忘记取,马来西亚政治中的几个转折点都是在马来群众闯入政治舞台后促生的:他亲眼所见的1946年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1969年5·13事件;1998年“烈火莫熄”。第一个事例促成巫统诞生;第二个迫使巫统彻底改变政治经济结构;第三个则似乎预示巫统将沦为无关紧要。未来的马来政治及马来西亚政治所面对的问题是,马哈迪之后的掌权者是否将会忘掉,或任听被忘掉。

1 Mahathir (2000f).

2 “Dr Mahathir: It's Malay Dilemma II”〈马哈迪:这是第二个马来人的困境〉, *New Straits Times*, 2001-6-22.

3 比方说,有位黄姓读者在《星报》写道:“依然有人观察,在现在到2003年10月之间,马来西亚有可能会遭受某类大危机;对不起,马哈迪医生,你得无限期地在位,国家需要你。”(June H.L. Wong, 'Waking up to an imminent loss', *The Star*, 2002-6-28).

4 正确地说:“在2000-6-22,美国的情报局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题为‘后马哈迪马来西亚’的会议。其中,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外交部与国防部也有

派人参与。”见“U.S. Thinks Post-Mahathir”〈美国正思考后马哈迪时代〉,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02-7-13, p.8

5 “Interview: Mahathir on race, the West and his successor”〈专访:马哈迪论种族、西方及继任者〉, *Time*, 1996-12-9, p.28

6 Mahathir (2001a).

7 Mahathir (2000f).

8 Mahathir, 引自 Rehman Rashid 的“Why I Took to Politics”〈为什么我投身于政治〉, *New Straits Times*, 1986-7-5.

9 同上。

10 同上。

11 Halim (1999: 187)

12 我觉得应该说明的是,这“轴心”(axis)的用语,并非抄自小布什具有私心的所谓“邪恶轴”(axis of evil)。早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我已在一篇学术论述中分析了马来政治中的这个轴心概念。见 Khoo (2001)。

13 Grouch (1980: 17.32-33).

14 Searle (1999).(译注:“本真性资本家”(real capitalists)即不依存于国家保护而能自力更生的资本家。)

15 Mahathir (2000a).

16 见《今日大马》(*Malaysiakini*)的辩论;论者包括:Farish A. Noor, 'The failure of reformasi thinkers'〈“烈火莫熄”思想家的失败〉(2003-4-26); Fathi Aris Omar, 'Memurnikan makna kesedaran berpolitik'〈纯化政治觉醒的意义〉(2003-4-28); Marissa Dell, 'Reformasi "thinkers" should examine themselves'〈“烈火莫熄”思想家应自我检讨〉(2003-4-30); Umar Mukhtar, 'Reformasi is alive and well'〈“烈火莫熄”尚是活生生的〉(2003-4-30)。见 Khoo (2002a)。

17 Mahathir (2000f).

18 同上。

19 Mahathir (2002c).

20 Ahmad (2002).

21 Mahathir (2002b).

22 同上。

23 Mahathir (2000e).

24 Armstrong (2000).

25 Wain (2000).

26 Mahathir (2002b).

27 同上。

28 “马哈迪昨天说,当前马来人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可比喻为‘第二度的马来人困境’。”(‘Dr Mahathir: It's Malay Dilemma II’, *New Straits Times*, 2001-6-22).

29 Mahathir (2000c).

- 30 Mahathir (2000d).
- 31 'Anak Melayu bukan bodoh' (马来人的孩子并不笨), *Harian Metro*, 2001-8-26.
- 32 Mahathir (2000d).
- 33 'Dr M: Assert supremacy' (马哈迪: 申张至高无上权力), *The Star*, 2000-6-22.
- 34 Mahathir (2000d).
- 35 'PM: In business, we must sell to all and not be selective of race' (首相: 做生意, 应卖给所有人, 而不应选择某一族群), *Straits Times*, 2000-2-27.
- 36 'PM on downfall of entrepreneurs' (首相论企业家的崩溃), *The Star*, 2000-12-6.
- 37 Mahathir (2001a).
- 38 同上。
- 39 同上。
- 40 'Examine why we fail, PM tells Malays' (首相告诉马来人, 要检讨我们为什么失败), *The Star*, 2001-1-16.
- 41 以及“感谢上苍, 若不是女性学生, 大学里的马来学生将减半。”见 'PM: Malay girls holding up quotas', *The Sun*, 2001-6-22.
- 42 Mahathir (2001a).
- 43 'PM: Malay girls holding up quotas', *The Sun*, 2001-6-22.
- 44 'Dr M: Where have the bumi male students gone to?' (首相: 土著男生都去了哪儿?), *The Star*, 2000-11-4.
- 45 'PM: Malay girls holding up quotas', *The Sun*, 2001-6-22.
- 46 Mahathir (2001b).
- 47 'PM: In business, we must sell to all and not be selective of race', *Straits Times*, 2000-2-27.
- 48 Mahathir (2001b).
- 49 Mahathir (1986).
- 50 Mahathir (2000c).
- 51 'Master English for your own good, Malays urged' (马来学生被催促, 为自己掌握好英语), *The Star*, 2001-6-22.
- 52 'We work by consensus, says Dr M' (我们依据共识行事), *The Star*, 2000-12-29.
- 53 Mahathir (2002c).
- 54 Khoo (1995: 85).
- 55 'Dr M: One day we'll have a non-Malay PM' (首相: 有朝一日, 我们将有个非马来人首相), *The Star*, 2000-6-18.
- 56 Mahathir (2002c).
- 57 Khoo (1995: 338).
- 58 引自 'Malays can be successful in IT' (马来人可在信息工艺中有所成就), *Business Times*, 1997-2-27.
- 59 Mahathir (2002c).
- 60 Abdul Razak (1971).
- 61 同上。
- 62 同上。
- 63 Montagnon (2000).
- 64 'PM: Easy to split the Malays' (首相: 马来人易于被分裂), *The Star*, 2001-6-21. 据称, 在 2001-5-17, 马哈迪曾与一批选定的国立大学与学院学术人员(绝大部分为马来人)会面。马哈迪在会中论及马来学生成绩欠佳及大意上由于政治活动而忽略学业时, 曾提到: “已经有人提议……当我们 [马来人] 玩乐时, 不要让他们 (华人) 学习。不! 我们不能阻止华人。”这段引文是转自一篇非官方及不完整的马哈迪谈话译文 (Speech at a Meeting with Academic Staff of Public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Putrajaya), 并贴在网上 <http://members.tripod.com/~mahazalimtwo/210501zaf.html>
- 65 Mahathir (2002b).
- 66 'No one to blame but themselves' (他们只能自责, 不能归咎他人), *New Straits Times*, 2002-6-12.
- 67 引自 Sonny Yap 之 'The Prodigal Who Made His Way Up' (步步上升的浪荡子), *New Nation*, 1976-3-9.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Entries for non-western names are cited and arranged alphabetically according to surnames or first names, without the use of commas, except where the first name is an honorific, or where the name follows western convention in the original source. Sources for quotations from newspapers and articles without authors' names in periodicals are given in the endnotes together with bibliographic details.

I. Writings by Mahathir Mohamad

- _____ (1970) *The Malay Dilemma*, Singapore: Donald Moore for Asia Pacific Press.
- _____ (1986) *The Challenge*, Petaling Jaya, Selangor: Pelanduk Publications; translated from *Menghadapi Cabaran*, Kuala Lumpur: Pustaka Antara, 1976.
- _____ (1991) 'Malaysia: The Way Forward', Work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augural Meeting of the Malaysian Business Council, Kuala Lumpur, 28 February, reprinted in *New Straits Times*, 2 March 1991.
- _____ (1993) 'The Second Outline Perspective Plan, 1991-2000', in Ahmad Sarji Abdul Hamid (ed.) *Malaysia's Vision 2020: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Im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Petaling Jaya, Selangor: Pelanduk, pp. 421-447.
- _____ (1998a) 'Call Me a Heretic', *Time*, 14 September, p. 21.
- _____ (2000a) 'Of Malays, mega projects and democracy', *New Straits Times*, 11 January.
- _____ (2000b) 'Tackling problems methodically', *New Straits Times*, 2 May.
- _____ (2002a) *Globalisation and the New Realities*, Putrajaya: Prime Minister's Office.
- Mahathir Mohamad and Shintaro Ishihara (1995) *The Voice of Asia*,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translated by Frank Baldwin.

II. Speeches by Mahathir Mohamad

- _____ (1995a) Speech at the National Summit on 'Achieving Zero Inflation', Kuala Lumpur, 12 September, reproduced as 'Towards Zero Inflation: A New National Agenda', in Hashim Makaruddin (ed.) (2000) *Managing the Malaysian Economy: Selected Speeches by Dr Mahathir Mohamad,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Vol. 2, Putrajaya: Prime Minister's Office, pp. 213-17.
- _____ (1995b) Speech at the Dialogue on The Malaysian Economy and Capital Market, London, 26 September, reproduced as 'The Malaysian Economy and Capital Market', in Hashim Makaruddin (ed.) (2000) *Managing the Malaysian Economy: Selected Speeches by Dr Mahathir Mohamad,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Vol. 2, Putrajaya: Prime Minister's Office, pp. 207-11.

- _____ (1996a) Speech at the New Asia Forum, Kuala Lumpur, 11 January, reprinted as 'An Asian Renaissance for a New Asia', in Hashim Makaruddin (ed.) (2000), *Politics, Democracy and the New Asia: Selected Speeches by Dr Mahathir Mohamad,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Vol. 2, Putrajaya: Prime Minister's Office, pp. 173-80.
- _____ (1996b) Speech at St Catherine's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16 April, reproduced as 'Market Economy and Moral and Cultural Values', in Hashim Makaruddin (ed.) (2000) *Managing the Malaysian Economy: Selected Speeches by Dr Mahathir Mohamad,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Vol. 2, Putrajaya: Prime Minister's Office, pp. 197-205.
- _____ (1996c) Speech at the 29th Internation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Washington, 21 May, reprinted as 'It's time Asia be accorded due respect', *New Straits Times*, 22 May 1996.
- _____ (1996d) Speech at the Second Langkawi International Dialogue, Pulau Langkawi, 29 July, reprinted as 'Business partnership a success story' in *New Straits Times*, 30 July 1996.
- _____ (1996e) Speech at the Beijing Dialogue, Beijing, 26 August, reprinted as 'Dawn of Asian Century is a myth', *New Straits Times*, 27 August 1996.
- _____ (1997a)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for Investors in the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5 January, reproduced as 'A Global Bridge to the Information Age', in Hashim Makaruddin (ed.) (2000)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Selected Speeches by Dr Mahathir Mohamad,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Vol. 2, Putrajaya: Prime Minister's Office, pp. 97-109.
- _____ (1997b) Speech at the 5th Gulf Economic Forum, Bahrain, 8 April, reprinted as 'Towards a Global Commonwealth', *New Straits Times*, 10 April 1997.
- _____ (1997c) Speech at the National Congress on Vision 2020, Kuala Lumpur, 29 April, reprinted as 'Our Vision 2020 wins over nations', *The Star*, 30 April 1997.
- _____ (1997d) 'MSC: A Global Bridge from Europe to Asia for the World Century', Speech at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20 May, reproduced as 'A Global Bridge to the World Century', in Hashim Makaruddin (ed.),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Selected Speeches by Dr Mahathir Mohamad,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Vol. 2, Putrajaya: Prime Minister's Office, pp. 75-83.
- _____ (1997e) Speech at the 30th 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Subang Jaya, Malaysia, 24 July, reprinted as 'An Asean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Star*, 25 July 1997.
- _____ (1997f) Speech at the Multimedia Asia 1997 Conference, Kuala Lumpur, 16 September, reproduced as 'Reinventing Our Common Future', in Hashim Makaruddin (ed.) (2000)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Selected Speeches by Dr Mahathir Mohamad,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Vol. 2, Putrajaya: Prime Minister's Office, pp. 61-66.
- _____ (1997g) Speech at the Annual Seminar of the World Bank, Hong Kong, 20 September, reprinted as 'Asian Economi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eign Affairs Malaysia*, Vol. 30, No. 3, pp. 61-69.
- _____ (1997h) Speech at the Canadian Investment Conference, Ottawa, 21 November,

reproduced as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Cyber Revolution', in Hashim Makaruddin (ed.) (2000)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Selected Speeches by Dr Mahathir Mohamad,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Vol. 2, Putrajaya: Prime Minister's Office, pp. 39-48.

_____ (1998b) Speech at the UMNO General Assembly, Kuala Lumpur, 19 June, reprinted as 'All Malaysians should defend our sovereignty', *New Straits Times*, 20 June.

_____ (1998c) 6th Prime Ministerial Lecture of the Harvard Club of Malaysia, Kuala Lumpur, 5 October, reproduced as 'Managing an Economy in Turmoil', in Hashim Makaruddin (ed.) (2000), *Managing the Malaysian Economy. Selected Speeches by Dr Mahathir Mohamad,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Vol. 2, Putrajaya: Prime Minister's Office, pp. 77-87.

_____ (2000c) New Year's Day Speech 2000, reprinted as 'Globalisme mengancam negara', *Utusan Malaysia*, 1 January 2000.

_____ (2000d) Speech at the Official Ceremony of the Congress of Young Malay Professionals, Kuala Lumpur, 26 February, reprinted as 'Kekalkan Tamadun Melayu moden', *Mingguan Malaysia*, 27 February 2000.

_____ (2000e) Speech at the UMNO General Assembly 2000, Kuala Lumpur reprinted as 'The party's unfinished struggle', *The Star*, 12 May 2000.

_____ (2000f) Winding-up Speech at the UMNO General Assembly 2000, Kuala Lumpur, 14 May, reprinted as 'Dr Mahathir: Important for leaders to meet grassroots', *New Straits Times*, 15 May 2000.

_____ (2001a) Ucapan Perdana Menteri pada Konvensyen Perdana Pendidikan Kebangsaan 2001, Institut Aminuddin Baki, Genting Highlands, 19 April, reprinted as 'Pendidikan penentu kejayaan bangsa, negara', *Berita Harian*, 20 April 2001.

_____ (2001b) Winding-up Speech at the UMNO General Assembly 2001, 24 June, reprinted as 'Dr M: Important to obey the president', *New Straits Times*, 25 June 2001.

_____ (2002b) Speech at the UMNO General Assembly, Kuala Lumpur, 20 June, reprinted as 'Good values destroyed by hate' in *New Straits Times*, 21 June 2002.

_____ (2002c) Speech at the Harvard Club of Malaysia Dinner, Kuala Lumpur, 29 July, reprinted as 'The New Malay Dilemma', *New Straits Times*, 30 July 2002.

III. Books and Articles

Abdul Razak, Tun (1971) Speech at the Development Seminar organized by UMNO Youth, Morib, Selangor, 25 July, reprinted in *Dasar Ekonomi Baru: hikmat, kebajikan dan peranan parti*, Petaling Jaya: UMNO, pp. 3-21.

Adam, Christopher and Cavendish, William (1995) 'Early Privatization', in Jomo K. S. (ed.) *Privatizing Malaysia: Rents, Rhetoric, Realitie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pp. 98-137.

Ahmad Hussein, Syed (2002) 'Muslim Politics and the Discourse on Democracy', in Francis Loh Kok Wah and Khoo Boo Teik (eds) *Democracy in Malaysia: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Richmond: Curzon Press, pp. 74-107.

Amin, Samir (1993) 'Replac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Monthly Review*, Vol. 45, No. 5, pp. 1-12

Anderson, Benedict (1998)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_____ (2001) 'Asian Nationalism', *New Left Review*, 9 (May-June): 31-42

Anwar Ibrahim (1996) *The Asian Renaissance*,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Appell, Douglas and Lopez, Leslie (1997) 'Foreign Funds to Shun Choreographed Buying',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2 September.

Armstrong, Karen (2000) *Islam: A Short History*, London: Phoenix Press.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1999) *69th Annual Report* (1 April 1998 ñ 31 March 1999), Basel.

Bank Negara Malaysia (1998) *Annual Report 1997*, Kuala Lumpur.

_____ *Monthly Statistical Bulletin*, Kuala Lumpur; various years.

Beeson, Mark (2000) 'Mahathir and the Markets: Globalisation and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Autonomy in Malaysia', *Pacific Affairs*, Vol. 73, No. 3 (Fall): 335-51.

Bhagwati, Jagdish (1998) 'The Capital My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e in Widgets and Trade in Dollars',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 3.

Camus, Albert (1956) *The Rebe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translated by Anthony Bower.

Case, William (2003) 'The Anwar Trial and its Wider Implications', in Colin Barlow and Francis Loh Kok Wah (eds) *Malaysia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New Centur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p. 119-31.

Cheah Boon Kheng [谢文庆] (1998)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Melakan Empire: Moral Judgement in Tun Bambang's *Sejarah Melayu*',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XXI, Part 2, 275 (December): 103-21.

_____ (2002) *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Singapore: ISEAS.

Crouch, Harold (1980) 'The UMNO Crisis: 1975-1977', in Harold Crouch, Lee Kam Hing and Michael Ong (eds) *Malaysian Politics and the 1978 Election*,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1-36.

Elegant, Simon (2000) 'Maverick Reform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2 June, p. 34.

Farish A. Noor (1999) 'Looking for Reformasi: The Discursive Dynamics of the Reformasi Movement and its Prospects as a Political Project', *Indonesia and the Malay World*, Vol. 27, No. 77 (March): 5-18.

Financial Times (1995) *Banking in the Far East 1995*, London: FT Financial Publishing.

Funston, John (1998) *Political Careers of Mahathir Mohamad and Anwar Ibrahim: Parallel, Intersecting and Conflicting Lives*, Bangi: Institut Kajian Malaysia dan Antarabangsa (IKMAS) Working Papers No. 15.

_____ (2000) 'Malaysia's Tenth Election: Status Quo, Reformasi, or Islamiz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2, No. 1 (April): 23-59.

Ghani Ismail (1983) *Razaleigh Lawan Musa, Pusingan Kedua, 1984*, Taiping, Perak: IJS Communications.

- Godement, Francois (1998) 'The Politics of a Crisi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8 January, p. 28.
- Gomez, Edmund Terence and Jomo K. S. (1997) *Malaysia's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 Patronage and Profi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im Salleh (1999) 'Develop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Social Stability in Malaysia',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99*, Singapore: ISEAS, pp. 185-203.
- _____ (2000) 'PAS and UMNO in Kelantan and Trengganu',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the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 of 1999,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Penang, 1-2 April.
- Henwood, Douglas (1997) *Wall Street: How It Works and for Who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Hiebert, Murray and Jayasankaran, S. (1997) 'What Nex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8 September, pp. 62-64.
- Higgott, Richard (2000)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in Richard Robison, Mark Beeson, Kanishka Jayasuriya and Hyuk-Rae Kim (eds) *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Wake of the Asian Crisis*, London: Routledge, pp. 261-82.
- Hilley, John (2001) *Malaysia: Mahathirism, Hegemony and the New Oppos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 Husin Ali, Syed (1996) *Two Faces*, Petaling Jaya, Selangor: INSAN.
- Hwang, In-Won [黄仁元] (2001) "Changing Conflict Configurations and Regime Maintenance in Malaysian Politics: From Consociational Bargaining to Mahathir's Dominance", PhD dissert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 Jayasankaran, S. (1996) 'Equal Opportunit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5 July, p. 16.
- _____ (1997) 'High-Wire Ac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9 October.
- _____ (1998) 'Art of the Bail',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30 April, pp. 62-63.
- Jayasankaran, S. and Hiebert, Murray (1998), 'Calling for Dai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 February, p. 14.
- Jomo K. S. (1995) 'Overview', in Jomo K. S. (ed.) *Privatizing Malaysia: Rents, Rhetoric, Realitie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pp. 42-60.
- _____ (2001a) 'Capital Controls', in Jomo K. S. (ed.) *Malaysian Eclipse: Economic Crisis and Recovery*, London: Zed Books, pp. 199-215.
- _____ (ed.) (2001b) *Malaysian Eclipse: Economic Crisis and Recovery*, London: Zed Books.
- Khoo Boo Teik [邱武德] (1995) *Paradoxes of Mahathirism: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Mahathir Mohamad*,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7) 'Malaysia: Challenges and Upsets in Politics and Other Contestations', in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97*, Singapore: ISEAS, pp. 163-84.
- _____ (1998) 'Reflections on the 1998 UMNO General Assembly', *Aliran Monthly*, Vol. 18, No. 6 (July): 2-7
- _____ (1999a) 'The Value(s) of a Miracle: Malaysian and Singaporean Elite Constructions of Asia',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 23, No. 2 (June): 181-92.
- _____ (1999b) 'Mahathir and foreign media no bitter foes', *The Nation*, Bangkok, 5 August.
- _____ (2001)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in Malay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 Garry Rodan, Kevin Hewison and Richard Robison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East Asia: Conflicts, Crises, and Change*, 2nd revised edition,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78-205.
- _____ (2002a) 'Can There be Reformasi Beyond BA?', *Aliran Monthly*, Vol. 22, No. 1, pp. 2-7.
- _____ (2002b) 'Writing Reformasi', *Kyoto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 Issue 1, *Power and Politics* (<http://kyotoreview.cseas.kyoto-u.ac.jp/issue0/index.html>), March.
- Khoo, Philip (1999)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A Malaysia Not Governed by the BN?', *Aliran Monthly*, Vol. 19, No. 5 (June): 2-8.
- Kua Kia Soong [柯嘉逊] (1996) *Inside the DAP*, 1990-9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PB.
- Kulkarni, V. G., Hiebert, Murray and Jayasankaran, S. (1996) 'Tough Talk',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4 October, pp. 23, 26-27.
- Lim Chong Eu [林苍佑] (1983) Speech at the Cultural Congress, Chinese Town Hall, Penang, March 27, 1983, reproduced as 'Malaysian Culture', in Lim Choon Sooi (1990), *Towards the Future: Selected Speeches and Statements of Lim Chong Eu 1970-1989*, Penang: Oon Chin Seang, pp. 122-26.
- Lim Kit Siang [林吉祥] (1998)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 _____ (2003) 'The Challenges of Opposition Politics in Malaysia - Checking Grow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Ethnic Repolarization', in Colin Barlow and Francis Loh Kok Wah (eds) *Malaysia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New Centur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p. 159-71.
- Loh Kok Wah [罗国华], Francis (1997) "'Sabah Baru" dan Pujukan Pembangunan: Penyelesaian Hubungan Persekutuan-Negeri Dalam Malaysia', in Francis Loh Kok Wah (ed.) *Sabah and Sarawak: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and Federalism*, Special Issue, *Kajian Malaysia*, Vol. XV, Nos 1 and 2 (December): 175-97.
- _____ (2001) 'Where Has (Ethnic) Politics Gone? The Case of the BN Non-Malay Politician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Robert Hefner (ed.) *The Politics of Multiculturalism: Pluralism and Citizenship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 183-203.
- _____ (2002) 'Developmentalism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tic Discourse', in Francis Loh Kok Wah and Khoo Boo Teik (eds), *Democracy in Malaysia: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Richmond: Curzon Press, pp. 19-50.
- Lopez, Leslie (1997) 'Malaysia Plans Stock-Purchase Initiative That Alienates, Alarms Foreign Investors',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4 September
- Lopez, Leslie and Pura, Raphael (1997) 'Mahathir Tightens Control of Market',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2 September.
- McCarthy, James (1994) 'Asia's Future Wall Street', *Malaysian Business*, 16 March.
- Malayan Law Journal (1999) *The Anwar Ibrahim Judgement*, Kuala Lumpur.

- Malaysia (1998), National Economic Action Council White Paper, *Status of the Malaysian Economy* (<http://www.topspot.com/NEAC/>).
- Mahani Zainal Abidin (2000) 'Malaysia's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Crisis Management', in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00*, Singapore: ISEAS, pp. 184-99.
- Maznah Mohamad (2000) 'The UMNO Malaise', *Aliran Monthly*, Vol. 20, No. 2, pp. 2-6.
- _____ (2002) 'Puteri UMNO: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 New', *Aliran Monthly*, Vol. 22, No. 8, pp. 2-6.
- _____ (2003) 'The Contest For Malay Votes in 1999: UMNO's Most Historic Challenge?', in Francis Loh and Johan Saravanamuttu (eds) *New Politics in Malaysia*, Singapore: ISEAS, pp. 66-86.
- Mohamed Ariff (1996) 'Effect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on Four Southeast Asian Financial Markets',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12, No. 3 (March): 325-38.
- Montagnon, Peter (2000) 'Mahathir attacks US pressure', *Financial Times*, 6 October.
- Musa Hitam (2000), Speech at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UMNO Branches in the Johor Baru Division, February 19, 2000, reprinted as 'What has happened to UMNO?' in *Aliran Monthly*, Vol. 20, No. 2, 2000, pp. 7-10.
- Ng Tien Eng [黄田荣] (2003) 'The Contest for Chinese Votes: Politics of Negotiation or Politics of Pressure', in Francis Loh and Johan Saravanamuttu (eds) *New Politics in Malaysia*, Singapore: ISEAS, pp. 87-106.
- Ong-Giger, Kim (1997) 'Malaysia's Drive into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Cruising into the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in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97*, Singapore: ISEAS, pp. 185-201.
- Patomaki, Heikki (2001) *Democratizing Globalisation: The Leverage of the Tobin Tax*, London: Zed Books.
- Petra Kamarudin, Raja (2000) *When Time Stood Still*, no place of publication.
- Pura, Raphael (1997) 'Tough Talk by Mahathir Rattles Overseas Investors',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2 September.
- Rajah Rasiah (2001) 'Pre-Crisis Economic Weaknesse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Jomo K. S. (ed.) *Malaysian Eclipse: Economic Crisis and Recovery*, London: Zed Books, pp. 47-61.
- RAM (1997) 'Malaysia Inc. Falter', *Aliran Monthly*, Vol. 17, No. 7, pp. 2-7.
- K. J. Ratnam and R. S. Milne (1970) 'The 1969 Parliamentary Election in West Malaysia', *Pacific Affairs*, XLIII, 2 (Summer), pp. 203-26.
- Robison, Richard (1996) 'The Politics of Asian Values', *Pacific Review*, Vol. 9, No.3, pp. 309-27.
- Rodan, Garry and Hewison, Kevin (1996) 'A "Clash of Cultures" or Convergence of Political Ideology?', in Richard Robison (ed.) *Pathways to Asia: The Politics of Engagement*, St Leonards, New South Wales: Allen and Unwin, pp. 29-55.
- Sabri Zain (2000) *Face Off: A Malaysian Reformasi Diary (1998-1999)*, Singapore: BigO Books.
- Sachs, Jeffrey (1998) 'Global Capitalism', *The Economist*, 14 June, p. 19.
- Saludo, Richard and Shameen, Assif (1998) 'How Much Longer?', *Asiaweek*, pp. 36-44.

- Peter Searle (1999) *The Riddle of Malaysian Capitalism: Rent-seekers or Real Capitalists*, St Leonards, New South Wales: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 Unwin.
- Singh, Ajay (1999) 'The New Malay Dilemma', *Asiaweek*, 10 December, p. 34.
- Spaeth, Anthony (1997) 'Man in the Middle', *Time*, 6 October, pp. 16-22.
- _____ (1998) 'Broken Dreams', *Time*, 15 June, pp. 24-28.
- Suh, Sangwon and Shameen, Assif (1998) 'Battle of Wills', *Asiaweek*, 18 September, pp. 40-41, 44, 49.
- Suh, Sangwon, Ranawana, Arjuna and Oorjitham, Santha (1999) 'The Struggle Goes On', *Asiaweek*, 23 April, pp. 22-26.
- Tan Liok Ee [陈绿漪] (1997)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n Tat Wai [陈达怀] (2003) 'The Impact of the 1997 Financial Crisis on Malaysia's Corporate Sector and its Response', in Colin Barlow and Francis Loh Kok Wah (eds) *Malaysia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New Centur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p. 29-45.
- Thillainathan, R. (2003) 'Malaysia and the Asian Crisis: Lessons and Challenges', in Colin Barlow and Francis Loh Kok Wah (eds) *Malaysia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New Centur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p. 13-28.
- Toh Kin Woon [杜乾煥] (2003) 'Machang Bubuk: Changes in Voting Patterns, 1995-99', in Francis Loh and Johan Saravanamuttu (eds) *New Politics in Malaysia*, Singapore: ISEAS, pp. 141-57.
- Tripathi, Salil and Saywell, T. (1998) 'Out of Control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7 September, p. 52.
- Wain, Barry (1998) 'Why Doesn't Mahathir Bow Out?',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12-13 June.
- _____ (2000) 'The Doctor Divides Malaysia',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18 August.
- Zaharom Nain (2000) 'Hacks and Hussies', *Aliran Monthly*, Vol. 20, No. 1, pp. 2-5.
- Zainal Aznam Yusof, Awang Adek Husin, Ismail Alowi, Lim Chee Sing and Sukhdave Singh (1996) 'Financial Reform in Malaysia', in Gerard Caprio *et al* (eds) *Financial Reform: Theory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76-320.
- Zunar (2000) *Kerana Mu Hidup!*, Batu Caves, Selangor: Oneside Network.

IV.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liran Monthly,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week, Berita Harian, Business Times, The Economist, Fortun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arakah, harakahdaily.net, malaysiakini.com, Malaysian Business, The Nation (Bangkok), New Nation, New Straits Times, New Sunday Times, Newsweek, The Star, The Straits Times, The Sun, The Sunday Time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Time, Utusan Malaysia

好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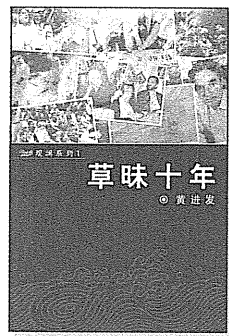
张景云 著《云无心，水长东》

作者张景云是《南洋商报》前总主笔，本书是他的一个同名专栏的文字结集；时值《南洋商报》首辟“南洋论坛”版，为本地华文报界首开先河，作文化观念之领航，此专栏即为论坛之强项。书中所收各篇，或剖析社会文化，或评介西方当代思潮，文字简练而寓意深远，可读性高，尤值得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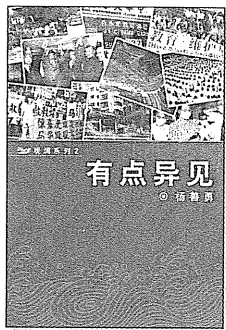
黄进发 著《草昧十年》

新生代健笔黄进发曾是《南洋商报·南洋论坛》时评专栏“因为我在乎”的作者、“全国华团诉求工委”执行秘书及“人民才是老板”运动发起人之一。针对爱国论、报恩论、新行动党、种族主义、西方人阴谋、大学生问政、马来西亚精神等等课题，作者都以多样化笔法及高强逻辑思维，层次分明地为读者一一解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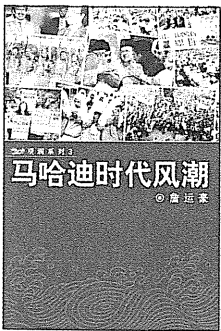
杨善勇 著《有点异见》

《有点异见》辑录的85篇时评侧重文教工程、媒体伦理、环境规范及政治显学四个领域，论述的议题则包括城市规划、义山搬迁、华小不足、马华党争、5·28事件、非典型肺炎、民选地方政府等等。关怀本土的执著，贯穿在作者的字里行间；不同的心事、心思和异见，配以史料的对照，反映了现实中政经文教各种不可思议的画面。



詹运豪 著《马哈迪时代风潮》

作者以其政治学养、简明写法，针砭在马哈迪威权及国阵政府主导下的弊端，包括政体失衡、政治失调、政策失宜及政党失责，并剖析在这个多元社会中隐现的种族极化、宗教狂热、文化隔膜与资讯堵塞等问题。所辑录的72篇时评撰写于马哈迪卸任前的最后三年期间，反映我国迈向后马哈迪时代这历史转折过程的时潮。



邮购书目

| 书名 | 作者 | 类别 | 定价(RM) | 出版 |
|------------------|------|-------|----------------------|------------------|
| 张景云书系 | | | | |
| 1 云无心，水长东 | 张景云 | 人文随笔 | 精装 45.00 平装 30.00 | 2001.9 2001.8 |
| 2 见素小品 | 张景云 | 抒情小品 | 18.00 | 2001.10 |
| 3 犬耳小品 | 张景云 | 思想小品 | | 编辑中 |
| 文苑系列 | | | | |
| 1 纯境可求 | 杨际光 | 散文随笔 | 18.00 | 2003.3 |
| 2 沉思者的叩门 | 沙 禽 | 诗集 | | 编辑中 |
| 方志丛书 | | | | |
| 1 槟榔屿华人史话 | 张少宽 | 地方史随笔 | 40.00 | 2002.9 |
| 观澜系列 | | | | |
| 1 草昧十年 | 黄进发 | 时事评论 | 23.00 | 2002.2 |
| 2 有点异见 | 杨善勇 | 时事评论 | 24.00 | 2003.12 |
| 3 马哈迪时代风潮 | 詹运豪 | 时事评论 | 24.00 | 2004.1 |
| 论述丛书 | | | | |
| 1 超越马哈迪 | 邱武德 | 政治论述 | 36.00 | 2004.4 |
| 飞脚丛书 | | | | |
| 1 报殇 (第二版) | 黄进发等 | 事件评论 | 15.00 | 2001.8 |
| 十方文库·评论系列 | | | | |
| 1 多元种族政治及其他 | 朱自存 | 政治评论 | 8.00 | 1990 |
| 7 面向权威 | 何启良 | 时事评论 | 16.00 | 1995 |
| 8 华人社会观察 | 林廷辉等 | 社经评论 | 12.00 | 1999 |
| 9 文化马华 | 何启良 | 文化评论 | 20.00 | 1999 |

邮购优惠 (至2004年12月止)

- 订购至少RM 60，可折扣20%，达RM 30则折扣15%。
- 邮购《云无心，水长东》精装本，可获作者（张景云）预先签名。
- 邮寄国内，免收邮寄费。（惟空邮东马每包须加邮寄费RM2.00）
- 外埠支票，免加银行费。

订购请志明中英文名、地址、电话/电邮。书款请以汇票或支票寄交：

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

Prometheus Enterprise Sdn. Bhd.
277 Jalan Desa Mesra, 58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邮: pe2@streamyx.com 传真: 03-798 00 310